

邛崃文史资料

第三十四辑

邛崃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2020年3月26日，四川省2020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主会场）在邛崃举行，主会场设在天邛高速（天府新区至邛崃）项目建设现场。省委书记彭清华宣布开工，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讲话，省领导范锐平、王宁、王铭晖、杨洪波，成都市领导罗强参加活动。



2020年9月8日，成都市首届天府大地艺术季在邛崃市开幕。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省委常委、省直机关工委书记曲木史哈，成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唐川平，成都市政协主席李仲彬等出席开幕式。



2020年1月28日，成都市政协副主席杨建德到邛崃市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工作人员



2020年12月10日，成都市政协副主席韩轶莅邛开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督导



2020年11月16日，市委书记王乾调研回澜塔片区、高铁片区规划设计和项目建设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忠，市政协主席欧俊波，市委副书记章建国参加调研。



2020年3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忠率队，先后前往成雅高铁邛崃站、平天大游客中心、夹关镇茶悦小镇、成名高速邛崃服务区等地，视察天府旅游名县创建工作。



2020年4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林率队，深入到成雅铁路邛崃站、城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2020年12月16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德彰率队，前往邛崃市绿色食品产业功能区、平乐镇，实地调研督查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2020年7月14日，市政协主席欧俊波带队走访调研我市白酒企业产业发展情况。



2020年6月15日，市委书记王乾走访调研政协工作，与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市政协主席欧俊波介绍了市政协工作情况和班子队伍情况。



2020年5月18日至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五届邛崃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邛崃市举行



2020年10月13日，市政协主席会议视察协商“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工作。市政协主席欧俊波，副主席杨彬、李显军、毛迪瑜、王萍参加。



2020年10月20日，市政协开展主席会议视察协商“建设人文宜居山水公园城市”工作 市政协主席欧俊波，副主席杨彬、郑继良、毛迪瑜、王萍参加。



2020年12月8日，市政协召开民主监督文旅三大创建工作评议会，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部分政协常委、委员，民主监督工作小组成员以及各委室负责人参加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杨敏到会通报情况。



2020年11月3日，市政协主席欧俊波在桑园镇向阳村调研乡村振兴工作情况，



2020年7月21日，市政协副主席杨彬带领民主监督小组部分成员对全市“十大民生工程”52件中的重点项目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民主监督。



2020年10月28日，市政协副主席郑继良带队调研二级场镇情况。



2020年7月30日—31日，市政协副主席李显军到文君街道、临邛街道进行民情“大走访”并调研川西民居保护情况。



2020年9月22日、9月25日，市政协副主席毛迪瑜率队开展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调研暨重点提案《关于加强邛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建议》的督办工作



2020年7月15日，市政协副主席王萍对“建设人文宜居山水公园城市”工作进行调研。



2020年7月21日，邛崃市2020年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天府新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功能区泉水湖湿地公园举行，成功签约云视科技裸眼3D及关联高科技产业项目、昕虹均体育成都国际足球产业示范园项目等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约145亿元。



2020年11月21日，2020年南宝山羌历新年庆祝活动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南宝山镇直台村羌寨举行。此次西南民族大学在南宝山挂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标志着该校与邛崃的合作迈出新的一步。



2020年11月29日，第五届中国社区治理论坛之公园城市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平行论坛在邛崃举行。本次论坛以“公园城市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为主题，由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指导，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主办。论坛期间，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等单位与邛崃市人民政府达成多项战略合作协议，为邛崃市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先行区提供路径和方法，推动公园城市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再上新台阶。



2020年7月28日—29日，2020年全省优质白酒产业振兴发展第二次推进会在邛崃召开。邛崃作为川酒重要产区之一，拥有成都市唯一的酒业园区。邛崃将聚焦邛酒价值提升，突出挖掘邛酒文化，重塑核心IP；并探索“林盘+酒庄”模式，打造邛酒主题街巷，丰富消费场景；同时创新运营模式，打造多功能产业平台，全力推进邛酒振兴。

目录

写在前面·久违的打量和端详 / 1

专题

- 陈先喆 陈泽恩 前尘往事话卧龙 / 5
王勤 “飞”来的桂山 / 15
傅尚志 桑园：舌尖上的那些事 / 24
杨辉祥 快速兴起的傅庵乡 / 34
樊安兴 百年“哈达镇”冉义 / 40
金成梦 花香包裹的孔明 / 50
袁国川 昔日鱼果之乡新安 / 57
何承洪 前身处于船形小岛的石头场 / 67
伍有兴 因泉水河涌流得名的乡镇 / 72
兰华荣 临济：茶果花香溢古道 / 79
陈映平 南君平的轶闻趣事 / 87
江万军 拱辰的风物与农事 / 95
王勤 观音、战斗或兴贤的题外话 / 103
杨辉祥 见证千年县城兴衰的油榨场 / 107
袁国川 偏居一隅的太和场 / 115
金成梦 探寻白鹤乡 / 123
何承洪 一直没赶场的西桥乡 / 129
屈千贵 高埂的“苦与甜” / 133
江万军 从下坝的历史遗存说开去 / 139
刘彬 因旅游而兴的天台 / 147

纪 事

- 胡立嘉 我参加筹建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始末（上） / 153
傅尚志 四十年前我的下派工作和生活 / 163
石 刚 《邛崃报》的前世今生 / 174
刘 彬 五彩广场诞生记 / 183
任 莹 邛崃电影院建造经过 / 192

特 稿

- 刘明丰 我的 1979 年对越作战回忆 / 199
周 灵 外公的大智慧 / 209
宁稚武 陈思华小传 / 218
王家荣 走出国门的临邛厨师刘开智 / 223

琐 忆

- 陈瑞生 且说邛崃二中 / 229
高义奎 记火井双童村小学 / 240
陈炽昌 陪马识途参观文君井 / 249
陈映平 我与第一代身份证 / 253

述 闻

- 陈叙言 1987 年，邛崃首次举办水上音乐会 / 259
周 灵 巴口香豆腐的来龙去脉 / 265
唐文迪 私立泉源小学溯源 / 270
王文才 铁夫韩永信 / 274

久违的打量和端详

邛崃的镇乡，改革开放后一度达到四十个。陆续调整和撤并中，大多数已成陌生称谓，或有待拾遗的谈资。耳熟能详的地名录，不知不觉翻过了一页。那些隐没无言的老地方，曾各有各的气象，各有各的蕴藏。踪迹深深浅浅不难寻觅，但简素的背影恍惚又模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辑文史资料专题是去年的增容，着眼田野调查方法，给静候添加与完善的档案做个小结。

说起来仿佛沧海桑田，整理、撰写和呈现并非易事，还原更困难重重。扩大涉及范围、找到更多支撑点成为硬道理，比如集市缘起、建筑风貌、格局流变、助学兴教和多种经营等，当然还有亲切的农事。其间底细、掌故乃至秘闻，都可作为不同成分的注解。请益善摆龙门阵的长者，显得尤为重要。脱口而出的答客问，是一种唤起。集体记忆的质朴轮廓，相似度虽参差，且多岔路相随，却也弥补猜测的缺陷。恍若隔世中，耙梳地理、物象和传统，谁又能忍住感慨？好在笔下有诚意，浮涌于时间长河的东鳞西爪，总为有心人存留着，就看我们会不会打捞。

对成都而言，邛崃就是基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当回望和反观。诠释昨天，是为了珍惜

今朝，憧憬未来。凭借行脚丈量的素材，或聚焦一处兼顾其余，或仔细推敲刨根问底。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探究的成因，使乡愁何指的大哉问凸现出来。访址溯源也好，目击此在也罢，山丘坝一时闪到眼前。旧人，旧事，旧景况，纠结又忐忑，全靠过滤与挑选。消失年代不同，发掘方式自然迥异，端看视野、侧重和认知。篇目引导笔墨，成就备忘标本。而文稿的铺陈策略，图像的写照佐证，都不外时过境迁的深美。

历史踱着方步渐行渐远。从前年光，再怎样追挽也无法倒回。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一束怀旧之作，也没打算留恋缠绕。扫描与排查，分属于察看和审视，传递的信息真实确切。吾乡吾土吾父老，农耕时代的基本特征飞絮般飘散之际，一些东西仍未逝去，犹有再次发现的空间，比如积淀着悠久历史的地域元素，承载了昔日欢欣的赶场活动，以及生涯寻常的情感认同，等等。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尚能伫立岁月另一端，与不再提起的行政区划在文字和老照片里重逢。

(陈瑞生)

专题

南宝乡原名新民乡，取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之意。1952年从火井乡分出，由盐井、金甲、茶板、大葫、秋园、龙洞等七个村组成。1958年改为新民公社。1980年地名普查时因与地区内公社同名，改为南宝公社。图为1969年新民公社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季康泉提供）



前尘往事话卧龙

陈先喆 陈泽恩

临邛过了南桥，有两个分别以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字和号命名的乡镇，即孔明乡和卧龙镇。2019年底邛崃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两个乡镇统一合并为孔明街道办事处，卧龙镇之名从建制上消失。作为南方丝绸之路门户的卧龙场，自明末清初移民来此落户开始，历朝历代多个姓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耕读传家，成就了几姓旺族，在经济、文化诸方面有丰富的创造和积累。

地理人文

卧龙场的得名，传说和诸葛亮有很大关系。一为诸葛亮曾屯兵卧龙，过去叫卧龙营。二为诸葛亮从此经过，南征西南夷，时人缅怀武侯功德，故名。另外，也有说因地势如一条潜渊之龙，周边以龙为名的寺庙较多。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杨子元撰蒲江《乡土地理读本》中有《卧龙场记》如下：

卧龙场接壤临邛。上场隶邛崃，下场隶蒲江。蜀藏往还必经之区。驿路飞花，冠盖横纵，吾蒲北境繁华地也。环场隶蒲者，二百九十二户，学校一，祠庙三，节孝坊一，为处士陈国琼之妻高氏立。场

之外，茂林修竹间，枫树千霄，红衣晒晴，沙明水净，香稻连阡，陈家坝也，前清八股时代，积学名儒，都毓其间。有领袖蟾宫者，陈兆颺；有会课京师，作第一人者，陈家镇。弔前哲故墟，山阳笛空，黄公鉅杳，感慨久之，出郊坰，渔舟唱晚，金乌西矣，停駒四顾，江上峰青。

二百字左右的短文生动呈现了一百多年前卧龙场的地理、人文风物，信息量很大。一是过去卧龙场两县共治，上场归邛崃管，下场归蒲江管；二是卧龙场为交通枢纽，进藏必经之地；三是场上有私立和鸣小学（后转为公办），有陈氏宗祠、城隍庙和关帝庙，有宏大精美的陈高氏节孝石牌坊一座，原照片为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是英国人威尔逊 1908 年从汉源回成都，路经卧龙场所拍，刊登于当时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陈瑞生先生经过大量调查走访，为此专题撰写了近万字的文章发表于《新邛崃》2013 年第 3 期)；四是卧龙场一带植被良好，常有野兽出没，加之青山绿水，红叶遍野，渔舟唱晚，风光颇为秀美；五是以陈家坝为代表的耕读世家，使卧龙场不仅稻香扑鼻，而且书香溢屋。

卧龙街长约三百余米，因势而建于一微凸山埂上，西北端稍高是



1908年8月10日，世界著名植物学家、英国人威尔逊途经卧龙场时拍摄的陈氏家族牌坊。

龙头，东南端稍低是龙尾，近百户街房分两列一字排开。街上除祠庙外，戏台、竹木市、猪羊市、牛马市等一应俱全。街周边皆为常年不涸的冬水田，如蛟龙出水，象征兴旺发达之兆。

卧龙场虽为小场镇，却位处雅安、乐山、成都三地交通之咽喉，东来的盐、糖、丝绸、百货，西来的药材、花椒，南来的蒲江梨、夹江纸，北来的茶、酒、陶瓷、竹、麻窝子草鞋等大量货物从此地流进流出，行商出门上路，每天行程一般安排在六七十里，务求一程接一程，一站接一站。站口条件相对好的，行程皆有固定安排。卧龙的茶马古道，足迹可觅，名称可稽。邛崃一中退休教师陈先喆幼时，其六伯曾指示于他，离场南行二里许，正对陈楼房后墙四十米左右一山坡，人呼马道子，此坡较平缓，宜骡马上下，沿此道延伸通往西南夷。

卧龙场过去的大姓首数陈家，其中一支以贩盐兴家后，在乾隆年间又抓住机遇，转而经营客栈，所谓“乱世盐赚，太平栈赚”。陈家客栈号大兴店，按邛州城中等偏上标准客栈而建，地址紧邻街中段的陈



因处于茶马古道要冲，民国时期许多小场镇的功能都差不多，
竹木市、猪羊市、牛马市等一应俱全。



川西茶马古道上的一座寻常客栈，与卧龙场的陈家大兴店没有什么两样。

祠堂。栈门内长廊大厅宽敞、明亮，除供商贾堆存货物外，尚有足够的空间供客人喝茶、休息。大厅两边是客房，计有十间、二十多个铺位。上厢房四间紧邻大厅，铺设了厚厚的木地板，雕花门窗，陈设雅致，供有一定身份的商贾、官员歇息。此外，客栈还另修了两间绣楼房，专门安顿客人的女眷。

大兴店开业后商客纷至沓来，陈家店主重德尚礼，视客人为亲人，让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有客潘志福偶染风寒，店主立即外出请医，亲手煎药，服侍客人十多日，令潘难忘，并和陈家店主结下了终身友谊。眼看大兴店生意日降，旁人也争相效仿，一年内在这条三百米长的街上客栈就增至五家，其中有两家兼住骡马。

商客、马帮择卧龙歇住还有一重要缘由，就是此地特别安全，街上每晚有专人打更巡逻，三更过后场头、场尾两道棚子门即完全关闭，有点森严壁垒、与世隔绝的味道。

由于人气聚集，卧龙场昼夜都相当热闹，各行各业随之兴盛，如制造染水、手工染布也是卧龙一枝独秀，来此贩运染水及染布的商客众多，尤以徐染房规模为最，有八个大池，旧址至今仍存。

卧龙各姓均注重耕读传家之风，文化底子较深，故街上的店招取

名亦雅，如药店叫“寿尔康”、糖果店叫“蔗境鲜”等等，皆不落俗套，稍有身份之家均有书画张挂于室。

各种文娱活动也多，茶馆里，听说书的，听川剧的，场场爆满。庙会期和农历大年，唱戏的一唱就是几天。黄记客栈灯箱上有一副对联“夜漏商旅至，灯残马帮来”便是卧龙场当时货物成流、商贾云集繁荣景象的生动写照。

民国时期，李家钰旅曾驻卧龙场一带，李将军的一个女婿为陈家人，故旅部就自然设在卧龙大兴店，卧龙和陈家的大兴店因此更为乡人津津乐道。

和鸣小学

一张拍摄于 1941 年秋季的老照片，为我们揭开了卧龙场鲜为人知的办学历史。照片为卧龙陈氏创办的和鸣小学高级第一班毕业照。陈氏和鸣小学，是邛崃、蒲江两县最早的私立新学之一，后改为公立卧龙中心学校。照片有师生、学校董事会成员、乡绅和小孩共四十人，照片上还有陈思华题记，以及陈怀珍于 1945 年将照片精心粘贴于帛纸并手书的跋。

陈思华于照片题记：

此照吾乡卧龙中心学校高级第一班，于辛巳七月毕业时所摄者也。中心校盖由和鸣小学校董会，议谋另建中学，呈交政府改组而成。照上诸生曾肄业和小。高级两期者当兹毕业。偶题记之。噫！吾有自贡之役矣，中学之成，则有仰望于今日同座诸公者。思华陈璧先谨识。（陈印）（考：辛巳七月当为民国三十年七月，即 1941 年 8 月至 9 月间）

陈怀珍于照片题跋：

吾乡中心校，即族立和小之化身也。和小又胡为乎高蝉退哉？盖欲另谋发展也。予助教和小者期年，讲贯中心校者半载。虽不克与诸



卧龙和鸣小学（后改为卧龙中心小学）高级第一班毕业照。（陈炜提供）

生同终始，然授憑之日，予亦幸而参与其间。对于第一班生徒，亦可谓视其生，视其长，视其成立分合。校方印赠此影，论其终，视为中心校生徒观之，可已（以）溯其始；视为和小生徒观之，又何尝不可哉！胜利年怀珍题（陈怀珍印）（考：款署胜利年，当为1945年9月至12月间。“8·15”以后方可作胜利年）

老照片让陈氏家族耕读传家、开设私塾、兴办新式小学并最终转入公办学校的事迹鲜活、丰满起来，为邛崃教育史提供了珍贵的图文资料。

卧龙陈氏家族为明末始祖陈奇风（字和鸣）“率家宦籍入川”，避乱于洪雅钟宝寺。清初始祖妣赵氏携子陈芳毓于邛蒲接壤买业为生。后人繁衍发展，主要分布在邛崃卧龙镇、蒲江复兴乡等地。陈氏祖先极为重视教化之功，清乾隆年间，陈氏族人就在卧龙场建立了陈氏宗祠，广设私塾，力倡圣贤之教。感于此，清代邛州知州杨潮观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特为陈氏宗祠题匾“元龙胜概”。

即使在抗战期间，面对社会动荡和家族财力衰退，陈氏家族对教育的坚持与投入也并没有中断。据和鸣小学毕业的陈先忠、陈先喆记述，1936年，族人鉴于西学东渐、原以科举为目标的私塾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官学未办，便在卧龙场街中段陈氏宗祠内开办了

和鸣初级小学。1939年清明会上又商议筹资自主创办完全小学，乡坤陈少甫、国民革命军36集团军第47军104师少将旅长李家钰女婿陈肇鑑等，每年捐助黄谷40石为资，不足部分从祠堂公田中提取补充。由陈思华任小学董事长，陈士珩任校长，陈怀珍任教导主任，教师有陈明星、李炳荣、李炳生和陈肇俊、陈肇敏两姐妹，师资配备在当时条件下是比较强的。和鸣小学择优招收陈姓子弟和当地外姓子弟入学，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全部免费就读。1939年秋即开学，三年后转入公办。

和鸣小学及后来卧龙中心学校开设的学科有语文、算术、地理、历史、自然、公民。学科开设颇得风气之先。在教育观念上一以贯之“忠、孝、严”三个字。

“忠”在当时主要内容体现为抗日救国，每周周会上学校组织宣传抗战形势及抗日精神，陈思华亲自教师生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抗日救亡歌曲，讲述国仇家恨。学校还组织学生步行到桑园机场参观，师生们自编自演抗日剧目到各处义演。教师李炳荣深受影响，毅然投笔从戎，走上战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七十二军军部通信兵营服役直至日本战败投降。为了不打内战，他解甲归田。2015年，李炳荣获得国家颁发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勋章。

“孝”的教育是和鸣小学又一大特点。作为族立学校，新生入学或每期开学，均要在正殿内祖宗灵牌前行叩拜礼，正殿也用作学校礼堂，在每年清明会上，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讲述祖先事迹，阐释“重王章、力耕作、勤诵读、尚节俭、专本业、戒酗酒、戒淫乱”的具体家规。学校也在这一天，组织学生到陈大坟园祭祖扫墓，踏春郊游。平时族中对不孝子孙的家法处置也在祠堂中行使，学生耳濡目染，“孝”的种子悄然落地生根。

“严”就是要求学生品学兼优，如有违反校规家训的言行，老师会给予十分严厉的批评教育。对学业也抓得很紧，每周都有一个周试，周试成绩出来，星期六便组织评讲兑现。所谓兑现，就是以60分为

及格线，对优秀者予以表扬，不及格者，差一分用板子打一板子手掌心，打来凑够 60 分。打板子执行者一般是陈怀珍或陈明星，下手毫不留情，“数量够，成色足”。以现代观念看，这种体罚学生的行为是禁止的，但当时确为教育中普遍认可和采用的方式——“黄荆条下出好人”是当时人们的信条。

时光的流逝，冲走了、冲淡了人事的记忆，照片中许多人已无法考证和指认，但无论是学生、教师、乡坤，即便是幼儿，个个都身姿挺拔，正气凛然，充满向上和希望的力量。和鸣小学及转办后的卧龙中心小学虽如流星划过天际，却闪耀出一道光芒，先贤们不仅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更把家国情怀的薪火传承了下来。

墨香酒事

作为一个传统的耕读世家，卧龙陈氏文士武将迭出，清代《陈氏功名簿》载入名册之文武功名者甚众。在传统教育中，书法作为一门必修课更受到重视与推崇。

到了近现代，陈氏家族研习书法之风仍然很浓，屈指数来，擅长柳体如陈鲁康，对隶书颇有心得者似陈栋材，行书出色者数陈世珩，而以擅书颜体享美名的就是陈思华了。据《邛崃文史资料》第八辑魏尧西记述：“民国癸未端午，蔡月崖发起‘诗人节’纪念屈原之活动，屈原画像乃顾隽卿杰作，屈原作披发行吟状，富有罗两峰的笔趣，临溪河上人陈思华用龙门二十品笔法题曰‘屈原画像’，二者可谓相得益彰。大会由县中耆老巫鉴三主持，月崖讲述屈原生平事迹。余兴，齐到里仁街杜姓小食吃粽子。”又如，卧龙场昆荣茶馆新开张，邻里乡亲抬来一道长两米、宽一米的上好大木匾庆贺，恭请陈思华题匾。由于事前准备不足，人请到了，却无合适的大毛笔。陈思华见众人面露窘色，淡然一笑，说了声“找棉花来”。其中一人跑进房间扯下棉絮一团。陈思华接过棉花，扯松调匀裹成棉花团。只看其右手指夹住棉

花团伸入墨砚中饱蘸墨汁，便在木匾上开始运“笔”走墨。只听得棉花团在木匾上发出行云流水之声，看得大家目瞪口呆，不敢眨一下眼。一会儿功夫，“润屋润身”四个庄严雄浑的大字便一气呵成。接着，他用指书落了上下款，令在场的人大开眼界。

这一道匾主人速即请来最好的木雕工匠，镌刻上金后，高悬于茶馆门楣的上方。每每有外来客人，陪伴其行的当地人总会指着这道匾，向他们讲述这一段墨香传奇。

卧龙地处交通咽喉，南来北往的货物均要从此地过往，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邛崃一处重要的陆路码头。新中国成立前，场上堂口很多，赶脚的客商、各地袍哥、当地乡坤各色人等汇集于此，故客栈、茶馆、酒店开的也多。卧龙街上、场头场尾、大路旁、牌坊边、大树下各色酒店、酒馆、酒楼有大小十余家，大缸小罐、大壶小瓶的酒堆满橱柜，酒的产地多为邛崃本地烧坊酿制，也有绵竹、泸州产的，琳琅满目，酒香扑鼻。

为了让人容易识别，场上的酒文化气氛也颇浓，有的在门柱上书“闻香下马，不醉无归”的招贴，有的在堂壁上题“酒逢知己饮，诗



现在的卧龙街。（陈炜提供）

向会人吟”的名句，有的路边酒摊干脆就只挂一个“酒”的幌子。陈氏国字辈陈建洪开的建洪酒店、先字辈陈仲远开的仲远酒楼位处正街黄金口岸，两家均是老字号，店主经营有方，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酒保也伶牙俐齿，心灵腿快，是有身份和来头之人饮酒必到之处。

每年秋收一过，场上的酒家便迎来旺季，酒友聚会，划拳行令，知己小酌，煞是热闹。酒店下酒菜冷盘如卤猪肉、香肠腊肉、油酥花生米、渍葫豆、糖醋豌豆、凉拌豇豆等，当然还有红锅小炒、砂锅炖萝卜等。一般人进店主要以饮酒为主，菜品供佐酒之需即可。每当人们酒酣耳热之际，便有人大讲小讲起文君当垆、李白醉酒、武松打虎等趣闻逸事。有饮得尽兴者，一偏一倒出得店门，已是星星点灯、夜深人静的时辰了。

由于场上来往之人鱼龙混杂，酒喝高了惹是生非之事时有发生。故望族对子弟饮酒之事甚为警惕，《陈氏家训》专门有一条就是“戒酗酒……可少哉，然但以为祭祀燕享之资，而特不可沉溺其中”。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张佳益提供)

“飞”来的桂山

王勤

桂山位于邛崃城东南部，1980年底，公社面积为33.79平方公里，人口9605人，其中非农人口6人，均为汉族。全公社共分八个大队，51个生产队，公社驻地乌龟山距邛崃城约30公里，在新（津）蒲（江）公路左侧。

桂山公社于1979年7月，由牟礼公社（原红光公社）划出三个大队和回龙公社划出五个大队组成。全公社均是蒲江河和南河以南地区，长丘山丘陵地带。桂山公社以取驻地乌龟山“龟山”二字谐音得名。

桂山公社北依回龙公社和牟礼公社，西与蒲江县五星公社交界，东与新津县永兴公社相连，南与彭山县保胜公社和眉山县将军公社接壤。境内属于丘陵地带，最高海拔617米，最低海拔455米，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为16℃左右，无霜期达9个月。全公社分为粘土、沙土两种，其中粘土占85%，沙土分布在顺河一带的三个大队，土壤比较肥沃。

分分合合的社乡

桂山最早不叫桂山，1952年至1958年间，桂山叫五星乡，乡政府驻地在五员村的千佛寺，书记谢华章，乡长徐桂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桂山最早的乡镇建制。1958年底被合并到回龙直至1979年7月。



1982年7月，桂山公社农技员在八大九队查看玉米生长情况。

对回龙来说，桂山犹如从天而降，凭空飞来一块版图，这应是桂山的第一“飞”。

1979年之后的桂山版图原属回龙公社和红光公社（今牟礼）管辖，位于长丘山脉中段，全是山地丘陵，与回龙公社隔蒲江河一衣带水，与红光公社隔南河相望。上有回龙大桥相连，下有红光蔡渡渡船相通。桂山地处邛崃、新津、彭山、眉山、蒲江五县交界处，中国有“鸡鸣三省”的形容，邛崃则有“一脚踩五县”的实地。桂山人赶场大都到邛崃的回龙、新津的永兴、彭山的保胜、眉山的将军庙和蒲江的五星场，相比之下红光公社较远，去的人相对少些。

由于桂山属山地丘陵，而隔河相望的回龙、红光属川西平原，虽然只隔一条河，气温还是有明显的差别，造成农作物的播种和成熟都晚了一个星期，不利于生产的统一指挥。当时是李克耻任邛崃县委书记，为了便于生产管理，邛崃县委多次向温江专区提出申请，要求把回龙、红光两个公社的山区划出去组成一个公社。终于在1979年7



1984年12月，位于龟山的桂山乡政府办公驻地。

月，回龙划出蒲江河以南山区的11、12、13、14、15五个大队，红光划出南河以南16、17、18三个大队，共八大队组建了桂山公社，袁俊德为第一任书记。

桂山公社办公驻地选在乌龟山旁，有人提议就以龟山命名，县委书记李克耻说龟山二字不好听，干脆用其谐音曰桂山。就这样，桂山公社成立了，成为了独立的机构，“飞”了回去。1982年1月撤社建乡，成立桂山乡人民政府。

到了1992年，桂山被合并到回龙镇，又“飞”到了回龙的怀抱。这样一来，把原红光公社的三个大队也一同带到回龙这边来了，等于“飞”来了三个大队的面积，回龙的版图在无意间就扩大了。桂山就这样“飞”过来“飞”过去地合了分，分了合，被人们戏称为“‘飞’来‘飞’去的桂山”。

贫穷落后的方

“飞”来“飞”去的桂山当时的生产生活和经济状况又怎么样呢？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桂山不仅非常落后，而且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血吸虫病的唯一宿主（传播源）是钉螺，那时的桂山遍山遍沟都是钉螺，连树枝上、野草上都爬满了钉螺，就更不用说水沟边水田里了，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桂山有一半以上的人得了血吸虫病。桂山的血吸虫病严重程度震惊全省乃至全国。据时任村大队会计兼团支书的汪怀金老人讲，县委书记柴景山组织县机关、各公社、中学学生三万余人在桂山参加长丘山灭螺会战，可见桂山当时的血吸虫病有多严重，到处都可以见到骨瘦如柴而又肚大如水桶的血吸虫病患者，脸色惨白，毫无血色，相当可怕。

那时的桂山，除了病害、贫穷，还特别缺水，别说是旱季，就算雨季来了也保不住用水量。回龙坝上的人都笑桂山人没水吃，喝的是牛脚板凼凼里的青蛙尿。

汪怀金回忆说，1981年，全邛崃的社乡都增产增收，桂山是唯一一个减产的，这主要是水源短缺造成的。为了解决吃水用水问题，桂山把大量的坡地改为梯田，把旱地改为水田。后来，汪怀金到成都开会，巧遇当时的成都市水电局长焦自励。焦局长听了汪怀金的讲述后，经过研究，给桂山批了20万元资金用于水电建设。接着，邛崃县也拔了一些款，在小小的桂山乡建起了60多个提灌站，修了100多个堵水坝。雨季一来，水被蓄在100多个小水库、大水塘中，桂山就能积蓄很多水资源了，地下水也随之丰富起来。以前打十几米深的井也打不出水，自从修了堵水坝后，往下挖几米深就能挖出一汪汪水。那时桂山人还有一个口号：“家家有鱼塘，户户种果树。”汪怀金认为有鱼塘有果树，这才像桂山人。

多种经营的兴起

1979年8月，桂山开始组建领导班子，9月初在回龙上场口社办茶馆开第一次筹备会，有袁俊德和农技员张元安等7人参加。

桂山公社刚建制时，什么企业也没有。据时任桂山主管社队企业的副乡长乔光福回忆，他 1980 年元月调任桂山公社办公室主任，当时建了一个白酒厂，1981 年底建了一个 14 孔门的机砖厂，年产 400 多万块砖，60 多名工人，工资 20 元一个月。由于当时各地都有传统砖瓦窑，人们还是比较青睐青砖青瓦，机砖厂的红砖红瓦还没有被普遍认可，所以一直都是亏本生产。但是，桂山最丰富的资源就是高岭土和页岩，这是桂山搞活经济最大的本钱，所以亏本也要生产，而且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后来，又建了民兵砖厂、康龙砖厂等。

乔光福回忆说，他 1982 年任副乡长，主管社队企业。当时，桂山唯一的白酒厂由于经营不善，已经关闭半年多了，适逢国家银根紧缩，贷不到款，想把酒厂运转起来谈何容易。经乡上

多方努力，县计经委才开了个贷款 4 万元的口子。他们把 4 万元用于扩建酒厂，酒厂建好了却又无米下锅，没钱买粮食同样也开不了工啊。那时的粮食市场还未完全放开，大吨位买卖只能通过粮站。酒厂修好了又无粮食烤酒，乔乡长等人心急如焚，找邛崃粮食局，找新津粮食局，找蒲江粮食局都未成功。最后，又返回羊安粮站，经双方协商，达成联办酒厂的协议，在羊安粮站赊了 20 万斤碎米，这才把局面打开。又与五粮液酒厂取得联系，生产的酒交到五粮液酒厂。1983 年，酒厂承包给了战斗乡的刘建康。

说起桂山乡，始终绕不开机砖厂。一直在桂山工作的汪怀金老人回忆，桂山有许多高岭土（白鳝泥），非常适合烧砖。于是 1981 年底，



桂山有丰富的页岩资源，生产页岩砖的厂就有好几家。

在一大队的汪大坟园，将原有的一个土窑子改为机砖厂，1982年投产。后来，经省里有关专家考证，桂山有丰富的页岩资源，页岩砖比粘土砖成本底，而且抗压抗冲击都优于粘土砖。1984年，由时任桂山乡武装部长的陈志军负责指挥，修建了民兵砖厂，汪水仙、叶仲良分任正副厂长。后来承包给了一位蒲江老板，一年后又转包给了回龙的人，于1988年关闭。

修建民兵砖厂的同时，在柏杨村（顾坟园）也建了一个机砖厂，羊安的张学民调任厂长。1992年，桂山合并到回龙时，有位台商想买砖厂，最后还是卖给了桂山当地人，至今生意兴隆。

桂山建砖厂，投资最大。也最费周折的要数康龙砖厂（现腾龙砖厂）。据汪怀金回忆，1991年上半年就开始筹备建厂，先是到省国土局批土地，土地批下来了，可资金又是大问题，靠桂山自己的财力物力是办不到的。于是，汪怀金就带领一干人四处融资，八方求人，找了不少成都的单位和大老板，来回谈了几个月，最后都因无法满足对方开出的条件而告吹。后来又通过各种渠道，找台商，找港商，又谈了几十家，就这样找来找去，谈来谈去，几个月又过去了，乡政府的一干人都跑得精疲力竭，用他们的话说叫“脚杆蹿断，嘴巴说干”。很



栽桑养蚕，
是桂山农
民增收致
富的又一
途径。

多人都失去了信心，甚至有人提议放弃这个项目。可是，好不容易才从省上批下来的土地指标，不能就这样白白浪费掉啊，“我硬是不死心。”汪怀金说。

正当大家心灰意冷而又不愿服输的时候，汪怀金他们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羊安加油站的曹武林。曹武林在甘孜州有关系，经他两边撮合，甘孜州委办公室主任带队，过来了考察团，洽谈相当顺利。邛崃县委书记何琼英出面洽谈，很快达成协议，出资方主要为甘孜州，桂山以 20% 资金和土地入股，成立了康龙砖厂，大家都说四处去绕了一圈，台商港商都搞不成，最后与甘孜搞成，真是瞌睡碰到枕头，合作办厂终于成功。

砖厂于 1992 年 12 月开始动工，1993 年 6 月出砖，总投资一千多万，年产确保一亿块砖。别说当年，就是今天，一千多万也算得上天文数字。汪怀金说这是他们最艰难的谈判，前前后后共谈了 60 多家，真是艰辛！

如今，桂山的支柱产业仍然是机砖厂，尚有腾龙砖厂、榆树砖厂、宏林砖厂、富华砖业、鹏强新型建材、红汇建材、八方建材、新欣新型墙体材料、万兴页岩砖厂等企业生产红火。

一条公路的插曲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桂山虽然建了社乡，但地处山区，医院、学校、面厂、农机站、大礼堂等等皆依山而建，地盘相当狭窄。

蒲江到成都的公路从此经过，公路两边稀稀拉拉地修起了十来栋火砖楼房，开起了小卖部、自行车修理店、理发店、饭馆等，90 年代末期还有不少休闲场所。当时，桂山有几家比较兴旺的饭馆，最有名气的当数王家饭店和二姐饭店。

二姐饭店是个二十来岁的女老板，名叫张小琴，在家排行老二。

桂山是蒲江到新津、成都的必经之地，往返的货车司机、小车司

机比较多。特别是蒲江驻军二十七团的官兵也常在此吃饭，军车排了一里多路。饭店里的各种炒菜、凉菜、卤菜还有河鱼都非常好吃，最出名的魔芋烧鸭子，到现在回忆起来大家都要啧嘴巴。加之从不乱收费，这里就成了吃饭的最佳地方。特别是老板张小琴，人称张老二或张二姐，年轻漂亮而又大气直率，逢客敬三杯。你一进饭店，她欢乐的哈哈声就把你感染了，掺茶倒水，招呼应酬，满心欢喜一连声的哈哈。凭着饭菜质量，以及开朗的笑容和性格，她的饭店生意越来越火，几乎成了这条路上最红火的饭店，很多回头客并非只是一顿两顿、三月五月的照顾她的生意，有不少人一吃就是一二十年，有这么铁的粉丝，二姐饭店生意兴隆就可想而知了。如今，说到桂山的过往与热闹，这二姐饭店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二姐饭店现在叫大姐饭店，由张小琴大姐夫妻二人经营，煎、炒、烹、炸、烧样样拿手。

真实存在的故事

桂山还是著名川剧《上游庵》和《下游庵》的故事发源地，《下游庵》又名《盘贞认母》、《庵堂认母》。

桂山曾经有个法华寺，香火旺盛，几十里远的香客都要翻山越岭而来。

有句民谣叫：“圆觉对法华，金銀在胯胯下。”一听这民谣，自然就会想起张献忠彭山江口沉银的传说“石牛对石鼓，黄金万万五”。如今，这传说成了现实。那么，“圆觉对法华”的“胯胯”又指何处呢？也许永远都是一个迷，而川剧《庵堂认母》的故事应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从现在的回龙新大桥上山，往成雅高速出口方向三里许，古时有个尼姑庵叫法华寺。

明朝时，宦门子弟申贵生游玩法华寺，与女尼王志贞一见钟情，不久申贵死于庵中，王志贞产下一遗腹子，徐姓知府怜其身在佛

门，收养了这个遗腹子，改名徐元宰。

徐元宰天性聪颖，得中解元之后，始知母亲是庵中女尼，乃借游览为名，前往法华寺寻访。他想尽办法盘问女尼王志贞，王志贞恐碍儿子前程，不愿相认。经徐元宰苦苦哀求，并拿出父亲遗物玉蜻蜓和生父遗像，母亲才不得不相认。

《上游庵》与《下游庵》为两个折子戏。《上游庵》讲徐元宰父母在寺庙男欢女爱的缠绵故事，因男有轻薄之举，女有不守妇道不守清规之实，此剧对回龙（桂山）人是一种笑话与讽刺。《下游庵》讲徐元宰庵堂认母的故事，讲亲情讲孝道。所以，历来在回龙镇唱川剧都只唱《下游庵》而不唱《上游庵》，故事发生在回龙镇的寺庙里，这是给回龙人一个面子，也算是一种尊重吧。

桂山曾经有许多寺庙，法华寺早已被毁，千佛寺也是空有其名。如今，唯有紧邻新津永兴场的兴隆寺还梵音不绝，钟磬声声。

如今，桂山早已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成雅高速从桂山贯穿而过，众多机砖厂生意兴隆，厂区内的洁净如新，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黑烟与尘土，是真正的环保工厂。

从前的荒山荒坡也已是大片大片的果园，水库、鱼塘比比皆是，水泥路像一条条灰色带子，舞动在桂山的村村寨寨、沟沟坎坎，生态农业、生态林业蒸蒸日上，用水早已不是问题。

桂山，桂山，到处都是绿水青山，到处都是金山银山。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桑园：舌尖上的那些事

傅尚志

1980年下半年至1983年，我在桑园公社（乡）工作了三年多时间。虽然至今已过去了37年，但一些往事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往事虽小且杂，但可以窥见那个年代一些层面的风貌。回忆陈述如下，既备忘怀，又与大家分享。

桑树成园得美名

代代先人口口相传，现在的桑园场，原是一片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桑树园。场上场外的居民农户，在房前屋后、路旁道边广种桑树，成为四方八镇称颂的特色景观。

全乡桑蚕业兴旺发达，场上专设了桑叶市场，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繁荣，促进了蚕桑持续发展。

清末民初统治反动，政权腐败，国运衰败，百业凋零。桑园蚕桑几近销声匿迹。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邛崃组建了蚕丝绸公司，办起了真丝针织厂、丝绸厂等企业，各种丝绸产品畅销国内外。桑园随着全县蚕丝业的蓬勃兴起，枯木逢春。县上给乡，乡给村、组和农户下达了一次又一次栽桑养蚕的任务，使蚕桑迅猛发展。我在县科委工作期

间，经过调研，写了一篇征文《杨学义“了不得”》，反应宝林乡专业户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栽桑养蚕致富，参加国家《科技日报》等单位主办的征文比赛。文章被收入专集《科技示范户百例》，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发行。

十几年后，世界经济危机不断，蚕丝及产品出口年年减少，加之人民群众消费习惯的变化，蚕桑业也由盛而衰。现在，只有零零星星的桑树依然顽强地生长在山乡与田坝。

蚕桑百年兴衰，但桑园美名却依然镌刻在方志史籍，熠熠生辉。

由于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原因，党和政府为了加强区域管理，推动生产建设，总是不断调整乡村区划。

邛崃自 1949 年 12 月 19 日解放以来的 70 多年间，对乡村进行了多次调整。所辖乡镇数量几经变化，由 1950 年代的 47 个乡、2 个镇到人民公社后期（1979 年）40 个乡、3 个镇，到撤乡合镇和撤县设市



桑园乡的桑蚕业一度兴旺发达，场上场外的居民农户在房前屋后、田埂路旁广种桑树，成为四方八镇称颂的特色景观。（谢永江提供）

(1996年6月6日)的18个乡、15个镇,到2004年的18个镇、6个乡,再到2019年底的8个镇、6个街道。

在不断调整乡村区划的历史进程中,桑园也顺势而动。称谓由桑园乡变为桑园人民公社(1958年—1980年),再由桑园人民公社改回桑园乡(1980年11月),再由桑园乡改为桑园镇(1986年至今),辖区面积几经增减。1951年,原属西禅乡(后称茶园乡)的陈河坝划归桑园乡群力村(后称叶河村)。1955年5月,桑园、君平合并,称桑园乡,面积扩大。1958年10月后,将乡属中田村划归国营桑园农场。1962年3月,桑园、君平分置,原划给国营农场的中田村回归桑园乡。2004年9月,将1980年改名为南君平公社的君平乡并入桑园镇。2019年底,茶园乡和原大同乡部分村一起并入桑园镇。至此,全镇区划面积猛增,成为邛崃市北面兼有4个乡场的大镇。

食堂礼堂待贵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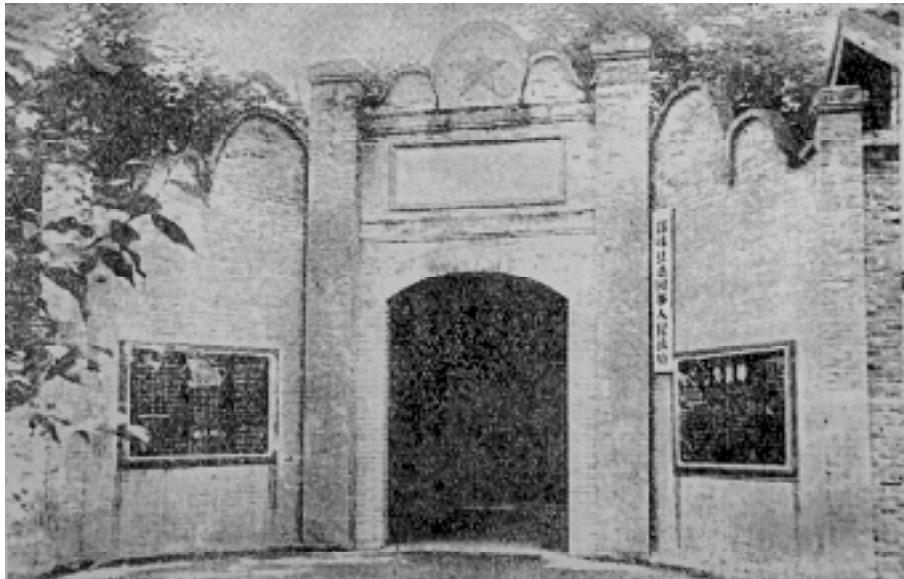
人们叫了多年的公社食堂,自1980年秋开始,随着桑园人民公社率先在全县试点“社改乡”工作的展开,干部群众逐渐改称“政府机关食堂”“乡政府食堂”“政府食堂”。

当年的桑园乡政府,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但不同于传统的全为砖瓦平房的四合院,而是有砖木结构、青瓦盖顶的两排两层楼房、两排平房,是一座亚类型的四合院。

坐北朝南向着大院大门的一排楼房,楼上两端是一间可容十几二十人的小会议室。除此而外,是宽阔的走廊和几间办公、住宿一体的房间;楼下是大会议室,也叫大礼堂,安放着可坐一百多人的条木板,是召开乡、村队干部会议的场所。

坐东向西的一排楼房,楼上一层有宽敞的走廊、办公室,楼下楼上的其他房间皆为乡干部和水利员、林业员等人的办公、住宿用房。

坐西向东的一排平房,除一间广播站用房外,其他同样为乡干部



1981年桑园乡政府大门。（傅尚志提供）

办公、住宿用房。

政府机关大门为砖砌八字朝门，左右两侧青瓦平房，东面是农村信用社用房，西面是政府食堂。

政府食堂面积约二三十平方米，三分之一为厨房，三分之二为饭堂。饭堂只安置了一张长方形的饭桌，几条双人板凳，整个饭堂可同时容纳十几人围桌坐凳用餐。

政府食堂面积不大，桌凳不多，平常日子用餐人少，显得冷冷清清，安安静静。因为政府工作人员多数是本乡本土，当时又无每天必须签到打卡的规定，每天下村下队到企业后，就回自家屋里吃饭；只有家在县城、在外乡的几位干部，一日三餐才依靠食堂解决；拖家带口住在政府的三四户人家，为了节约或嫌食堂菜肴单一，只买饭不打菜。

但是，每逢政府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或召开村级干部会议，或有县上工作队（组）来驻乡、驻村指导工作，或上级领导来视察、检查、调研，政府食堂就会人进人出，川流不息，用饭票用现金买饭

打菜，然后就会端着饭菜到院坝、到礼堂、到平房走廊或坐或蹲用餐。整个正方形的院坝顿时熙熙攘攘，热热闹闹，像赶场一样。

1981年9月中旬的一天，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一行在县委书记李克耻等县领导，以及政策研究室同志的陪同下，到桑园视察黑虎滩和乡上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在乡政府礼堂听取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探索汇报，座谈改变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加快农村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路径。时至中午用餐，因政府食堂小而窄，来的人多，我们就请谭启龙书记、李克耻书记等领导及随行工作人员，在政府礼堂用餐。

餐桌用两张方桌拼接而成，坐凳有藤椅、方凳、板凳，形态各异，高低不一。米饭，食堂用杂交稻米煮，用日常用的木甑蒸，香糯可口；菜肴，除了时令蔬菜、红烧豆腐、回锅肉、白萝卜肉片汤，我们特意从马鞍村一个生产队买了几条活蹦乱跳的鲤鱼做成红烧豆瓣鱼，从黑虎滩农工商联合企业的花生厂买了几袋文君牌五香花生。饭间，我们以红烧豆瓣鱼、文君牌五香花生为例，向谭启龙书记汇报本乡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因地制宜，改田建塘养殖水产品、河滩地增种花生、建设食品厂增产增收的情况。

当时，我和其他同志得知谭启龙书记要在乡政府吃午饭时，心中忐忑不安，觉得食堂条件差，师傅烹饪技术一般，只会做农家菜，不知谭书记的口味如何。李克耻书记说，放心，谭书记不讲究，你们做啥吃啥，都可以。大家才放开手脚，尽食堂所能，做饭做菜，并和谭书记同桌用餐。

面条锅魁遐迩闻名

桑园场上的面条好吃，特别是徐兴林家的红油臊子面更好吃。口碑长盛不衰。

徐兴林的红油臊子面，面条白如瑞雪，软硬适度，滑腻劲道；辣



邛崃县委县政府领导在黑虎滩视察利用河滩沙石生产的预制构件。

(张国全提供)

椒油红亮耀眼，椒香扑鼻；臊子颗粒似花蕾含苞欲放，香嫩脆爽，入口化渣。一碗红油臊子面，养眼开胃，让人大快朵颐。

一日，山西籍的邛崃县委书记李克耻到桑园检查生产。走了几个村组，中午到乡政府听汇报，询问，座谈。乡上的同志打算炒几个油荤菜，请李书记吃午饭。可是，李书记不同意，说，简单点，下碗面条来吃就行了。

乡政府的食堂没有现成的面条，更没有肉臊子。咋办？侯师傅只好到徐兴林的面馆去端回一碗红油臊子面和一大碗面汤。李书记吃了面，喝了汤，连说味道不错。

饭后，李书记叫乡上的负责人陪他到场上去看了徐家面馆和其他饭店、面馆，夸奖徐家面馆干净卫生，红油臊子面有特色，打、烘的锅魁饱满，受看。同时，对徐师傅和乡上的同志说，县上要组织物资交流会，宣传各乡的名优特色产品和各种名优小吃，到时候你们一定要参加。

全县物资交流会盛况空前，县政府前的人民广场和南街县委门



1983年，县委副书记蔡文彬陪同美国客人参观黑龙滩农家。（王怀利提供）

前，简陋的交易棚鳞次栉比，名优特产、各种特色小吃琳琅满目，锅灶里煤碳火焰熊熊，食材香味和刺鼻的煤碳味交相弥漫。徐兴林的红油臊子面，因书记关照，摆在县委大门北面宽敞的街沿上，吃客不断，名利双收，声誉更隆。

徐兴林的锅魁，也因河南籍的邛崃县委副书记蔡文彬喜欢，在全县物资交流会上一展风采，声名远播。蔡文彬副书记当时既抓黑虎滩农工商联合企业试点工作，又时常过问桑园乡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次到乡政府说完工作吃饭，多数时候就是两个锅魁，一碗菜，一碟蒜，偶尔喝上一瓶啤酒。每次都吃得风卷残云，一扫而光。陪伴接待的同志倍感轻松解脱。

水片牛肉贺选举

1980年，邛崃县、乡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意义非凡。根据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与过去相比，有几个令人难忘的亮

点。一是人民代表由间接选举改为全体选民参会直接选举。候选人可以由党组织提名，人民团体提名，也可以由选民个人提名，几人附议，候选人获全体选民过半票数后，按得票多少的顺序当选。二是人民代表任期由两年改为三年。三是由人民代表选举产生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简称县人大常委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进一步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四是将“革命委员会”改为“县人民政府”。五是差额选举县人民政府的县长1名，副县长5名。

这是“文革”结束后，城市政治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如火如荼进行中开展的一项大举措，涉及面之广，难度之大，社会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为了认真做好这项政治制度的改革，保证第九届县人民代表大会的顺利进行，邛崃县委、县选委会多次召开围绕选举的工作会议，对选举工作每个阶段、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布置得十分具体，十分细致，要求各乡镇要抓紧抓实，要“早出工，晚收工，中午不休息，晚上打夜工”，务必不能出现纰漏和差错。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万事具备，只待实施。

1980年11月30日，正式选举县人民代表之日。

那天，我和乡上的全体干部及“几大员”（农技、毛猪、水利、林业、蚕桑等县级主管部门聘任在本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早早起床，洗脸吃饭，或步行，或骑车，按照分工，怀着神圣的使命感、强烈的责任感和几分担心出差错的紧张心情，奔向各自负责指导、监督的选举会场。

选举会场都设在村上或队上较大的晒场和空旷的坝子。

会场里，男女老少自带坐凳，按生产队坐成几堆。村队干部和计票员、监票员有条不紊地清点人数，发放选票，宣讲注意事项，请选民先酝酿酝酿，等待时间一到，就开始在选票上画圈打叉。

忽然，我听见几位选民交头接耳说：“选哪个？”“随便，要不然挨倒画够圆圈。”

我心中一惊：“要不得，这样一起来显得不严肃，是没有吃透选举精神的表现！”

话未出口，马上叫支部书记和几个组织选举的同志过来商量。说部分选民对待选举的态度不够认真，要把本选区的候选人情况再详细讲一讲，比如县上派来的一位局长，大家要注意，在选民画圈打叉前要说明白他的情况，他的业绩，千万不要出错。

紧接着，我又叫几个人赶快骑车到其他几个点去通知他们注意这个情况，不要出了大错。

事前估计，选举时间会花大半天。为了避免中途出现人员早退的情况，各选点根据本村本队的情况，为与会选民有的准备了麻饼子，有的准备了馒头，有的准备了包子及其他干粮开水。这些准备，使选举工作从上午八九点钟开始，到下午三四点钟结束，无一选民早退。

各选点选举结束，全乡统计，全部一次成功。9位候选人，选出出席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6人。6位代表，中共党员4人，非党人士2人，其中妇女代表1人。县上派来的候选人以高票当选。

晚上，县上召开电话会议，张绍森副书记在会上通报全县选举情况。桑园等25个社、镇选举一次成功，受到表扬。其他社、镇有一次未选够代表，有的因候选人选票相等，要重新选举，有的是人民代表未能一次选出，选了两次。还有乱写乱提候选人，令人捧腹的怪事。

选举一次成功，大家欢欣鼓舞。乡长何代金与县上派来参选的局长开玩笑，



食堂一角。（骆元江提供）

让他招待，请客。几位同志跟着起哄。局长拿出 5 元钱办招待。5 元钱不是一个小数，在当时，够一个工作人员半个多月的生活费了。一位乡干部拿着钱，很快跑到场上工商所旁边的牛肉铺买回一大包火草纸包着的水片子牛肉和一小包干海椒面。在何乡长寝室里的办公桌上摊开，你一片、我一筷地蘸着海椒面，呼尔嗨哟地干起来。

水片子牛肉，色红肉嫩，入口化渣；海椒麻辣无比，几片入口叫人舌尖麻辣过瘾，头上冒汗。

大家乘兴连连祝贺局长高票当选，祝贺选举一次成功。

快速兴起的傅庵乡

杨辉祥

邛崃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傅庵乡，与大邑接壤。从 1948 年到 1992 年，它与冉义几分几合，只存在 40 多年。回顾傅庵乡的过去，虽然面积小，时间短，但它曾经在邛崃各乡发展中表现十分突出，给邛崃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傅庵场与刘树成公馆

傅庵场镇的形成，与曾经的川军师长刘树成有关，这与邛崃其他众多场镇的形成史相比较，显得非常特殊。

袁泽明老先生是傅庵场上的住户。据他讲，现在的傅庵场位置，1946 年前只是一大块荒地，茅草坟茔遍地，周边是农田，没有居民，只有一座寺庙，名字叫傅庵子。

现在傅庵的名字，就是由傅庵子演化而来。据说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 1568 年），有一个叫傅登佑的居士捐了这块地，敬奉佛祖，由僧德寿开建为庵，是为傅家庵。当地老百姓叫傅庵子，迄今已有 400 多年。一直到民国时期，傅庵子香火都很旺。寺庙内有三大殿，五百罗汉，供奉的是自唐宋以来一直盛行于巴蜀地区的一种民间信仰神灵——璧山神。



挨着刘树成公馆形成的傅庵街道。（彭明权摄）

傅庵子虽然闹热，但仍然还是寺庙，只是烧香拜佛的地方，并没有形成交易集市。傅庵子上临唐场，下接冉场。冉场和唐场都是比较大的物资交易场镇，分属邛崃和大邑，已经吸引了大量的人气。当时，从冉场到唐场赶场的主要道路，是沿着斜江河岸走，不经过傅庵子，离傅庵子还有三里之遥。根据场镇形成规律，从地理区位、物资交流和交通条件来看，傅庵子自然而然很难形成一个场镇。

1945年，有人在傅庵子附近建了一座公馆。这座公馆解放后成为供销社，现在街面部分还在。此人叫傅银良，是川军的一个营长。不久，川军师长刘树成也在这里修了公馆。傅银良和刘树成是连襟，都娶的是当地黄家的女儿。黄家是个大户人家，还是当地的袍哥舵把子。黄家的三个女儿，都嫁与了有权有势有脸面的人物。大女嫁给了刘树成的副官刘松廷，二女嫁给了师长刘树成，幺女嫁给了营长傅银良。

1928年，刘树成在傅庵修公馆之前，就已经在安仁修了一座公馆，叫刘树成公馆。为什么刘树成还要在傅庵修一座公馆，众说纷

纭。有说他在显摆，孝敬老丈人；也有说他在安仁镇斗不过刘文彩，避而远之，到傅庵发展。当地老百姓认为，刘树成选这里修公馆，是因为傅庵子的风水好。据说，公馆落成之日，刘树成办了十四天的流水席，唱了十四天的大戏。刘树成在傅庵的公馆，现在依然存在，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这两座公馆建成，傅庵子一下兴盛起来。很多人开始挨着公馆在两边修木板房，并很快形成一条三四十户的街道。也有了茶铺、饭馆、商铺，还建有一个小小的戏台。一个场镇的基本元素都已经具备。不久，还形成了场期，五天一赶场。人们开始在这里进行交易，并用寺庙的名字命名这个新兴的场镇，称为傅庵子。

1948年，国民政府在这里设置乡级行政建制，从冉义乡划出几个保（类似于村的建制），设傅庵乡。刚开始辖有三个保。后来，又增加到八个保。

一般场镇的形成和兴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傅庵能够在短短几年内，从一块荒地崛起为一个场镇，然后独立成乡，成为乡公所驻地，速度之快，非常少见，其中可以明显看出人为干预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当地任职的喻学林老人说，傅庵能够建制设乡，明显可以看出是刘树成的影响。在安仁镇，他斗不过刘文辉、刘文彩。所以，刘树成选择在邛崃大邑交界处的傅庵精心建造，独立设乡，提高傅庵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是他扩充势力范围的考量。为了控制傅庵，刘树成还把其妹夫安排为第一任傅庵乡乡长。他还采取了一些政策和办法，例如鼓励人们在此修房置屋，打通内外道路等，使傅庵迅速形成场镇。另外，作为一般老百姓，在民国兵荒马乱的时期，与军阀为邻，安全感会高很多，也愿意到公馆旁边修房。

新中国成立后，傅庵乡的建制仍然保留，并于1956年并入冉义乡。1961年又从冉义公社划出，称傅庵公社。1982年撤社建乡，称傅庵乡。1992年，冉义乡和傅庵乡再次合并，傅庵乡的行政建制被撤销。

傅庵乡的哈达与灰塑

傅庵乡独立建制的最长时间，是 1961 年到 1992 年，历时 31 年。其间，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年代，傅庵虽然在面积、人口及场镇规模上，都不如与它时分时合的冉义，但在经济发展上却是领先的。据说，1992 年傅庵和冉义合并为冉义镇时，傅庵有 60 万的财政盈余，远远超过冉义。在当时，傅庵经济能快速发展，主要是依靠哈达生产和建筑业，这是傅庵乡对外响当当的两个产业。现在看起来，这两个产业，其实不是傅庵新引进产业，而是传统产业的升级。

傅庵乡哈达生产的兴起，离不开新民村和一个叫朱宝清的人。清末民初，朱宝清的爷爷在成都一家生产哈达的作坊里做事，掌握了哈达生产的全套技术。这个作坊，有两三百年哈达生产历史。不久，朱宝清的父母亲也到了成都，参加生产织造哈达。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鼓励大家寻找致富项目，由于哈达生产投资小，技术容易掌握，邛崃与藏区有着历史悠久的经济往来，市场比较大。新民大队的朱宝清等村民开始生产哈达，并且很快见利，



傅庵生产的哈达远近闻名。图为 1979 年傅庵哈达厂工人检查哈达质量。（樊安兴提供）

许多同村人随之跟进，迅速形成规模。新民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哈达生产专业村。那时候的傅庵人，很苦很累，自己购原料，自己生产，自己跑销售，从摆地摊销售起步，与藏胞交朋友。在藏区很多地方，到处可见傅庵人的身影。1992年傅庵和冉义合并为冉义镇之后，民族用品生产更上了一个新台阶，成为冉义镇经济的支柱产业。

傅庵除了哈达生产外，建筑业也非常出名。过去的傅庵，人多地少，很多人外出学手艺，产生了众多的泥水匠和修房建屋的木匠。傅庵匠人历来做事认真，技艺高超，在成都平原口碑很好。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掌握一门已经失传的技艺——灰塑。



傅庵很多匠人还掌握已经失传的灰塑技艺。（杨辉祥摄）

灰塑属于雕塑艺术的一种，民间工艺称之为灰批。它与泥塑有些类似，就是用石灰来塑造物品。在清代和民国的建筑中可以见到这种雕塑艺术，例如安仁刘文彩公馆大门上就有很多种灰塑，邛崃的一些古建上也可以看到。民间艺人以石灰为主要原材料，加上发酵后的稻草或草纸，反复锤炼，制成草筋灰或纸筋灰，然后根据建筑空间和装饰部位的需要设计图案，在需装饰的部位进行现场制作。一般先以草筋灰堆塑造型，再用纸筋灰细塑表面。待干到一定程度，最后绘上各种色彩。一般装饰在门额窗框、山墙顶端、屋檐瓦脊、亭台牌坊等处。灰塑工艺精细，立体感强，色彩丰富，题材广泛，通俗易懂，多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人物、花鸟、虫鱼、瑞兽、山水及书法。如今，灰塑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邛崃很多地区几近消失。

曾任傅庵乡干部的鄢正全老先生说，过去傅庵比较有名的灰塑匠人是方银山、颜九山。新中国成立前，傅庵刘树成公馆里的灰塑就是他们做的。那些灰塑造型考究，做工精良，雕塑精美。1958年再义建大戏台，他们在上面装饰了戏曲人物的灰塑。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做了雅安汽车站里毛主席像的灰塑。1987年，邛崃鼓楼由瓮亭公园迁到五彩广场，上面的花鸟鱼虫灰塑的重塑，也是他们做的。他说，这些灰塑艺人很多已经去世，灰塑手艺已经后继无人了。

改革开放之后，傅庵的泥水匠和木匠，除了承接一些古建的灰塑外，开始进入建筑市场，成为工人、包工头甚至老板。他们继承了在灰塑中培养的做工细致、讲质量、重信誉的傅庵工匠精神，在建筑市场上大受欢迎。建筑队不断扩大，建筑业成为傅庵的又一个支柱产业。在邛崃各乡镇中，傅庵的建筑队最多。刚开始，傅庵乡的建筑队只能挂靠在一些外地的大建筑公司，后来，因为建筑队太多，傅庵决定成立自己的建筑公司，称邛崃县第六建筑公司，成为邛崃乡镇成立的第一家县级建筑公司。

其实，在傅庵，不只是哈达和灰塑，还有很多传统产业，在新时代里为傅庵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过去傅庵用瓦缸烤曲酒的传统，也为傅庵后来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从1992年到现在，傅庵乡撤销乡的建制已经过去二十八年。但当与原来傅庵的老人们一起回忆那一段历史时，他们仍然对傅庵记忆犹新，充满感情，激动不已。

百年“哈达镇”冉义

樊安兴

冉义镇位于邛崃东部，东与新津县交界，南与羊安镇相连，西与高埂镇接壤，北与大邑县韩场镇和唐场镇毗邻。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为邛崃的坝区。境内海拔最高481米，最低470米，西北高，东西低，属都江堰自流灌溉区，水源丰富，主要河流水系为斜江河与东河。

冉义镇政府驻地早年为冉姓聚居之处，后来逐渐形成场镇。据清嘉庆《邛州直隶州志》记载，嘉庆时已名冉家场，简称冉场。又因境内斜江河上曾有三处义渡，因而得名冉义。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根据冉场义渡含义，取名冉义场。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建制改为冉义乡。新中国成立后，分为冉义、傅庵两乡，1956年冉义、傅庵两乡合并成冉义乡。1958年公社化时，成立冉义公社。1961年傅庵划出，分别称冉义公社、傅庵公社。1982年1月撤社建乡，成立冉义乡。1992年11月撤并冉义、傅庵两乡，新建冉义镇。2019年12月，撤销冉义镇，所属行政区域整体划归高埂街道管辖。

义渡冉场由来

斜江，也称斜江河，据《邛州直隶州志》载：“因委曲斜流数十里，经州东故名斜江。”系南河支流，发源于大邑县斜源镇雄黄岩东麓，

经晋原、安仁、冉义、羊安，最终流入南河。平坝地区的冉义，气候温和，适合农耕，加之交通便利，环境宜人，是理想的栖息之地。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因朝冉从驩，定筰存邛……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驩、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从中可以看出，冉族很早就已存在，并且是西南少数民族中较大的部族。冉族人不喜迁徙而好定居生活，人工建造的固定居所成为部落一大特点。

冉族人的生活习性是傍山而居，望水而生。据《四川郡县志》载，冉族在汉化过渡期所建的最后一个部落，就位于邛崃东北角的斜江河流域，约为今天的羊安、冉义和大邑安仁一带。

时移世易，朝代更迭。明洪武年间，生活在斜江河流域的一户冉姓人家为祭祀祖先，修建了祠堂——冉大庙，同时施舍了一些良田，修建冉房街市。街市因占用冉家土地而建，得名冉家坊。日往月来，暑退寒袭，以冉家坊为基础，逐渐形成市场，并不断扩大，场镇功能日益完善。至清朝嘉庆时，已名冉家场，简称冉场。

流经冉场的斜江河水源丰富，为方便冉场河西、河东两岸和临近场镇的人往来，在斜江冉场段设了上、中、下三个渡口。上渡通大邑县管辖的上安镇、高山镇、王泗营，中渡通上安镇，下渡通邛崃的高桥、高埂子。这几处渡口，据说是冉姓人家和一些乐善好施者捐献出地，每年收租作为修造船只、雇佣船工、冬季搭桥之开支。凡往来商旅行人，一律不取分文，遂被称为义渡。

为记其事，冉家场上曾树有义渡碑。1934年，根据冉坊义渡之名，改冉坊为冉义。

20世纪90年代以前，冉义镇一水相隔的河西、河东两岸群众往来，都依靠船只摆渡。

延贡村60多岁的赵志清便是当年的摆渡人。他记得，当时冉义公社为方便两岸群众出行，砍伐本地一工厂内的楠木来做船，找人摆渡。群众过渡都不收钱，渡口就在中渡位置。80年代开始，撑船的人有6名，两条大船。撑船的人没有工资，只是每年象征性地给点补



2012年4月，冉义大桥建成通车，结束了河西、河东两岸百年无桥的历史。（刘彬摄）

助。遇到一四七场期，早上四五点钟就得开始干，要到很晚才收工。

撑船人要随时在船上，方便群众过渡。赵志清说，有一次涨大水，晚上住在船内，发现洪水涨起来时，船已经被冲到河中间了，随后被冲到泉水镇才靠到河边。

1998年，宽4米、长100米的踏水桥建成，两岸群众出行更方便了。但踏水桥离水面近，一旦涨水，行人、车辆就无法通行。

2012年4月，在冉义的中渡位置，宽9米、长213米，总投资750万元的冉义大桥建成通车，结束了冉义镇河西、河东两岸百年无桥的历史。

二月二农具会

农历二月二龙抬头，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也被称为春耕节、农事节和春龙节。此时节，素有“贡米之乡”美誉的冉义镇，六十年前

便有了交流备耕物资的农具会。冉义二月二农具会过去叫文昌会，由冉场各行各业出资筹款，在二月初二当天举办酬神活动，以示敬龙祈雨，祝愿一年风调雨顺，大地丰收，百姓安康。

农具会前一两天商贩就进场。会期当天，来自邛崃及周边大邑、新津、蒲江等县的商贩早早摆好竹、木、铁制的各种农业生产用具。会场上人头躜动，摩肩接踵。道路两边商品林立，整地管理用的木犁、木耙、锄头、木水桶，收获用的掐刀、镰刀、梿枷、扁担、晒簟、筛子、箩筐、拌桶、风谷机，运输用手推车、鸡公车、平板车，称量用的杆秤、升、斗等，以及生活用的桌椅板凳，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也有一些小商贩，在冉义场周围的河坝、田间就地设摊。会木匠手艺的农民会趁农闲时节，在家里赶做一些竹木制品，拿到农具会上卖。

蜂拥而至的商家，带来各式各样的商品供农民挑选。对于农具的选择，农民有自己的见解，比如拌桶和木水桶要选柏木的，坚韧结实耐沤。扁担要选桑木，经久耐用而有弹性。

除以农具为主的交易外，来赶会的还有成都、崇州、蒲江等地的唱戏班子，以及经营各类小商品、食品、药材的商贩。

二月二当天还有阴差会（人扮成鬼脸撑着布伞）、高桩会、平台会（表演者扮成川剧角色）、花灯戏（又名幺妹灯）、坝坝戏、舞龙表演、剃头等。到了晚上，各地唱戏班子各显神通，你方唱罢我登场。



冉义的二月二农具会。

农具会期间，大邑韩场，新津安西，邛崃羊安、高埂、泉水等冉义周边乡镇的群众前来购物，集镇上人来人往，买的卖的，耍的看的，热闹非凡。

后来，冉义文昌会更名为二月二农具会。同样为一种自发的传统集会，既方便群众购买农具和生活用品，又满足人们对娱乐的需求。由于多种原因，二月二农具会曾停办数十年。

2000年，为深入挖掘冉义民俗文化，提升冉义对外形象，活跃冉义商贸经济，冉义镇政府组织恢复举办了二月二农具会。活动内容主要以农资农具及其他生活物资交流为主，同时增加了藏民族用品展销，并组织一些文娱体育活动。到2004年，冉义二月二农具会更具规模，逐渐演变成一种物资交流活动。

冉义的二月二农具会不断被赋予新使命，保留民间属性的同时，更具有参与性。舞龙表演、传统老游戏、老剃头匠免费剃头、诗歌朗诵、帐篷音乐节、文艺表演、户外骑游、拔河比赛、长跑等活动层出不穷，精彩纷呈。

民族用品生产

作为川藏公路的要塞，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西出成都第一站，邛崃历来有与藏区群众做生意打交道的传统。一来二往，聪明的冉义人了解到，作为藏族宗教礼仪中向神灵敬奉的珍贵供物，以及僧侣间互赠或向活佛敬献的礼品——哈达，已成为藏族农牧民生活中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礼仪往来必备之物，年人均消费在几条以上。高寒干燥的藏区又不出产蚕丝，哈达主要依靠内地生产后运进西藏，四川是产蚕丝大省，邛崃的蚕丝生产又十分发达，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为冉义生产民族用品提供了有利条件。

冉义新民村4组的陈文华说，据祖辈讲，大概在晚清时期，村里就有人去成都学习哈达的人工织染技术，艺成后回村自行生产。当时

的生产规模小，全部用手工操作。生产哈达的机器是木制结构，造型简单，一般的木匠师傅一看就会做。而哈达的颜色单一，只有白色，以蚕丝绸为原料，没有花纹，编织成型即可。

陈文华介绍，哈达生产看似简单，工序其实颇为复杂，调丝、织造、上浆、包装……前后要经历二十多道工序。由于产量少，一年卖不到几次，等到可以卖的时候，还需要雇请挑夫，肩挑背扛地把哈达运到康定、昌都等藏区，来回要一个多月。

早先的哈达成匹售卖，藏族群众买回家还得自己裁剪成需要的尺寸。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由于社会动荡，物资紧缺，人民生活困难，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工商业改造，冉义新民村的哈达生产便中断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逐渐有了乡办企业、社办企业，原傅庵乡也创办了社办企业的哈达厂。时任新民大队 4 生产队队长的王火生，了解到本生产队有很多人会做哈达，加之自己就有从父辈那里学到的哈达制作技术，于是以生产队的名义向上级申请开办哈达厂。得到批准后，他大胆带领本生产队的群众生产哈达。进原料、跑销售由王火生负责，村民挣工钱，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哈达厂搞得顺风



手工生产哈达的机器是木制结构，造型简单。

顺水，4生产队也成为当地第一个有队办企业的生产队。

改革开放初期，政策逐渐宽松，王火生对群众承诺，只要愿意生产哈达的，他都提供原料，可以先赊，等产品生产出来卖了再给钱。要想生产也不复杂，只需请木匠打一架木制纺织机。有了机具，有了蚕丝等原料，就能生产哈达。新民村家家户户开始自行生产哈达，那个时候，新民村到处是晒着的哈达，随风飘动。

村民陈文华家也安装了两台手工木制机具，当时12岁的陈文华跟父辈学习纺线、编织。哈达编织技术比较简单，左手梭过来，右手梭过去，一梭一梭地来回丢。同时，脚还要踩，把线分开，从中间穿一梭过去，就这样经纬线式地来回穿插。

1983年，傅庵乡党委、政府成立了邛崃县哈达公司，专门负责销售。新民村的民族用品生产由点到面，发展到冉义乡和大邑县的韩场、文井等地。产品也由单一的哈达，逐渐增加了氆氇、腰带等品种。

到了80年代末，因产品不统一，不规范，加之没有创新，手工生产的哈达在藏区不大受藏族群众的欢迎，冉义的哈达生产遇到瓶颈，生意大不如前，很多企业停产，这其中也包括王火生经营的哈达厂。



机器的应用，新民村的民族用品生产又多起来。



工艺的多元化，使提花、纹饰等不断创新，满足不同藏族群众的需求。（邓虹提供）

王火生于是带着陈文华到成都学习机器生产。1990年，掌握了机械生产技术后，王火生回到新民村，并从邛崃丝绸厂购买了淘汰下来的制布、纺丝设备12台，用马车把设备拉回冉义，成为当地最早半机械化生产的哈达厂。在他的带动下，部分村民也尝试使用机器生产哈达，新民村的民族用品生产又逐渐多起来。有本钱和场地的，多投资，多雇员。没本钱的，两口子自己在家生产。不想自己做的，就去哈达厂上班。农忙时，哈达厂还要放几天假，把庄稼收割了再开工。

蚕丝等原料来自重庆商检局、成都商检局、泸州商检局和丝厂。主要依靠重庆，因为那边栽桑养蚕的多，价格相对便宜，做出来的哈达利润空间大。成品哈达主要为藏区的国营供销社供货，多从邮电局寄送，大邑、新津、邛崃三县邮电局的邮车到新民村哈达厂接货，曾一度出现三县的邮电局相互间抢生意的火爆场景。后来，采用了更快捷的航空运输。陈文华说，他们厂生产的哈达，送到双流机场发拉萨，非常快。青藏铁路开通后，也曾用铁路运输过一段时间。随着川藏线上建起大批隧道、桥梁，无须再途经危险的陡峭山路，汽车就成了主要的运输工具。

改革开放后，在西藏昌都、拉萨等地允许私人摆地摊销售民族用



2003年3月，首届民族用品展览会在冉义举行，四川演出公司特为展览会助兴。（李光洁提供）

品。这其中以冉义新民村人居多。陈文华说，当时家里兄弟几个都在冉义做哈达，自己想到拉萨看看，于是十几岁的他也在西藏拉萨八角街摆地摊销售哈达。哈达是藏族同胞的必需品，只要摆起就有人买，也不讲价，你说好多钱就好多钱。在西藏拉萨八角街摆摊干了两年时间，陈文华回到冉义，继续生产哈达。

在西藏经营民族用品的冉义籍商人隔一段时间就回来收购哈达。在此过程中，藏区同胞有什么需求，回来后就告诉冉义的哈达生产厂家，这种那边销售、这边生产的模式，让新民村人挣到了钱，家家户户的房屋都从泥坯房变成了砖瓦房。

1995年，邛崃市冉义新民民族丝绸厂成立，下属8个分厂，再联络50多家生产氆氇、腰带、藏香的农户。2000年，在王火生的鼓励下，陈文华成立了自己的民族用品厂，生产哈达、酥油、藏香等。他说，哈达生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吃透技术，不断创新，机械设备也要持续更新换代，才能适应市场，才有发展空间。

哈达的设计方面，以吉祥八宝和藏文祝福语图案为主，藏族人喜欢吉祥八宝，根据其爱好，一直都保留这个藏文化特色。颜色则从单

一的白色，到蓝、白、黄、绿、红五彩。

哈达的原料也在发生变化，从最早的天然蚕丝、羊毛，到丝光棉，再到丙纶丝。

工艺的多元化，使提花、纹饰等不断创新，在保留藏文化特色的同时，结合当代理念和时尚元素，增加了高档蚕丝哈达的生产，满足不同藏族同胞的需求。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尤其是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新民村哈达生产厂在方便群众使用方面下功夫，不断增加民族用品的品种，开发了铜灯、藏香、酥油灯、浪尊等 20 多个品种，被誉为“哈达第一村”。

2000 年 4 月，冉义镇被四川省民族宗教委员会授予“邛崃市民族用品生产基地”；2002 年国家五部委授予冉义镇“民族用品生产基地”。冉义镇民族用品生产企业受到极大鼓舞，各生产厂家纷纷追加投资，扩建车间，添置机器设备，扩大生产。其产品畅销西藏、青海、新疆、内蒙、甘肃等省和自治区，有的还转销到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好评。

2003 年 12 月，新民村共有哈达、氆氇等民族用品生产企业 64 家，提供原料粗加工的农户 86 户，有织机、牵丝机、卷纬机、无梳织机 318 台，年产哈达 116 万条、氆氇 715 万条、藏香 1242 万箱（小箱），解决农村剩余劳力 2518 人。

如今，常住人口不到 3 万的冉义，一年生产的哈达超过 1 亿条，西藏和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省藏区绝大多数哈达都来自冉义。冉义已是全国最大的藏族用品生产基地，被称为“哈达镇”。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花香包裹的孔明

金成梦

出临邛古城南门，沿土平路（土地坡至平乐古镇）行驶几公里，便到了孔明。据清嘉庆《邛州直隶州志》载：三国时，蜀相诸葛亮（字孔明）率兵南征，曾驻师于此。后人立庙镌像祀之。清乾隆年间，又经邑人马登甲、李秀梅、李秀林等出资扩建，定名孔明庙。民国《邛崃县志》也记载：“孔明庙，山市小场也，相传武乡侯过辙，后人立庙。”之后，以庙为中心，逐渐形成小集市。1940年建乡时，因乡公所驻孔明庙而名孔明乡。新中国成立后沿用此名。1958年公社化时，成立孔明人民公社。1982年1月撤社建乡，成立孔明乡人民政府。2019年，孔明乡与卧龙镇合并，设立孔明街道，以原卧龙镇、孔明乡的行政区域为孔明街道的行政区域。街道办事处驻卧龙镇龙府路149号（原卧龙镇人民政府驻地）。孔明黄鹤村则与文君街道土陶村合村，仍称黄鹤村。黄鹤村境内黄鹤窑、廖家窑、张家窑等小窑场，一同划入邛崃市文君街道管辖。

悠久的铸陶史

孔明属于川西平原向邛崃山脉过度地带，境内丘陵、平坝、沟壑共存。汉唐以来，邛州大地上窑场林立，除了著名的十方堂邛窑外，



孔明境内丰富的高岭土资源，孕育出众多民间小窑厂。

还有许多远不及当年邛窑辉煌的小窑场。丰富的高岭土资源，孕育出众多民间小窑场，孔明境内的小窑场大多以窑主姓氏称呼，如叶新窑、徐家窑、廖家窑、张家窑等。也有窑场用当地小地名直接称呼，如黄鹤窑、柴冲窑等。这些民间小窑场，除了烧制坛罐、水缸、酒壶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陶器外，还生产花瓶、砚台、水滴、香炉、香筒、陶狮等神龛、文房陈设器皿。

时序已过秋分，天气渐渐转凉。蒙蒙细雨中，我从封营廖家窑沿古道穿古堰酒厂，到叶新窑考察。兴盛于清代，20世纪50年代仍然还在生产的叶新窑，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窑址已被竹林、灌木丛、荒草掩盖，窑边一棵百年老树，枝繁叶茂，见证了叶新窑曾经的辉煌。78岁的当地人王树荣在叶新窑做了一辈子的陶器，对叶新窑有很深的感情。他翻箱倒柜，找出当年制陶的工具泥捶和泥木掌送我。泥捶用陶土做成，进窑烧制，上面有个手握的泥柄，下面为光滑的半圆形，做坛子和缸子等大型陶器时，便于捶打陶壁。泥木掌一般用红豆杉或青冈等坚硬木头所制，经久耐用。泥木掌做得厚实，掌面上还

刻有花纹，可以捶泥，还能在制成的坛罐上敲打出水波纹、几何纹、花草等装饰图案。王大爷讲，这些制陶工具是窑上老窑工代代相传，自己也不晓得有多少年了。他还说，当地村民在叶新窑旁边田地里种庄稼，会挖到很多残损的窑具和土陶残片。老古道古堰附近的山坡地里，也会挖到各种形制的陶瓷碎片，陶片釉色品种很丰富，可以看出茶马古道昔日的繁华。此外，叶新窑还生产一种四耳扁形酒壶，印有各种花卉、动物图案，除开胎质和釉色，形制与唐宋时期邛窑扁壶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看出邛窑对后世窑场的传承和影响。同时也说明，扁形背带壶，从唐宋时期就已适应南方丝绸之路上马帮盛酒或装水的需求，从而伴随茶马古道延续千年。

孔明境内小窑场烧造出的各种陶罐和生活用品，除了满足当地居民所需，还要远销他乡。从旱路运出去有两条路：一条由高店子、金店子、拐子塘、三通碑，到土地坡（在此又分两条路：一部分沿土地坡茶马古道经南河坎大东街运进临邛古城，再运至大邑、崇州、温江等地。另一部分进入临邛古道，运至卧龙、蒲江大塘、雅安名山等地）；还有一条由高店子、叶店子、孔明场、正法寺、五通碑、九里山坝进入平乐镇，运到道佐、夹关、高何等山区场镇，以满足山区群众所需。

从水路运出则需请当地专门从事搬运的背工，从各家窑场沿古道走封营、翻越梭岩顶、下石厂沟、背到葫芦湾河边上著名的陈大院子陈红法家。陈家院落宽敞，又紧邻河岸，被新津、双流、成都等地做坛罐生意的商家长年租下，专门用来堆放坛罐。等到收购的陶器够装满一船，便雇船顺流运走。陈红发的孙儿媳、今年 68 岁的封秀英回忆，她嫁到陈家时，经常听公公陈家洪讲和坛罐打交道的事，对祖上充满钦佩。封大娘对坛罐也颇有感情，家里用来装黄谷和玉麦的两个大坛子，也是当年祖上遗留下来的，是家里人的念想，她要保留下来装东西。古旧的陈家大院历经沧桑，几经改建修缮，曾经的恢宏已然不复存在，院坝里长满荒草。由于陈家院子房屋位于山崖旁，村上已

动员陈家人迁入葫芦湾新农村集中安置点。

民国时期，葫芦湾是川西平原著名的水码头。据葫芦湾 90 岁的罗大爷讲，自己年轻时，随爷爷在葫芦湾铁匠铺打铁，每天傍晚，从上游火井、水口、马湖等地载木头和竹子下来的筏子有百余条，加上各种运输木船一两百只，在元兴石桥下一字排开，葫芦湾应运而生出许多赌场、饭馆、旅店等，热闹非凡。孔明廖家窑、徐家窑、叶新窑及封营的黄鹤窑等窑场，及一河之隔的原南河乡金店子金家窑，需错开各自开窑的时间，避免外地客商压价。窑场开窑的日期，窑主会提前知会外地客商，客商们结伴头天逆流而上住到葫芦湾；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出窑窑场，选好坛罐、缸子等货物，每个窑场有专门背坛罐的脚夫子。窑场主找来脚夫子，和客商谈好各种物品的价钱，背夫便开始往葫芦湾的河边背。一趟又一趟地装船。本家 90 岁的大婶婶告诉我，我四老爷金德安的母亲，年轻时专门在金家窑和孔明窑上背坛罐到葫芦湾，因脚力好，力气大，每天来回好几趟，竟也能养活一家大小，还活到一百多岁。可以想象当年的古道上，来往穿梭的脚夫子背着坛罐时蜿蜒前行的盛况何等壮观！

黄桷兰的兴起

我初中毕业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随二姐夫在孔明郭山村乡下修建房屋，打零工。当时，郭山村等地有头脑活络的农民，开始利用自己家房前屋后空地种植牛心花嫁接黄桷兰，摘黄桷兰花卖钱。因栽种黄桷兰技术要求不高，见效快，当地农户一拥而上，几年时间，孔明成了川西著名的黄桷兰基地。一起打零工、年长我几岁的表哥发现黄桷兰花的商机，邀约我一起从孔明郭山村贩黄桷兰花去雅安等地卖。

收花季节，需早上三四点起床。我和表哥各自骑了一辆自行车，从金店子出发，沿土平路骑行两三公里，到郭山村收购黄桷兰花朵。黄桷兰种植户在凌晨一两点钟就起床，打着手电筒开始摘花。摘花是



郭山村等地农民利用自己家房前屋后空地种植黄桷兰，几年时间，孔明就成了川西著名的黄桷兰基地。

个细致活，肩上斜挎个竹篓，爬上自制脚手架，开始轻轻摘。黄桷兰花骨朵从傍晚开始绽放，一直到清晨。摘花需细心、手巧，才不会弄坏花瓣。摘下的花朵轻轻放进竹篓，竹篓满了，再下树移进竹筐里。



孔明乡下几分钱一朵的黄桷兰，带到雅安每朵可卖到三五角钱。

当时买花按朵计价，孔明乡几分钱一朵的黄桷兰，带到雅安每朵可卖到三五角钱，利润相当可观。我和表哥将鲜花买到手后，要立马骑自行车赶到邛崃车站，坐最早一班车到雅安。到了雅安，我们将黄桷兰分为两份，每人各带两篮，兵分两路，开始沿街叫卖。当时的雅安及周边县份，还没有人栽种黄桷兰，所以，黄桷兰花无疑成了稀奇物，供不应求。一般情况下，黄桷兰需成对出售，有顾客从篮子里挑出花朵，我要熟练地穿针引线，把线穿在花柄上，线要留出适当长度，以便客人把花朵挂在纽扣上、戴在脖子上。很多年轻情侣，以胸前佩戴两朵黄桷兰花为时尚。等不到中午，我和表哥在彩虹桥边会合时，从邛崃带来的黄桷兰花都卖得干干净净。后来，到雅安卖花的人多了起

来，我们就采取批发。我在雅安联系小客户，表哥从孔明买花在车站顺车带货。我在雅安接到黄桷兰后，转发给小客户，再由他们零售给当地人，省力又赚钱。黄桷兰花生意做了一年多，由于竞争激烈，我也就罢手，改行去了外地打工。这段卖花经历，成了抹不去的记忆。

石板铺出乡愁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孔明场，只有一条独街，土平路就从街上穿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供销社、幺店子、老茶馆，依次排列街道两旁。红砂石板铺成的街道仅够一辆汽车通行，长年累月碾压，石板变得坑坑洼洼，遇到下雨，坑里积满水，有汽车通过不减速，就会溅得行人一身泥水。有的过路者免不了追着车子叫骂，一直追出很远。街道两边栽了很多桂花树、黄桷兰树，花开时节，整个孔明场都笼罩在浓浓花香里。

孔明虽然属于丘陵地带，山势不高，却有非常丰富的红砂石资源。孔明供销社专门售卖当地开采出来的红砂石板，以满足孔明、下坝、南河、卧龙等地居民需求。孔明的石板硬度好，耐风化，做工精良，销路一直不错。

1999年，我在老家修建四合院“安然小舍”，需要定制一批大小、厚薄均匀的石板，用来铺院坝、修猪圈、砌谷仓等。我母亲娘家在马湖，那儿出产红砂石板，我一个亲戚家也有采石场，母亲劝我去马湖购买石板。我大姐夫是石匠，



孔明的石板硬度好，耐风化，做工精良，销路一直不错。

在孔明场背后采石场开石板，让我先去看看，说他亲自开采出来的石板质量不比马湖差。

从孔明场背后沿一条机耕道土路蜿蜒前行一两里，就到了一处山林旁，山不高，密密麻麻长满松树。在山嘴处空地上码满了开采出来的石板，采石场就在岩下的半腰上。从岩上下到半山腰采石处，需踩着一架十多米长的云梯下去，云梯比普通梯子做的结实，扶手用整块原木固定在崖边，梯子踩板用钉子钉死，踩板两头还用铁丝加固。踩着踏板，胆战心惊缓缓下到采石处，探头向下望，有几十米的高度，头晕目眩，让人望而却步。

采石场不大，有十多个平方，只容得下三个石匠干活。大姐夫负责打粗坯，第一道工序是揭盖山石。先将石头表面泥土去掉，盖山石质量不好，需揭开，然后平整出岩石，再按尺寸大小下錾子打出石槽，在石槽四周打上眼，眼上塞铁塞头，均匀用铁锤敲打铁塞头，慢慢地揭出粗坯子石板。大姐夫说，揭粗坯子看似简单，却是个技术活。打眼时，需顺着石头纹理走，才能避免石板的损耗。还有就是石板厚薄的掌握，全凭一双火眼金睛，石板开薄了，不经用，开得厚了，又浪费石材。采石场老板手艺较好，他负责将粗坯子石板表面打磨整齐，另一面打出錾子纹路，用以防滑。加工成形的石板，由另一个石匠用草绳绑着，踩着云梯背到岩上空坝里码好。我修建房屋所需要的一百多块石板，在大姐夫建议下，厚度多了两公分，这也是我家院坝的石板很少踩烂的原因。因为监工，我在采石场待了一个星期。采石场老板说，解放前的茶马古道所用石板量大，基本上是就地取材。从临邛古城到平乐这条古道，他听老辈石匠说，用的都是孔明采石场的石板。岁月悠悠，古道长长。站在这条茶马互市的古道上，感慨万千。这条石板铺出的路，是一条嵌满乡愁的路，残存的石板路，仿佛还在向人们讲述着那些远去的往事。

(本文图片由杨军提供)

昔日鱼果之乡新安

袁国川

新安乡位于邛崃城东面。改革开放初，有 11 个大队，82 个生产队。乡驻地巫大塘，距县城 20 公里。这里曾经柑橘成林，鱼塘处处，是邛崃著名的鱼果之乡。

新安原名新庵，为东路小集市，因集市地处清初修建的一座寺庙新庵子而得名。民国二十九年（公元 1940 年）由固驿、宝林两乡各划出一部分保、甲组成新庵乡。新中国成立后沿用此名，1955 年并入固驿乡。1962 年从固驿分出，改庵为安，成立新安人民公社。1975 年公社驻地由新庵子迁至巫大塘。1982 年撤社建乡，成立新安乡人民政府。1992 年，新安乡并入固驿镇。



1951年土改后，新安开始修塘筑埝，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浪潮。



1970年，新安组织500名青壮年驻扎玉溪河畔，肩负大坝的挖方、浇筑工作，直到大坝通水。

为水奋战30年

位于五面山丘陵区的新安乡南面与蒲江县友爱乡、西崃乡交界，境内土层为黄砂，过去都是“望天田”，十年就有七八年用水困难。

为解决丘陵地区农业用水和干旱问题，从1951年到1981年的30年间，新安除在当地开掘了许多新的沟、渠、堰、塘，还参与修建了邛崃、蒲江的大量水利工程，治水规模和投入都很大。

1951年土改后，新安开始修塘筑埝，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浪潮。在修建两级提灌站的同时，还组织民工在白塔村墩子山脚下的干水碾建一级单筒提灌站。到1966年，基本解决了新安六个村的用水问题。

1969年，中央批准修建玉溪河水利工程。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新安公社立即组织100名青壮年到高何大窖，同“三专八县”民工一起战斗在镇西山上。花了一年时间，筑成一条长达15公里的盘山公路。施工中，因后方运粮接不上，筑路队员们就买南瓜煮稀饭吃，仍然坚持战斗。1970年，新安又组织500名青壮年越过镇西山，驻扎在玉溪河畔，分成五个连，同红光、战斗、回龙、石头四个公社

的民工负责大坝的挖方、浇筑工作。新安平均每天出动 200 人，苦战十年，投工 70 多万个，于 1980 年完成 12 个基墩的浇筑，安装完成拦河大坝工程的五个闸门。

为了迎接玉溪河水，1976 年新安组织力量修通北斗渠，这条渠与南渠同一地方起水，同样经过西崃、宝林进入新安后，再经杨坝水井、黑石、青石、方拱、南京、白塔等地，流入观音境内，全长 10.5 公里，沟底宽 2 米，沟底高平均 1.5 米，仅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工程。

1979 年，四川省、温江地区同意邛崃用水在天台分支，但经济上不予支持。邛崃县立即组织力量向这条支渠进军。新安负责修天车坡渡槽，花了半年时间，完成了渡槽的修建。这个渡槽长 150 米，高 7.5 米，9 个基墩，全用石梁加水泥浇砌，用钢筋水泥浇成底宽 3.2 米，坎高 3.2 米的槽身，能容 5 个流量的水。

1977 年，邛崃县对五面山的水路作出进一步规划，决定修建新安军田渡槽。1979 年 10 月，新安公社在军田召开干部会，成立军田渡槽建槽指挥部。随即开始放线、打桩，建立伙食团……11 月，以军田、朝阳两个大队为主的受益户全面开工。1980 年春完成长 160 米、底宽 1.2 米、边墙高 1 米、全用钢筋水泥浇筑的渡槽。1980 年 5 月，小满来临前通水。

通水那天，渡槽两头人山人海，喜气洋洋。县委书记李克耻来到军田参加了庆祝大会。在喜悦的气氛中，北边来的玉溪河水从渡槽中徐徐向南流去，浇灌了新安 1700 多亩田。渡槽通水后，两个大队的民工继续护墩护岸，到 1980 年 7 月 10 日全部完成。

为了五面山用水，1980 年，新安又肩负了修建夹关渡槽任务。渡槽在夹关烂泥口，上面是黄泥高山，玉溪河水要经过两座山和两山之间的明渠，再通过渡槽流下来，因此就在两座山凿隧道。这段支渠新安共修了 420 米长，工程之艰无以复加，特别是烂泥口的烂泥最难收拾。隆冬季节，站在烂泥里挖方可谓难苦异常，往往晚上成沟，第二日早上沟又平了。新安民工硬是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半年时间就完



为了五面山用水，1980年，新安又肩负修夹关解放渡槽的任务。（彭明权摄）

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1980年五面山支渠全线通水，是年冬天，卧龙渠塌方，新安又组织民工把卧龙一段支渠修成暗沟。这段渠长300米，工作起来也颇艰巨。由于支渠地基是白鳝泥土，无固性，深挖后又塌方。民工们不怕艰难，奋战三个月，在深挖4.5米后，用鹅卵石和水泥浇成3.2米宽的沟底和3.2米高的沟坎，又用鹅卵石和水泥浇圈成拱，上盖泥土，完成了暗渠工程。

到1981年，历时30年，新安消除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再无干旱之忧，为新安的渔业、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创办新安农中

上了年纪的农家子弟大部分人还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类学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农中，它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农家子弟的求学需求。

1964年秋，是农村体制下放的第三年，国民经济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农村小学毕业生增多，但要继续升学只有到村以外的固驿去。新安公社根据群众要求，创办了一所农业中学，由党委书记代品富、党委委员梁永安、贫协主任李寿山、小学校长周俊成等组成农中校务委员会。办校，万事开头难，首先要解决的是校舍、设施、教师和生源等问题。为方便农村子女就近上学，聘请了一名教员，招收学生52人，以青石大队的大队部作为教室，开设政治、语文、农基、珠算4门功课。

学校没有吃住条件，不管多远也得早出晚归。72岁的杨水蓉回忆，她读完小学五年级就到了农中，在农中读了3年，学校教学条件艰苦，教室的围墙是泥砖砌的，桌子板凳是泥砖搭木板，教学模具是省上拨下来的，有实验田，老师自己煮午饭。学生上午上课，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

当时农村缺人才，农中那一批培养的是大队会计、出纳，分配工作。所以，到农中学习的人也多。

简陋的校舍，“走教”的辛苦，微薄的收入……正是新安农中的真实写照。农中为集体办学，经费由家长负担。1964年创办时，由学生每人每期交3斤米、2元钱，书本费除外。教师每年领薪9个月，其余3个月靠半农半教的劳动收入解决。1968年，国家补贴教师每月9元，差数由各生产队负责，算12个月钱粮。

在勤工俭学中，1965年新安农中师生培育桉树苗2000株，收入80元；1967年晒松果收入400元；1968年为附近生产队搞油菜高产，收入全交队上；1970年，南京班晒松果收入200元，45个学生全免学杂费。1964年政府补助100元建校费；1971年补助1000元，投入新庵修中心校，农中进驻两年，又分到杨坝、龙庵大队去建校招生。

1964年冬天，省教育厅到战斗农中考察时指示，农中要走“学生半农半读，教师半农半教”的路子。1965年秋，国家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培养“能文能武能上能下”和“又红又专”的



1981年新安农中并入新安中学，完成了使命，静静走入历史。

新型劳动者。

从1964年到1967年，新安农中师生坚持了“双半制”，教师年做工分1000—1500分，由生产队发劳动手册；学生每天坚持读书外，每年实做工分1500—2500分。多数学生天没亮就出工，使牛、挖桐子窝……温江地区还专门派员核实。1965年9月，农中学生杨水蓉、王明高、李玉先、马国双等6名优秀学生代表和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代表汇聚北京，在长安街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1966年春，农中划拨了实验田，学生所在队都有自己搞的水稻实验田，亩产千斤，交生产队不要工分，六至九队学生还开辟荒废的池塘搞实验。新安农中火了起来，吸引了二区农中教师前来观摩；随后，又吸引了全区和西崃农中师生80多人参观学习。

从1964年至1978年，新安农中或在新安公社青石、杨坝、龙庵、南京大队就地招生就地办学，或搬迁到新安中心校，最初农中是半耕半读，到后期基本上普通中学的课程全开了。随着时代变迁和教育结

构调整，经过 17 年的风雨办学，1981 年新安农中并入新安中学，完成了其使命，静静走入历史。从这里累计走出了近 3000 名毕业生，大部分成了各行各业受欢迎的实用人才，更有一些人成为部门领域的翘楚。

建成“鱼果之乡”

“山光水色美，果香鱼虾肥。”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安大力发展果园和养鱼业，成为邛崃著名的鱼果主要产地，被誉为“鱼果之乡”。

新安历来靠天雨蓄水保水稻栽插，因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冬水田，田里自然生长繁殖着白鲫鱼，每年平均亩产半斤到一斤左右。由于毒鱼的较多，人们一开始用马桑籽，继而用灭虱粉、盘香面，发展到用乐果、钉螺药等剧毒药毒鱼。政府虽然屡下禁令，但收效甚微，以致白鲫鱼濒于灭绝。1964 年，县上号召淡水养鱼，新安乡从新津调回 10 多万尾鱼苗，分给各生产队，放在塘里和稻田里任其生长，结果大量鱼苗随水流失，收效不大。

1980 年，新安大力提倡人工养鱼，要求每个生产队改造三亩老化塘作为养鱼基地，干部带头养鱼，把围水田、稻田全部利用起来。首先是清洗水底，进行杀菌消毒；其次把出水口用网或竹笆封严，专养鱼池周围还开好进水、排水沟；三是经常撒石灰或漂白粉消毒，一旦发现病变，便根据县上发放的资料对症给药；四是循环养殖，每天大约按 100 斤草鱼给 40 斤草料，草鱼的粪便白鲢消化，白鲢的粪便鲤鱼消化，除喂草料外，再撒玉米粉、混合饲料。实行新技术养鱼后，新安渔业得到了飞跃发展。1980 年产鱼 9000 多斤。

根据农业区划，邛崃决定把新安建成商品鱼基地。1981 年，新安全境开始自繁自养，专池养鱼 250 亩、围水田养鱼 800 亩、稻田养鱼 2000 亩，当年产鱼 6 万多斤，其中提供商品鱼 4 万斤。为了发展养鱼业，新安成立了水产公司，与省、地、县联办以巫大塘为主的渔场，

以联办渔场带动全乡渔业发展。总场下设两个分场：第一分场是龙安大队的小塘子渔场，第二分场是杨坝大队的熊大塘。省、地、县在联办渔场投资 13.5 万元，其中 10 万元作为固定资产，0.35 万元用于购买鱼苗、渔具。

1981 年 10 月动工，到 1982 年建成投产，共建鱼池 130 余亩。其中，总场巫大塘面积 47.6 亩，大小鱼池 15 个，塘坎上修建渔场，场长 1 人，职工 13 人。第一分场小塘子渔场鱼池 5 个，面积 40 亩，场长 1 人，职工 6 人。第二分场熊大塘鱼池 8 个，面积 50 亩，场长 1 人，职工 9 人。新安公社还培训了谢治良、梁明清、陈志伦为技术员，专门研究、指导鱼类的繁殖和生长。

64 岁的谢治良回忆说，他在重庆合川水产学校培训学习回来就分配到了渔场。公司经理是梁炳安，有 20 多个职工。这 3 个渔场总称为新安渔场，1982 年开始产成鱼，主要养殖鲤鱼、花白鲢、草鱼、白鲫鱼、罗非鱼等，每年可产几百万鱼苗。那时，新津县还曾多次前来参观学习取经。1985 年，在成都市农委科教处的支持下，新安乡还在



新安曾经是邛崃的商品鱼基地。

丘陵区开展连片稻田养鱼高产试验，虽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仍然获得了较好收成。1987年，新安渔场申请转贷世界银行贷款及省、市配套资金5.56万元，改建鱼池和添置设备。到1989年年产成鱼26.5吨。

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后，新安乡的渔业实行专业养鱼和群众养鱼相结合，形成了自繁、自育、自养体系，渔业产量大幅度增长，既满足了城乡群众的生活需求，又拓展了农村致富之路。

除了养鱼外，新安水果种植起步早，曾经也辉煌了一阵子。新安水果以其色泽鲜艳、果皮光滑、甜酸度适中、成熟期适时的优势而闻名，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远销省内外，是邛崃主要的水果基地。

新安于1964年开始种果，从江津县调回7万株江珠橘苗，分配到各生产队栽种。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当年只有八大队二队和四大队三队共成活200株，余皆枯死。

刘启全原是新安果品分公司经理、果技员，谈起新安水果种植历史如数家珍。他说，1974年冬天，县上在浅丘地区大抓水果种植，新安当年就嫁植和定株柑桔幼苗12.5万株。当时发展了82个生产队小果园，龙安、朝阳等11个大队级果园，3个公社级果园，温江地区还拨了部分资金支持水果发展。果苗种下后，公社组建了专业队加强管理，适时灌溉、除草、松土，按时修剪。每年摘果后和夏天都要修剪一次，夏天还普遍拔掉秋芽。每年7月施一次壮果肥，摘果后又施一次。对于病虫害的防治，那时主要采用石硫合剂灭红蜘蛛和白猫，用洗衣粉加柴油，或水牛尿消除螨类。

每到柑桔收获季节，橙红鲜艳的桔子压弯了树枝，果实累累，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绵延在新安丘陵区的八里十乡。刘启全说，新安果品分公司实行产供销一条龙，主管单位是邛崃县果品公司、新安乡政府，经济性质为集体联营，主营干鲜果品，兼营果树所需的农药、化肥及农副土特产品。水果属二类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分为三个等级议价收购，政府免税。公司拥有一部农用车，三间营业门市，一个储藏库。1983年9月，国家投资30多万元在新安修建了联营柑桔储藏

库，该库房建筑在水井村六组的荒坡之上，征用面积 10 余亩。构筑围墙为界，项目总面积 1243 平方米，三幢库房共 742 平方米，其中半地窖式联营库 261 平方米，简易库 161 平方米，调温通风库 320 平方米；营业门市三间 93 平方米，办公及住房 17 间 276 平方米，还有厨房、水塔等设施。

新安水果品种有早蜜柑、中蜜柑、脐橙、血橙、锦橙、红毛橙、夏橙，到 1985 年底，全乡水果总产量达 130 多万斤。每到水果上市的季节，各果园将果品运到服务站，果品站派专人验收水果。合格了，就收储起来，然后分批装车运出去，销往东北市场。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新安各大队的果园最初属于集体，由专业队管理，实行评工记分，吃大锅饭。1981 年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集体果园也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到 1987 年，果园承包实行与集体按比例分成，同时鼓励农民大力发展家庭小果园，发展果树专业户，有的农户靠种植水果发家成了万元户，有的成了水果经纪人。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吴建成提供)

前身处于船形小岛的石头场

何承洪

石头场位于邛崃西南部，距邛崃城区 20 公里。民国二十九年（公元 1940 年）建石头乡。新中国成立后沿用此名。1958 年成立石头人民公社（1958—1960 年，临济乡曾并入），1982 年 1 月撤社建乡，成立石头乡人民政府，驻地石头场。2004 年，石头乡并入临济镇，为石头村。曾经的石头乡，面积 27 平方公里，人口 1 万余人，下辖 9 个村。石头乡除沿石头河两岸的两个村为平坝外，其余都是丘陵区，林木繁茂。境内海拔最高 626 米，最低 535 米。全乡分粘土和半沙土，土壤肥沃，农作物产量稳定。

石头乡因乡政府驻地石头场得名。据民国《邛崃县志》载：“石头场，四面皆山，场在平坝，不知其命名之义。”据乡人称，其说有二：一是由于场侧河床石头较多，所以河名为石头河，场也为石头场。二是相传很久以前，离场不远有独堰，堰头有二石，作为流水口，石长约四尺许。后来二石不知何时被人盗走，故取石头为场之名。

石头场原来是在一座船形的小岛上，这个小岛大约有 100 多亩，位于现在石头场的东南边。小岛四周被石头河河水环绕，人们怕这条“船”被水冲走，便在西北边的“船”头“船”尾各修两道石条搭的踏水路与对面山边相连，以期把这条“船”牵住。岛上的人就是通过这两条踏水路与外界联系。原来岛上住着几十户人家，房屋顺东南和西



2000年3月，石头乡人民政府大门。（杨洪伟提供）

北两岸排列，在西南和东北方“船”的头尾分别建有两道隔栏。夜晚上下两道隔栏一关，内外便隔离开来，石头场便进入安静的夜色中。处在“诺亚方舟”上的石头场，让人们躲避了一场场洪灾，也让场镇得以延续。

可能是与临石路（石头到临济的公路）较远的原因，老的石头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的石头场是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形成的。

当地人说，清乾隆年间，皇帝曾命人在河边铁碑寺的基础上改修了一座新庙，有五朝大门，雕刻精美，色彩艳丽，雄伟壮观。修新庙时，附近寺庙的和尚都来帮忙，大家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前后都看不到头。走进新庙大门，左右两边供有四大天王、八大金刚。中道有九尺宽的拱拱桥，长约五六丈。桥两边有石栏杆，下面有水池。水池一亩大小，深约五尺，有许多鱼在池中游动。水是人们修双合堰汪滩时引入，清澈见底。桥中间还有一座八角亭，可在亭上纳凉、观鱼。新庙的第二殿是城隍殿，共十间。殿后是四间走廊，两边天井种有花草，还有三棵大桢楠树。

为什么乾隆要老远叫人在石头场修新庙呢？据当地 76 岁的王天云和 74 岁的陈广全老人讲，原因是石头场周围山形独特，地脉好，风水师认为这个地形容易出草寇皇帝。而且当地植河坝就有植姓人家人丁兴旺，还出了个大官。乾隆怕出草寇皇帝危及自己的江山，于是叫风水师来看后，修新庙镇住龙脉。说来也怪，从此以后，植氏家族便只是出“将”——草鞋匠。旧社会植家男男女女都以打草鞋为生，住的都是破草房。人们说这就是因为五朝门压了植家穴脉。新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部分改成了石头小学，其他房屋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包括雄伟的五朝大门也在破除封建迷信活动中被拆除。现在唯有那三棵枝繁叶茂的桢楠树挺立在原地，见证岁月沧桑。

石头场过去的新庙及雄伟的五朝门，当地还健在的许多老人都看到过。据石头场的吴永安老人讲，他近 70 岁的老表韩德雅是中国美协会员，擅长中国画、雕塑和年画，名山人，就曾画过新庙和五朝门。韩德雅在电话中说，20 世纪 60 年代他画过新庙和五朝门，原稿不知存放哪里了，但对新庙和五朝门印象特别深。

因为修新庙，当时官府出钱修了条官堰，在流入新庙水池后放入当地的农田中，有效地解决了缺水问题。至今这条官堰还在发挥灌溉作用。

成为中共邛大特区区委和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地，使石头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声名远扬。当地 86 岁的吴明扬老人所讲的一个有关红色石头场的故事，不由让人感受到那段掩映在山水间的红色记忆，体味艰难困苦中的峥嵘岁月。

1932 年 12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入川。为配合苏区的斗争，打乱军阀的防御部署，中共邛蒲大县委遵照中共四川省委的指示，决定发动武装起义，组建抗捐军。1933 年 6 月 26 日，中共邛蒲大县委领导的上川南抗捐大同盟在邛崃夹关乡发动王店起义，上川南各县贫苦农民群起响应，以从事篾工手艺为生的蒲江甘溪贫民王甫成就在此时参加起义军。随后，上川南抗捐军转战邛崃、

蒲江、名山、丹棱、洪雅、芦山、大邑等县，声势渐大，起义队伍发展到 1000 多人，控制了较大区域，建立红色根据地政权的条件逐步成熟。为加强邛大地区的工作，适应武装抗捐斗争的发展，1933 年 10 月 29 日，中共四川省委在石头场建立中共邛大特区区委，区委书记由上川南抗捐军政委余宏文担任。1934 年 7 月，上川南抗捐军在石头的蒋山张老房子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川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邛大特区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大会选举王甫成为特区苏维埃政府第一任主席。成立大会上，王甫成号召农民起来与地主进行抗捐抗租斗争。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以邛（崃）蒲（江）名（山）三县交界的石头场为中心，辖域为邛崃临济、道佐、银杏、太和、天台、高何、火井、油榨、南宝、夹关等镇乡和蒲江甘溪、大塘各一部分，以及名山廖场、中峰各一部分，覆盖纵横邛（崃）、蒲（江）、名（山）、丹（棱）、芦（山）、大（邑）、崇（州）等县山丘地区 70 余里的广阔红色区域。



2000年5月，石头乡农民精收细打油菜籽。（李文勇提供）

石头场蒋山张老房子尚存有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遗址。它不仅是中共邛大特区区委的诞生地，也是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还是上川南抗捐军战斗与工作过的地方。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历时两年多，积极组织引导群众武装抗粮抗捐，开展游击战，开辟了邛（崃）蒲（江）名（山）三县结合部石头场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达到了牵制敌人、扰乱敌人后方、打乱敌人围攻苏区、支持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目的，有效打击了地主军阀的封建统治，为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因泉水河涌流得名的乡镇

伍有兴

泉水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邛崃市东部，距成都市区 54 公里、邛崃市区 21 公里。1940 年，邛崃置泉水乡。1958 年改公社。1982 年改乡。1996 年，泉水乡建制，面积 19.9 平方公里，人口 1.5 万人，辖泉水、高河、白衣、樊哈、马河、上龙、永安、新建、富营、新庄、玉泉、中心 12 个行政村。2002 年撤乡设镇，镇政府所在地依然保留在原址。2004 年，泉水镇撤销建制并入羊安镇，原镇政府所在地改建为羊安中心敬老院，一直沿用到现在。境内的泉水桥因泉水河涌流而得名，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千年之前。著名的川藏公路 108 国道穿镇而过，交通优势明显。泉水镇 1953 年始建兵站，沿用至今，军民亲如一家人的佳话广为传播。场镇中心广场矗立着一座纪念碑，那是 1987 年秋落成的“军民共建文明集镇纪念碑”。

泉水桥

一说起泉水镇，就不得不提泉水桥。

在羊安街道中心村 6 组的翠竹茂林中，有一座因泉水河涌流而得名的古桥，名叫泉水桥，历史悠久，历经沧桑。

泉水桥有两洞，洞与洞之间有鱼嘴，系青砖和红砂石建造，做工

精细，气势磅礴，桥面两旁用红砂石砌成近一米高的护栏。桥头有一棵三人合围大的麻柳树，是老百姓歇息纳凉的好去处。

据泉水桥旁的老人回忆，早在民国时期，泉水桥就已经开始形成集镇，每逢三、六、九日赶场，当时集镇约有三十来户人家，房屋均系中式瓦房，木质结构，街面宽约八米左右，有两家茶馆、三家中药铺、五家饭馆、七家旅店，街上人群熙熙攘攘，四面八方的商贾云集于此，从事各种农副产品和日用百货的买卖。还经常有戏班子搭台演出棒棒戏（木偶），引得百姓争相观看，好不热闹。

20世纪30年代，闻名于世的川藏公路穿境而过。1940年，作为川藏公路上一个重要的驿站，泉水桥还设立了泉水乡公所、邮政所等机构。

在泉水桥的下游一箭之地，还有著名的杜水碾，因主人姓杜而得名。据说，此碾建于清朝同治六年，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水碾前方石梁正中镶嵌楷书“川流不息”四个大字（落款时间为同治六年），最初系楼板铺就，甚为简陋，后来在咸丰年间作全面改造，用红砂石踩拱，有大槽、小槽。水碾常年为群众服务，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现在已经整体搬迁到古色果香家庭农场。

新中国成立前，在泉水桥西面，有一个地方叫七里坝。方圆七里没有人烟，七里坝因此得名。七里坝区域内，有一条溪沟，两边柳树成荫，沟里鱼儿成群，有鲤鱼、鲫鱼、鲢鱼等，许多百姓爱到这里捉鱼叫卖，鱼儿常常用细线串连。这条原本没有名字的溪沟因此得名串渔沟。

正因为解放前七里坝和串渔沟方圆七里没有人烟，格外偏僻，这里就成为棒老二（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据泉水桥当地一些老人回忆，在当时，很多路人和外地行人在这里经常被棒老二洗劫一空。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不管你的本钱有好大，很难走过七里坝。不管你的本钱有好多，很难走过串渔沟。”从民谣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七里坝和串渔沟的强盗抢劫是何等猖獗！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治安的好转，改革开放的深入，七里坝和串渔沟面貌一新，如今已成为富庶之地。

而始建造于清代，位于泉水村 3 组的周林盘井颇有特色。该井为圆形

直筒井，井口直径 0.5 米，井深 3.6 米。井壁用红砂条石分层砌筑而成。八边形井盖石，圆形井口无井圈。现仍为当地村民所使用。

自 1954 年川藏公路改道后，泉水桥场镇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繁华，赶场的人数大不如前，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其他场镇的兴起，泉水桥场镇不再赶集。



位于泉水村 3 组的周林盘井。（彭明权提供）

永安场

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2 年土地改革期间，泉水乡公所搬迁到中心村 7 组陈德仁家中。1958 年，由于全国行政体制改革，泉水人民公社取代泉水乡公所，办公地点搬迁到永安场。

一说到永安场，它的来历颇有故事。永安场坐落于斜江河畔，起初不叫永安场，叫杨家场。清朝道光年间，羊安对河有一户姓杨的人家在此开设幺店子（路边小店），以供来往行人休息买吃之用。时间一久，附近很多小商小贩便聚集于此开始经营活动，逐渐形成场镇。由于夏季斜江河水泛滥，幺店子不久便迁至河对面形成新杨场。出于区分，老百姓习惯称原旧址为老杨场。清朝光绪末年（公元 1904 年），

为吉祥起见，老杨场改为永安场，新杨场改为杨安场，也就是后来的羊安镇。在永安场和杨安场之间，建立了永安渡口，方便路人通行。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永安渡口配有车渡船两艘，摆渡过往汽车。后来，随着交通量的增大，车渡船渐渐满足不了过往车辆的需要。据曾经家住永安场的耄耋老人许龙回忆，当年他在永安村小上小学，课外休息时间爱去渡口目睹车来人往的热闹，多次看到待渡的车辆不见头尾地排到两三公里长。1959年，由四川省桥梁公司设计，新津养护分段施工，在永安渡口上游建羊安大桥。次年大桥竣工，桥长166米，混凝土墩台，7孔，木桁架桥面，结束了斜江河多年车渡船的历史。1966年，羊安大桥改建钢筋混凝土结构桥面，增设人行道，当时人们称新桥为钢桥。

1953年，永安场旁边始建油库和兵站，本名新津油库和邛崃兵站，当地群众习惯叫油库为永安场油库，邛崃城里人把油库和兵站统称邛崃兵站。油库和兵站都隶属成都军区后勤部成昌兵站，分别负责西藏及川藏公路沿线部队和地方的战备油料储存、保管、收发以及进



1962年永安加油站部分干部战士。（朱华林提供）

出藏区人员的食宿接待任务。油库和兵站占地一百多亩，其中，仓库区约七十亩，生活区约十亩，其余地段为多功能服务区。据先后担任油库上士和兵站司务长的朱华林回忆，1957至1962年间，油库有干部战士五六十人，兵站只有十几个人。油库当时是营级单位，主任先后由武兵（老红军）、杨香林和许光忠担任；兵站是连级单位，站长王福贵，指导员雷秋发。当年的永安场油库和兵站，是成都西出的第一个军队油库和兵站。中印战争期间，通过川藏公路运往西藏和中印边界的油料，内地派出的大批军队，都要从这里经过。后来，随着部队军营的改革，永安场油库被撤销，兵站仍然保留下来，一直沿用至今。

永安场镇住有一百来户居民，仅有一条独街，全长约一公里，客栈、食堂、酒馆应有尽有，从建场到后来的20世纪80年代，每月一、四、七赶集，曾经车水马龙，十分闹热，是川藏公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后来，随着川藏公路的改道，永安场和泉水桥一样，逐渐没落。如今，这座拥有两百余年历史的老集镇，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风貌，住着上百户居民，只是早已褪去了往日的繁华，变得异常宁静。

新食堂

随着永安场的没落，泉水的另一个场镇逐渐兴起，直至现在依然热闹不减，那就是新食堂（泉水集镇）。

新食堂始建于1958年，当时为公社化末期，大集体、大食堂正在转型中，当地人李轩书、周小溪在板凳湾路边修建十余间中式房子，建材是从高河村清凉寺拆迁而来。房子修好以后，他们合作开办食堂。由于诚信经营，名噪一时，新食堂由此而得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泉水人民公社改为泉水乡。1982年，著名的川藏公路108国道经过改

道，从泉水集镇中心穿过，新食堂的交通优势立即凸显出来，马路经济日益发达，成为连接羊安、邛崃、牟礼等地方的主要交通枢纽。而随着泉水乡政府、邮电所、供销社等政务部门陆续搬迁到此，新食堂逐渐成为集镇，取代当地永安场成为泉水乡的政治中心和物资交流集散地。当时，泉水乡政府设立在泉水集镇南街 110 号，占地 20 余亩。



2000年交通优势凸显的泉水集镇。（张新民提供）



2002年庆祝泉水撤乡设镇。（刘晓雨提供）

新食堂集镇面积 300 余亩，常住人口 300 多户，1000 余人，集镇共有四条街，东西南北各一条，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有铺面 500 多间，其中有 102 家铺面从事经营活动。

1987 年，在泉水集镇四条街道交汇的中心广场，修建了一座引人注目的标志性建筑——军民共建文明集镇纪念碑，彰显着建国以来当地驻军与百姓水乳交融亲如一家鱼水情的佳话。此碑碑基 9 平方米，碑高约 18 米，砖结构，金三角形三个平面，底部约 3 米，文化石装饰，三个立体平面均装饰有鲤鱼跃龙门、莲花等各类花卉和浮雕，古朴典雅，栩栩如生。塔的中部为主体部分，约 13 米，塔的三个面分

别镌刻着白底红字非常醒目的题字。向着驻军部队的一面为“共建开新花，文明结硕果”，向着 108 国道川藏公路的一面为“川藏文明路，军民共建花”，向着集镇繁华地段的一面为“军民共建文明集镇”。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泉水乡的社会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乌木产业在当地开始繁荣起来。90 年代初期，牟礼乌木村人韩水林，泉水当地人许凤祥、盛文安在新食堂场镇开始收购乌木，并销往上海、广州、江浙地区。经过数年的经营，随着市场的拓展，乌木生意越来越好，从事乌木产业的老板也从最初的几人增加到后来的 30 余人。在他们的带动下，乌木产业日益兴旺，乌木交易价格从每立方米两三万元到四五十万元不等，每年交易额高达上亿元，一度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乌木交易集散地，每年全国各地到泉水采购乌木的商人络绎不绝。1999 年，泉水集镇本地人张信明也开始从事乌木生意，2007 年，他兴建明韵清风经典家具厂，乌木产品多达几百种，销往全国各地，生意火爆。但从 2013 年开始至今，受各种因素叠加的影响，泉水地区乌木产业出现了连续下滑的势头，乌木交易和乌木产品销售受到较大的影响，市场低迷。

临济：茶果花香溢古道

兰华荣

因常到临济镇采访撰稿，临济在我的印象中，遂从疑是石头多的地方，转换成绿水青山花果飘香的镇乡。临济地处邛崃、名山、蒲江三县交界处，是一个鸡鸣三县之地。临济场与名山廖场仅仅一河之隔，每逢赶场天，两县群众同日赶场，你来我往，买卖兴隆，十分闹热。清代同治年间诗人熊维芳赶场后，曾作一首《石头场》诗吟赞：“市场斜抱远山陬，别有峰尖锁石头。城比金陵高入古，源探河水积成秋。清溪浪涌巘巘立，极浦波冲凿凿流。交易日中噬嗑取，何人不到此间游。”道出了赶山区小场的妙趣。

(一)

临济镇古庙多，有静庙、新庙、峰顶寺、瑞林寺等，各有特色。静庙，位于石头村，始建于明末，庙内有城隍、文武二将、三霄圣母等塑像。庙门外有五层六角形字库塔一座。新庙，位于石头河对岸，始建于清代雍正年间，庙门仿北京午朝门建筑，远观宏伟壮丽，近看龙神佛刻雕塑栩栩如生，庙内供奉十殿阎王，有行身木偶城隍和坐身城隍等塑像。峰顶寺，位于石头场西800米处，因建庙于青华山上高处，故名。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庙内供奉木莲和尚、西天佛祖、观

音菩萨等神佛。清代诗人熊维芳有《峰顶寺》诗吟记：“五更敲罢数声钟，顶射圆光月满峰。仙眼双开招岭鹤，禅心一悟指天龙。云生上界梯追步，石现前头面洗容。此会直从高处望，山山都现岁寒松。”写出了深山古寺俨然已成胜地的庄严景象。

瑞林寺，位于龚土扁，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为龚姓先祖捐资修建。庙内有藏经楼、观音殿、阎王殿、药王殿、牛王殿、四大天王殿等。该寺独特之处是塑造并供奉有胡须的男性观音和女性观音两种不同形象，在国内寺庙中是颇为罕见的，表明建庙人具有渊博的佛学知识和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可惜，这几座寺庙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拆毁。

临济镇有茶马古道遗迹。兴于唐，盛于宋，历明清，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茶马古道，在邛崃境内有遗址 30 公里。《平乐镇志》记载：“2008 年文物普查，在邛崃市临济镇的青华社区、瑞林村四村民组、凉水村十村民组……均发现古道遗迹。”龚扁的龚朝银回忆：“在临济镇龚土扁有两条古道，一条在龚锡明房屋前面，一条在我家房屋左侧。古道是由一块块大石板铺砌，两边镶砌大石头。石板上有许多较深的马蹄印，表明曾经是马帮来往之地。”茶马古道沟通了内地与藏区的经济往来。



茶马古道
上的马
帮。（张
青提供）

清代至民国时期，临济的龚烧房、龚染坊、官庄窑、闫碗窑、龚瓦厂等作坊曾经名扬古道，盛极一时。其中，官庄窑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 1779 年），王福蛟从新津迁居邛州石头乡包塘村，见当地盛产高岭土（白鳝泥），发现商机，即请来孔明乡技师，兴办官庄窑。该窑建有一座长达 14 米、有烟道 11 窗的龙窑，烧制各种坛罐及生活用品，畅销于周边地区。新中国成立后，由社办企业经营。1977 年，该窑产品参加展销，荣获邛崃优质产品称号。改革开放后，邛酒企业大发展。该窑及时烧制一批容量可达 1000 斤的大酒坛，满足了酿酒企业贮酒的需要。该窑生产的坛罐具有防鼠、防潮、防腐等特点，泡菜坛、豆腐坛具有久贮不变味的特点，深受群众喜爱。

闫碗窑兴办于清代，以烧制各种陶器为主。该窑能烧褐色、白色、青色、褐黑色、猪肝红等多种釉色，还能烧制薄如玻璃杯的白胎白釉的薄胎碗，畅销于周边各县，还通过茶马古道到宝兴县新街子赶

山，销售或调换物品。该窑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歇业。1984 年重新修筑，烧制坛罐，经营到 1997 年歇业。



曾经名扬古道的官庄窑。（彭明权提供）

（二）

临济与名山毗邻，种茶历史悠久。明代，邛州主要产茶区“十八堡”中的“石匣”，即石头场的称呼。临济属丘陵区，自然条件优越，前有蔡山、蒙山，后有雪山、雾山，土壤肥沃，坡梁纵横，谷岭相

间，寒暑不齐，气候亦异，极宜茶树生长。生产的黑茶（茯砖茶）、绿茶、红茶，深受周边城市民众的欢迎和康藏地区藏民的喜爱。清代吴振棫著《养吉斋丛录》记载：清代道光年间，各省进贡的物品中即有邛州的贡品，“四川督年贡进……砖茶一百块、锅焙茶九包。”锅焙茶产于火井漕，砖茶产于邛州何地呢？宋代元丰《九域志》说：“邛州贡茶，造茶成饼，二两，印龙凤形于上，饰以金箔，每八饼为一斤，入贡，俗名砖茶。”邛州是茶乡，产砖茶的茶场多，与蒙山为邻的临济茶品质好，是进贡砖茶的茶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以粮为纲，临济的茶园纷纷改种粮食。上世纪90年代，临济凉水村党支部书记龚国忠参观学习后，决定调整产业，发展茶树种植。他将本村水土样本送去检验，得知土壤微酸，适宜种茶，当即召开村民大会，号召大家种茶。但是大多数村民尚不知种茶的长远效益，因此不愿意将粮田改种茶地。信心满满的龚国忠遭遇挫折，但他并不灰心，围着凉水村转了三天，苦思转变村民观念的方法。他发现本村有多处荒山荒地可供种茶，便带领村干部在凉水村四组山上开荒30多亩，平均分配给38户村民种茶。市结对帮扶单位及时送来茶树苗，于是，家家户户都种上了茶树。三年后，村民通过对比发现，种茶比种粮收入翻了好几倍，种茶的积极性更高了，纷纷改粮田为茶地。临济镇各村的农民看到种茶效益好，也纷纷改种茶树。到2005年，临济镇有茶叶基地1300公顷，分布于2个社区7个村，年产各类优质茶叶687吨。主要品种有福鼎大白、黑茶等。制茶企业随之兴起，已建有三个茶厂，及时收购鲜叶，加工生产成品茶。

我曾问龚国忠：“农民多年来都是种田为生，你咋个想到要种茶才能致富呢？”他坚定地说：“凉水村山坡多，种粮产量低。不因地制宜，改种茶树，怎么改变贫困村的面貌呢？”走进农户，看到家家修建的房屋宽敞明亮，许多农民拥有货车、汽车、摩托车、电器用品等，我从心里感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确为临济带来了许多新变化。



临济是邛崃的柑橘之乡，家家户户都拥有成片的果园。（骆敏锐提供）

（三）

临济是邛崃的柑橘之乡，其发展历程颇为不易。1963年，临济的龚锡明为探索多种经营、农民增收之路，创建了“五一果园”。临济适合种什么果树呢？他心中没底，便去咨询农技员，又到水果市场考察，发现人们喜爱苹果和柑橘，便决定先试种。为了节省苗木费用，他在一些果园修剪枝桠时，剪回一批果枝，扦插在自己的地里育苗。三年后，果树开花结果，但是苹果个小，没有卖相，销售困难。柑橘个大汁多味甜，市场反响很好。于是，他向各村推广柑橘种植。一些农民利用荒山荒地种植柑橘，尝到了多种经营的甜头。

1978年，龚朝银任临济公社党委副书记。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他认真作了调查研究，经党委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在临济发展柑橘，并制定了多项措施促进柑橘种植：一是补贴，农民每种一棵补贴0.10元；二是贷款，帮助经济困难的农户到信用社贷款购买果苗；三

是划出土地种植柑橘，全乡 9000 多人，要求每人调出 1 分 2 厘地种植柑橘，将一些旱地变成果园。农民种植积极性很高，不久家家户户都拥有成片的果园。1980 年，柑橘种植达到 40 万棵。

刚开始栽种柑橘时，个别乡领导不支持，竟叫农民扯掉果苗栽秧苗。龚朝银顶着压力，坚持发展柑橘不动摇，并加强技术指导，帮助农民学会嫁接果树、防治果树病虫害等。临济柑橘越种越好，品种越来越多，迅速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柑橘之乡。经省农业厅检测认证，临济镇双绿公司生产的“峡临牌”柑橘系列产品被评为省级无公害产品。到 2005 年，全镇果园面积发展到 660 公顷，品种有椪柑、甜橙、早熟蜜柑、脐橙、粑粑柑、柚子等 20 多个，年产 1.14 万吨，远销俄罗斯和东北三省等地。

(四)

种植花木，是临济人增产增收的又一产业。他们利用房前屋后空地，栽种桂花、罗汉松、银杏等苗木，美化环境，增加收入。其中，善于种植花木的当属龚兴国和他的子女。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龚兴国即开始种植茶花。因缺乏经验，引进的茶花品种遭受多次失败，但他毫不气馁，坚持种植，不断积累经验。1984 年，他到云南、贵州等地考察学习，开阔了眼界，增强了种植茶花的信心和决心。引进 400 多个品种，将茶花园艺场由 3 亩扩大到数百亩，年销售额达 300 多万元。

龚兴国的儿女们从小跟随父亲学习花卉栽培和嫁接技术。后来，龚氏 5 兄妹共有各类花卉苗木基地 520 亩，品种有茶花、罗汉松、腊梅、金弹子及各类盆景，其中茶花苗圃 300 余亩，品种 800 个，已成为成都地区著名的苗木专业户。

龚兴国之子龚国文善于学习和经营，他培育的盆景多次参加全国和省市比赛，获得奖章 60 余枚。创办邛崃市国祥花卉苗木种植专业



龚花园里茶花、桂花、罗汉松、金弹子，以及各种造型的盆景，无不引起观赏者的兴趣。（罗永强提供）

合作社，园林盆景从业人员 200 余户，500 多人，每年提供 300 余个就业岗位。在平乐镇鹤鸣村建有 108 亩茶花基地，在临济镇有苗木园艺基地，这些基地是集观光、科研、接待、销售为一体的生态农业产业基地。在郫都区春天花卉市场有一个经营门市；三圣花乡有 5 个花木经营门市，面积 3500 平方米；邛崃花木盆景市场有 3 个经营门市，面积 1300 平方米，为城市绿化和市民美化环境作出了贡献。经营品种为各类盆景、多肉植物、茶花、罗汉松及各类盆景等，年销售额 1000 万元左右。他掌握了繁殖四季茶花的核心技术和盆景蟠扎技艺，培育苗木周期大大缩短，培育的茶花品种繁多，可与云南茶花媲美。他以野生油茶作为母树，培育品种繁多的世界名贵茶花。已培育出可耐 40℃ 高温、10℃ 低温、四季开花、花期长达 9 至 10 个月的茶花品种近 500 个，引起了世界茶花专家的关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国内专家纷纷前来参观考察。

我曾经多次游览位于临济与平乐交界的“龚花园”。该花园占地

150多亩，主要种植四季茶花、桂花、罗汉松、金弹子等花木，培育各种造型的盆景。花园中有几棵造型为“寿”字、“春”字的树木，无不引起观赏者的兴趣。坚韧的树木，经过人工技术造型，塑造成曲折有趣的文字树木，令人惊叹园艺的高超！置身于花田小径，我不禁吟诗纪游：“胭脂点染送幽香，朵朵奇葩竞靓妆。夏梦盛开承暑热，冬寒独放傲冰霜。盆花美妙凝清韵，寿树精工送吉祥。迎客松前留倩影，漫观园艺沐春光。”

每次到临济，走进果香、茶香飘溢的柑橘林和茶园，我为临济农民拥有增收致富的产业而欣慰；走进龚花园，在满园美丽茶花和千姿百态盆景的簇拥下，我对建设公园城市的内涵有了更深的体验。临济，正以它特有的产业方式走进我们的生活之中！

南君平的轶闻趣事

陈映平

据 1994 年出版的《邛崃县志》载：南君平乡位于县城北，西北与拱辰公社连接，东与大邑县的高山、三岔公社交界，南与桑园、王泗接壤。境内属平坝地区，最高海拔 528 米，最低海拔 500 米。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为 16℃，无霜期达 9 个月左右。全乡面积 20.1 平方公里，人口约 1.23 万人，下辖 11 个村，乡政府驻童桥，距县城 6 公里。

(一)

童桥是明末清初始建的场镇，场上有一桥，为童姓人家修建，故名童桥。民国初曾改童桥为万兴场。民国二十九年（公元 1940 年）实行新县制时，因该地为汉代著名星相学家严君平故里，故改名为君平乡。新中国成立后，沿用此名。1958 年公社化时，成立君平公社。1980 年地名普查，为区别于彭县君平公社，改名南君平公社。1981 年撤社建乡，成立南君平乡人民政府。2004 年 9 月并入桑园镇，现为童桥村，村委会为君平雅居。

20 世纪 50 年代的童桥，街道不足 200 米，人口不到 100 人，泥巴路，土夯、竹篱笆墙体的小青瓦和草房铺面沿街而建。街中有一大坝子，因中间有一约两尺高的石砌台子，坊间称为台子坝。平日作为

街道的集市，遇有时令节庆，如端午、中秋、春节、元宵和赶场天，城里有名的戏班子轮番来唱戏。演员背着锣鼓、二胡和各种道具，天不见亮就从城里步行到童桥，散场后打道回府。

若是数九寒天大雾弥漫，早晚有时要打火把，或提煤油灯才能看清路。春节和元宵节时，有唱戏的、耍狮子灯和牛儿灯的，沿街有很多卖叶儿粑、酸粉、甜豆花等童桥特色小吃的，偌大的台子坝和街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最出彩的要数当地民间艺人耍的狮子灯，十几张大饭桌垒起，近十米高。在一阵响亮的锣鼓声中，艺高人胆大，倒挂金钩、天鹅抱蛋、仙女散花等精彩动作频频呈现，观众无不发出惊叹和报以热烈掌声。据传，在一次演出高潮迭起之际，桌子突然轰的一声倒下，观众惊叫着四处逃逸。演员却像电影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样，一个跟斗扯过去，抱着旁边一棵大槐树笑着向观众挥手致意。台子于 1960 年代被毁。

1970 年代初，童桥的叶应付在正街开了一家茶馆，十几间铺面，梁木和青瓦的庭院风格，与童桥上一景一木相映成趣。一进门，宽敞、明亮、高高的土灶台上，几把古老的铜壶冒着沸腾的水汽。大堂墙上丹青留韵，前后天井花簇艳艳直望蓝天。每逢赶场天，城里一个叫吴独手的民间老艺人，总是带着门生来到该茶馆说书、打金钱板。

童桥河一湾清流，来自大邑䢺江的水穿街而过，碧波粼粼的水中倒映着翠竹、青瓦、白墙、蓝天以及屋檐下晃晃悠悠的包谷、海椒和葡萄架，流经拱辰、前进，在宝林汇入南河。街上的人们吃水、淘菜、



位于公道村的严君平墓。



1977年君平公社三大四队喂牛使牛模范。

洗衣、灌溉田地都用河里的水。据今年 72 岁的童氏家族后人童桂安回忆，小时候听爷爷说，童桥为童氏家族明代修建，到清代时桥长约 15 米，桥上有石柱，柱上有人物、花卉等浅浮雕图案，是当地的文化地标。后因改河、修路等原因，桥变短了。70 年代末，县农机站的履带拖拉机来君平支农，当开到桥头时，师傅担心桥窄承受不起拖拉机，决定快速通过。结果，猛轰油门过了桥的拖拉机毫发无损，可桥上的石柱和木栏杆却被撞断掉入河中，至今下落不明，桥也未修葺。

(二)

与南君平乡有深厚感情的欧大爷清楚地记得，上世纪 60 年代初，他作为县食品公司委派去支援的屠宰人员，在南君平工作的点点滴滴。他说，那时的童桥，一条扁担弯独街，街上大多是草房子，只有街中间才有些瓦房子。北面街尾子上一条机耕道，一边通大邑三岔、

高山，一边通桑园、王泗，南与拱辰泉水河接拢。天晴尘土飞，下雨满地泥，交通落后，进城全靠步行。赶场天，穿着补丁衣裳的农民担着自己种的花生、烟叶、海椒、大米、小麦等各种农副产品上街卖，换些钱买油买盐和日常生活用品。饿了，一角钱吃一碗血旺子和甜豆花；渴了，喝两分钱一碗的老鹰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卖肉的刀儿匠名气很大，吃得开，可与当时的学校教师、供销社职员、电站职工和汽车驾驶员等齐眉比肩。虽然工资与其他行业一样，但请托的人多。只要有人到家来找，十有八九都是找他帮忙割肉的。欧大爷不无自豪地说，我随便走到哪里，都有人主动倒茶、寒暄，甚至递上当时流行的黄金叶、大前门烟，点然火，套近乎。他们要割肉时，往往提前几天就将肉票和钱送到我家，为的是开后门割肥宝肋肉。一拨一拨的，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很是热闹。欧大爷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屠宰生猪，按计划保障供应南君平乡场上的居民和当地农村群众猪肉。有时在县城北门屠宰场杀好猪，请南君平乡拖拉机站的手扶式拖拉机运到童桥街上，每次一般拉七头猪。

欧大爷的肉摊子摆在童桥边上。一根大木棒一头穿在大槐树丫中，一头支在木三角架上，撑起的黄油布大伞在太阳照射下，明晃晃的耀眼睛。十几副肉钩子、两把大砍刀、一把刮子、一把打气筒和几把长短不一磨得锃亮的尖刀，油浸浸的与一大捆干谷草搓成的绳子扣一字摆开。大片大片白里透红的猪肉挂在钩子上，远远望去，让人眼馋。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只要农民上街，哪怕皱巴巴的牛皮纸钱包里空空如也，没有一分钱、一两肉票，也要在肉摊子前停一停，转一转，徘徊好一阵。尤其到了下冬和临近春节，摊子还没有摆好，大槐树下就已排起了黑压压的长队，高峰时，一天30头猪都不够卖。“师傅！师傅！我要宝肋肉，割肥的！割肥的啊！”的喊声不绝于耳，肉摊子被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若遇下雨天，晶莹透明的塑料布用手一甩，把肉遮得严严实实……

欧大爷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大娘来赊肉。那天散了场，正在收拾工具准备回家，忽然从背后传来微弱的声音：“老弟，包包头没得钱赊点肉吃要得不？”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晓得又是大娘来赊肉了。尽管肉只有 0.68 元一斤，可大娘已先后赊了四回，都是欧大爷垫钱才把公司的账结清。赊吧，每月的工资实在垫不起。不赊吧，看到大娘苍白的脸，说话有气无力。纠结之时，耳边又回响起“小伙子，来，趁热吃碗苕尖子饭！”的声音。那是欧大爷在童桥工作的第二年冬天，某日细雨霏霏，寒风阵阵，卖完肉已是下午四点过，又冷又饿，晌午饭还无着落。正在犯愁时，大娘把围腰帕包着的一碗热气腾腾的、当地农民常吃的苕尖子饭送到他面前。天寒地冻，有人突然送来一碗苕尖子饭，咋不让人生地不熟的外乡人感动呢？想到这些，欧大爷和颜悦色道：“大娘，今天只剩半斤猪油了，拿回去熬油吃吧。”

(三)

南君平乡虽处于平坝，浅丘却不少。有的田处于沟漕和河沙冲沱之间，一年只种一季水稻，土地利用率低，一遇到天下大雨，高坡的土流失，产量低，甚至没有产量。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农作物的生长条件，增加土地生产潜能，提高抗自然灾害能力。20世纪 90 年代初，逐渐富裕起来的社员自发组织起来，利用冬天农闲时，自己出钱出力买抽水机、板板车、铁铲、锄头等工具，改造冬水田、下湿田和烂泥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田基本建设——修沟、修渠、修路。在县上和乡上的大力支持下，11 个村通了水泥路。群众自筹资金，修通了通往各自承包田的机耕道，极大减轻了以前靠肩担、背运肥料到田间和收割粮食的繁重劳动。

今年 81 岁的严大爷聊起南君平的过去，也打不住话头。20世纪 80 年代土地下放到户时，他家 6 口人承包了 6 亩田地，全家年收入不到 500 元钱，4 间草房，半头老黄牛（实际 4 户人分一头牛）就是全

部家当。每年到了清明前后，农家就忙开了，家家户户都在为大春生产做准备。到县城种子公司或买桂潮、双南1号或买杂交水稻谷种，照着包装上的说明提示，小心翼翼地把脚盆或洗脸盆用开水清洗，反复消毒后，用干净清凉的温热水浸泡谷种，是为浸种。待谷种吸水泡胀后，放到灶膛边或内室保温处，3天左右出乳白芽，这叫催芽。把长出嫩芽的谷种均匀地栽在事先准备好的秧母子田里，称作育秧。

育在田里的秧，沐浴阳光雨露，追几遍农家肥，早已露出叶尖的幼苗茁壮成长，约一个月左右，秧苗长到一拳头高时，广阔的农村也就拉开了大战红五月的帷幕，水汪汪的田野上新的生命蓬勃生长。

每年裁秧的第一天，无疑是南君平乡十里八村的喜事。提前几天，家里的老人会一页一页翻皱巴巴泛黄的历书，寻找适合栽种的喜庆吉日。常常是带“6”和“8”的日子被选中，寓意农民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日子定下后，一般要举办小九碗，割肉、打酒、买菜，整满满一桌菜，请亲朋好友和邻居撮一顿。酒足饭饱后，由族中长辈主持，拿着香蜡、钱纸、鸡公、刀头和酒菜等，与参加裁秧子的



1977年君平公社丰收喜送爱国粮。



君平食品厂生产的香肠，产品大量销往广州、深圳等沿海一带。

一行人到村口祭祀土地，坊间谓之热热闹闹开秧门。

(四)

农民相信“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一祖传经验。为发展生产，用了大量农家肥和适量化肥，粮食连年丰收。收完小麦淹田栽秧子，田坝头布谷声声，蛙声连连。低洼田直接放水，高膀子田则用水车车水或小型抽水机抽，那时的水清亮得能照见人影子。公社供销社也大力支农，平价卖给农民犁头、耙子、柴油和化肥等农业用的物资。育秧苗、栽秧子和田间管理时，还能得到公社农技员手把手地教。土地承包到户后，光是谷子亩产就比吃大锅饭时多得多。家里有了多余的粮食，猪、鸭、鹅家畜家禽也吃得饱了，长得又肥又大，真是一富遮百丑！虽然包产到户单干，但南君平的社员们很团结，每当大小两季农忙时，家家户户，男的女的天不见亮就起床，有说有笑涌向田坝头，纷纷挽起裤腿，一脚踏入泥田。女的不时来一曲半生不熟的栽秧歌，有文化知识的“秀才”借景抒情，随口而出：“脚下泥田水汪汪，声声布谷催耕忙。东河引品桂潮种，西坝推优晚稻粮。手分秧

苗千万株，眼观棵距五寸方。你追我赶争先进，早日栽完好赶场。”这打油诗至今还流传于君平和拱辰地区。村民还自发组织起来，帮助军烈属和缺劳动力的家庭犁田、耙地、车水、锄草等。“搭把手，风雨同舟一起走”，是南君平人祖上留传下来的美德。

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严大爷也像其他搞副业的人一样，利用农闲时间卖零工挣钱补贴家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君平乡企业跟邛崃其他镇乡企业一样，基础弱，素质差，管理经营粗放，也是“一酒二砖三榨油”模式，先后有酒厂、机砖厂、榨油厂等十几家企业，解决了近700人就业。最有名的要数邛崃县君平食品厂，主要生产“万福”牌腊肉和香肠，产品大量销往广州、深圳等沿海一带，年销售量600余吨，在邛崃和川内名噪一时。俗话说，天干饿不着手艺人，在南君平乡，像严大爷那样腰上别把砖刀，跟着师傅早出晚归走乡串户给群众打水井、修围墙的手艺人不在少数，他们凭着过硬的本事，有的进入白泥厂、酒厂，有的进入食品厂。长了见识，眼光高了后，有的人还做起了当老板的梦。比如严大爷，90年代中期，他在公社信用社的支持下，无息贷款5000元，加上自己的存款，将万余元的“巨款”投向养鱼、栽苹果树、种叶子烟、种海椒等当时非常热门的经济作物项目上……

如今，南君平乡已不复存在，体制发生了变化，2004年并入桑园镇成立童桥社区。但昔日人们那种纯朴、厚重、锲而不舍、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新生活的精神没有变。在乡村规划和振兴中，一个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绿茵碧水，传承农耕文化的新童桥社区正向我们走来。

(本文图片由毛国兵提供)

拱辰的风物与农事

江万军

拱辰乡域考

最早的拱辰不是乡级行政区。1911年，从临邛城北到大邑县三坝河流域均为北路统带管辖，下设若干团，后来的拱辰乡辖区叫北护城团。辛亥革命后沿袭管制，只是把北护城团改设总保，下置三个保。第一保叫拱辰保，辖区为三好、胜利、文脉、北坛、洪川五个村，是围绕临邛镇东西轴线以北的地区；第二保叫清正保，辖区为晨阳、司马、金娥、三集、万石（音 dàn）五个村；第三保叫清孝保，辖瓦山、公道、东乡、九山、关家、八角、白雀、艾河八个村。1933年，北护城总保将下辖的三个保改为三个分团。两年后实行闾邻制，不久又改为保甲制。1936年，临邛城西、北两路总保联合，将北护城总保（也说联保）更名为护城镇，管辖西河三十一保半和北路十八保。1939年，护城镇援用原拱辰保的名称，改为拱辰乡，乡政府驻地设在北门外静安寺（即北坛庙，最早为严姓人家院宅，后改建成庙宇。1952年修建北仓粮站时拆除）。1941年，联保拆分，原西河总保依旧，北护城则沿用拱辰乡名称，同时划出拱辰乡的白雀、艾河两个保给新成立的君平乡管辖。至此，拱辰乡辖区为16个保，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也未曾改变。



北城门以北至原北仓粮站一带最早都归拱辰乡管辖。（陈祥提供）

1950年，拱辰乡成立农民协会，乡以下各保改称农协分会，分会以下设组。1951年元月，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任务结束后，乡政府驻地迁至庞家山王寿乔院宅（俗称王三间龙门子），同时将农协分会改称村，下属组织改为组。是年，拱辰乡北坛村（现北城门以北至原北仓粮站一带）划归东安乡管辖。1955年，拱辰乡的洪川村四个组（现临邛镇洪川村集中居住区周围一带）又划归东安乡管辖，而东安乡的白莲村三个组（现临邛镇敬老院周边及以西一带）则划归拱辰乡，新组建了拱辰乡白莲村。1958年，邛崃成立双江人民公社，拱辰乡整体划归双江公社管辖，称为双江公社拱辰分社，村改称大队，组改称生产队。1961年，体制下放，复设拱辰公社。1981年，拱辰人民公社改为拱辰乡人民政府，大队改称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称组。1985年11月，拱辰乡三好村（现西外街至老西桥以北，围城路西环段以西、以北的区域）又划归临邛镇管辖，只留下张公堰（现啤酒厂至君平广场一线）沿线几个石灰窑、社办企业仍归拱辰乡所辖。其时，全乡共辖14个村102个组，面积2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1589亩，人口16617人。1992年11月，拱辰乡被撤销，整体划归临邛镇管辖。

王三间龙门子

王三间龙门子，是拱辰王姓人家最初修建的宅院大门，其门房规

模大约有三间房子那么宽。据王家晚辈王成基、李合如、黄方清以及当地90多岁的王文福等人讲，他们祖上是水口庞坝梅子沟人，数百年前迁至北路统带管辖的清正保庞家山（现临邛镇白莲村7组），始建于王家大院，其龙门子就是后人所称的王三间龙门子。老人们描述：王三间龙门子从外面看去，门房及其门廊是建在三级台阶上面的阙台，高大的中门双扇对开，左右两边各有一扇双开侧门；柱头、门楣、穿枋、斗拱色彩艳丽；龙门子两端的八字墙与院墙相连，墙中间阴刻两个对称的福字，漆成大红色。单檐歇山式建筑风格，加上夸张上翘的飞檐和檐上伫立的瑞兽，烘托出主人的身份。

后来，王家弟兄分家，权势较大的王寿乔一脉祖上另立门户，在王三间龙门子前东南方位的三棵桢楠树西面修建了新的王家大院（也说中龙门子）。再后来，王进臣一脉祖上又在王家大院东南方位修建了王家大龙门子及其庭院。其他王姓兄弟的祖上则只让其在庞家山这个船型屋基的后边缘线内，修造自己的小院。这样，由东南北三个方向远望王家宅院，建筑全在一条巨型船上，三个龙门子尤其突出，这也成就了后来一些人所说的王家三个大龙门子合称王三间龙门子之说了。

王三间龙门子内房屋基础坐落在庞家山凹形小山丘略靠北的位置，整个房屋坐西向东，光彩明亮。据说，建造房屋前，王家请来风水先生反复查勘，最终选定了这个形似帆船模样的屋基，而桅杆就是后沿线上的杉树和前沿线上相对集中的几棵大桢楠树。由远处眺望，整个屋基犹如一艘扬帆起航的大船，寓意王姓家人和衷共济同船渡。宅院建筑鳞次栉比，有大小房屋上百间，前院、后院数个天井由檐廊或挑廊连通，主仆生活区、娱乐区、读书房、客房、厨房等功能不同的建筑错落有致。

为解决家中人畜饮水，王家还在龙门子前开凿了一口深井。井边立有两根青石柱子，上口凿凹槽，横放龙车轮轴，方便转动从井里提水——这也是王家大院保存至今，仍在使用的唯一设施。

王家兄弟分家后，发展较快、庭院规模最大的要数王寿乔了。新中国成立后，拱辰乡政府在王寿乔院中办公办学，王三间龙门子内祖业院宅，则在土改时分与多家后人及外姓群众，其龙门子也被拆除殆尽。大家也就只管把王寿乔院宅龙门子称为王三间龙门子了，当地的知情人也有说中龙门子。

新中国成立后，拱辰乡人民政府最初在北门外的静安寺（北坛庙）内办公，1951年元月，为方便工作开展，便将乡政府搬入了拱辰相对中心的王寿乔宅院办公，这就是人们记忆中，拱辰乡老乡政府驻地在王三间龙门子的开始。至此，王姓后人所居之地逐渐又被王三间龙门子的称谓取代，而它原有的地名庞家山却鲜有人知，甚至连世代居住于此的王姓后人也不了解。

如今，王家祖业的王三间龙门子，以及龙门子后面王家后人另建的独立院宅，连同所有的设施，除解放初期被政府征收，悉数分配他人外，自留的部分因年久失修，也让它的主人们逐渐自行拆除改建成了砖木结构或砖混结构的现代建筑，只留下一片杂乱无章的乡村民居。搬进中龙门子办公的拱辰乡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又将政府办公地点迁至拱辰乡泉水河，继而全部拆除了王家大院。

当年的农事

拱辰乡是邛崃的粮仓之一，全乡有水田两万多亩，除万石坝多下湿田，不能实现一年两熟外，其余均为大小春交替、粮经轮作的高产田。每年大小春交替之际的农历四五月就进入习惯所说的“红五月”，其关键是“双抢”：抢收，将已经成熟的油菜、小麦抢晴好天气及时收割，晒干风净归仓；抢种，抢时间放水泡田，适时早栽秧子。

备耕：拱辰的备耕工作严格说始于上年的小春种植计划安排，打好油菜小麦不同成熟期、不同栽种地用水时间差，适时早播早收，为来年抢水栽秧争取时间。乡上在做小麦、油菜播种计划时，要求各村

组算到家家户户，细到田块地块。红五月来临前，乡政府一般在三月份召开备耕工作会，由此拉开大战红五月序幕：要求供销社调运、储备好全乡的种子、农药、化肥，乡农技站提出分配计划，安排落实到位；农机站负责调运、修理、测试大型农业机械，做好机耕分时段、分区域保障计划，确保人员安排、油料供应、机具调配，做到人休息机不停；要求农户清理调试好打谷机、风谷机、拌桶等收割机具，准备好犁头、钉耙等犁地整田农具；添加精料饲喂耕牛，同时上山租牛到位，确保抢种抢收落在实处；要求驻村乡干部带队，与村干部一起检查所在村备耕情况，细分用水计划，明确分水时段，定期向乡政府报告进度、存在问题、解决办法等。

备耕的难度是肥料储备，1978年邛崃氮肥厂建成投产后，除尿素外的氮肥储备就不再前往青白江四川化工厂调运了。当时，川化按产量分配尿素、碳酸氢铵等肥料计划给各区县，各区县分配到镇乡，各镇乡供销社派车购买运回。但邛崃氮肥厂产量有限，为及时调运碳酸氢铵、过磷酸钙等化肥，供销社煞费苦心，有时排队通宵达旦就等着运回一车肥料。为弥补固体肥料不足，缓解备耕时间集中调运化肥的压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拱辰乡动员了交通方便的几个村、二十多个组修建了氨水池，平常则先将氨水调运回来，储存待用。90年代开始使用氮磷钾三元复合肥之后，农用肥料随着国家产能的增加，供需矛盾才得到缓解。

抢收：拱辰乡的小春作物基本为小麦、油菜，成熟季节相对集中，时间紧迫。乡上一般在开镰前召开工作会，要求针对不同品种，成熟一块收割一块，颗粒归仓。大战红五月开始后，乡政府一般就不再召开会议，有什么重大事情都是通过两个渠道传达下去，一是运用广播向全乡提出要求；二是驻村干部专程下去传达。这段时间，时有一些县级单位、企业职工和学校学生下乡帮助收割。乡上则安排一至两位乡干部负责接待。而乡上的工作大多数在晚上安排，召开干部会有时也在晚上八九点钟。因为乡干部大多家处农村，也有几亩田地，



拱辰是邛崃的粮仓之一。全乡水田多为大小春交替、粮经轮作的高产田。（张君如提供）



抢时间放水泡田，适时早栽秧子。
（刘永红提供）

除了职责工作外，还得进行自家的双抢。农忙季节乡政府安排昼夜值班，家住县城的乡干部轮换着值班至双抢结束。

抢种：拱辰乡的小麦多选择在田里栽种，尤其是靠近来水渠道前端的自流田中，而油菜多数选择在一些高榜田（地势较高，不能自流灌溉的田）、望天田（靠天下雨积水泡田才能栽秧的田）或尾水田（处于水渠末端，时有时无来水灌溉的田）栽种。其原因还是突出红五月的“抢”字。

抢打小麦成熟时间差：整个拱辰乡处于都江支流五堰、六堰、三合堰童桥支渠尾水地段，堰渠流程长，灌溉面积大。适时早播小麦，抢在上游的桑园、君平、大邑三岔等乡的田块大面积成熟之前先收，为大春水稻栽插用水抢得几天时间。

抢打油菜早收时间差：油菜籽灌浆结束，籽粒饱满，植株叶片微微泛黄时，正值农历四月，这时，尚未全熟的油菜就可收割晾晒，经一段时间的自然熟化干燥，就可用连盖拍打收仓。上游的田因种植小麦尚未成熟，不能收割，暂时不用水灌田。这样，渠道放水下来，分水少、流量大，栽种于尾水或靠人工取水的油菜田就有水灌溉栽秧。至于后熟的小麦田，相对处于上水地段，用水矛盾稍显轻缓。

抢水守水：大战红五月守水是拱辰乡比较特殊的工作之一。说是特殊，主要是拱辰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全乡主要灌溉渠有：1954年邛崃、大邑、崇庆三县联合修建的三合堰，引都江堰水灌溉拱辰的大部分田地，文脉支渠和童桥支渠是三合堰的主要引水渠道，在几公里的拱辰乡境内，分出了司马堰、范石堰等20多条堰，灌溉面积近10000亩；取水至都江支流的五堰、六堰，为清康熙年间修建的简易灌溉渠，历经数百年，其分支文脉堰、稽公堰水流量小，且在上游时有淤塞，其灌溉面积约5000余亩；历史上使用多年的泉水河仍在发挥作用，灌溉着拱辰三个村的部分田地。上述堰渠总长近300公里，除泉水河堰外，两条主渠进入拱辰乡都是末端，来水自然就是尾水了。要保证大春当季及时将秧苗抢栽下去，实现满栽满插，水是关键；要



守水是拱辰乡大战红五月比较特殊的工作之一。
(陆德佳提供)

确保水路通畅，放进田块，合理调水是关键。因此，首要任务就是被拱辰乡村干部戏称的守水。而守水时节来临前，乡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会前往都江堰流域水利管理处和邛崃桑园水文站对接，争取最大的水量分配计划。小春开镰前，乡上召开调水工作专题会，宣布全乡用水计划安排，从时间、流量、来水堰渠、用水村组、灌溉面积等方面进行布置，合理调度全乡灌溉用水，尽力防止过度灌溉浪费水。抢栽正当用水时，每天的来水量按照先前的计划落实，偶有超计划流量下来，多是乡上领导再度临时协调的结果。承担守水任务的乡村干部各负其责，分工明确。乡干部大多在三合堰、䢺江河的主渠和主要支流上巡查守水，防止上游镇乡和个别村组不按计划放狠心水（刻意加大流向本村组的流量）；村干部主要在支斗农毛渠（支渠、小堰、小沟等）守水，保证片区田块水量合理分配；农户自己也守水，主要在来水时间内保障自己的田地灌透、灌足，防止别人偷水。守水多数时间在晚上，乡上给乡干部每人发一只手电筒照明。大家在渠上巡查守水，多数时候手里还拿着小竹竿，既作走路时在堰埂、田埂上探路，又在遇上农户家狗咬时当打狗棍，时遇蛇隧道时，兼作驱离竿。

大战红五月期间，许多工作都贯穿着“抢”的氛围。乡村干部双抢之时，少不了抓住农忙间隙抢巧工作，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乡上主要领导协调用水、用油、用肥计划，保障生产一线需要；县上也随时通过电话了解双抢进度、存在问题、调处情况等信息。而双抢之后更少不了抢抓小春粮油入库工作。

观音、战斗或兴贤的题外话

王勤

战斗乡始建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 1940 年），原名观音乡，因境内有观音院得名。新中国成立后沿用此名。1958 年公社化时，认为观音乡缺乏现实意义，遂更名为战斗人民公社。1982 年 1 月撤社建乡，成立战斗乡人民政府。2002 年 8 月撤乡建镇，改名兴贤镇。2004 年撤销兴贤镇，并入牟礼镇。

战斗或兴贤的初始名字缘于观音院。观音院这三个字在兴贤及其周边乡镇中知道的人很多，使用率也高。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经常说“去赶观音院”、“到观音院走人户”等，年轻的则说战斗或兴贤。

据《邛崃县志》记载，战斗街上以前并非集镇，只有一座观音院，是大家朝拜观音菩萨的地方。观音院不远处有个龙凤镇（今龙凤村），集市还算繁荣。然而，龙凤镇不知为何常常发生火灾，时间一久，老百姓待不住了，便主动搬迁，有搬到南河对面牟场去的，也有搬到观音院周边聚居的。

观音院系明成化二年（公元 1466 年）僧真方修，清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僧惠光重修。长年累月香火不断，加上龙凤镇迁来不少人，于是慢慢形成了一个小集镇。观音院最终是怎样被毁的，没有查到什么文史资料或历史遗迹，民间也无此类故事留下，连传说中的观音院遗址在何处也众说纷纭。如今的观音院街上，最有历史价值的

人文景观当数兴贤塔。

兴贤塔位于观音院老街中心十字路口，以前那里没有十字路，只有一条小巷，这个塔在那里站立了近 200 年。

兴贤塔乃一字库塔，字库塔又称惜字塔、焚字塔、敬字塔和文峰塔等，各地名称有别，但都是对文字的一种尊崇。仓颉造字，把语言变成图案，才有了文字记录，才有了以文字代替语言的交流方式。后人修建字库塔用于焚烧写过字的纸，是对文字的敬重。老百姓把读书识字看得特别重要，尤其敬重读书人。所以，他们的字纸是不能乱扔更不能弄脏，只能拿到字库塔去焚烧。这既是对文字的敬重，也是希望通过此行动让孔圣先贤等保佑自己能够高中，从而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观音院街上的兴贤塔始建于道光八年（公元 1828 年），为六面六角形，束腰须弥塔座，三重檐楼阁式砖石结构，外表皆是彩绘烧制陶件和琉璃瓦，通高 13.5 米，底座边长 2.7 米，直径 5 米，是一座非常精致的字库塔。

战斗乡后改为兴贤镇，皆因有此兴贤塔之故。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红光（牟礼）公社赵河坝的小朋友最爱唱一首儿歌：“红光公社红又红，超过羊安压回龙，战斗公社是铁保笼。”

什么叫铁保笼呢？在当地，老一辈对蒸笼的又一种称呼叫保笼子，因为它有保温作用。而蒸笼状圆，矮平，所以铁保笼就是长不高



位于观音院老街中心十字路口的兴贤塔。
(张晓林提供)



战斗街上的新老房子。（杜明伟提供）

的意思。那时候的战斗公社，给人的感觉就是小而落后。

观音院起初也建了修理厂、社办酒厂和机砖厂，但这些企并没有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机砖厂正常生产还不足三年。真正让观音院扬眉吐气的是三大行业，从那时起，战斗公社就不再是铁保笼了。

那是改革开放的战鼓擂到战斗，战斗公社真正战斗起来了。

首先是任糖房那里原有的几十亩蔬菜地，从种莴笋韭菜的小打小闹，延伸到战斗的多个坝区，到几十亩、上百亩地的大棚菜，由完全靠天变成了科学种菜，蔬菜品种也变得多了起来。一年四季都有番茄、茄子、豇豆、三月瓜、八月瓜等蔬菜往外运，真是勤快人种来懒人爱，看着就喜欢。

到了八九十年代，战斗的红苕粉加工更是搞得热火朝天，红苕淀粉加工可以说占了战斗乡生产加工业的半壁江山。本地红苕种植量远远赶不上各作坊的吞吐量，于是各家各户便到蒲江、丹陵、洪雅等地坐点收购，也有从南充、资中、遂宁等地长途运输回来的，一时间战斗乡红苕淀粉加工远近闻名。

然而，落后的交通制约了生产发展，大部分加工作坊都在林盘里，很少在公路边。为了促进红苕粉的生产加工，战斗乡政府和村干部想尽办法让交通畅行，让拖拉机开进每一个农户的院坝里。极积协

调，村民也相互体谅，竹笼挡道就砍竹笼，菜地占道就填菜地，一时间，战斗乡的家家户户都可以通拖拉机，尖车满车的红苕突突突地拉回家，红苕淀粉源源不断地销到成都等地。若是天气晴朗，则满坝都是晒淀粉的人，地里全是晒簟。一家人往往有三四十张晒簟，单是铺晒簟都要铺好大一会儿。人们经常吃的一道菜是用一半鸡蛋一半淀粉煎的饼，香喷喷味道极佳。还可用于煮汤，丢几片菜叶在里边，那汤味就更鲜了。

战斗的红苕粉做出了名，让许多种田人都变成了作坊主，收入一下子提高了不少，很快就甩掉了经济落后的帽子。

除了红苕淀粉红火，还有一种产业也在蓬勃发展，那就是白酒生产。特别是三大队五大队的酿酒作坊相当多，在各个林盘星罗棋布，有一家单干的，也有几家合伙办厂的。八九十年代，邛崃有三个酒厂聚集区——高埂、桑园和战斗。

战斗乡私人小酒厂和红苕淀粉生产的兴起，产生了大量的酒糟和淀粉糟，带动了当地养猪业的长足发展。房前屋后，菜地竹笼，到处都可见用水泥瓦搭的简易养猪棚，每家每户都养满了猪。据估计，战斗当时的生猪出栏量远超牟礼和回龙。并由此派生了一个专门从事生猪外运的行业，从业者将收购的200斤以上的肥猪贩卖到藏区。

从前的观音院只有从西向东一条独街，很窄，场头场尾路很烂，常有积水，只要有一辆车从此经过，所有的人都要跑到一米宽的街沿下躲避。若是逢场天，街边摆满了背篼、箢碗、捞草耙，卖鞋的、卖布的、卖米的将街面塞得满满，赶场的人前脚跟后脚。后来，修了一条新街，总算缓解了交通拥堵情况。如今，原先的战斗已改变了模样，除了旧街子、新街子，还增修了新果街、新贤街、塔子街、新龙街、新迎街、新元街、新柳街，街道纵横。更有广袤的五面山区以种植水果为主，柚子、猕猴桃、粑粑柑遍山都是，坝区的稻田养鱼是全国示范片，黑猪喂养也成了一大特色和亮点，成新蒲快速通道从这里穿境而过，一幅美丽新农村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见证千年县城兴衰的油榨场

杨辉祥

从临邛古城出发，沿邛芦路西行约 25 公里，就到了南宝山镇的政府驻地油榨场。油榨场曾经是汉唐时期生产食盐的重要基地、古火井县城的所在地，是世界上有记录最早使用天然气的地方。如今，古城留下的遗迹只是一条短短的老街，完全没有一个县城的风采。它为什么会从一个县城衰落成一个小小的场镇呢？

兴也天然气，衰也天然气

民国初年的一个午夜时分，万籁俱寂，油榨场沉沉地睡在文井江边。各家各户的灯火已经熄灭，人们鼾声四起。突然，有人高喊，李二娘的房子遭火了。人们惊慌失措地跑出房子，看到李二娘的房子燃了起来，火势已经窜到屋顶。整个街道被火光映得如同白昼。大家赶忙帮助打火。一直到天亮，大火才被扑灭。不过李二娘的房子已经烧成了光架架。大家议论纷纷，这个月，场上连续发生三次火灾了。这里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生火灾。乡民说，如此下去，如何得了。

火灾后，几位乡贤聚在一起讨论。他们认为，此地古称火井，火井之名，有火也。现在名油榨沱，而油榨沱之油乃易燃之物，本地火



油榨古码头。
(彭明权提供)



南方丝绸之路
之油榨段。
(彭明权提供)

灾频发，实乃地名犯了忌讳。于是，大家决定将油榨场更名为清和场，清者，从水也，水能克火；和者，平安也，将来就不会发生火灾了。民国版《邛崃县志》载，“城西五十里油榨沱，濒河，唐火井县旧治，今名清和场，灭火祥也。”灭火祥，就是为了避火灾。当地人面对经常防不胜防的火灾，寄希望于更改地名讨吉利。但更名之后，火灾还是依然如故，不断发生。很多老百姓不知道油榨过去曾经用过清和场的地名。老百姓仍然使用油榨沱或者油榨场的地名。当地老人

说，在民国时期，火灾非常频繁，老街是屡烧屡建。以至于老街上很多人不敢盖木架房，只盖茅草房，因为茅草房被烧后的损失要小点。由于火灾，鲜有人在街上修房子，人们纷纷搬离油榨场。

油榨场经常莫名其妙发生火灾，现在这个现象能很好作科学解释：油榨地区岩层有裂隙，天然气沿着裂隙上行泄露，遇火燃烧。造成火灾。这种现象如今依然存在。2020年3月22日，火井镇就发生了农户打水井却打出了天然气的事情。正是这种天然气的自然泄露，被油榨的先民发现并利用，用来熬盐。于是，油榨场地区成了世界上最先利用天然气的地方，成就了邛崃世界第一的美誉。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对盐的管控非常严格。盐是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也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汉代时，油榨地区发现了天然气和盐，用天然气熬盐，生产成本低，生产量很大，这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三国时诸葛亮也亲往视察。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朝廷决定在这里置火井县，对盐的生产销售进行管理，而且就用火井作为县名。同时，在这个地方设了具衙。两年后，隋朝灭亡。唐朝继续在这里设县。唐初著名相士、天文学家、星象学家、预测家袁天罡曾经在这里当过县令。

现在油榨场的横街子不远处，有一座天罡祠，周围发现有输送天然气的火槽子。人们认为天罡祠就是袁天罡火井县的衙门遗迹。在它旁边，有一个小地名叫衙上。油榨方言，衙上就是在县衙上边的意思。从在油榨发现的文物和历史资料来看，唐时，古火井县城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比较繁华的。但奇怪的是，千年以后，现在火井的地名却不在油榨，而在它南边四五里的一个场镇，叫火井镇。那个地方以前同时还有另一个名字叫高家场，又称高场。

当地老人告诉说，这是因为油榨场经常发生火灾，不但场镇时不时被烧毁，县衙门也经常被烧。于是，县令决定将火井县衙迁到不远处的高场。所以，高场又叫火井。考察油榨场经常发生火灾的历史，老百姓关于火井衙门因为火灾迁往高场的说法是有些道理的。

高场离油榨很近，将衙门迁到高场，有点像把机关从城东搬到城西，只能说是挪一下位置而已。历史上，火井县衙门最远还迁到过平乐镇。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到至道三年（公元997年），火井县衙迁到了平乐。平乐作为火井县城，历时27年。这次迁移比较远，平乐与油榨之间距离20余里，还有一条山脉相隔。志书说，“北宋曾移火井县治此（平乐），从本县令肖琢之所请也。”说是火井县的县令请求把衙门迁到平乐。但为什么县令要把火井县治搬到那么远的平乐呢？其原因，历史记载语焉不详，极有可能像老百姓所说，油榨场经常发生火灾，甚至相隔不远的高场也经常发生火灾。县衙门被火烧很不吉利，为了避火，才把县衙迁到了平乐。

油榨的地理和交通位置十分优越，完全可以形成为一个大的中心场镇，但油榨的人户就是集聚不起来，一直是邛崃一个不太起眼的小场。火井县衙的驻地，历史上也时而在油榨，时而挪高场，时而迁平乐。从史书记载和老百姓叙述的民国时期频繁火灾来看，这种人气的衰减和衙门的迁徙，都是与天然气造成的火灾有关。油榨场因为天然气的发现、使用而发展成一个县城，也因为天然气引起的火灾，使县城衰落。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油榨场横街子不远处的天罡祠。（彭明权提供）

随着历史的演进，火井的县衙逐步常驻高场。高场被越来越多的人叫火井。油榨曾经为自唐时古火井县城一事，也慢慢被人们遗忘了。当然，从另一层意义来说，唐古火井县城也并没有衰落，在后来的高场得以传承和融合。而且，从地域和文化来看，高场的火井县和油榨的火井县，其实完全可以看成是一个不分彼此的古火井县。

天然气和石油开发使用的世界第一

油榨场天然气的使用是世界第一，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不过这些年人们通过深入调查研究认为，油榨场可能在石油的使用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也是世界第一。人们首先发现，油榨的地名就隐藏着这个重要信息。

油榨的名字，来源于油榨沱。油榨沱是离场镇不远山边文井江的一个水沱。地名因它而起。那么，为什么叫油榨沱呢？据志书说，那个沱里有岩石如榨油工具，经常冒气泡和油花，故名。这提示我们，沱里可能有裂隙，冒的气泡和油花其实是天然气和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往往有共存共生的关系。油榨地区，也极有可能同时发生石油迁移到地表的现象。石油往往是糊状，黑色的油状物，有些在水面浮起，被老百姓称为油渣。油榨沱，可能就是那里长期有石油浮起，而且比较多，所以称为油渣沱。“榨”可能就是“渣”的长期形成的讹音。油榨沱是油渣沱的讹变。

河中浮石油的现象，当地老百姓的叙述也证明这一点。他们说，在火井江中浮起的，其实不是油花，而是油渣状的石油。

在离油榨沱上游不远处，有一个地名叫新碾子，其地断层明显。某年修堤坝施工中，曾在河中发现一个古砖砌围成的一口井，方形，两尺直径。这个古井建于何时，不得而知。这个地点可能经常冒油渣，人们砌了一井，围了起来，并从里面捞油渣。据当地老百姓回忆说，民国时期，这口井都还在，高出河面，上面经常浮出油渣。人们



油榨场成了世界上最先利用天然气的地方。（龚世伦提供）

将其打捞起来，用于点灯和装在竹筒里当火把。1947年夏的一天，有人打米路过这里，见有大量黑黄色油渣冒出，浮在水面。他们准备回家拿工具打捞，但因为后来暴风骤雨，河水猛涨，只好作罢。乡民所述，完全是石油冒出水面的情形。这口井，被当地人称为油井，而且还形成约定俗成的地名。据有村民回忆，在油榨场往南宝山木梯的路上，曾经发现一通指路古碑，上有“下至油井，上至木梯”的文字。这里指的油井应该是新碾子这个地方的油井。

从油榨的地名解析到对当地的田野调查都证明，很早以前，油榨地区就已经发现并使用石油了。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对古籍中的记载进行审读的时候，发现古籍中记载的内容，其实不只是天然气的发现和使用，还有很多是石油的发现和使用。

《华阳国志·蜀志》载，邛崃地区的火井，“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一段说的是天然气，是肯定的；但后面“以竹筒盛其光

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显然从常识来看，竹筒里盛的，不可能是光，也不可能气，只可能是石油才讲得通。将石油装在竹筒里做成火把，才可能做到“拽行终日不灭也”。其实，后来唐朝的《十道要记》一书比较明确是石油了。书中记载道，邛州，“火井有水，郡人以竹筒盛之，将以照路，盖似今人秉烛”。“火井有水，郡人以竹筒盛之”提到的水，其实就是石油，这是将石油装入竹筒做的火把。

油榨先民砌油井，收集石油，把它装进竹筒，用来做火把照明，这是对石油有意识的使用。有些人认为，中国最早利用石油的记载，是南朝（公元420—589年）范晔所著的《后汉书·郡国志》。此书载有，在延寿县（今甘肃省玉门一带），“县南有山，石出泉水……燃之极明，不可食。县人谓之石漆”。“石漆”，即指石油，但也只是说燃之极明的现象，没有具体的使用方法。《华阳国志》成书更早，是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公元348—354年）。根据《华阳国志》对油榨地区使用石油的记载，石油使用的记录又往前推了一百多年。而且使用方法叙述得更详细。也就是说，油榨地区的天然气和石油使用应该是同时出现的，都是在东晋时期。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在《巴蜀的科技成就》一文中就提出，巴蜀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石油的地区。油井是伴随着天然气的火井而出现的。世界第一口油井就是临邛的火井。根据唐代《十道要记》的记载，唐代初期临邛即已从火井中取石油加以利用。“火井有水，郡人以竹筒盛之，将以照路，盖似今人秉烛，即水中自有焰耳”。这是关于利用火井来取石油的最早记载。这说明，油榨的先民，不但在历史上有最先使用天然气的记录，而且在石油开采使用上的记录，也是世界第一。

油榨场现在还遗留一条很窄很短的街，叫老街。历史上，它曾经多次因地下天然气的泄漏而遭火烧，现在连场都很难赶起来。那些铺向河边的水巷子的踏脚石，已经长满了苔藓。这条街近百年来没有什

么变化。民国时，街上有几十户人家，一个幺店子，还有几间商铺。当时，邛崃到火井还没有公路。人们从邛崃到油榨火井，要步行经马湖，穿纸房沟，到油榨场对面河边。过去，岸边有一个摆渡船，在它上游，还有一座廊桥。人们过河到老街，走过老街，然后分两条路，向西一路往大川进入康藏，往南一路到火井高何。应该说，油榨场处在茶马古道的一个节点上，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油榨场置火井县，距今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了，历史辉煌过。作为古城，如今它似乎衰落了。但风水轮流转，现在新的历史机遇又出现在它的面前。一座崭新的、勃勃生机的新油榨场正在老街旁边崛起。

偏居一隅的太和场

袁国川

太和位于邛崃城西南，据民国十年《邛崃县志》载：“城西南一百里太和场，在天台山之下白崖沟骆家坝。道光年间新设，场期四、七、十。”

清康熙元年（公元 1662 年），太和还没有设场镇，乡人买卖交易都到夹关。从大坳头到夹关，沿途有榨口庙、徐店子等幺店子，供来往客商食宿打尖，贩卖油、盐、烟、布、针线之类，给乡人送货上门，哪里黑哪里歇，时人称“赶龙门场”。康熙二年（公元 1663 年），乡人王太和领建太和场，兴街设市。当时属邛州南路文八甲，由夹关管辖。1912 年，国民政府设太和团，辖区上自大坳嘴，下至榨口庙。1935 年，太和团改称太和乡。同年 10 月，南下红军的二方面军、红九军进驻太和，建立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红军北上抗日后，民国政府将太和、正义、三角乡合并为太和联保。三年后又将太和联保改为太和乡、三角乡。解放前后仍为太和乡。1958 年为太和人民公社。

太和东依名山县中峰，西南与上里交界，北与天台接壤。境内属山区，山势雄峻，竹木繁多。新中国成立前常受干旱影响，农作物不能及时栽插。解放后，修建了英雄堰，引来了玉溪河水，彻底改变了水利灌溉条件，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



位于太和场镇新街 27 号的太和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彭明权提供）

人工天河绕山腰

太和堰是太和、天台两乡群众于 1958 年合建的，反映了两乡群众在大兴水利建设中的顽强战斗精神。这条堰长 50 余华里，绕过 172 个大小山头，103 条沟壑。其中有一段长 280 米的渠道在悬崖上开凿，社员们冒着数九寒天，腰系大绳，凌空打眼，装药放炮，完成了筑堰任务。当时，为了表彰两地农民的业绩，邛崃县委把这条堰命名为英雄堰。

提到太和历史上最早的人工天河——英雄堰，人们首先说起一个人，是他带队修英雄堰！

他就是当年 25 岁的太和乡团支部书记高明顺。而今虽已耄耋之年，却精神矍铄，说起话来仍然口齿清楚。

1958 年，太和乡党总支主持成立了英雄堰指挥部，2 月 25 日是正



新中国成立后的太和乡教育工作者。（陆家明提供）

月初八，农历新年还未过完，引水工程便开工了。全乡 10 个村近 5000 余名太和修堰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自带伙食，从四面八方向着天台山半山腰汇集。

最后确定的引水渠路线，堰首设在天台山水磨坡，主干渠堰尾落在观音岩，全长 30 公里。

人们沿着勘测人员用白灰撒出的线路图，在天台山上摆出了一字长蛇阵，各村分段施工。

四五千人聚在一起声势不小，但面对巍巍天台山，又是何其渺小。工程开始后，太和人才真正感觉到了艰难。建设之初，太和没有任何外来支援，更没有大型机械。修堰队伍像移山的愚公一样倔，最大的财富是自己的双手，他们用的工具是锄头、钢钎、铁锤和十字锹。

炸药是工程最大的稀罕，特别是牛角尖最险，山似老鹰嘴，堰渠要从这里过，全靠人工打就非常困难。那时没有炸药，乡上就动员群

众自力更生，家家户户把泥土挖起来熬土硝，自己生产炸药，搓火线。又从各村抽调强壮小伙组成两个炮工队，在牛角尖上打窝子，栽桩拴上粗麻绳，一次安排十多个小伙子坐进竹编的大箩筐，从悬崖顶上垂下去，凌空在峭壁上打炮眼。他们每挥舞一下铁锤，大箩筐就会荡一下。

每天下午，全乡群众就将砍伐的竹竿破碎，捆扎成把，送上工地，并将火把点燃绑到树上，确保夜晚照明。攻坚队夜以继日，耗时半个月，用钢钎铁锤打了许多炮眼，一炮就打下了牛角尖。

遇上坚硬的岩石，就进行爆破，肉岩骨则用十字锹挖掘。沿线1000多民工，锹、锄飞舞，炮火震天。

高明顺说，太和是偏远山区，历来很穷，那时提出的口号是修条英雄堰，堰上种果树，堰下开梯田种稻谷。想到不久便会有白米饭和水果吃，人们就越干越起劲，大家白天晚上不停息，打起火把加油干。六七十岁的罗焕堂精神好，干劲大，是不怕苦和累的老石匠；二十多岁的女青年高桂英则是妇女中的劳动模范。群众编了“罗焕堂老人赛黄钟，高桂英赛过穆桂英……”的山歌进行传唱，更是激发了修堰大军的热情。有一天，四五十岁的高炳忠负责打火把，有一炮打响后泥巴飞溅到头上，打得血长流，仍然坚持劳动不下火线。

春分是传统节气之一，为了实现“五一引水过三山（江山、戴山、黄山）”的目标任务，指挥部提出打破常规，不过春分，大家仍坚持战斗。高明顺回忆，那时候有很多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像沿岩石包上、悬崖上书写的大幅标语就有“万人大战天台山，堰不修成不下山”“男女老少总动员，万人大战牛角尖”“打开镇西山，劈开鹰嘴岩，大战英雄堰”等。

高明顺说，到5月30日，桂花大队的烂槽头硬是整不通，此处地形如槽，槽里头是烂包田，全是呈泡沫状的乱泥浆、泥夹石。人踩进齐膝深的乱泥石中，不敢动，不能提脚，一提就出血。要想从这里挖出堰渠来，比登天还难。那时不懂科学，又缺乏技术。“那天中午，我

在公社开完会就立马赶到工地，传达公社的要求，必须完成！”在经过现场观察会商后，最终确定了一个方案：砍树子，将前边坡、后边坡打满树桩，柴花子横起拦，两边做成隔挡墙，然后盖上柴花子，铺上树枝，让泥浆从土涵洞上面流走。

工地上人人出主意，个个献计献策，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在5月底完成了大部分工程，多数劳动力返回生产第一线，留少数搞扫尾工作。全线未修一座桥、一个渡槽，只挖2.5尺沟底，沟面3至4尺。6月1日，正式通水到江山。清清的堰水，灌溉着天台公社三角大队、马坪大队、花水大队和太和公社的株山大队、桂花大队。英雄堰当年见效，群众喜之不尽。

英雄堰线路高低不平，其形如一条玉带，蜿蜒流淌在天台和太和山腰。工程声势浩大，工作艰巨，时有叶代富等3人受伤。当年参加英雄堰修建的群众至今还记得流传的一首民歌：“五十里长英雄堰，五十天内就修完。双手劈开天台山，万亩良田不靠天。”



人们沿白灰撒出的线路摆出了长蛇阵，各村分段施工。
(杨理升提供)

“工程完工后，指挥部评选推荐我出席北京劳模会，高桂英出席省劳模会，罗焕堂出席县劳模会。”高明顺说，1958年10月下旬，他到成都参加了全省群英会后，和全省50名代表，其中温江地区有6人，坐火车经过三天三夜到达北京，住进了前门饭店4楼40号。

27日，全国群英会在北京体育馆隆重开幕，朱德委员长作了讲话，胡耀邦主持会议。会后，朱德还邀请四川代表去他家玩。朱德问：“你们人民公社化了吗？老百姓的泡菜罐罐不能没收哈！收了的要退给老百姓！”“你们回去后要把百姓的事情办好！”……回想起那次与朱德委员长的谈话，高明顺至今仍难掩激动。

大会期间，高明顺参观了怀仁堂、故宫、北京展览馆等地。参观北京展览馆时，高明顺带了一块又长又饱满的大寨玉米种子回邛崃。这个玉米一粒点下地，跟秧苗一样，一边发一根苗，一粒发3根苗，3粒就可发一笼，包米结得密实，每株要结三四块、四五块，从1958年起到1962年，太和公社试种了好几年，许多群众都来找过高明顺要种子。

为保持常年灌溉，1963年，太和公社曾对英雄堰进行疏通维修。1974年，因修玉溪河太和干渠，英雄堰荒废。

太和干渠大会战

20世纪70年代，全县修建太和干渠的大军涌进了太和场，让这座偏僻的小镇一下喧闹起来。

1974年12月，玉溪河大坝工程竣工后，即转战太和干渠。泉水、夹关等27个公社的民工进行分段包干施工。首先，架线、修公路、架桥梁，公路从张榜修到大坳嘴，其中太和场到大坳嘴是新修，张榜到太和场是原有路基毛样，全长15公里。工地上人山人海，肩挑背扛，号声震天，红旗招展。

为加速干渠工程的进度，民工们日夜苦战，10天左右就通了车，

运民工、工棚及各种器材的车辆日夜兼程。玉溪河工程邛崃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纷纷前来太和，按工段位置布设。整个工段从夜合岗起至红军隧洞出口止，全长 34 华里的主干线，搭满营棚，住满民工，红旗招展，炊烟四起。“我这辈子很幸运参加了太和干渠大会战，我们油榨营在打通镇西山隧洞后就上了太和工地，我在营部（公社）搞政工。40 多年过去了，但那场景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70 多岁的高彩波讲，人们一到工地，便热火朝天忙开了，搭工棚，砌炉灶，安营扎寨。一排排工棚，远看，像群鸟栖息；近看，像古代军营。每当一轮红日从山边升起，朝晖从工棚迎接出锹的队伍；收工了，工地一片喧腾。各公社来的数万民工，把开挖干渠的丰功伟绩写在了历史的画卷上。想起他们，高彩波眼前便会呈现太和工地的画面，绵延几十里，红旗接彩旗，白天人接人，晚上灯连灯，歌声、炮声、号子声、喇叭声……数万大军奋战天台山腰，激战龙垴河上。

玉溪河工程邛崃指挥部设在太和场下场口张湾一带，下设政工作组、技术组、材料组、机修组等，配套设置了医院、商店、粮店、餐厅、理发厅、招待所等。这些单位的摆布全用晒席、牛毛毡搭架覆盖而成，好似一条街道，晚上电灯、水银灯、日光灯照明，如同白昼。

太和场街面自来狭窄，民工们几乎天天上街领粮、领料、买菜、开会，拥挤不通，非常闹热。供销社为了供应需要，新建了百货、副



1976年9月，太和玉溪河工程指挥部工作人员悼念毛主席。（何吉民提供）

食门市，扩大商品营业，新设商店3家，银行1所，以满足工程需要。

指挥部下设4个指挥组：第一指挥组设街上；第二指挥组设严营；第三指挥组设老林口；第四指挥组设安基坪，将整个太和工程分成四段。每组指挥若干营，营以下设连排，人数不等。指挥部、指挥组及各营的电灯、电话联成一体，指挥调遣快当，确保了工程进度。

指挥部还组织有宣传队、电影队。1974年，四川省乐团、邛崃川剧团及各公社电影队都来太和工地为农民工演出。太和街上和乡下天天有歌舞，夜夜有电影。以指挥部为中心的高音广播，串联着指挥组、营、连、排，组成了广播网，各种歌曲、戏剧、新闻播送频繁。

工地上巨幅标语、号子声、歌声、铁锤声，混杂着一阵阵爆破声响成一片。铁姑娘、突击队抬着条石，拿起钢钎，钻山凿土，运输、后勤按工序、工种各司其职，忙个不停。每日三餐，收工点炮，一点就是几十甚至几百响，浓烟四起，尘土满天，飞石四溅。

1978年春，玉溪河干渠太和工段工程竣工，玉溪河水通到名山工段。

时光流逝，当年那些在太和工段挥洒过汗水的人们已经老去，但太和干渠依然挺立在风雨中。当年工地上战天斗地的人声、炮声、喇叭声等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响。

探寻白鹤乡

金成梦



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的白鹤桥，是邛(崃)高(何)公路的枢纽。(彭明权提供)

白鹤乡位于邛崃城西三公里，白鹤之名源于该乡北面有山名白鹤。旧志称汉朝学者胡安在山上设馆授徒，以白鹤为坐骑，云游四方，白鹤升降处，人称白鹤台。胡安死后，其弟子在台上建立寺庙，叫鹤林寺。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国民政

府实行新县制时建立白鹤乡，新中国成立后沿用此名。1958年公社化时，白鹤与大东、拱辰两乡合并，成立双江人民公社。1961年，双江公社解散，分别成立白鹤等4个人民公社。1982年撤社建乡，成立白鹤乡人民政府。1992年撤销白鹤乡，所属行政区域划归临邛镇管辖。

古老的白鹤场

从金山窑穿越封营，轻车熟路可直达白鹤。我在白鹤场四处打听

原白鹤供销社位置，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转来转去，寻找到了丁字口处的济岷药店，巧遇正在买药的70多岁的杨国良。杨大爷说，眼前这家药店就是原来的白鹤供销社。他接着讲，白鹤乡离邛崃城区很近，解放前就没有场

期，解放后也无法形成，供销社就成了农民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场所。杨大爷的印象中，小时候随父母赶白鹤供销社买东西，供销社黢黑的玻璃柜子和自己一样高，柜子里摆满糖果糕点，等父母将生活必需品买齐了，便央求他们给自己买几颗糖果，一路回家一路吃糖。成家后，杨大爷在白鹤后山砍竹子卖，卖到钱就去供销社打白酒。供销社售卖的商品品种齐全，除食盐、肥皂、白酒等生活必需品外，还有布料、罐头、香烟、石板、小五金等，基本可满足周边农民的需求。杨大爷是离白鹤不远的葫芦湾人，他说，葫芦湾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解放前就兴起了场期，逢一、四、七赶场，马湖、孔明、石坡、大同等地的人前来赶场，甚至邛崃、大邑、温江都来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猪羊马市、饭馆、茶馆、赌场等一应俱全，紧邻白鹤的葫芦湾成了川西著名的水码头，一度热闹非凡。

白鹤场上的老人回忆，白鹤最早仅有一条石板路通行，场上也只有一二十户人家。住在白鹤山下的叶国成大爷，年轻时从西河乡来白鹤场安家。他回忆，解放前邛崃出西门只有一条石板路，沿南河河岸通行，到了白鹤才拐进乡场。从场上经过，一直通到马湖、水口和火井。旧时的白鹤场有一家供骡马和客商打尖的幺店子，为过路客人提



由于白鹤没有场期，供销社就成了群众购买必需品的场所。图为1989年农民在供销社购买平价化肥。（杨遇欣提供）

供简单饭食和开水。饭菜基本为素菜，有干豆腐、青菜、炒豆子之类。此外，店家还卖些草料给过往马帮的马匹吃。场上还有一家饭馆，为路过白鹤场的富商、军官、袍哥等有钱人提供酒菜。让他们坐在清净的雅间，一壶好酒，几个好菜，慢慢享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饭馆主人的后代继承祖业，在白鹤街上开了一家酒楼，生意红火。1958年，白鹤街上开始修邛崃到高何的公路，路面铺的碎石头，碎石由当地居民按人头斤数提供。到了90年代，碎石公路才改建成水泥路面，显得干净而整洁。

生意兴隆的玻璃厂

我中学毕业时，听说白鹤有家玻璃厂，就委托嫁到白鹤山下的亲戚，托她帮忙进厂打工，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听当地人讲，当年的玻璃厂很红火，当地做古玩生意的侯师，80年代一度在玻璃厂拉货。请他帮忙打探首任厂长的情况，却一直没有消息。亲戚得知



玻璃厂生产的各种玻璃瓶供不应求。（张伟提供）

后，介绍了当年曾在玻璃厂质检科上班的尹华君。在青石桥鹤鸣村十七组，五十六岁的尹大姐说，1984年秋，南河坎高巷子玻璃厂在白鹤山下建分厂，叫邛崃玻璃厂。1986年，邛崃玻璃厂又搬到白鹤西南村（现在鹤鸣村十七组），改为邛崃啤酒瓶厂，后来又改名文君酒厂玻璃厂。新建成的玻璃厂1987年开始投产，首任厂长邓学兰。玻璃厂占用鹤鸣村十七组土地二十四亩，十七组共计四十八人进入玻璃厂，经过短暂培训后开始上班。

尹大姐的老公李世祥1987年进厂后在车间专门烧大锅炉熬玻璃水，对车间情况比较熟悉。他说，玻璃厂共四个车间，每个车间四班三倒，每班三四十个人，八小时倒班。李大哥记得，熬玻璃水，第一道工序是洗玻璃，然后是配料，有两个工人上料。刚出炉的玻璃水有一千多度，十多个专门倒玻璃水的工人用钢筋焊的铁舀子，舀玻璃水去倒在模具里。舀玻璃水的工人劳动强度大，一小时就要换一次班。另外，每个车间有专门管模具的，气压机按各种规格吹出玻璃瓶，成型后的玻璃瓶用输送带运到冷却炉退火。模具里的瓶子用舀子每次可舀四个，舀进退火炉冷却。每个车间有专门开行列机和空压机的工人，行列机成形酒瓶，空压机送气。玻璃瓶子冷却后，送到包装车间，包装车间有五六个人负责包装。刚开始用麻袋装，还有专门补麻袋的工人。到后来，不用麻袋包用车子直接装车运走。

尹大姐说，开始生产啤酒瓶、汽水瓶、曲酒二厂的酒瓶、罐头瓶，生意红火，订单排到一个月以后。1994年，玻璃厂又搬到原来的拱辰乡，惨淡经营两年后，红极一时的玻璃厂便关闭了。

华瓦厂探秘

去年夏天，有朋友约我为他从白鹤境内带回来的几件陶瓷做鉴定。几件器物分别是：一个黄褐釉、碗底有圈足、碗心有垫圈痕的土碗，一个残缺的双耳黑釉罐，另有一个没有施釉的土钵。朋友问是不

是邛窑器物？通过造型、釉色、胎质比对，几件东西的年代是清代，也可以称作广义上的邛陶。朋友说发现这几件器物的华碗厂在大鱼村邛窑遗址对岸，让我亲自去窑场上考察一下，看看和邛窑有无关联。我曾去过一次，遇到南河大水，无法下到河滩，只在河岸捡回几个没有釉的垫圈。垫圈是窑炉用来垫烧器物之用，碗、罐、钵、盘等，垫烧器物不同，垫圈各异。

朋友口中的华碗厂位于鹤鸣村四组，与大鱼村邛窑遗址隔河相望。少行人通行，河岸长满活麻、青蒿、灌木、竹林，有些荒凉。由于大水冲刷，河岸垮掉不少，冲出许多窑具和陶片，以及与泥土粘在一起的盘碗等堆积物，铺满了河滩。下到河滩，捡起河里、岸边的陶片仔细端详，陶片釉色多为褐色和青黄色，胎质粗糙、火候不老，说明这里应该是一处清代专门烧造生活用品的场所。问及当地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华碗厂之说，倒是多次提到华瓦厂。于是，前往华瓦厂一探究竟。在白鹤加油站打听，说到当年的瓦厂，年近花甲的华大爷高兴地说，华瓦厂当年的厂址就是加油站这里。华家祖上明末清初迁来此地，看中这儿丰富的陶土资源，便支窑烧瓦。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居民华孝山在窑上专门制瓦烧瓦，手艺精湛，华瓦厂做的青瓦在当地不愁销路，同时还远销大邑、崇州、温江等地。新中国成立后，华瓦厂仍然在生产，大集体时，华孝山的儿子还在帮集体烧瓦卖。

提到制瓦，华大爷来了兴趣。他说，瓦厂每个制瓦工人都有一套吃饭的家伙，绑了铁丝的弯弓、弧形木掌、铁丝指环等，其中瓦筒子最重要。这让我想起小时随父亲去孔明郭山村走亲戚，路过孔明何瓦厂，见工人们正在做瓦，便不走，停下看。虽说年纪小，制瓦的场景却一直留在记忆中。华大爷怕我听不明白，又叫来一位当年在华瓦厂专门做瓦的华姓邻居，由他讲解做瓦过程。

据 86 岁的制瓦工回忆，做瓦的陶泥是高岭土，也就是邛崃人眼中的白鳝泥，挖出的白鳝泥也需精炼，先将打坑挖出的白鳝泥倒在一个炼泥坑中，牵着蒙着眼睛的牛来回踩。陶泥踩好后，工人手持一张

绷了铁丝的弯弓，弯腰用弓使劲一切，一团切好的陶泥抱起甩到肩上，然后扛到做瓦的长条桌子上。提来瓦筒子，瓦筒子像以前蒸饭的木甑子，上大下小，由十多块薄木片铁丝捆成，高度一般一尺二，口沿有提手和活扣。按瓦筒子容量，做瓦工人眼疾手快，用铁丝弓顺手切下一块陶泥。这活全凭眼力，切多了，瓦筒子装不下，切少了，得再塞陶泥，浪费时间。陶泥塞进瓦筒子，转动坯盘。制瓦工人一手按紧瓦筒子，一手握木片制成的有弧度的木掌，边旋转，边刮泥。用木尺按瓦坯尺寸，瓦筒子里分四方插入四根竹筷子，开始切瓦。做好的瓦坯提到长条木桌上，打开活扣，将做好的泥坯码到长木板上晾晒。待晾晒差不多了，再装窑烧制。装窑时，手指上套个铁丝环，揭瓦时，连在一起的瓦坯需用套在手指上的铁丝削去粘连一起的坯泥，手法简单，却要熟练。单从制作工序上看，小青瓦的烧制实属不易，这还不算烧窑的那道工序，以及炉窑里的损毁。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建起了一座座现代化新居，新型机制瓦逐步取代了小青瓦，小青瓦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直没赶场的西桥乡

何承洪

西桥乡位于临邛古城西北，面积 24.25 平方公里，人口 1 万多人。乡政府驻长腰山，距县城 6 公里，在邛大路右侧。该乡始建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 1940 年），称西和乡。新中国成立后沿用此名。1958 年建立人民公社时因其位于西河之侧，故更名西河人民公社，共分 11 个大队，57 个生产队。1982 年 1 月撤社建乡，次年改名西桥乡。1992 年，西桥乡与拱辰乡、白鹤乡、南河乡以及宝林乡的渔箭村、马坝村，前进乡的天官村、金鼓村一同划归临邛镇管辖。

邛大公路从西河桥头起，经西桥、石坡至大同，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条古道，沿途驿马驮帮循此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不到三尺宽的石板路，两人并行都较困难。1976 年方才拓宽了路面，路况逐年改善。1988 年铺设柏油路，西桥乡的交通才得到较大改善。

今天去往原西桥乡，须经过一道叫返修桥的小桥。在距西桥约两公里处，原本有一座踏水桥，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因修建去石坡、大同的公路，在踏水桥上游约 300 米处新建了一座长约 20 米、宽约 12 米的公路桥梁。由于此桥修建时正值中苏冷战，桥又建成于 1966 年，受到当时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人们就给新桥取了一个颇具时代色彩的名字——反修桥，反映出一段公众熟知的时代背景和地名特色。改革开放后，当地人才将反修桥更名为返修桥。



1997年5月，新西桥建成通车。（王文军提供）

过返修桥，西行约三公里，便可到西桥乡的场镇。老街道离现街道不足百米，是一条长不到200米的小街。难怪有老人说，吸一根烟都要把全街走两趟。1980年左右，场镇的街道逐渐延伸到了邛大路两侧。虽然公社、信用社、供销社等机构健全，但场一直赶不起来。据当地老百姓说，自从解放前大邑县新场开始赶场起，西桥乡的场就赶不起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曾经有段时间，西桥乡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推动场镇发展：规划场期，划出赶场区域，还动员乡干部带头去赶场购物，但场还是没有赶起来。现在想来，主要原因还是西桥离邛崃县城近，流动人口少，而且当时老百姓卖的东西，大都是海椒、茶叶、鸡蛋、农家菜等农产品，当地乡民都有，自然做不成买卖形不成市场。

西桥乡虽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小乡，却也有几处值得游玩参观的古迹。

磐陀寺，位于原西桥乡磐陀村，因有大石如磐，故得名。磐陀寺始建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原名开元寺，明代改为磐陀寺。现存大雄宝殿系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重建，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培修。殿内正中有泥塑西方三圣（即佛家所称弥陀三圣），四壁有明代壁画（工笔重彩），内容描绘“善才童子五十三

参”的佛教故事。壁画中的各个故事，都以山水、树木、流云、屋宇、楼亭相间隔，使之上下衔接而又互相独立成章，类似一部珍贵的古典连环画。寺庙前后尚存摩崖造像4窟。寺前一窟为元和十五年刊一佛二菩萨，左右外壁刻有浮图及伎乐一队。寺后有三石窟：一为千佛龛，一为西方净土变，另一窟为密宗造像，亦具唐风。

对邛窑有兴趣的，除了去十方堂邛窑遗址，还可以去看看西河尖山子古窑址。尖山子古窑为唐、宋时期瓷窑，现存窑包两个，东西长80米，南北宽40米，高6米，面积3200平方米。表层露出烧结土，堆积大量陶瓷残片。出土的器物有碗、豆、匣、钵、垫圈等，为灰胎青釉，饰连珠纹。

在西桥乡一个名叫撮箕口的地方，有一座小小的寺庙叫寄子院。关于寄子院的由来，在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相传五代十国时期，孟昶为蜀王，在位晚期时宋军包围成都府，大军压境，随时有可能攻破城池。不得已，孟昶携家人仓促西行避乱。走到石坡时，孟昶的儿子不知生了什么病，萎靡不振，连御医都没法医治。当一行人走到今天的杨店子坡时，王子不幸病逝，孟昶悲伤不已。因战乱连连，加之交通不便，王子的遗体只能运送到西桥一个叫撮箕口的地方，暂且寄放在路旁一个小寺院，待战事平息再行安葬。此庙后来便被称作寄子院。据民国《邛崃县志》记述：“寄子院为蜀王孟昶寄子处，考其碑记，亦如是说。”今天的寄子院虽然地处偏僻，香火仍然旺盛。

西桥是个小乡，但历史上也有不同寻常的喧嚣时刻，那便是处决罪犯的当天。人们没事爱看稀奇，听说要枪毙罪犯，便从四面八方赶来，到西桥乡的铁二院或黄青冈林刑场看热闹。开过公判大会后，县城到西桥这段路，总有追着卡车跑的人群。

随着岁月变迁，西桥再不是当年枪毙罪犯的地方，曾经的刑场铁二院已经先后被改建成了养鸡场、养牛场了。西桥乡又恢复了本该有的宁静。

走在今天的西桥街上，能找到的原来印记非常少。在小学校门口



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邛崃县西桥乡医院门诊部。（田怡提供）

的一家小吃店里，发现了手写的“西河品味小吃店”字样。除此而外，再没找到别的什么。连那间曾经摆放着一张把脉桌、药品装在一排玻璃柜、进门靠着招牌的邛崃县西桥乡医院门诊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今仍居住在原西桥乡的人，除 40 岁以上的还对这个老乡名有印象，年轻人早已不知道西桥乡指的是哪里了。究其原因，就是这个乡一直没赶起场来，加之与其他乡镇合并后更名时间比较早。在街头一角的小区里，居住着从磐陀村几个组迁来集中安置的 60 多户人家，小区内除了老人和儿童，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显得有点冷清。场镇上有一个医院和小学校，还有几家卖电动车、日常用品的商店，一个红旗村卫生站，还有卖面和酸辣粉、卖卤肉的小店。原先街上乡政府、供电所、电信公司的房屋仍在，但人去楼空。原信用社和供销社的房子也早已卖给了当地农户做起了小商品生意。除了流动商贩偶尔的吆喝声，以及到大同的来往车辆不时鸣几下喇叭，碾起飘浮的灰尘之外，老街依旧是一如继往的宁静。

高埂的“苦与甜”

屈千贵

高埂镇又名高桥镇，位于邛崃东部，地处川藏线左侧和奔江河畔。据清嘉庆《邛州直隶州志》记载，明代时其地所建一庙，名高桥寺，又名法藏寺，殿宇高阔，结构异常，为当时驿站（又名高桥驿），故以庙得名。新中国成立前名太平乡，但群众都习惯称高桥，新中国成立后沿用此名。1955年将高埂乡合并仍名太平乡，1958年公社化改为太平公社。1980年地名普查时，因与地区内公社同名，故将太平公社改为高埂公社。高埂原名二江镇，因瀕南河，又有奔江水来之意。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以堰之名，称为高埂，高埂之名由此而来。1982年撤社建乡，成立高埂乡人民政府。1992年撤乡建镇。2019年底，因行政区划调整，高埂镇与冉义镇合并为高埂街道。

摆渡人的苦与乐

高埂镇高埂村自古就和周边村来往密切，但一直苦于有南河阻隔，通行十分不便。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组织下，由村里负责购船，并安排专人摆渡，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著名的渡口有哑巴船（摆渡者为聋哑人）、任渡船（该船摆渡人姓任）等，而最繁忙的则是三河渡口，历经五任摆渡人，分别是敖文术、任国华、牟良成、任国



高埂村著名的渡口之一。（梁忠伟提供）

品和张继民。

摆渡人的工作十分辛苦，全年几无休息。只有急事时，才去找亲朋好友来临时顶替。

为了确保随时都能通行以及船的安全，撑船者必须吃喝拉撒睡24小时在船上。船后的一个篷就是睡觉之所。遇到洪水季节，撑船者必须高度警惕。在长期的实践中，摆渡人总结了一套判断水势上涨的经验。只要上游一打雷，两个小时后便开始涨水，就得把船撑到水势平缓处躲避，并插上船篙固定船身。待洪水消退时，为避免搁浅，又会慢慢将船撑到原来的泊位。

渡船一般由当地的木匠打造，长15米左右，宽约3米，一次能载三四十人。木船的用料十分讲究，船底必须采用青冈木，耐磨。船边用桢楠，插篙（固定船的插杆）用檀木。造船代价不菲，20世纪80年代，造一条船的花费要1万多元。除了依靠村集体经济组织筹划，还要依靠县里的航运公司划拨原材料，并接受其指导。这种船拥有营业执照，摆渡人也有专门的证件，航运公司每个季度还会派人下来检查安全及运营情况。



1996年，高埂村一对新人结婚时乘坐渡船的留影。（周建奇提供）

涨水时渡船，最考验摆渡者的技艺。此时的船头要斜着迎向浪头，避开水筋（水流湍急处）。稍微有点偏差，船篙就无法控制，会被冲到下游数百米。为了有效控制，涨水时渡船一般会加上艄佬和一个掌舵的人，水势再大则暂停运输。此时小渔船却活跃起来，招呼急于过河的人。一次只能载一两个人，乘坐感受差又十分危险，不能站只能蹲，稍有不慎就有翻船的危险。

每天乘坐渡船的人特别多，清晨是最挤的时候。早高峰从凌晨4点多到早上10点左右，持续五六个小时。读书的学生，赶集的，做生意的，打工的，排队上船往往要两三个小时。由于渡口是浅滩，没有码头，船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上船时必须通过桥板。冬天桥板结冰时颇不安全，两尺宽桥板大家都在争着上船，因此，滑到水中的大有人在，这种情况被村民戏谑为“栽桩”。摆渡人最开心的就是遇到好日子，特别是结婚的新郎官会给船家打赏，封10元20元不等的红包。摆渡人也自然心领神会，凡是到新人家里赴宴的统统不收船费。

超载早就司空见惯，乘船高峰期船的吃水很深，船舷边缘距水面

仅一寸左右，风险系数随之增加。船尽管不会翻，但颠簸得很厉害。特别是自行车载物上渡船的很容易掉入水中，从开始登船的那一刻就惊恐不断。驮甘蔗的落水率最高，一辆加重自行车搭几百斤甘蔗，数捆甘蔗以直立的方式固定在后轮两边，重心自然偏高，晃动幅度稍大，人就掌握不了，往往连人带车一并落水。不过乘船者都是乡里乡亲，大家会主动帮助落水者，从未出现伤亡情况。

每年春季是船的维修保养期，完全停渡。因水位较浅，天气好时，群众或涉水，或依靠其他小型渔船过河。船的维修保养十分麻烦。“一条船三千钉”，需要检查的各种接口数不胜数，一般要半个月左右。一年修一次，一次花费近万元，几乎赶上新做一条船的造价。回龙两河口的张木匠是这一带比较出名的修船师傅，将船拖上岸后，他便翻转其身，让船底朝天，逐一检查破损或开裂处，宛如给船“挠痒”一般，这道工序行话称为“扣背”。接着是换板、盖缝、打磨、清洁和晾晒，最后为了防水、防腐及防虫蛀，还要在船的表面打一层桐油。由于检修渡船十分辛苦，结束工作后的张木匠要到第二天才能完全直得起腰。

火红的渡船生意，让摆渡人有了丰厚的收入。他们开始将家修缮一新，成为村里率先修建四合院的人户，摆渡也成了那个年代令人羡慕的职业。后来，国家渡改桥政策出台，桥梁建设如火如荼，只要是正式渡口都会架设桥梁。2004年前后，附近的渡口全部被新修的桥梁取代，渡船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甜味十足的产业

高埂的沙地盛产甘蔗，又脆又甜，20世纪80年代是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那时一斤能卖到一毛多钱，一亩田能产七八千斤甘蔗，毛收入达千元以上。在物质还不丰富的年代，甘蔗不仅好吃，也方便储存，在邛崃及周边地区很畅销，是春节期间馈赠亲朋的上佳礼

品。秋季为甘蔗成熟季节，为了让甘蔗在春节期间卖个好价钱，收割以后，人们普遍的做法是挖窖保存。在沙地里挖个深约一米左右的坑，把甘蔗放入码好，上面覆一层甘蔗叶子，再盖上一层土就大功告成。天气转冷后，甘蔗就不会因冰霜侵蚀而腐变。随着经济的发展，种甘蔗的人越来越多，产量也飞速增加，高埂周边建起了规模较大的糖厂，每年产糖达数十万斤，用煤量也达千吨。然而，运煤过河的方式仍然靠渡船。因为能通汽车的公路只有川藏线一条，拉煤汽车只能把煤拉到高埂小学的操场上堆放，然后再请工人用箩筐一担担挑上渡船运过河。

邛酒甘冽爽口，回味醇香，在全国享有盛誉。改革开放后，经济活跃的高埂开始在白酒行业崭露头角，小型白酒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开来。站在高埂地界内，无论朝哪个方向放眼望去，周围至少有二三十个酒厂的烟囱进入眼帘。原始的白酒厂用传统方法酿造曲酒，以大



改革开放后，经济活跃的高埂小型白酒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高建军提供)

曲发酵，酵期长达两个月以上。而这种小型白酒厂采用新技术麸曲发酵，酵期仅有7天，生产周期极大缩短。由于资金周转率高，往往投资1万元建白酒厂，当年就有3万元左右的利润。最红火的酒厂要数汤安全的二江酒厂，在万元户还是富裕人家代名词的年月，二江酒厂的产值就达百万元以上，汤安全也因此成为邛崃地区最先进入百万身家的富商之一，当地人还给汤安全起了个绰号“汤百万”。随着名声的扩大，在高埂提到汤安全，熟悉的人并不多，但一说到“汤百万”，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86年，为了回馈乡亲，汤安全一人承担了高埂村所有人的农税提留，1000多人共计20余万元。1988年，高埂遭遇旱情，汤安全又捐出数万元，购买抽水机等抗旱物资和生活用品，帮助大家顺利渡过难关。

从下坝的历史遗存说开去

江万军

下坝作为行政区域名称，已经不复存在。但对于当地民众以及知道下坝历史的人，其名其地从不曾改变。

历史上的多数时间，下坝说的都是地理概念，一般指临邛城西南方向，五面山西段与邛崃西部山区过渡带，上至现平乐镇李河坝，下至原下坝乡马流村和金钵村，东西宽约二三公里，南北长大致七八公里的椭圆形平坝的北部区域。习惯上，人们将这南北长、东西窄的平坦区域称为平落坝。南起李河坝，以平乐镇为主体称上坝，坝中心地带的老鹰坝周围区域为中坝，下坝场周边一带为下坝。而作为地理概念的下坝，仅指下坝乡的洗马村、马流村和金钵村的部分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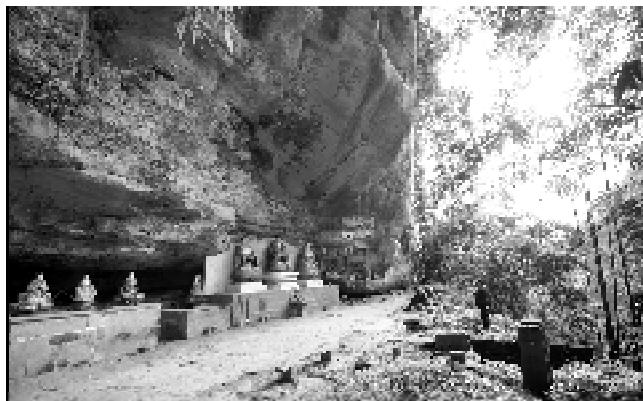
作为行政区域，下坝具名的历史并不长。早前的下坝乡辖域面积29平方公里，山丘森林覆盖，面积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而田地仅有1万余亩。辖9个村，79个组，人口9000余人。

下坝乡历史上曾名平乐下乡。清朝实行团甲制，设团练总管地方军政事务。民国初年沿袭清制。1935年，下坝改为乡，同时，将下坝划为一镇一乡，即以下坝场为中心的下坝镇（平原地区）和西部地区为下坝乡（山丘地区）。此时，下坝一镇一乡辖域为整个下坝历史上最大时期。1940年合并下坝一镇一乡，始设下坝乡。其名称和辖域直至1949年解放也未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沿用此名。1956年，原属孔明乡的青冈墩儿两个村划入下坝乡，合并成立第十村。1962年体制下放后，下坝第十村又划归孔明乡管辖。之后，无论是下坝乡还是下坝人民公社，均未调整下坝的行政区域。2004年9月，下坝乡并入平乐镇。

汇川塔的传奇

大排山位于下坝乡马流村，清嘉庆年间，平乐乡绅张大滨在大排山南面边沿，捐资主持建造了一座砖塔，因其位置是山下纸坊沟、范沟合流后的鸭子溪与白沫江的交汇处，两水合流，故名汇川塔。塔呈正六边形，分十一层，高约三十六米，塔基占地十二平方米、高约两米，塔身由下至上逐步收小。宝顶之上的宝刹由多粒金黄色宝珠串缀而成，建塔所用材料全都是留有“大排山”印记的特制巨型青砖，采用糯米石灰浆砌而成。砖塔落成后，晴日通体明亮，塔刹明珠金光闪烁。天将下雨，则塔体昏灰，宝刹阴暗。附近几里乡民预测天气多有看塔出门之说，故而也就称为风水宝塔。清末，马流村贡生徐守恭曾有诗云：“指天欲撼星辰落，立地但使鬼神哭。一幅云蓝开下坝，长虹远作珊瑚驾。”自汇川塔建成后，人们开始将大排山称为塔子山。



下坝乡官田村岩鹰寺唐代摩崖造像。（彭明权提供）

据传，张大滨常从叶河岸去平乐赶场时，要经过窄窄的独木桥过河，一遇白沫江涨水，常常被阻。张乡绅一次赶场行至木桥上，远眺

北面下坝的汇川塔，忽然发现其塔恰似插在船头的篙竿，而白沫江木桥则似船尾横架。于是，请来风水先生，反复察看平乐三坝地形，先生但说“无巧不成”，张大滨却误听成“无桥不成”。为结善缘，他开始多年奔走游说，并广泛联络平乐乡绅周潼滨等人，共同募集捐资建桥，终在清同治元年（公元 1862 年）完工，于白沫江上建造了六墩七孔红砂石券拱桥，方便了平乐及其周边人过河。念其乐善好施之德，后人命名乐善桥。

大排山上的汇川塔，不仅有着地形构图的完整性，而且还是当地出名的风水塔。在其存世的一百多年里，下坝官绅不绝，亦商亦官亦武连连拔彩。而 1964 年 4 月发生的事，却让人有些费解。当年，时任下坝乡主要负责人的王某某，下令乡干部组织炸药、雷管炸毁了大排山上的汇川塔，并将塔砖运回乡政府修建大礼堂等办公用房，说的是为了节省建筑费用，就地取材。奇怪的是，汇川塔崩毁之日，县上却免去了王某某所有职务。原因是炸塔方案早前被人举报，实施炸塔之日，县上派人实地查勘属实，故将王免职调离。这事在下坝传为笑话，继而在民间发酵，演变成了“修塔张大滨，毁塔（邛崃话：弄错了、不如意）王某某”的民谚。个中故事几乎成为当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至今仍是家喻户晓。

继承桥的故事

沿土下路（土地坡至下坝乡道）南行，下了尖岔坪的陡坡后，得见一座伟岸的公路大桥，横跨下坝场东北面的白沫江黄谷滩上，这就是下坝人自力更生建造的最大规模石桥。1976 年底大桥建成竣工，并于 1977 年元旦举行了开通庆典仪式。当时，因毛泽东主席去世不久，为表达下坝人继承毛主席遗志，努力建设伟大祖国的雄心壮志，便将大桥命名为继承桥。继承桥全长 80 米，宽 8.2 米，桥面距河床近 10 米。大桥为三孔券拱石桥，单孔跨度约 20 米，拱高 3 米，桥拱矗立



1977年元旦，继承桥举行开通庆典仪式。（季康泉提供）

在 5.3 米的桥墩上。整个大桥高出地面七八米，由大桥两端长长的引桥连接贯通土下路。大桥的建成通车，不仅解决了进出下坝各类物资的运输问题，而且让下坝人彻底摆脱了靠船摆渡出行的困境。

建桥以前的下坝，人们进城办事、赶场购物均靠渡船过河。农业生产使用的肥料、种子等物资，也得提前数十天，慢慢靠船运抵下坝。麻烦的是雨季来临，白沫江进入汛期，经常被迫停渡，严重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

1969 年，已在下坝乡党委书记任上履职多年的胥文清，看到下坝人渡河之苦，生产生活不便，便召集乡上干部开会，提出修建下坝大桥的动议。后又广泛征求各大队及下坝各单位、各部门意见，群策群力取得共识。1970 年，下坝公社成立建桥石料备料组，由当时的革委会主任何宗寿任组长，冉光彬协助领导备料工作。胥文清还带领备料组人员前往著名石匠——下坝二大队（金钵寺村）的梁树山家拜访，拟请梁石匠出来担当采石、建桥技术员。在梁石匠建议下，公社确定建桥石料场选在三大队（马流村）九队石场。在县公交局技术人员帮助下，选定了在下坝场东北部白沫江黄谷滩位置的石梁子连山岩处建桥。

1970 年 12 月，备料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全公社各大队、生产队等选调的 100 余名石工，组成了庞大的采石队伍。他们分作挖盖山、

开石、下料、运输和后勤保障若干组，在冉光彬的领导和梁石匠的技术指导下，开始了长达五六年的开山取材，运输石料工作。料场距离建桥位置二三公里，仅有江岸悬崖边的一条小路通达，要靠人力将石料从齐口料场抬到建桥处十分困难。唯一的办法是用木船水运，沿白沫江逆流而上，江岸上再靠人工拉纤助力上行。

对于众多吃住在现场的采石工，公社决定给予每人每天补助 0.5 斤粮、0.1 元钱，在生产队记 10 分工的待遇。但在强度巨大的体力劳动面前，采石工匠常常半饥半饱，生活异常艰苦。几年中，备料组挖去石料盖山 1000 多立方米，开凿石头毛料 6000 多立方米，凿出成品石料近 4000 立方米，且将上万吨的石料用小木船水运到指定地点，确保了大桥施工的顺利进行。1975 年，备料工作几近尾声，大桥建设进入施工阶段。公社成立了由党委书记挂帅的 7 人领导小组，指挥大桥建设。在大桥施工现场，白沫江两岸几十亩田地上堆满石料，几十名石匠打磨修凿石材，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不绝于耳；各大队增派的石料转运人员，组成二十多组双人、四人靠肩抬料组合，吆喝声此起彼伏；全公社选调的二三十个木匠，也在江岸摆开阵势，将从各队送来的杉树等木料加工成型，加班加点支起了三孔半圆形木拱架；十多个安装浆砌组的石匠在梁石匠指挥监督下，一丝不苟地将成品石料安装浆砌到位；后勤组十多个人，有的在施工现场发放石匠、木匠工具、备件以及施工、防护用品；有的在不远处搭起的工棚内为大家烧水煮饭，忙忙碌碌。整个建桥工地既一派繁忙，又井然有序。同时，公社还动员教师、学生、单位职工参加义务劳动挖填路基，总计投工达 3000 余个。

1976 年底，大桥竣工，经县公交局检测符合标准。次年元旦节，所有参与建桥的工匠师傅，组织保障人员，各队选派的群众代表，学校师生，相邻镇乡和县级有关部门人员齐聚下坝，一时间，下坝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台子坝上演连台川戏，白沫江畔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通车庆祝大会在新落成的继承桥上隆重举行，从此结束了下坝

千百年来靠船摆渡的历史。

茶马道的过往

历史上，经过下坝乡的古道有两条，均从临邛西出，经白鹤驿，过仙人洞上行至环扇子后分路：一条南行走元兴场（现葫芦湾），过石河堰，上尖山子，经罗店子、青冈墩儿、金钵寺至白沫江东岸黄谷滩到达下坝场后，再由东岸山脊继续南行走牛屎坡茶马古道，经过夹门关，到太和翻山至雅安上里，再到雅安、汉源至云、贵、南亚、西亚；另一条是从环扇子西行，沿火井河上行至马湖营，过马湖石桥后上山，经纸坊沟、桃源桥、打儿窝，翻过竹根坡、大水井、马岩岭，然后下山经马鞍腰到达油榨沱，再经火井场、高兴场翻过镇西山到达芦山、天全至泸定、康定进入藏区到达印度及西亚。

沿环扇子西行经过下坝的这条古道，是当年临邛西出进入西南夷的主要通道之一。如今，在邛崃境内这段古道上，尚有一些历史遗存和流传下来的故事。

邛州的古道可以说星罗棋布，但有名的茶马古道，不过上述两条。古道上的驿站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休息场所，而成其市集之地的，



纸坊沟不少泡竹麻的深坑和蒸煮竹子的簾锅，仍然清晰可见。（彭明权提供）



始建于光
绪三十二
年（公元
1906年）
的桃源桥。
(彭明
权提供)

不过大型驿站罢了。下坝纸坊沟的市集则有着不同的意味。之所以叫纸坊沟，是因一条无名的小沟，两边分布着大小十多个造纸作坊而得名。如今，不少的泡竹麻深坑、蒸煮竹子的簾锅，仍然清晰可见。千百年来，人们用竹子做原料，手工造纸，大量土纸从纸坊沟走向茶马古道上的郡县人家，一时声名远播。引得纸品商络绎不绝，有的为换几担纸，还得住上几天几夜。造纸业的兴盛，还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

桃源桥是下坝纸坊沟上的一座单孔石桥，始建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桥长6.6米，宽3.8米，高5米。桥面由石板铺就，桥拱腰正中塑一龙形避水兽，桥头立3米高的三栏石碑一通，中间竖排阴刻行书“桃源桥”三字，碑面刻有对联两幅，一联为：“走马斯桥如逢洞日；停车此地许问源头。”一联为：“南越西行通佛国；长安东去达神京。”穿过桃源桥，得见原野空旷，视界开阔，土地平旷，阡陌交通，农人往来种作，屋舍俨然。犹如《桃花源记》中描述的自然景象。于是，人们在石桥建成后，信手拈来，取名桃源桥。

穿过桃源美地，一路爬坡上坎，来到位于古道上第一座高山的制高点，也是下坝乡西北面最远处的马岩岭山脊。伫立环顾，一览众山

小，一幅以广袤天空为画布挥就的山水画尽收眼底。东望林木茂盛，浅丘低壑逐级向平原下降延伸；西南望去，文井江有如通天之河蜿蜒而至；西面的龙门山脉山峦叠嶂，云雾缭绕。从马岩岭西面下山经过马鞍腰，进入油榨沱，沿古道走向远方。而东南面下山不足百米就是下坝的大水井了。这大水井有着许多历史的功名记载，它隐秘岩石之中，常年恒温涓涓而出。当年的茶马古道上，人畜疲乏时驻足大水井旁，小饮甘甜之水，顿觉清心爽口。而大水井周边的人家，饮食之用自不待言。为方便往来商贾行人，善良的大水井山人还在井边凿石凳和石台，并在台上置备一把木瓢，方便大家饮水解渴。

大水井的水，流到官田冲，开始了它的第二用场。山下的官田冲，其实是大山之间宽不过一二百米，长约千米的狭长平坦地带。据说，这里的大多数田地在民国及其之前的朝代都是政府的公田公地，故而谓之官田冲。

顺着官田冲东下，不出一公里，看见山形似鹰的悬崖，人们称作老鹰岩。新中国成立前，此地曾建有一寺庙，名岩鹰寺，如今已不复存在，但岩鹰寺之名沿用至今。尤其让人留恋的是半山腰的溶洞，多年来，曾有不少胆大之人进洞探究，但出来多显不够满足。究其原因，说是洞深岔路多，深浅不明了，洞内宽窄无规律，上下艰难。溶洞深处，闻有流水潺潺之声，强光手电映照，可以看见地下河水流不断。据当地人讲，从这里倾倒下去一箩筐谷壳，数日后才能在马湖营下面的齐口得见河面漂着的谷壳子。人们至今也不明白，这地下河从哪里发源，又从哪里流出？

因旅游而兴的天台

刘彬

天台乡地处邛崃市西南边陲，距邛崃市区 45 公里，东连火井、夹关，南邻雅安名山，西接雅安芦山，北与南宝山接壤。天台乡原名三角堰，是民国初期形成的一个小集市。早年，因该乡有一堰口，形如三角，故名三角堰。集市形成后，称为三角堰场，习惯上仍称三角堰。民国二十九年（公元 1940 年）改称三角乡。新中国成立后，因境内有天台山风景区，遂更名天台乡。1958 年，成立天台人民公社。1982 年，撤社建乡，成立天台乡人民政府。2004 年，太和乡并入天台乡，成立天台山镇。

提到天台乡，自然绕不开天台山。随着不断开发和宣传，天台山已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四川生态旅游示范区、全球八大萤火虫基地之一。作为宗教名山，天台山以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大量游客纷至沓来。人们在欣赏天台山美景的同时，不免也对天台的各种美味赞叹不已。

提到天台美食，首推当地村民自己制作的原生态老腊肉。天台的猪大多以散养为主，每户村民每年多则喂上十来头，少则三五头，给猪吃的是山地生长的玉米、红薯以及米糠和各种鲜猪草。猪稍大，就在山坡上敞放几个月，吃的是没有农药残留的野生植物，喝的是没有



天台山旅游的兴旺，影响着天台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污染的山涧泉水。其他地方一头猪养两三个月，而天台的猪大部分要喂一年左右才屠宰。肉质不仅劲道，而且鲜香可口。肥猪宰杀后，分肌劈理，割成大小适中的条状肉块，用泉水洗净，手工将食盐均匀涂抹在肉块上，放在大锅或大缸里腌二十四小时。待腌透后取出挂于通风处滴干，然后再穿挂在一起，用柴火进行烟熏。熏制腊肉时，柴火距离腊肉三四米高为宜，距离太近则容易把肉烤得过焦、过硬，影响口感。熏制用的木柴也有讲究，通常要选择青冈柴、杉木柴等硬木干柴，同时为了增加腊肉的香味和口感，还要酌情添加柏枝、花生壳、核桃壳慢慢熏烤，让水分缓缓流失，把木柴的自然香味渗透到肉丝里。短则半月，长则要一两个月，烟熏火燎中，直到腊肉被熏得黄褐油亮。很多农家都省去了专门熏烤的麻烦，将腌好的肉块直接挂在自家柴灶上方的梁木上，每天生火做饭时燃烧柴草的烟火日复一日地对腊肉进行熏制，要吃时取下一块，其余的则一直挂在那里，有的人家的腊肉可以挂上一整年，成为名副其实的“老”腊肉。制作好的老腊肉外观呈黑黄色，层次分明，肉皮金黄有光泽，瘦肉外观呈黑红色，切开则为玫瑰色。香味浓郁，入口清香，回味悠长。食用方法多样且方便，可蒸、可炒、可炖汤。游客到了天台，无论是在星级宾馆宴客，还是在路边小店便餐，必定会点上一份天台百姓制作的老腊肉。游客不仅在当地吃，游玩结束返程时，还会选择购买几块老腊肉带回

家，慢慢享用或赠送亲朋好友。当地村民则抓住这个商机，将自家的老腊肉拿到景区周边向游客推销，收入可观。

除了老腊肉，天台山的老鸭子、烫皮山羊肉也非常有名。天台生态环境好，有大片的山林和无数溪沟，当地群众又多习惯散养散放，鸭子在清澈的山泉中嬉戏觅食，捕食鱼虾、螺蛳，成群的山羊在山林间自由穿梭，采食各种青草、野果，这样的原始养殖方式造就了天台老鸭子、山羊肉极佳的品质。将带皮羊肉入锅煨烫，加入少许鲜牛奶调味，经过精心烹制，羊肉的鲜、香、嫩让人欲罢不能。老鸭子的烹调更简单，将清理好的老鸭子放入锅中，加入适量山泉水，撒少量盐，再放入天台本地野山药，文火慢炖，让老鸭体内的含氮浸出物慢慢熔出，就可获得一锅鲜美无比的肉汤。每吃上一次，总让人回味无穷。游客离开时，汽车的尾箱里通常会多上三两只嘎嘎叫个不停的鸭子。

随着游客增多，天台当地村民发现，不仅腊肉、鸭子、山羊等受到外地人欢迎，就连平时根本看不上眼的一些本地蔬菜，也可以为他们带来可观收入。老南瓜，就是受游客喜爱的食品之一。天台山的老南瓜是在南瓜成熟后，等到根苗都枯萎才采摘。这样的老南瓜，能吸收根苗里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吃起来更加美味。天台老南瓜在黄绿色蔬菜中属于非常容易保存的一种，村民将地里完全熟透的、黄橙橙的老南瓜收到家里，成堆成堆地放在墙角处，放上几个月不成问题。以致在过去蔬菜紧缺的冬天，村民习惯把老南瓜作为重要的维生素来



受到游客欢迎的天台乡老腊肉。

源储藏起来，游客在冬季的时候也能吃上天台山香甜可口的老南瓜。

还有野蕨菜、野韭菜、野芥菜、野洋合笋等，野生在林间、山野，无任何污染的绿色野菜，不但富含人体需

要的多种维生素，还有清肠健胃，舒筋活络等功效。食用前经沸水烫后，再浸入凉水中除去异味，与腊肉等一起炒制，风味独特；或直接拌以佐料作凉拌菜，口感清香滑润，是难得的开胃菜，带给吃惯大鱼大肉的游客特别的味蕾体验。在天台山景区周边，随处可见打



2001年6月，日本客人在天台乡考察山葵生长情况。

着特色野菜招徕客人的大小餐馆。而随着对各种野菜的需求量增大，靠山吃山的村民也忙个不停，按照一年四季的生长特性，在山野间找寻、搜集各类应季野菜，或卖给大小餐馆、酒店制作美味佳肴，或直接卖给来往的游客带走，也能获得一笔贴补家用的意外收入。

山药、白果、板栗炖土鸡，寒水鱼、老腊肉，天台豆花、烤鸭兔；野韭菜、扎耳根、鹅脚菜，竹笋、灰菜、羊肚菌；以及烧蛋、玉米馍和竹筒饭，共同营造了味蕾惬意的氛围，使吃在天台不是一句空话。

许多年里，天台乡一面借力景区，一面围绕绿色生态资源进行开发，带动当地百姓增收。2001年，曾经吸引进日本客商到天台种植号称“植物中的黄金”的秋葵。后来，还大规模种植过皮球桃，发展观光农业。而猕猴桃、大樱桃的大面积种植，以及高山蔬菜基地、生态茶园等，所有这些无不与绿色生态、与美食相关。天台美食吸引了游客，也让群众找到了一条在家门口致富的路径。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纪事

2003年5月，抗击“非典”期间，交通局坚守在新邛路羊安收费站监控检查点，负责登记、检查、测量乘客体温等，不间断地对进入邛崃境内的客运车辆严格把关。统计外地回邛人员，并及时做好上报工作。（许志军提供）



我参加筹建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始末

(上)

胡立嘉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邛崃作为革命老区，一些单位和部门都组织党员到高何红军长征纪念馆进行革命教育。纪念馆从筹建至该年也已过去15个年头，虽曾有谭勋廉老师撰写过《建立红军长征纪念馆前后》一文发表于《邛崃文史资料》第十六辑，但仅只是一个非常简略的梗概。本人不揣冒昧，在一些老领导、老同志鼓励下，将我参加纪念馆筹建过程中所知道的一些具体工作的人和事，包括一些极少为人知的情节记述于后，按顾志军先生的话说，“算是给后人一个交待”。

一、筹建红军长征纪念馆的时代背景

1、邛崃“革命老区”的申报成功

1995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60周年、红军长征过邛崃60周年活动，促进了邛崃申报成都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根据地”的工作。1995年上半年，邛崃有关部门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积极准备将邛崃市或部分镇乡申报为革命老区。在邛崃申报和成都市调查、审批过程中，邛崃申报革命老区差一点“流产”。究其原因，主要是很多部门、人员对红军这段历史的认知长期存在误区：一提红军就只说南下红军在邛崃，而把邛崃地下党领导的地方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川

康边游击大队”割裂开来。所以，申报材料上就只有南下红军在邛崃的 112 天。而上级部门就根据邛崃的报告提出“红军在邛崃虽然建立了红色政权，但时间太短，只有 112 天，不足 4 个月”的异议，认为“不符合中央相关文件所划定应达到的时间长度标准”。

在成都市考察中，我从老领导老朋友徐仲旭处了解上述情况后，向他详细汇报了邛崃早期地下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抗捐军又名“中国工农红军川康边游击大队”两年的革命历史，徐先生立即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邛崃随即全面、细致汇报了从 1927 年建立党组织、1933 年王店起义，到抗捐军同通南巴“川陕苏区”的直接联系等情况。而南下红军所依托的正是抗捐军（红军游击队）游击根据地。调查组认真听取邛崃方面的汇报，十分重视，一致认为“历史是不能割裂的”，同意邛崃提出的 1933 年—1934 年抗捐军（红军游击队）和 1935 年 11 月至 1936 年 2 月红四方面军在邛崃建立苏维埃的革命历史都是红军革命史，“把两者接起来”的观点，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

1996 年 7 月 31 日，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万和执笔重新起草了一份近 3000 字的《邛崃市人民政府关于申报命名部分镇乡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根据地的请示》（邛府发〔1996〕41 号），并附上万字的《情况说明》、历史档案、文献、文物图片等附件材料上报成都市人民政府审批。《请示》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共邛崃地方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抗捐斗争，开辟了邛大特区根据地，建立了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红军进入川康地区后，



20世纪 60 年代的高何红军石刻标语。

又在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辖区内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为了教育和培养青少年一代，为了革命老根据地经济更快发展……我市拟报请命名：石头乡、临济镇、道佐乡、夹关镇、太和乡、天台乡、南宝乡、高何镇、银杏乡、油榨乡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根据地镇（乡）。”

同年9月11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高何镇等11个镇乡为革命老根据地的批复》：“……经审查，符合民政部（1979）30号和财政部（1979）85号

《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根据地的划定标准》，批准你市高何镇、石头乡、临济镇、道佐乡、夹关镇、太和乡、天台乡、南宝乡、火井镇、银杏乡、油榨乡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根据地。”

9月27日，命名授牌大会在邛崃市委会议室举行，会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暨成都市邛崃革命根据地批准命名大会”。四川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鄢正刚，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陈文，成都市政协主席骆隆森，成都市委副书记苏碧群，成都市委常委、秘书长苏海红，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严家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魏柏良，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黄忠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舒銮逸，副市长吴平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曾少金等省市领导出席了大会。邛崃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琼英，市长张义铭，市政协主席郭家镛等领导和有关部门、镇乡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大会由魏柏良主持，苏碧群讲话，



20世纪80年代初由木桥亭改建的长征亭。
(何吉民提供)

吴平国宣读同意命名批复并授牌。张义铭代表邛崃接受命名铜牌。

2、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发表

邛崃革命老区命名授牌之后仅十天时间，中共中央于1996年10月7日至10日召开了十四届六中全会。全会审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正是邛崃革命老区批准命名的机遇和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以及全会审定通过的《决议》的双重影响，促进了邛崃市委、市政府建设红军长征纪念馆思路的形成。

二、红军长征纪念馆筹建方案出台

1996年11月，为进一步将红军长征纪念馆规划建成成都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邛崃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熊定能为组长，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一田为副组长，有民政、党史、文化、教育、建设、旅游、财政等十多个部门和镇乡参与组成的邛崃市红军长征纪念馆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这项工作。

一开始，围绕纪念馆建设选址就有几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可以在城内或城郊选址新建；一种认为可以依托邛崃烈士陵园扩大建新馆，条件好，离城近，便于参观。我和多数同志倾向于在老区高何红军亭附近选址新建，既能依托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石塔区苏维埃旧址和红军亭、红军石刻标语等革命文物，又可助推老区发展。不足是距市区较远，参观不太方便。

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又发出关于利用革命文物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通知。正是这一通知精神，为在高何红军亭依托石塔区苏维埃旧址新建



工程甲乙双方、项目监理人以及设计工程师在现场指导施工。

红军长征纪念馆明确了方向。

1996年11月22日上午，熊定能副书记带领宣传、文化、民政等部门负责人到高何调研并现场办公。在高何镇政府听取镇党委书记李美银汇报后，一行人又在李美银、王明信陪同下到红军亭实地考察。登上石阶，在红军亭旁停下来，熊副书记要我汇报作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塔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和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塔寺石塔保护发展规划，他又指着半山腰坎下，详细询问了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我一一作答，并对坎下农民荒地及无主坟等情况作了汇报。李美银随后补充介绍。熊副书记就如果在这一带修建红军纪念馆是否与《文物法》有违背之处，上级文物部门是否会批准等问题提出征求意见。最后，要求文物部门按文物法规，立即向省、成都市主管部门汇报，争取各方支持。至此，纪念馆选址已初定。12月12日，市委、市政府又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到高何红军亭作进一步规划，准备申报成都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馆主体建筑设计方案的初步评选

方案评选工作在市委常委会议室进行。参评方案除有来自本市的建筑设计师何鼎康、杨学明等人外，还有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区县建筑设计单位和个人的设计方案。邛崃参加方案评审的除有关部门领导



门墙全部设计成红砂石城墙垛子，使纪念馆整体上被赋予了红色城堡的深刻寓意。

外，还有来自党史、民政、文化、教育、建设等部门相关人员以及老同志代表。参评方案以主体建筑设计效果图、平面布置图配以少量说明，沿墙壁悬挂展陈方式进行。最后，评选出何鼎康设计的以川西民居院落风格为主体建筑的方案。该方案在初评入选后，又吸收各方面意见，再根据石塔寺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关于体量、层高、风格的法律要求，同时结合斜坡式山地地形地貌，进行多次修改完善后，交付施工。施工过程中还结合实际情况作了必要调整。至于如今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一片山地，不修大点？展厅太小，应该修成一楼一底的水泥大楼才大气……殊不知这里面涉及太多的法律法规，是必须遵守的。在整体布局设计上，何鼎康突出以主厅为中心，左右两侧配房相抱形成升旗广场，同时又有效地把新馆与旧址分隔成两个区域空间。在广场前沿设计安放一道浮雕墙作屏风，使大厅、浮雕屏风墙和题写纪念馆名的门墙在同一中轴线上。建筑式样、材料和装饰很少使用现代金属、玻璃一类，朴实大方，使之与石塔寺文物保护区整体协调而又有区别。门墙全部设计成红砂石城墙垛子，使纪念馆整体上被赋予了红色城堡的深刻寓意。

施工方案经批准后，选定具有资质的邛崃市四建司五队（郭立生

工程队)负责施工。工程项目质监单位为邛崃市建工质监站。监理人王仲元。设计工程师何鼎康负责指导全面施工。工程于1997年3月2日顺利动工。

红军长征纪念馆总体规划方案

总体规划方案将纪念馆分为两大区域：1、石塔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含石塔寺石塔和红军亭)为文物保护区。严格遵照文物法规维修复原，模拟复原陈列工作交由文化局负责。经费争取四川省、成都市文物部门拨款，邛崃地方财政配套补助5万元。2、纪念馆区规划在旧址文物保护区东北。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规划面积39亩。纪念馆陈列图片、资料和文物实物展示。

根据市委统一规划安排，旧址维修复原工程由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实行五包(包上报审批、包施工、包质量、包经费、包工期)，一竿子插到底，实行一把手负责制。1996年12月，文管所所长陈炽昌专门去省文化厅、成都市文物处汇报情况，争取上级支持。由我负责编制旧址文物古建维修复原方案，绘制工程维修复原图报送成都市文物处批准实施。同时，组成旧址维修工程领导小组，陈炽昌任组长，我负责甲方现场施工。施工队仍选定郭立生工程队。该维修工程从1997年3月2日起动工。

1997年3月5日，熊副书记在市委召开关于高何红军长征纪念馆若干问题协调会议，强调这一工作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会上进一步明确规划，分工负责，强调各责任单位严格实行五包责任制，具体分工如下：

- ①征地费投入，20万元(高何镇负责)；
- ②新建专用公路1公里(高何一大窖公路楠木溪路口至纪念馆大门)，40万元(交通局负责)；
- ③纪念馆主体建筑400平方米，40万元(财政局负责)；
- ④纪念广场2亩，15万元(财政局负责)；
- ⑤纪念馆陈列及配套设施，15万元(民政局负责)；

- ⑥ 停车场，10万元（高何镇负责）；
- ⑦ 水电公用设施，40万元（城建委、电力公司负责）；
- ⑧ 旧址维修财政配套补助，5万元（文化局文管所负责）。

其余绿化等由林业局负责。预计总投资180万元。

会后，各相关责任部门积极协调配合，筹建工作紧张有序顺利进行。其间，成都市委副书记苏碧群、邛崃市委书记何琼英、市长张义铭及熊定能、王一田、胡元军等领导多次亲临视察，多次召开有关方面协调会议，对新馆土建工程和旧址维修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

纪念馆新建主体建筑在施工过程中，原设计的青瓦白墙改为红瓦白墙曾引起异议。考虑到文物保护区的总体风貌，经汇报，成都市文物处十分重视，派王政明老师多次来现场察看。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梁旭仲深入了解情况后指示：一要注意协调文物总体风貌；二要支持地方纪念馆修建，支持邛崃保护性利用文物、建设爱国



竣工后的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



维修后的石塔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以上。

红军亭位于石塔寺保护范围内，原是 1967 年 4 月高何公社当地干部、群众自发动工，移十几通红军标语石碑陈放沙坝桥头一座木桥亭中。当时还是学生的王明信用红底白字油漆摹写毛泽东主席《长征》诗木模匾一块，挂在亭子上，人称长征亭。1979 年下半年，当地政府将长征亭建筑连同红军石碑标语一起迁建今址，更名红军亭，共陈列红军标语石碑 22 通。1983 年 6 月 11 日，原国防部部长、老红军张爱萍将军在邛崃亲笔题写了“红军亭”三个大字，刻碑立于亭前。这次也一并列入维修。维修过程中，我和郭立生又遵照领导小组综合各方意见，将红军亭建筑采用柱下加垫石础的方法，整体抬升 60 厘米。维修前，曾有部门和部分同志建议：将红军亭改为长征亭，同时把高

主义教育基地。最后，施工方听取多方意见，慎重选择深玫瑰红色板瓦，与白墙、绿树交相辉映，取得完美效果。

位于高何石塔寺内的石塔区苏维埃政府，是红军在邛崃建立的两个区苏维埃政府之一，全称是太平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又称太平县石塔区苏维埃政府，其旧址是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本次维修除大殿暂不列入外，其余厢房、山门，从屋面、屋架、墙体、门窗到地面，维修面积达百分之六十以上，复原面积达百分之三十

何附近的红军标语石碑全部集中起来建红军碑廊。鉴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塔寺石塔文物保护范围和红军标语石碑文物原址保护的基本原则，加之张爱萍将军亲题红军亭名，人们早已习惯叫红军亭等因素，否定了这一意见。

1997年9月19日，成都市委副书记苏碧群一行在何琼英、张义铭等领导陪同下到纪念馆工地现场办公。旧址维修进入尾声，新区主体工程也已起来，文物石塔塔基四周的保护和环境不协调问题已突显出来。熊定能、王一田（已调任市纪委书记）、胡元军（已接任宣传部长）找我提出对塔基四周用条石保坎、做石栏杆的建议意见，并同意由财政再补助10万元维修费，其工程费不足部分仍由文管所向省、成都市文物部门争取解决。我和陈炽昌所长紧急编制方案，由我做《石塔寺石塔塔基挡土墙保护方案》，绘制挡土墙和栏杆设计图，由李子军绘制石塔平面、立面图，上报省、成都市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实施。1997年12月初动工，仍由郭立生工程队施工，我作甲方现场施工。1998年3月，旧址维修、石塔塔基保护工程基本完成，进入扫尾阶段。4月22日，省、成都市领导、专家现场检查验收文物保护维修项目。成都市委副书记苏碧群、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国璋、成都市市长助理晏永和、成都市文物处处长刘笑平、副处长尹建华以及省厅、市局、处室专家一行，在邛崃市委书记何琼英、市长张义铭和熊定能、王一田、胡元军等领导陪同下亲临现场检查验收，高度评价旧址、塔基维修保护工程。

接下来，进入旧址陈列方案和纪念馆新馆陈列方案策划和方案实施阶段。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张武提供）

四十年前我的下派工作和生活

傅尚志

1970 年代中期，我曾在水口公社工作生活两三年。先做下派干部，任党委委员，驻十四大队，兼任党支部副书记；后转入县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任副队长，协助队长王兴臻（法院院长）工作；县工作队撤离后，又作为工作组组长留守水口公社，配合党委处理遗留问题。

水口公社工作、生活期间，我在“狠抓革命”的同时，不忘“农业学大寨”，猛“促生产”发展。开会、集会讨论的问题多是移山填沟，造梯田平原，争取农业丰收再丰收的大问题，流行说法是“先治坡，后治窝”，很少涉及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

但衣食住行须臾难离，越不让说，越刻骨铭心。一些生活琐事，时隔四十多年，不仅没有烟消云散，反而在今天生活条件愈来愈好的反比下，更加清晰地在脑海里呈现。

下乡回城赶车难

1975 年某月，我同其他几十位同志一道胸佩大红花，分乘几辆从军队驻地借来的军用敞篷卡车，从南街县委大院出发，奔向各自下派的公社。

我下派的水口公社地处西部山区，离县城 25 公里。



1975年某月，笔者同其他几十位同志一道胸佩大红花，
奔赴各自下派的公社。

敞篷卡车没有坐凳，只能双手抓住车厢板，站在车厢前和车厢左右。县城到水口的碎石公路沿着白鹤、马湖公社的山边蜿蜒向前。路面坑坑凼凼，道路弯弯拐拐，坡坡坎坎。卡车不断颠簸，我们左摇右晃，前倾后仰。幸好当时年轻身体好，骨头骨节才没有被抖松震散。

25公里的山路，一个小时才跑到目的地。

那时实行六天上班一天休息工作制，等到了星期天，想回城看望妻儿老小。一问车站在哪里，方知水口既无车站，也无过路公共汽车。仅一天休息时间，靠旱走步行来回，除了把时间花在往返路上，还有什么时间待在家里呢？只好望城兴叹，望家兴叹。

那时，公社的干部几乎都是本乡本土。他们在公社开会领了任务，到自己负责的大队、生产队去检查督促后，就可以回家。作为下派干部，只能天天吃住在公社机关或自己下派的大队公房。只有等满了一个月，再请上三四天假回城：一是到机关办理差旅费报销和领工资领粮票；二是在家里换洗衣服，和家人待上几天。

没有公共汽车，回家的办法有几个。一是“甩火腿”。用自己的双脚旱走，一步一个脚印，快走慢行。这个办法，简单可靠不求人，但费时费力，会挤掉在家休息的时间。二是骑自行车。那时，自行车是奢侈品高档货，要凭计划和车票购买。大的机关有公用自行车，小的单位很少配置。单位的自行车只安排给短期出差办事的同志使用。公社更少，更难配置。工资高、家庭负担轻且能找到计划票证的工作人员，才可能会拥有一辆自行车。有自行车的人家理所当然被同事、左邻右舍高看一眼。那时，县上领导作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的报告，都会讲到全县增加了多少辆自行车、多少台收音机之类的数据，以证明群众生活越来越好。有自行车的人，一般不外借，怕外借一次，就会接二连三。当时，自己没有自行车，也不好意思向别人借用。第三种办法，可遇而不可求。水口是西部山区较大的场镇，公社机关所在地，设有粮站和大供销社。粮站常



水口公社地处西部山区，离县城 25 公里。

有车来拉粮进城，供销社隔三岔五也有车来送货和运走农副产品。要搭这些不定时的车，一是要机缘巧合，二是要和他们的头头脑脑关系好，说得上话，更要看开车的师傅随不随和，好不好说话。那时，社会上流行三种人最吃得开玩得转，就是手握方向盘、手拿听诊器、手提割肉刀的人。开车的师傅名列第一。我搭了几次拉货的车，也惊心动魄了几次。每次货物堆得冒过车厢，似一座山。人坐在货物上面，随车随货摇晃、颠簸，吓得惊呼呐喊，心惊肉跳，唯恐运气不佳，甩下车去，掉进崖壑，掉进河里，伤筋动骨，甚至丢了小命。



下乡回城赶车难，能搭上在粮站运货的拖拉机顺风车是幸运之事。

下派干部回城开会或休假，要自己解决交通问题；公社干部进城出差，同样靠自己想办法。遇到县上召开四级干部会，即有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参加的农业方面的会议，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还要背上被盖安步当车，到城里早已备好稻草的学校教室，打地铺住宿。

除此而外，我也沾光坐过“专车”进城。一天下午，县上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公社党委书记和有关负责人在规定时间赶到县委会议室。庞书记急中生智，调了一辆丰收35的拖拉机的机脑壳来载我们进城。一路上机头“突突”跳跃，坐在驾驶员两侧的我们，屁股不断腾上腾下，五脏六腑晃来荡去。屁股腾得再痛，也要全神贯注，双手紧紧抓住篷杆，不敢有丝毫闪失。

驻村随俗遇三难

在下派干部动员会上，县领导要求大家做到“三同”，即住到大队

和生产队，与当地干部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部门还发给每人一本小小的劳动手册，规定由本人按年月日填写劳动内容、劳动地点，请大队或生产队的干部签字证明。还说这项措施，是对年轻干部的锻炼培养。

其实，当时流行领导干部、机关干部甚至学校教师、学生每年都要到农村去劳动几天。比如，参加大战“红五月”的抢收抢种，机关干部要安排一周左右的时间，到指定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割麦子、收油菜籽、栽秧子，学校要停课放农忙假，让学生帮助抢种抢收。

对领导干部驻村劳动，县上还要组织专项检查。有一年，我和县委党校的韩合训同志被抽调到组织部帮助考察西路、南路的部分公社党委书记。考察的一项内容就是到党委书记驻的大队，去看有没有被盖，被盖是干燥的还是湿润的。干燥的，说明党委书记常在那里住宿。反之，则视为形同虚设。

我到十四大队“三同”时，首先遇到了与干部社员“同住”的难题。

大队没有大队部，当然就没有供我住宿的地方。大队党支部李书记家住第三生产队，为了方便商量工作，他建议我住在第三生产队的公房里，不去社员家里吃住。因为社员散居在山腰、山脚和沟边，家里人多房间少，很难腾出一间供我住宿。更主要的是，该生产队地多田少，社员人均口粮一年三四百斤；大米少，玉米小麦多，我每月粮票三十斤，工资不高，每天交多少粮票和钱给社员，不好商量确定。所以，还是住公房，自己开伙好。

第三生产队的公房建在山腰的一块平地上，一排木结构的几间平房。一间仓房，储藏粮食；一间带粪坑的猪圈，养着两三头架子猪；一间作大队合作医疗站诊室兼赤脚医生李医生的住房；一间厨房。公房后面是岩坎，前面是能容几张晒簟的坝子，是生产队开社员大会的地方。

按安排，我和李医生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同用一口锅灶。



第三生产队的公房，建在山腰的一块平地上。一排木结构的几间平房。

李医生家在山顶上的第五生产队，老婆在另一个公社。他每天到生产队去看病后，不是回五队的家，就是到老婆的家，很少在合作医疗站吃住，寝室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常住。

吃饭问题多数时间由自己解决。第三生产队离公社四五里，我每次到公社开会、办事时顺便买回几天的粮菜；柴禾不用买，生产队给我准备了几大捆树枝柴花子；饮用水，公房附近有一处清澈甘冽的水凼，用木桶打回来就行。

到其他生产队劳动时，也和干部社员一起吃集体伙食。一次，我到山顶上的第五生产队参加开山造茶园。早饭在公房自己煮，午饭由生产队集体开伙。王队长认为我是城里来的干部，不会吃玉米馍，叫饮事员给我蒸了一土碗米饭，比平常多了一二两米，干部社员全吃玉米馍馍。我三下五除二就吞了，但劳动一会儿肚子就饿得不行。到吃晚饭还有两个钟头，一看社员干得正欢，闲谈得知“莽翻山，麦倒拐，玉米馍馍经得甩”。米饭再吃得多，没有油荤都不经饿。试了几次果真如此。

干部社员请吃也难。一次腾贵队长邀请去他家吃夜饭，说推细豆花招待我。盛情难却，傍晚收工，回公房洗手洗脸后，迎着暮霭，走过一段山间小路，一段冬水田埂，到他家去作客。

生产队虽已收工，但腾贵夫妇回家后，仍然忙碌不停。清理牛圈里的草粪，自留地上摘土耳瓜，扯葱子，房前屋后招呼鸡儿鸭儿回家，再回到厨房剥豆子，泡豆子，推磨豆花。忙到晚上十一点过，才开始吃夜饭。

腾贵家的细豆花非常好吃，但夜深瞌睡浓，我很想早早告辞，碍于礼貌和盛情，大家放碗后，又吃了一杆叶子烟，摆了一会儿龙门阵才起身，回到公房已是凌晨一点多钟。

后来，又在一位社员家里，同李书记一起吃了一次夜饭，回公房已是凌晨两点钟了。之后，我就不愿到干部社员家吃夜饭，怕耽误了睡觉。

开荒扩地谋增产

到第三生产队住下后，队长说明天早工在周山扯豆子，挖土地。在老家上初中逢暑假，大战“红五月”我常常参加生产队劳动，出早工是常事。

凭经验，第二天天刚亮，我赶忙起床漱口洗脸，带上锄头上山下地。可是到周山地头，不见一人。等了好一会儿，仍不见人来。心头着急，又无人可问。无奈之下回到公房，烧水煮饭。不到一个钟头，万事大吉。一看手表，八点过一点。出门往高处一站一望，周山坡地还是没有一人。咋回事？难道是我昨天听错了队长的安排，还是生产队改变了劳动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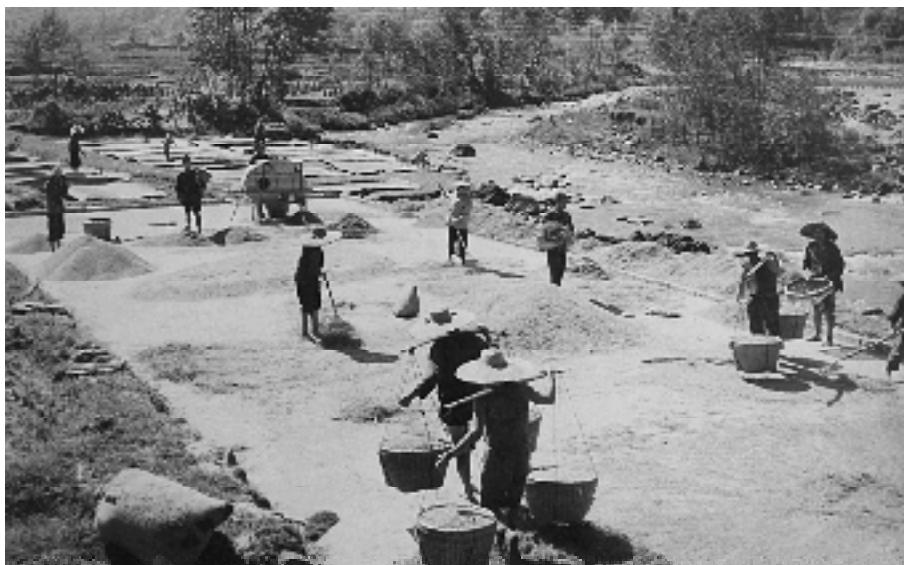
到队长家一问。队长告诉我，山区多数人家一天吃两顿饭。早饭早的八九点钟，迟的十点过钟，午饭要到下午两三点钟。早工就干一晌午，下午三四点出工干到天黑。坝上的人户一天吃三顿，出早、午、晚工，有手表看时间。山上的人有手表的少，只能看天色，按习惯出工收工。生产队晚上开社员大会，不等到十一二点钟，人都很难来齐。

队长、书记对我说，你初到我们这里，不习惯，慢慢就好了。你和社员比不得，各家各户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人外，都有老人或大娃娃在家煮饭。你一个人要煮饭，要到其他生产队检查生产，要到公社开会，就不要天天参加劳动了，有空半天也行。

队长、书记言之有理，也是关心我，县上也没有要求下派干部出满勤，只要求每月劳动十天就行了。我只好入乡随俗，随机应变，得空就上山下地同干部社员一道劳动一天或半天。

我驻的十四大队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大队，多次受到公社和县上的表扬。大队有五个生产队，分布在几片山上山下，田少地多，以产玉米、小麦为主，水稻很少。

县上、公社年年召开农业学大寨的三级干部大会。有时县上还要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主题多为战天斗地夺丰收，或者战胜灾害保丰收。为夺取丰收，县上、公社想了不少办法，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选用推广良种，改造下湿田，合理密植，想尽千方百计扩大耕种面积，多施化肥，移山造平原，种满种尽，精打细收等。



战天斗地夺丰收，这是生产队晒场的一角。

怎样才能保住农业学大寨先进大队的光荣称号，使全大队的粮食丰收再丰收？我心中没底，全听大队李书记的安排。李书记对五个生产队的田地了如指掌，对粮食增产信心十足。

大队召开生产队队长会议，我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宣布公社分配的增产任务、磷肥指标。李书记要求各生产队将牛圈里的草粪整干净，全部送到玉米、小麦地里，多用公社要求的玉米、小麦良种。然后，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告知哪里开荒荒（开荒地）种玉米，哪里的山坡山包整平点小麦。说开够荒荒，增产就有了保证。

生产队长没有不同意见的，只是要求多分点计划供应的磷肥和氮肥。

开荒，整平山坡山包，扩大种植面积，当然能增产，但上级不是要禁止毁林开荒吗？李书记要我放心，说开荒的地方原来就是大跃进时种过的地。只要开够荒，多整点山坡山包，就能完成任务。还说，荒荒灰多地肥，山坡山包含磷多，种玉米、小麦没问题。

我参加了第三生产队开荒荒的劳动。那天，干部社员在一个两山之间凹地之处，砍掉拉走一大片人一样高的杂树，割去丛生的藤蔓，将其和一堆堆枯枝败叶堆在一起，点上一把火，任其烟熏火燎，化为灰烬。过几日种玉米、小麦、豆子时，将草木灰撒开，或一把一把地抓来放到玉米、小麦、豆子的窝里，做肥料。

牙祭难打轶事多

在水口公社工作的几年，物资供应紧缺，穿衣吃饭吃肉喝酒点灯用油等都要按计划、凭票证。不少时间，有计划票证也不一定能按时买到所需的食品物品。加上工资收入低，要吃一次猪肉，难能可贵。

公社食堂平常日子都供应素菜素饭，久了，整得人痨肠寡肚。但大家又不好说三道四，指责管理食堂的办公室主任和大师傅，因为都把自己的计划肉票拿回去和家人共享了。每逢办公室主任想办法到食

品站（杀猪的屠宰站）买回一些血旺、肥肠、心肺或猪头给大家打牙祭，食堂的大师傅就认真地按一人一份的规矩，先分好，再卖给大家。在食堂就餐，有酒喝的人，可以倒一小碗酒，你一口我一口地传着喝，但吃肉只能搛自己碗里的。

粮站是场上的一个好单位，常年喂几头猪。有时杀了肥猪，为搞好关系，会让驻公社的粮管员出面，请几位书记到粮站打牙祭。一次一位书记去了，说还有事情没办完，端了一份回锅肉就回家了。这位书记顾家，不愿自己在外打牙祭。除了几位书记，与粮站负责人关系



粮站是场上的一个好单位，常年喂几头猪。

好的公社干部也可以参加打牙祭，但吃饭吃肉的钱是要付的。

为了解馋，专门为场上几个集体性质的旅店、门市以及家不在本地的工作人员办的食堂，间或会问用餐人愿不愿打牙祭。

如果多数人愿意，负责管理食堂兼司务长的卢老师——也是旅店的经理，就按照大家的意愿想办法去食品站整点猪下水，或到自由市场买几斤鱼，或一只鸡一只鸭，请闲暇的人监厨，让参加打牙祭的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卢老师对人对事公平公正，从不克斤扣两，多吃多占。他是县城下来的人，家庭成份不好，但大家敬重他，不叫他经理，都称他卢老师。

一次，食堂组织吃羊肉，他同炊事员同去买回一只羊，做烫皮羊肉。煮好后，他将羊肉捞起来滤干，亲自用秤称出总斤数，算好每份重量，再一份一份地用秤分，每一份都称得平平的，既不高也不低，直到恰恰分完。然后舀汤，分尽。大家看在眼里，赞在心头。

打牙祭除了吃猪肉、羊肉和鸡鸭鱼等美味佳肴，还可吃黄鳝、泥

鳅等水产品。

有人说吃黄鳝、泥鳅是成都知青带到山上来的，我没有调查考证，不敢妄下结论。但是，我听说过一个知青请王队长吃黄鳝的故事。

几位知青抓了半盆子又长又肥的黄鳝，开膛剖肚，切成寸长的鳝段，到王队长家里要了半碗胡豆瓣海椒，加上大蒜葱花，到村上代销店买回一斤二曲酒，连说带拉地请王队长去知青的屋里吃饭喝酒。说要感谢王队长在劳动、生活上对他们的照顾，也感谢王队长的胡豆瓣海椒。他们听说山上的人不吃黄鳝，所以对王队长说是红烧鲢鱼。王队长和几位知青围着一张小方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喝酒吃黄鳝。红烧黄鳝味道鲜美，大家吃得欢天喜地。王队长连说几次好吃，比他婆娘整的红烧鲢鱼好吃多了。

饭后，几位知青打着电筒送王队长回去。走出不远，一位知青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对王队长连说今晚吃的不是红烧鲢鱼，是红烧鳝鱼。开始，王队长还认为是开玩笑，后来相信了，“哇”地吐了一地，把几位知青吓惨了。

后来，有人问王队长：“黄鳝打牙祭安不安逸？”王队长回答：“安逸是安逸，就是想起来不舒服，那些黄鳝像菜花蛇一样，咋安逸嘛，那几个知青整我的冤枉！”

(本文图片均由何叶文提供)

《邛崃报》的前世今生

石刚

1958年11月的一个晚上，27岁的谭勋廉坐在邛崃县委邛崃报社一间简陋的平房里，专心审阅记者和通讯员交来的稿件。这些稿件审阅完成后，通过编辑、排版，将连夜送至县红旗印刷厂印刷，保证能在第二天发往全县各个机关、40个乡镇。

……时光荏苒，当初的编辑、排版、印刷技术早已淘汰，其时的新闻也已成为历史。而仅留下的一张工作照，却使我们得以穿过岁月沉淀，依稀望见一张报纸的前世今生和几代新闻人的执着与追求。

邛崃第一份铅印报

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以传达上级最新精神、反映党务政务活动、指导工农商学生产生活为要务，是权威部门权威信息的唯一来源，普遍以机关报形式出现。20世纪50年代，全国掀起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热潮，粮食、钢铁、机械化“三帅”齐头并进，号召“人人是歌手，人人是诗人”，鼓励全国人民用歌声、用一张纸为大跃进摇旗呐喊。受全国形势影响，许多地方（市、县）相继办起了报纸，甚至一些镇（乡）、农业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也办起小报。1958年8月1日，中共邛崃县委、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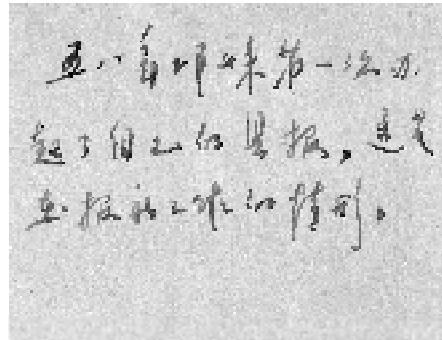
政府机关报《邛崃报》应运而生。这也是邛崃县第一份铅印报。

时任副总编辑的谭勋廉说起当年办报的情形，仍然激动不已。老人说，他原是县委宣传部的下放干部，创刊的次月才从油榨公社抽调回县委，担任报社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当时的《邛崃报》为三日刊，黑白四开四版，每期发行 8000 份，月发行价一角八分钱。报纸当时以强调政治方面的内容为主，较多地围绕“肃反肃毒、抗美援

朝、大发展”等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心任务进行报道。当时的编辑部只有四五个人，时任副总编辑的他不仅要编稿，还要出去采访。通过县委办发文，动员各单位熟悉业务、有写作能力的积极分子和镇乡通讯员为《邛崃报》写稿，以保证稿源。为提高稿件质量，编辑部每期印发报道提纲，告知通讯员本月要报道的主要内容。据谭勋廉讲，当时共有一百多名通讯员为《邛崃报》义务写稿。对积极性较高的通讯员，编辑部赠送稿笺、信封、邮票等，个别来稿多、质量好的则奖励一两元钱。由于当时只有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成都市还没有一家市级报纸，遇有《关于发展农业的决定》《关于建设人民公社的决定》等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指示，《邛崃报》必须全文转载，这是



1958年8月1日，中共邛崃县委、县政府机关报《邛崃报》应运而生。这也是邛崃县第一份铅印报。



1958年11月，27岁的谭勋廉在邛崃县委邛崃报社一间简陋的平房里专心审阅记者和通讯员稿件。后又在这张照片背后写下了说明：“五八年邛崃第一次办起了自己的县报，这是在报社工作的情形。”（谭勋廉提供）

当时的一项政治任务。每隔几期报纸就要增加一版插图，大多数是手绘简笔画，内容主要有“社会主义无限好”“资本主义阴森森”等图案对比，或展示新中国美好未来的画面。

1959年2月15日，邛崃、蒲江合县，蒲江县委合到邛崃，蒲江报社也和邛崃报社合并，报社编辑基本上合了过来，编辑部队伍一度壮大到八九人，由蒲江报社总编辑杨漓源和邛崃报社谭勋廉一同负责，报刊名称仍为《邛崃报》，只是内容更加丰富，囊括了蒲江县相关内容报道。为此，1959年3月7日第62期《邛崃报》还特地更名《蒲江报》（31期），四开四版，以示纪念。

除了采稿的艰辛，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排版印刷流程也十分麻烦。报社没有自己的排字房、印刷厂，编辑部须提前一天将所有稿件收齐汇总，由副总编辑负责审稿，交代好稿件编排原则，编辑划定好各种标题字体、大小，设计好后交送县里唯一一家印刷厂——红旗印刷厂。由于红旗印刷厂当时的业务主要以石印和小铅印为主，不能铅印报纸，县委便专门投入资金，为印刷厂新添了一台对开平石板印刷机和几个排版用的活字架，并抽调排版工人兰华富到《四川日报》印刷厂学了半年的排版技术，同时派其他工人去温江印刷厂培训平石板机印刷技术。出创刊号那段时间，印刷厂还从成都聘请了排字师傅黄彝

来报社进行现场指导。排版当天，四个工人站在四个字架前检字钉排版，如遇上字钉不够或缺字，两名刻字师傅还得现场在与铅字一样大小的木块上刻字。由于字太小，必须用放大镜，一笔一划地刻。当时的刻字师傅工资比一般人高，很多刻字师傅都身怀绝活。《邛崃报》基本每期都有照片，如转载上级报刊的图片以及本县先进人物、模范、炼钢的钢炉等照片，报社没有相机，县里很多照片都是由照相师傅王廷义提供。图片的印刷更为麻烦，拿到照片后，需要提前拿到成都去制成胶版，再拿回印刷厂贴在同样大小的木块上，和检好的字钉一起组版印刷。为此，编校人员、排版工人、刻字师傅往往要守候至半夜或到天亮。排版、印刷工人一日三餐都在厂里解决，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

困难时期奉命停办

由于《邛崃报》出刊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全国各地许多报纸都出现了大跃进，宣传“唯意志论”“浮夸风”等，造成“客里空”。受此影响，《邛崃报》通讯员来稿中也存在着虚报工业进度、农业产量等假大空数据。为此，谭勋廉曾亲自带着编辑下乡对通讯员进行批评教育。

20世纪50年代末，《晋绥日报》对“客里空”问题进行揭露和检查后，毛泽东、刘少奇相继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央作出明确指示：地方自发办报太多，没有控制，水平不高，浮夸风严重，县级以下报纸全部停刊。如今再翻看1958至1959年的《邛崃报》，时代的烙印随处可见，凯旋式的话语充斥报端。如当时《邛崃报》创刊号的头版除《发刊词》外，即为《千户万户传捷报 村前村后话丰收——全县早稻空前高产》《社会主义力量大显威风——全国早稻大丰收总产量比去年增加四百亿斤》和《鼓足干劲 乘胜前进》三篇报道。“当时全国性县报水平都不高，办得也很粗糙，草率，编审力量又薄弱，所以在大跃进当中报纸出的问题也

比较多，很多报道现在看来是不符合事实的，后来就奉命撤销取缔了。”谭勋廉回忆。

事实上，《邛崃报》停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三年困难时期悄悄临近。存粮短缺，纸张匮乏，使得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叫停一批不必要的小报。

1959年6月27日，邛崃报社在当日出版的第95期《邛崃报》上刊登了一篇《邛崃报暂时停刊启事》。历经11个月331天短暂的红火后，《邛崃报》暂时停刊，报社人员也各自回到原单位。尽管这份铅印报纸未满周岁便告停刊，但它为邛崃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红旗印刷厂的业务因此由石印作业本和社会印件拓展到铅印报刊、图书和杂志等。

人民来信催生复刊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为邛崃报刊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很多单位、企业纷纷创办内部报纸或刊物，交流经验，指导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的工作。一时间，文风蔚然，各行各业陆续推出近40种报刊以各自的风格传播知识，弘扬时代风尚，给后人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记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生活的需求。

2000年2月，高埂镇村民张春生致信时任邛崃市委书记谢志迪，反映“邛崃没有一张自己的报纸……听不到基层老百姓的声音和呼声”。不久，市委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讨论，决定成立邛崃报社。

“市委对报社的成立非常重视，由市委常务副书记熊定能直接分管，宣传部长主管，我担任总编辑，主持报社日常工作，宣传部干部王茂楠任副总编辑。”据时任宣传部副部长、《邛崃报》总编姚明辉回忆，“团队最初还是向各单位抽调人，从高何中学抽调了曹斌，从市委办抽调了徐学军。成立报社的文件下发后，很多社会人员也踊跃报

名，毛遂自荐，所以又临时招聘了韩涤非等人员。由于任务紧迫，就在当时市委宣传部大办公室里加了几张旧办公桌作为报社临时办公点。市上还专门划拨了 10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用于报社报纸印刷、发行、稿酬等费用以及临聘人员工资等开销。”

通过不到一个月的筹备，2000 年 3 月 15 日，中共邛崃市委、市政府机关报《邛崃报》试刊第一期正式发行。时隔 40 年后，《邛崃报》重新与市民见面，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报纸采用黑白四开四版，设新闻、经济、综合、副刊四个版面（有时也根据版面内容作适当调整），积极反映改革开放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激励全市人民投身邛崃地方经济建设。

“报社组建初期人手非常紧张，只有两三个记者。稿件来源除了市上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靠记者采写外，其余向各部门、镇乡通讯员电



2000年3月15日，中共邛崃市委、市政府机关报《邛崃报》试刊第一期正式发行。

话约稿。偏远的镇乡只能通过邮寄将稿件寄到编辑部，稿件不够详细的，才派记者亲自下乡采访。”姚明辉说，“当时的报社其实就是一个光杆司令部，车辆、相机、电脑等什么都没有，基本的办公用品都是将就宣传部的。排版用的排版纸还是我以前在渡口（攀枝花）报社工作时带回来的，连电话都是借用宣传部报道处的。记者要跟随领导下基层，只能搭乘相关单位的顺风车，或者赶公共汽车。”

《邛崃报》创刊之初，由于条件有限，报纸都在本地排版印刷。稿件汇总后，姚明辉负责看稿，徐学军负责将校对好的稿件分好类，在排版纸上画好版式，由印刷厂来人拿过去照排。先是出小样，小样拿回来姚明辉修改调整，然后拿到印刷厂打出清样，将清样拿给宣传部长审阅，再送分管报社的市委副书记审查，合格后姚明辉签字确认再拿到印刷厂印刷。

2000年7月5日，在试刊10期后，从11期开始，《邛崃报》作为周报正式发行，逢周三出版。市委通过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报社经费自收自支，《邛崃报》也由免费赠阅改为有偿订阅，并通过市委发文鼓励各机关、单位、镇乡和村组以及个人积极订阅，并由邛崃市邮政局统一发行，半年订价15元，每期印发近20000份。《邛崃报》作为周报正式发行后，又陆续增加了记者和编辑，采编队伍进一步扩大。原有的办公条件已不能适应日趋紧张的工作需要，后经市委协调，由报社出资，购置了当时位于东星大道的畜牧局一楼两间铺面和三楼一排办公室。一楼预作报社发行部和广告部，三楼为报社办公处，计有会议室、照排室、记者室、编辑室、联络室、总编室等，并配备了几部电话。

改刊《今日邛崃》成区县翘楚

2003年初，邛崃报社领导班子作出调整。市委宣传部部长胡元军任报社总编辑，日常工作由执行副总编杜卫平负责。市委副书记王一田分管宣传。报社开始实行总编负责制，除重大决策向分管副书记请示外，具体事务均由总编负责。据时任副总编陈瑞生回忆：“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后，自主决策事项虽然增多，程序也有了简化，但对办报质量要求却有增无减。报社成立之初，由于人手、办公设备等各方面条件所限，再加上起步较成都市其他区（市）县迟，报社的办报质量不够理想，在每年成都市对各区（市）县报社总体评价排名中，《邛崃报》的名次比较靠后。王书记分管宣传后，对报社提出明确要求，《邛

崃报》要想办法，争取在成都市评比中冲到区（市）县前列。”

任务面前，《邛崃报》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尝试。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沿海一带的报业水平一直居于前列。邛崃报社先后安排骨干人员到上海、浙江等沿海地区学习考察，并带回大量的当地优秀报纸，组织报社人员专题研究。从内容、版式上学习南方报纸优秀经验，并及时应用到《邛崃报》的内容改革上。翻阅那段时期的报纸可以发现，《邛崃报》的内容不再是市委、市政府文件、会议精神的大规模照抄照搬、简单剪切，社会观察等民生内容的比重明显增加。同时，报纸还创办了曝光栏目，加大了报社的监督功能。报纸定位也由单纯的党报转变为党报和市民报的有机结合，可读性明显增强。对于报纸的改革创新，市委高度认可，同时在资金和人员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专门为报社配置了当时最先进的电脑、排版软件系统，还大胆放权，允许报社自主招人，充实记者力量。报社采编队伍一度接近 20 人。



2003年4月防非典期间，邛崃报社与职高联手，向市民免费赠阅刊登有相关防非知识的《邛崃报》。

2003 年 7 月 1 日，《邛崃报》顺应形势要求，改为彩色对开四版大报。印刷点也由本地印刷厂转到成都博瑞印务，和《成都商报》同一条印刷线，印刷更精致。2004 年 1 月 1 日，《邛崃报》按照中央有关要求，转为刊型，并更名《今日邛崃》，每周一期，彩色四开八版，不定期出刊十六版，平时发行 15000 份，有时高达 2 万份，通过邮局全部免费赠阅给副局级以上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干部和各镇乡村组、社区群众、商家及机关企事业单位。

《今日邛崃》的编辑出版，开始受到《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等省、成都市级以上媒体的关注，其稿件经常被多家媒体采用。不仅如此，报社通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管理机制。据当时负责排版的樊安兴回忆：“《今日邛崃》时期，报社已经有了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我们学习《成都日报》《成都晚报》，实行评报制度。每期报纸出来后，所有记者都要集中在一起，对当期报道内容、报道

形式等进行点评，明确得失。副总编陈瑞生的每期审读清样，都会张贴在会议室，供记者交流学习。”良性机制下，报社快速培养起一支专业新闻工作者队伍。他们不仅向上级媒体投稿，对外宣传邛崃，提升邛崃形象，还经常与上级媒体联手策划、采写一系列重大稿件。在2005、2006年度评比中，《今日邛崃》与金牛区并列成都市区（市）县第一名，报纸质量获得了成都市新闻行业的高度认可，各区（市）县开始陆续到邛崃报社取经学习。

今天，报业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变革，但无论时空如何变幻，《邛崃报》在几代新闻人眼里，都是承载过光荣与自豪的阵地。关注邛崃发展，见证时代变迁的信念从未改变。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刘正富提供）



2004年1月1日，《邛崃报》按照中央有关要求，转为刊型，并更名《今日邛崃》。

五彩广场诞生记

刘彬

邛崃，是一座有着 2300 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历史上的邛崃是南方丝绸之路西出成都第一站，城市工商业兴盛，商铺林立，百姓富足，城市功能完善，市民生活丰富多彩。改革开放后，邛崃积极投身经济建设，城市经济不断繁荣，市政设施也有了很大改善。但与先进地区相比，邛崃的城市建设还相对滞后，城市面貌比较落后。

邛崃市民渴望自己居住的城市也能拥有集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环境优美、建筑风格独具地方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广场。进入 21 世纪，地处邛崃北门外的城北广场建成，虽只是一个位于城市边缘、



在政府门前围绕钟鼓楼的老广场，以及周边各种大大小小杂乱分布的房屋。

面积有限、功能单一的广场，但每天却吸引数千市民前往休闲、散步，足以看出市民对现代化城市广场有着强烈的渴求。

2000年，邛崃市委、市政府抢抓机遇，顺势而为，提出坚持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并重，加快以城市中心广场建设为主的旧城改造，以及五彩大道为重点的新区建设，将邛崃建设成为“东方波尔多，天府五彩城”。城市定位确立后，建设随即进入加速期。如何快速改变邛崃城市建设相对落后现状，提升形象，兴建现代化的城市中心广场，无疑是打响城市品牌、提升品位的有效途径。

确定广场建设方案

邛崃的街道形态大致呈“丁”字形：从西街往东街一字贯通；南大街从钟鼓楼前直通南门外，与东西大街在鼓楼前形成了一个丁字口。丁字口北边，从古至今均为坐南朝北的政府办公地。在政府门前围绕钟鼓楼，有一个小广场，周边还有各种大大小小杂乱分布的房屋，弯弯拐拐的小巷。一直以来，这里虽是城市的中心地段，也是商业兴盛之区，但环境杂乱，影响了邛崃的整体城市形象。

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以鼓楼广场为中心，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广场。

建设新广场，规划须先行。为保证新广场的规划设计科学合理，经深入了解，邛崃决定请中国市政规划的顶级设计院所——中国市政西南设计院负责新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在广场设计建设过程中，政府还多次组织设计、建设单位和技术人员，前往周边市县学习取经。通过对照比较，充分考虑自身特色，对广场总体设计布局进行不断调整完善。同时，本着“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新广场建设指挥部和市委宣传部联合印发了6000份问卷，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五彩广场、五彩大世界商贸广场建设有奖问卷”调查活动。为提高市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问卷调查还设置了奖项。一时之间，全市各界人士



在鼓楼开展的五彩广场建设方案有奖问卷调查活动。

新广场建设方案最终确定：以邛崃市政府办公楼前面的鼓楼广场为基础，东起棉花街、小北街，西至八宝街、学道街，南临东西干道，北靠市政府旧办公楼，总占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新广场的功能定位是：集休闲娱乐、商贸购物于一体，充分体现邛崃的特色经济、自然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底蕴。

新广场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购物的场所，也是邛崃的城市名片，因此，给新广场取一个响亮而又符合邛崃城市气质的名字，显得尤为重要。在深入研究邛崃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基础上，经反复斟酌，最后将新广场定名为“五彩广场”：红色代表邛崃革命老区；白色代表名扬中外的邛酒；蓝色代表境内丰富的天然气；黄色代表临邛悠久的历史；绿色代表邛崃优美的生态环境，寓意为“东方波尔多，天府五彩城”，形象地概括了邛崃的文化内涵和风格魅力。

一号工程顺利推进

2000年9月19日，市委五会议室室内气氛热烈，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邛崃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建平与成都市合力达集团总裁罗羽林，就该集团在邛投资1.2亿元开发建设五彩广场签定协议书，五彩广场

纷纷参与，积极为新广场建言献策。先后收集到有效建议意见近千条，不仅为新广场的规划设计提供了决策参考，还在全市上下形成了人人参与城市建设的热潮，凝聚了人心力量。

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并反复论证，新广场建

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邛崃把五彩广场建设列为市委、市政府的一号工程，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五彩广场拆迁建设指挥部，负责整个项目的拆迁和建设。制定了具体措施，明确了各部门的责任分工，规划了拆迁建设的具体时间安排：2000年9月完成拆迁摸底；2000年12月31日前完成居民住户的拆迁；2001年3月底前完成13个单位的拆迁；2003年春节前完成广场的建设任务。

然而，大家都清楚，城市建设最难啃的硬骨头就是拆迁。为保证新广场建设顺利推进，邛崃全市上下积极行动，全力以赴做好拆迁工作。

2000年9月28日，五彩广场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就前期拆迁作出安排部署；2000年10月13日上午，五彩广场拆迁建设动员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谢志迪讲话，希望全市人民特别是拆迁户充分理解、支持五彩广场建设；2000年10月17日，市委机关召开五彩广场拆迁建设动员会，要求广大机关工作人员提高认识，从大局出发，在拆迁建设中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五彩广场拆迁建设指挥部从不同层面，对拆迁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是广泛宣传动员，提出“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建好五彩广场，人民城市人民建好城市为人民”口号，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群众了解五彩广场建设的意义，正确认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全力支持广场建设。二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三当三不当”，即当宣传员，不当评论员；当支持者，不当阻碍者；当参与者，不当旁观者。带头宣传，带头签订拆迁协议，带头搬迁。同时，积极做好亲属工作。三是做好拆迁户安置，主动帮助拆迁住户解决具体困难，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实际行动支持五彩广场的建设。

拆迁工作中，身处一线的广大拆迁干部最为辛苦。面对艰难、繁重的拆迁任务，他们积极发扬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方百计的“三千”精神，深入拆迁户家中，讲政策、作动员，一户一户做通思想工

作。家住临邛镇人民路的一位拆迁户，家里情况比较困难，对拆迁有顾虑，怕办理拆迁手续后，房管局不安置，也不再管，再加上听了些马路消息，一开始对拆迁工作比较抵触，迟迟不愿办理拆迁手续。为做好他的工作，房管局干部职工多次深入走访，耐心细致解释和宣传，使其思想慢慢转变，最终不仅满意地办理了拆迁手续，还主动动员亲朋好友，以及兄弟全家办理了拆迁手续。

在认真做好拆迁动员工作的同时，邛崃各级职能部门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履职尽责，全力配合做好拆迁安置工作，确保五彩广场拆迁顺利推进。五彩广场的部分拆迁户，被政府妥善安排住进了黄坝村的皮革小区。入住的拆迁户大多对这里的条件比较满意，认为皮革小区的房子修得好，比自己原来的房子宽得多，环境也不错，水电都有。但他们很快发现一个问题，这里还没有接通电视信号，住进去的拆迁户没办法收看电视节目。眼看春节快到了，拆迁户都想看春节晚会，看邛崃新闻。于是，有人向拆迁建设指挥部反映：“我们要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请及时给拆迁户接通电视信号。”这个信息很快反馈给了邛崃市广播电视台。该局马上安排此项工作，经过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终于赶在春节之前牵通了电视线路，让住在这里的 200 多户拆迁户顺利收看到了春节联欢晚会，高高兴兴地度过了拆迁后的第一个春节。

在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全力配合下，五彩广场建设拆迁工作在预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据五彩广场拆迁建设指挥部统计，修建广场（包括建广场东面的五彩商贸大世界）共拆迁 812 户，其中，单位 20 家，居民 792 户，拆迁总面积达 7 万平方米。

成都第一爆留遗憾

五彩广场建设拆迁涉及的住户和单位搬迁工作完成后，为尽快拆除拟建设区域的旧房屋，特别是楼房等高层建筑物，五彩广场拆迁建

设指挥部决定对四栋楼房实施定向爆破，以达到快速拆除的目的。被纳入这次爆破拆除的房屋面积多达 11000 平方米，其在当时的成都市乃至整个四川都是空前的，堪称成都第一爆。

为保障爆破成功，邛崃选择了经验丰富的川投工程爆破有限公司承担此次爆破任务。经过前期的准备工作后，爆破工作定在 2001 年 6 月 5 日进行。

为了借此对外宣传邛崃的城市建设工作，五彩广场拆迁建设指挥部计划通过新闻媒体对这次爆破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报道，邀请了《华西都市报》等多家成都媒体派记者到邛崃报道成都第一爆的盛况。大批邛崃市民也自发涌到爆破现场附近，等待激动人心的第一爆。

爆破当天下起了小雨，14 点 30 分起，公安机关在爆破点四周安全范围设置了警戒线，并派出警力值守。电力部门特意将附近的高压线降到地面上，防止发生意外。15 点开始，有关部门暂时停止了该区域的水电气供应，消防车、救护车也开到了现场。16 点半，川投工程爆破有限公司总经理、爆破现场副总指挥一声令下：“起爆！”一阵剧烈的响动过后，右边独立的 D 楼应声倒下，而左边相连的三栋楼房却



留下遗憾的邛崃第一爆。



最困难的
拆迁工作
完成后，
相关建设
工作快速
推进。

跟人们开了个大玩笑：最高的六层黄色外墙房子（A楼）仍歪歪斜斜地“矗立”着，旁边的B、C两栋楼分别炸开一个大缺口，主体部分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此情此景令在场的工程技术人员十分尴尬，冒雨围观的人群也议论纷纷：“咦，专门炸都炸不垮！”

见爆破发生意外，川投方面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顾不上危险，一个个转身跑到几栋未倒塌的楼房内逐一检查；邛崃市领导也及时赶到现场，指示有关部门尽快查清问题、提出处理办法。经过现场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B、C楼里布设的大部分炸药没有引爆，据分析，是下雨淋湿导线，影响了爆破。几经磋商，工程方决定将临街的C楼剩余部分再次爆破。17点45分，爆炸声再度响起，但这次只听到三四声空响，房子仍然一动未动！围观群众在遗憾中散去。

随后，有关方面紧急开会，认为这三栋楼房已不适合再派人入内安装爆炸装置，决定改用机械拆除的方式拆除这些旧房。后来，据川投爆破公司总经理介绍，公司技术人员和毕业于西南交大的爆破专家对旧楼进行勘测后，发现爆破的建筑地处市中心繁华位置，出于安全考虑，在装填炸药时略微有些保守；加之雨水天气，使电雷管导线遇水短路，部分关键的炸点未能爆炸，导致这次爆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这次意外虽让人遗憾，但并未影响到五彩广场拆迁建设。之后，

在成都第一爆中未能炸毁的 A 楼及 B 楼，被大型挖掘机全部推倒。

亮出城市崭新名片

最困难的拆迁工作完成后，相关建设工作快速推进。2002 年 6 月 1 日，五彩广场市政道路、排水工程开工，由四川省瑞云集团路桥三公司承建，基础、回填工程由四川省高宇集团邛州建筑有限公司承建。至 2002 年 11 月 26 日五彩广场建设项目基础工程竣工，共配套铺设地下雨水管 1200 米、污水管 1100 米、给水管 1500 米、天然气管 700 米，安装电力线 1200 米。2002 年 11 月 3 日，五彩广场第二期开工，地面铺装、雕塑工程由成都朗世宁环境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承建，广场中心喷泉由四川省机电一体化总公司承建，广场绿化由成都蜀汉园林有限公司负责，2003 年 4 月底竣工。五彩广场工程全部完工后，于 2003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正式向市民开放。

五彩广场的草坪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培栽 29 种植物，绿化率占广场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一。广场北面为城市森林景观区，南面为疏林草地景观区，西面草地间植灌木、竹林。绿化带以外地面铺装 1.24 万平方米形色各异的方块花岗石，其间嵌有 1000 余块青石浮雕，浮雕图像选自邛崃出土文物的汉砖图案，供市民观赏和开展休闲娱乐活动。广场中心有花岗石舞台，跨度 20 米、高 10 米的五彩彩虹圆弧拱横跨舞台东西。彩虹有红白蓝黄绿五种颜色，分别代表邛崃地方五大特色。舞台后修建有旗台，中间旗杆高耸，三面有汉白玉栏杆围护，五星红旗在旗杆上迎风飘扬。草坪内五组大型花岗石雕塑错落有致，每组长 7 米，高 3 米，厚 0.6 米，塑有“原酒基地”、“火井飞煌”、“巴蜀古城”、“绿色明珠”、“红军北上”等图案，分别采用不同颜色的天然花岗石雕刻而成，与五色彩虹互为呼应。

广场中心喷泉分五个部分，全电脑实时音乐控制，水形和音乐可根据需要任意编排，喷出中心水柱、五彩飞虹、邛酒飘香、天穹步步高、



集休闲娱乐、商贸购物于一体的五彩广场。

科技之光、奔向新世纪、巨龙腾飞等 19 种形状，每种水型又有若干变化。喷泉灯光效果可随音乐强弱而相应变化，颇具动感和艺术效果。

广场周围及活动中心四周置 39 个花岗石酥树池，池中分别栽有桂花树、杜鹃、金心万年青、金叶女贞等观赏木本植物。池边石台及多处长椅可供市民闲坐聊天观景，体现了广场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紧挨广场的，是同期修建的占地 40 余亩的五彩大世界商城，仿中国汉式建筑修建，楼高两层（局部三层），与广场互为依托。城市文化与商业文化在此相互交融，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娱乐、休闲、观赏、运动、集会和购物消费的理想场所。

早上，在广场上散步、晨练、喝茶的市民络绎不绝；风和日丽的日子，人们三三两两坐在草坪边的长椅上晒太阳，或是三五成群地围在树荫下下象棋，孩子们在广场上奔跑嬉戏。最热闹的时候当属晚上，广场上跳舞的、玩滑板车的、打陀螺的、搞网络直播的……喧嚣鼎沸；广场周边的各种商铺，灯火辉煌，顾客熙熙攘攘。

临邛自古称繁庶，不到五彩广场，无法体会邛崃人休闲安逸的生活和活色生香的精彩日常。

（本文图片由刘向阳提供）

邛崃电影院建造经过

任莹

在邛崃的西街，曾坐落着一座电影院，玻璃幕墙上“邛崃电影院”几个铜雕大字由县委领导董朝永题写。但在老百姓口中，一直称其为西街电影院。影院揭幕于 1979 年底，承载着一代邛崃人的影像记忆。随着城市发展，影院交迭更替，曾经辉煌一时的西街电影院逐渐衰落，直至熄灯停止营业。但它仍是万千影迷心中曾经的精神家园。

1979 年，位于邛崃南街的老电影院，由于是原来的大礼堂改建，年深月久，设施陈旧老化，因此县上准备新建一座电影院。刚好那年，何子敬从部队转业回邛。他是文化系统出来的，曾在济南军区文化部、宣传部工作，因此被县上安排担任电影工作站副站长，负责新电影院的修建工作。何子敬在济南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与当地的大型钢铁厂和水泥厂等企业比较熟悉。在计划经济时期，钢材、水泥都不好买，他负责新电影院的修建工作，正好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资源。

当时西街是城区主干道，西门进城的人也多，附近的工厂也比较密集，因此拟建的电影院选址西街。新电影院由徐贵元主持设计。样稿出来时，大家感觉比较生硬，仍追求当时比较流行的礼堂样式，正门修筑牌坊，没有跳脱苏联风格。为此，筹备组先后组织人员到当时此类建筑修得比较好的什邡、成都等地礼堂参观，回来后有针对性地开会讨论，又和设计师商量，对顶棚、门面都作了改动。顶棚设计成



邛崃电影院新颖、超前的风格，在当时整个温江地区都是数一数二的。（张轶提供）

有起伏的波浪样式，电影院门面改用打磨过的水磨石。影院内部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安全问题，特意增加了通道宽度。行间距充分保证观众坐下观影后过道还能正常通行，遇到紧急情况能快速疏散，并确保在十分钟内完成退场。

新电影院相关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只待资金到位。经县委研究决定，由财政给予8万元资金支持，缺口部分由电影工作站自己想办法，去省上“化缘”，争取上级资金援助。何子敬回忆，他们一行人在去成都之前，特意先到温江地区所辖的另外两个正在修建电影院的新津和崇庆（今崇州市）县了解情况。实地察看后发现，邛崃的进度比这两个地方还稍快一些：邛崃的基脚已经垒好，开始铺砖；新津正在打基脚，还没有铺砖；崇庆才刚刚开始对旧房进行拆迁。

到省财政厅后，相关负责人回应道，目前温江地区有三个县在修电影院，省厅择优扶持，哪个修得快就支持哪个。何子敬连忙说：“我

们三个地方都看过了，新津在打脚子，崇庆在拆房子，邛崃已经在垒筒子了！”省厅相关负责人听了汇报后表示，到时会专门派人下来检查。何子敬一行人回邛后，马上向县上汇报情况。县委随即组织文化局、建设局等相关单位召开会议，要求加班加点、保质保量修建。没过多久，省财政厅派出工作组下来了解情况时，对邛崃的建设进度大加赞赏，说：“邛崃确实弄得快。”回去后，经过审批手续，省财政厅支持了邛崃 8 万元。后来，工作站又通过省文化厅和温江地区文化局，向上争取了一部分资金。

修建电影院最重要的材料是钢材和水泥，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建材很紧俏。好在何子敬有个战友在威远钢铁厂，取得联系后，他便和修建组的人一道，带上邛崃很有名气的“崃山二曲”和茶叶赶往威远。火车抵达威远已快午夜，老战友赶来迎接了他们，热情地说：“走，我们先吃饭，其他的吃完再说。”吃完饭，何子敬把需要的材料清单交给战友。战友慷慨表示：“螺纹钢、盘圆钢这两种都给你解决，要多少给多少。”得知邛崃修电影院资金比较紧张，战友灵机一动，告知正好厂里有车要去西昌拉货，途径邛崃，可以不收运费。说完马上安排发货，何子敬一行人还没回邛崃，钢材就先到了。

最难找的是修建梁体用的角钢，一般只有成都钢铁厂、绵阳钢铁厂这类大厂才能生产。听说省文化厅有计划，何子敬立即带人赶到成都，找到相关科室负责人，说明情况后，对方说可以给邛崃 3 吨。何子敬便“讨价还价”：“我来个车起码就是 4 吨，你不能让我拉 4 吨的车子装 3 吨货就回去嘛，而且我们修大梁确实还差一点。”交谈中，无意听到这位负责人喜欢吃黄鳝，成都市市场又不好买。何子敬就说，这个我们那边多得很，回到邛崃后，通过设在镇乡的电影队，让他们在赶场时特意买了一些。当时邛崃夹关、火井的黄鳝比较多，就弄了一桶。第二次去成都，这些在邛崃不算值钱的土黄鳝，却令这位负责人感动。最终，邛崃顺利批到了 4 吨角钢的计划。

钢材问题解决了，还剩水泥。由县委出面，通过省五金公司介

绍，电影工作站联系上了绵阳水泥厂。工作站一行人赶到绵阳水泥厂，对方听说是修电影院用，非常支持。谈到运费时，绵阳水泥厂负责人主动提出，他们正好要到成都拉材料，绵阳到成都的运费就免了，只需支付成都到邛崃的运费就行了。

钢材和水泥的问题都在四川境内解决，省去了从济南采购的高额运费。

无论是材料已到，还是在采购当中，电影院修建工程一直抓得很紧，晚上也要加班赶工期。电影工作站决定每天给工人加开一顿饭。一顿饭每人不到一块钱，每天吃饭按人头结算。因南街老电影院照常营业，电影站便增加放映场次，一天放十几场电影，从早放到晚，来观看的人也很多。票价几毛钱，积少成多，每天几百块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收到的钱，工作站就用来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当时新建电影院的所在地城关镇居委会也给予了一些支持。何子敬告诉负责伙食的师傅要天天见肉，回锅肉、卤肉、红烧肉换着来。肚子填饱了，工人师傅拉沙子、拉石头、砌砖……大家干起活也才更攒劲。

虽然想尽了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但总的来说，影院修建资金还是比较紧张。原先波浪形顶棚准备用三合板或五合板，最后为了节约成本，又和施工队商量，改成了牛皮纸板，再在上面刷上一层油漆，既实用也不影响美观。影院的翻板凳子是用重庆医药局的五合板制作



拆除时的邛崃电影院。
(张轶提供)

的，把材料拉回邛崃，专门请了温江技术好的工人，帮忙把五合板压成翻板。

西街电影院从开建到竣工，用了大概十个月的时间。影院分楼上楼下，设有六道门，总共能容纳 1000 余观众。售票窗口设在大门左侧，开始时是将拟放影的影片名称、票价和上映时间写在一个小黑板上，后来，专门在影院门口的街沿边搭了一个大铁架，请美工师画上每部电影的巨幅海报。不仅如此，还把电影海报置放了一个在十字口。总之，邛崃电影院新颖、超前的风格，在当时整个温江地区都是数一数二的。

影院竣工后，工作站在电影院内举行了落成典礼，并进行了邛崃电影院的首映式。那天全场座无虚席，散场时，何子敬还特别计算了一下观众的退场时间，果然 10 分钟内全部安全退场。

1979 年底，1980 年元旦前夕，西街电影院正式向观众开放。经常是买票的队伍排得老长，同一部电影看两三遍的大有人在。新电影院针对南街老电影院检票不严，影响观众观影体验等现象，特别加强了管理和放映秩序维护。

何子敬说，在对观众开放后的第一场放映前，还出现了一些小插曲。管理人员检片时，发现影片带子划坏了，由于时间来得及，立马联系温江电影院，支援了一卷完好的带子。电影院落成后，陆续收到观众的反馈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影院大气美观，通风、音响、秩序等体验也相当不错。去西街电影院看电影，成了那些年春节期间最时髦的事情。

西街电影院的开放，也带动了周围的店铺生意。邛崃很出名的“西部海鲜城”（主营炸土豆、小鱼、小虾），邛崃最好吃的甜水面，以及冰粉、盐萝卜……和西街电影院一样，都是 1980、1990 年代邛崃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稿

“凤求凰”故事在国外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赞誉，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慕名到文君井参观的外国学者、友人、游客络绎不绝。1982年2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传记作者、英籍华人、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及丈夫参访文君井。（王运升提供）



我的 1979 年对越作战回忆

刘明丰



1979年5月，作者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昆明军区庆功会荣立二等功留影。

坚守 387 高地、清剿周登寨、严守 226 高地以及驻扎红河边掩护大部队回撤。战斗中连队荣立一等功，个人荣立二等功，并被破格任命为营长。

在 1981 年四川抗洪救灾中，率领全营干部战士转战内江、资阳，成

作者简介

刘明丰，1944 年 7 月生于四川省邛崃县东安乡，高中文化。1964 年 8 月入伍，在 13 军 39 师 115 团 1 营 2 连服役，曾获“五好战士”“优等炮手”称号，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

1979 年 2 月，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指挥全连与兄弟连队一起渡过红河，奇袭 248 高地，勇夺 194 高地。协同 37 师打开全军南进大门。攻取 266（登高寨）高地，血战 215 高地，同兄弟部队一道彻底摧毁了越军谷珊西山防线。此后，

绩显著，全营荣立集体二等功，个人荣立三等功，并作为代表在四川省政府、成都军区抗洪救灾英模大会上发言。

1982年底转业，历任邛崃县（市）民政局副局长，市直机关党工委副书记，市精神文明办副主任，县委委员，县政协委员，县总工会常委。2004年10月退休。2019年1月因病去世，享年74岁。

准备

1978年12月28日晚10时，我们所在连队从驻地向内江火车东站开进，零时乘火车离开四川，前往云南。12月30日下午，部队到达昆明，然后转小火车赴个旧市鸡街，驻训小芭蕉寨子。

1979年元旦一过，部队就开始做补员、战前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等工作。训练重点是教新战士学会射击、投弹。由于我们备战地区山高、坡陡，因此在后来训练中除了射击、投弹外，还重点增加登山、越野训练，以增强大家的耐力。与此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爱国主义和阶级教育，请华侨控诉越南当局的反华罪行。部队还进行了照相、个人物资候运造册等战前准备。

1月20日，我连随全营乘一列小火车向河口开进。团政委王品端带团政治处人员为我们送行。晚上10点左右，我们到达河口蚂蝗堡车站。又经过三四个小时行军，终于在凌晨5点过到达漫峨新村（农场）住下，直到2月16日。我连一边训练，一边进行战前政治思想教育。最初，计划武装偷渡，我们上山去砍大



1978年，作者自制的点明册。

毛竹，准备漂浮器材，用长树干制作简易排雷装置。在连队，我们结合将要作战的地区地形，堆制了简易沙盘，并根据可能担负的任务，在沙盘上反复推演几套预备方案。同时详细规定了各种联络记号，便于作战时熟练使用。

2月16日上午，全连人员除战斗装备外，不准携带任何东西，其余物资全部打包集中。我们喝了壮行酒，晚饭后部队休息睡觉，养精蓄锐。夜里11点左右，我连在团侦察排陈克文带领下，向冯五寨渡口方向前进，12时到达冯五寨渡口北侧235高地，占领出发阵地。



1979年2月，作者在387高地上构筑工事。

战事

1979年2月19日，对我们二连全体战士来说，是最忙的一天。

上午，接营长命令，到387高地南侧。全连立即向目标进发，刚到那里又叫我们到369高地，去了后，又叫返回387。营长命令放下背囊，攻占266（登高寨），同时支援左邻三十七师攻占255高地。

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即向266高地攻击前进。一排在前，副连长带领，我带二排同贾排长居中，指导员带三排在后，副指导员带后勤。经过浴血奋战，全连一举攻克了266高地。我立即向营长报告，前面悬崖无法去支援左邻部队，只能用火力支援，把重机枪高架射击，用60炮火力打击。在兄弟部队的勇猛进攻下，越军狼狈向后逃

跑。晚上驻守 266 高地（登高寨）。各班派人去 387 高地把背囊带回，其余人员构筑掩体。连排干部召开会议，研究第二天战斗分工。决定由二排代替一排做前卫，三排在二排后，一排转为预备队。

20 日上午，我赶到营部接受任务。营长付天顺把地图摊开下达任务：三连主攻，从右边（西）山梁进攻；二连助攻，从左边（东）山梁进攻，配合三连攻下 215 高地后向谷珊西山攻击推进，夺取 345 和 402 高地；一连为营预备队。各连明确任务后，炮团王副团长征求炮火的打法。我建议先打谷珊西山（我判断那里有重炮阵地），然后朝前推打 215 高地。王副团长同意。

任务紧急，我们以前三角战斗队形攻击推进。刚前进不到 100 米，前面就传来三排受阻的消息，好几个战士受伤。我立即叫通讯员王全治通知三排撤下。王全治撤回时，大腿被打穿负伤。我立刻叫炊事班抢救三排伤员，卫生员袁学高带领炊事班积极抢救……当觉察到三连未占领 215 高地，我马上通知二排注意前面敌情，机动、灵活处理情况，并命副连长从右边接应，用 60 炮支援二排。指导员也拿起火箭筒打向敌人阵地。信号弹发射后，60 炮、火箭筒等齐发，直到弹药打完。

随后，我让指导员在后负责，带上司号员、步机员上二排处查看。刚走到前面，十二班副班长何田忠就向我指了敌方的火力点，叫我注意对方。他装上一发火箭弹，瞄准后打出去。只听一声巨响，敌火力点被打中。隔了一会儿，却见他一晃倒下，身负重伤，被一个新兵背了下去，后牺牲。

这时，指导员派人通知我，说营长找。我向营长简短汇报了情况。此时天色已暗，战场上烈士摆了一片，伤员一堆堆坐着，惨烈场景令我终生难忘。营部下令暂停攻击，坚守阵地，防敌反扑。我立即安排没负伤的战士挖掩体。

从前沿回到连指挥所后，指导员去团部汇报，我则同副连长李林一起检查防御情况。营长电话要我报我连人员伤亡，并向我传达了昆



1979年3月，驻守在云南河口蚂蝗堡防线上。

明军区杨得志司令员询问215高地战况。他问我还有多少人，我说没负伤回来的80多人。晚上9点左右，指导员带回指示，先组织一部分能走的下撤。不久，副连长过来说又回来了十多人。凌晨1点过，副连长得到报告，四班长杨乐文带20多人摸回来了。他们把鞋子脱了，用鞋带拴好挂在脖子上回来的。营长再次来电问回来多少人，我说100多了。他问明天可以再打吗？我回答能打！

21日凌晨4点过到5点，失散人员全部回来。初步统计，二连伤26人，亡10人。我们立刻决定做好防御准备，防敌反扑。清查弹药装备，保护好烈士遗体，准备天亮后继续进攻。二连三排暂由副连长带领，二排长贾颖民代理副指导员，继续在二排，四班长杨乐文代理排长。同时向营部汇报：弹药严重缺乏，特别是火箭弹、60炮弹。营部同意我们的计划，指示天明后，听命令用曳光弹向炮兵指示目标。我立即叫一排长清查子弹，找来几十发曳光弹。

天蒙蒙亮，营长问准备情况，并说三营九连接替右边进攻，我连任务不变，听命令向炮兵指示目标。炮火后发起攻击，攻占215高地。

并清理战场。谷珊西山、402高地攻击任务由三营接替。与此同时，团部派人送来所需的弹药和食品。记忆最深的是有大块大块猪肉的几盆汤。我们用沾了血和泥的双手随便吃了饭和几块猪肉，就把干部集中向215方向给大家布置作战任务：二排在左、一排在右并向攻击，副连长李林随一排，我和指导员率连部60炮班前进。司务长率炊事班跟进。一排长李永贵随时给炮兵指示目标。60炮在炮火准备时向215射击。

7点左右，各排报告准备完毕。电话突然响起，营长命令炮火准备马上开始，注意观察，及时向炮兵指示目标。几个射手各按选定的目标打了几发曳光弹，几分钟后，215高地炮声隆隆，火焰横飞。炮火刚停，我立即下令发起冲击。全连干部战士向215高地奋勇冲去。不到20分钟，就同友邻九连攻占了215高地。

下午，我连接到命令，到369高地东侧防御。晚上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决定：一是三班长武海强代理三排长，四班长杨乐文任二排长，二排长贾颖民代理指导员，副连长李林到三排指导武海强工作，其余各班正副职依次增补，并向营党委上报。二是配属分队不变，喷火班归建。三是做好防御挖掩体，布好明、暗步哨和班哨。各班、排清查伤亡人数，检查装备损失情况后上报，做好当晚的驻地警戒，查哨，带岗，牢记口令等事项。直到晚上10时左右才休息。

215高地一场血战，我连牺牲14人，伤30多人（含配属分队）。

清剿

2月22日早晨，我连接到命令到387高地布防，主要任务是保障我师西侧387至369高地的安全和防止敌特工袭扰。2月23日上午，继续修筑工事，连部用两层直径20公分粗的圆木架成人字形掩体。

26日上午，部队接到通报，近期敌特工活动频繁，要各部加强防备。根据通报，上级要求搜山，清剿消灭越军散兵游勇。下午全连召开干部会，研究搜山、清剿计划，按上级划分区域进行，决定由三排

留守防御，60炮班留下配合，我和副连长、副指导员带一排、二排进行搜山清剿。

3月2日，我连接上级通知，对387高地西北方两千米处的周登寨进行搜索和清剿。

到周登寨前，连部先派一个班配属一挺重机枪在寨子西北路口高地占领阵地，封锁寨子出口及附近各处，只准进不准出。各路口也派了哨卡。然后，成一字队形向寨子包围搜索。到了寨子，再对各家各户进行检查。我带着通讯员李胜利、文书何崇斌、司号员杨裕东、步机员邓德忠，端着一挺班用机枪来到一户人家。一进大门，就看见厅堂上供的是用汉字写的“天地君亲师”牌位，还有毛泽东与胡志明握手的宣传画。主人对我们并无敌意。

我们把全寨子的人集中到坝子上，然后叫老潘（翻译）给他们讲我们来的目的，叫他们交出越军散兵和特工。这个寨子沙族同中国沙族同宗同源，文化、生活习俗都相同。听了老潘的话后，有几个人和老潘说了几句。老潘翻译说，有些不是他们寨子的人。我们就把不是他们寨子的人带到一边，然后把年轻人叫到一起进行观察辨别。一看头额，二看双手。共抓了32人。然后，由翻译同他们讲，我们先把他们带回，进行识别。如果不是特工和散兵，马上放回。

387至369高地是我军最边沿线。经这几天反复清剿，搜索各高地后，晚上我们阵地安全多了，但也不敢有任何松懈。这也是连里对各排、各班的要求。因为这几天通报敌特工仍然在其他地方活动多。

回国

1979年3月5日，天刚亮，指导员打开我连唯一的收音机，就听到中央台宣布撤军的消息。但啥时候撤还未定，下一步怎么办？我同指导员组织全体干部开了会，一是向全连宣布撤军消息，安定情绪。二是服从命令，做好准备，随时按指定路线撤离。三是研究撤离方案。

四是避免松懈、麻痹和轻敌思想，提高警惕，防止越军偷袭。随后，各班、各排传达落实，人人皆知。下午，到各防御阵地检查落实情况。指导员则把开会情况向营部汇报。是日，为作战以来心情最轻松的一天。

3月7日中午，刚吃完饭就接到命令，要我连马上去孟珊外斩河山口出水口东南面226高地防御，防止越军从此处袭击，保障我军回国途中西侧的安全。命令一下，连部立即决定由一排担任前卫，派出尖兵，三排居中，指导员同60炮班随行，二排担任后卫，副指导员随行，我和副连长随前卫一排行动，下午3点过向226高地开进。

到226高地，立即布防。一排在北侧沿地形布防，三排在中和东西两侧，二排在南侧依地形布防。天黑前挖好单人掩体，派出班步哨。布防完后，回连部仔细检查60炮班两门炮位，天黑前由炊事班抽调人帮助把两个炮阵地挖好。

3月9日深夜，我连接到命令：12日上午自行经龙金向红河边撤回；同时，注意加强警戒，保障我部西侧（左）安全。接到命令后，一直没有睡好。怎样才能安全撤回，同时保障我部左翼安全？撤离要途经龙金大坝子，阵地西侧还有一个孟珊寨子。考虑了一夜，天亮了，把几个连干部叫在一起研究我的想法：先由副连长李永贵带一排一个班，过外斩河经孟珊过龙金坝子至龙金，把沿途的情况探察一下，龙金至外斩河边公路一线的情况也同时探察。我在地图上给他作了详细交待，并让一个通讯员一起去。中午，李永贵回来，听了他的侦探情况后，全体干部开会，研究决定直接从一排防御前沿小路下山过河、沿孟珊至龙金路线撤离的方案：一排撤退时注意左侧（西）警戒，三排掩护一排过河，特别加强对孟珊寨子的警戒；二排与一排同时由阵地向北撤离，连部、60炮班、炊事班随三排行动；按交替掩护，各排、各班撤离时成散兵队形，不能太密集，防止越军游动炮袭击；各排、各班做好动员，随时准备行动；要求每个干部、战士加强警惕，严防松懈麻痹思想。

3月12日上午，我连开始撤离回国。按方案，一排担任前卫，三

排、连部、60炮班、炊事班居中，二排担任后卫掩护。各排按规定布好防务，派出哨兵，警戒保障安全。此时我连离开大部队已6天。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马上要把战友们带回了，担心的是发生意外，特别是伤亡事件。

下午5点左右，部队撤到红河边，眼看就要到舟桥了。突然接到命令：往回（南边）就近占领高地防御，掩护大部队过河。

天快黑了，大部队已撤完。我们刚走到河边又叫回到194高地东侧一线防御，掩护工兵拆舟桥。眼睁睁看着舟桥拆了，我连的退路也断了。为防越军追来，我连迅速将三个排根据地形组成三角防御阵地。从晚上8点起，各班、各排高度警惕，加强戒备，严防越军偷袭。

3月13日凌晨3点过，营部命令我连做好撤离准备，我回答，一排、二排还在前沿两个高地，需要时间。命令说，4点30分在红河南岸边做好撤回准备。

接到命令，我马上用对讲机通知一排、二排撤回，并加强警戒。三排、连部、60炮班和炊事班做好第一批撤回准备。二排撤到三排阵地警戒，掩护全连撤回。4点30分左右，全连集结完毕并清查人数向



1979年清明节，作者在烈士刘增武坟头培土。

上级报告。几分钟后，冲锋舟来到南岸，我连按顺序分三批顺利撤回北岸。集合好部队，此时营、团首长早已在此迎接。沿途看见 100 炮连、我营炮阵地严阵以待，心里十分感谢。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我感觉全身轻松了许多。



1981年，作者（右一）出席四川省抗洪救灾英模会时与成都军区首长在一起。

后续

4月6日，清明节，接营里通知，早上带上冲锋枪、子弹袋、手榴弹到营部集合。起床后，我吃了饭，全副武装到营部集合，然后到团部集中乘解放牌汽车，由团政委王品端带领到屏边扫墓。我们顺红河而上，沿途高度警惕，冲锋枪都上了实弹匣。10点过到达陵园，听完介绍，各连去看自己的烈士墓。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在我连 12 位烈士墓前默哀。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就这样长眠在这里，永远守卫着祖国的南疆。在我悼念时，成都军区政治部的宣传干部黄道明刚好在，就给我拍了一张给烈士刘增武坟头培土的照片。当时墓碑用的都是木牌。

4月7日，我连奉命到中越边境八字河边（界河）田房地区防御。早饭后，我们按昨晚研究的方案向田房开进。午饭后，我和三个排长及配属火器的干部，带上地图现地勘察，最终决定按地形分排兵力布置，用两个排在前沿各自高地做好防御。

4月27日下午，我连圆满完成了防御任务。接到营部通知，28日从驻地撤回四川，标志着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结束。

（本文图片由刘莉提供）

外公的大智慧

周灵

我的外公陈志良先生自成年起就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乱和动荡。十几年的时间里，因战祸伤亡的人口数以千万计。那个时代最高危的职业是军人，外公却在其间辗转十余年，然后平平安安地回了家，颇为罕见。

小的时候，我们常把外公的事迹当做英雄故事来听，总是怀着景仰和赞叹。听他讲对日作战，因为年纪小，他没有过多地专门说明什么。以前我几乎天天见到外公，认为是非常了解他的，近些年在一些资料的蛛丝马迹中，结合点点滴滴的回忆，慢慢揭开了让我既吃惊又佩服的答案。在战场上生存，固然有运气的成分，但事情的结果，往往由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促成。外公的从军原则，就是他屡次逢凶化吉的必然因素。

一、戴眼镜的黄埔生

外公是长寿之人，活到 93 岁。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他还能清醒地坐在电视机旁观看。80 岁时还骑着我初中淘汰下来的小自行车满城跑；一根拐杖在手，轻松制服两三个歹徒不在话下。这得益于他年轻时打熬的一副好体质。而倍儿棒的身体，其实在读书时期就已练



1947年，外公外婆与他们的大女儿。

就，因为他是运动员，曾参加过在温江举行的成都中学生运动会，获得铜球比赛冠军。在学校，排球、篮球、足球三个球队他都是队长，还曾经率领县篮球队，代表邛崃到成都参加比赛，居然一路过关斩将，以初中球队打到了决赛。那个时候的比赛不像现在，有严格的分级制度，他们的对手是高中队，结果屈居亚军。但比赛的组织者，当时在成都驻防的一个师长邀请他们专门打了一场花式表演赛。由于时间过得太久了，这个师长是谁，他回忆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回跟我说：“我想起来了，那个师长叫范绍增。”

全面抗战爆发后，外公也跟着完成了高中学业。“当时有三所大学录取，我没去，而报了黄埔。”他讲述时的神态，云淡风轻，仿佛是在说别人的事。可能在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后，很少有什么值得他内心再起波澜了。他是家中独子，幼年失怙，由寡母拉扯成年，偏偏又投笔从了戎。“那天军校报名的人情绪高涨，非常积极踊跃，排号都到了七千多，刷下去不少人，只招了一百多个，刷下去的又直接去征兵处报名。”说起成都民众抗日的激情，外公眼里难得地闪过一丝神

采，如同昨天发生的事，“黄埔是不招近视眼的，但我有文化，身体也好，破例招了。”

1938年，外公进了黄埔军校十六期，因前线用人紧迫，1940年暂时中断学业，提前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0军106师，当了少尉排长。40军为庞炳勋所部，是有名的抗日劲旅，虽是杂牌军，但战绩不俗，打过不少恶仗、硬仗，在仓县姚官屯跟日军第十师团矶谷师团死磕过，台儿庄会战中在临沂战场数次同板垣师团正面硬捍，并一度击溃敌人，将敌追至莒县。李宗仁在关于徐州会战的回忆录中写道：“敌军穷数日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支那‘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

这样一支骄兵悍将，战斗力超强，个个都是鼻孔朝天，眼高于顶，哪肯轻易服人指挥。杂牌军的军纪也造就了一群兵痞，他们见新来的长官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学生，文质彬彬，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即使穿着一身笔挺的新军装，一双锃光瓦亮的高靴，那也逃不开“百无一用”的印象，就等着看笑话。但兵痞们的愿望落空了，外公没有气急败坏地训斥，而是非常淡定地叫勤务兵牵一匹最烈的战马来，突然一鞭猛抽马屁股。待战马受惊冲出三丈之外，他才不慌不忙地徒步追赶狂奔的战马，几个兔起鹘落竟然后发先至，轻身翻上马背，左手执缰，右手掏出手枪，只一发子弹，便将百米外一棵大树上的鸟窝击落下来，又稳稳当当跃在这帮兵痞面前，这才在一片目瞪口呆中开始训话。立威之后，再没有一个兵敢在他面前挑衅。

部队经常山地作战，钻山打洞，卫生条件不好，导致干疮子流行，又得不到医治，许多士兵患处流脓，苦不堪言。外公见状，立即组织人熬硫磺水用大黄桶泡洗，不但免除了感染的风险，还将患病的士兵都治愈了。那时候部队里面夜盲症的现象较为普遍，长官都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外公提议让炊事班天天煮南瓜给士兵吃，居然把夜盲症

治好了！士兵们提起外公，没有不称赞服贴的，都说：“有文化就是不一样，这个眼镜长官，硬是要得。”

二、训练早期特种兵

外公的文稿《太行山反扫荡战》中记录：“……不久调任本团军士队任分队长，负责轮训全团中、下士和优秀上等兵，提高班实战指挥能力与战斗技术，以便更有效地打击和歼灭敌人……有时兼行团警卫部队职能。”一般军队中，战斗力较强的单位有警卫部队、特务部队、侦察部队，这些军人训练有素、身手强悍、装备精良，尤其是保卫指挥系统的警卫部队，更是精锐。那么，军士队是做什么的呢？规模大一点的部队往往设置教导队、教导团之类的直属机构，轮训初级军官或军士，一旦扩军，这些干部就可以直接充实中、基层军事主官，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担任过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队长。外公所在的 636 团格局小，搞了一个军士队，成为该团精华所在，并已具有早期特种作战的雏形。典型例子是在林县塔子山，以小部精锐实施突袭，以零伤亡全歼日军一个炮兵中队及守卫的一个步兵小队。

文中记录的大小战斗，展示出的各种战术动作，均体现了强大的特战技能。1942 年那一战，日军出动整整一个三单位制的师团 1.2 万余人。忻口会战时，板垣征四郎曾率一个半师团一举击溃国军三十多个师，虽然战略相持阶段时的日军特设师团和抗战初期的常备师团不可同日而语，但 106 师以一师之力与之正面硬抗，双方打了个平手，日军伤亡数千人。

1943 年 4 月，冈村宁次集结 5 万大军，九路围攻太行山区，106 师在白云山拒敌 8 天后突围。李振清在《行述》中描写：“敌人用飞机轰炸，连波进攻无数次，遗留在白云山山坡上的敌人尸体不计其数，战场上发射的子弹，像狂风暴雨一样。”这一战整个 24 集团军被打散，集团军总部、40 军军部及各师分别突围。

106 师突围后，艰难渡过黄河，同军部汇合。外公之所以能率部过黄河，全凭他们的一项特种训练——武装泅渡。他回忆到：“马（法五）、李（振清）水平可以，看形势不对，马上就组织突围，退到黄河对岸，再迟一步，全军就被包围了。过黄河的时候，风浪太大，我们的船翻了，连船老板都淹死了，但我带的那个连包括一匹马，一个伤亡失踪都没有。”讲述这段过往的时候，眉宇间掩不住自豪的神色。

一仗下来，40 军损失惨重，军部和 39 师合计不到一千人，其他突围的部队好多只剩个空番号。建制完整、损失不大的，106 师是唯一一个。

众所周知，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把中央军以外的部队当杂牌来排挤，杂牌部队不仅反感中央军，甚至连自己内部人都防范算计。外公是黄埔生，西北军、保定系与中央军的积怨更深，黄埔来的小人物必然备受打压，既要让你带兵打仗，又不正视你的战功，藉此压制你的升迁。如此能打仗的干将，对日作战五年整，经历大小八十余战，放在嫡系部队早已是上校团长，何至于在 106 师才委任一个少校营长。不过正因如此，外公的脱队，才没有引起 106 师过多的注意。

三、受进步思想影响

1944 年底，抗日战争到了快要结束黑暗进入黎明的时期，日本的败亡指日可待，前线已无大的战事。于是，接到军校通知，十六期学生带着实践经验，到学校回炉，修完最后一学期的学制。毕业后，军校要求学生返回原部队，充实基层作战力量。外公请了个假回到邛崃成了家，日本也投降了。小日子刚刚过得正是惬意，却收到了部队的召令，大意是说，他的职务将由少校营长晋升为中校团参谋长，速归队履新。函电来得甚急，这个时候，外公敏锐地感到了异样，于是委婉回了一电，称：他是遗孀独子，按民国兵役制度不在征兵之列，之

所以仍然上了战场，是为了尽忠；现日本已投降，需留在家中尽孝。他因此未回原部队，部队亦未对此作出回复。

果不其然，在抗战胜利的曙光刚刚来临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全国军民还没来得及享受多少战后难得的宁静，蒋介石就命令驻防河南的军队发动了邯郸战役。国民党军队第30军、40军、新八军同刘、邓大军交手过招，结果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所部战场起义，40军受重创，军长马法五被俘，106师被全歼。如果当时外公已是师主力团长，想要辞职回家，可能不容易走得脱。

如果说抗日战场上，外公生存下来靠的是较有能力的指挥、自身过硬的军事技术和一些运气，那么邯郸战役躲过一劫，靠的就是个人的革命思想倾向了。

外公宁愿回家也不打内战的思想倾向，是他还在读书时期受到一位革命先贤的影响，这是中共在川内隐蔽战线的极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位先贤搞过兵运，领导过广汉起义，又在邛、大、蒲指挥抗捐军活动，是四川省军委负责人。在邛崃时，以做茶叶生意作掩护，住在东街外公家里。外公的母亲人称陈二娘，将染房部分租给他使用，那里就成为中共的一个中心联络点。因长期接触，一些进步思想逐渐影响了外公的政治倾向。因此，外公在中学时期就与李欣奇等进步青年组织“前哨剧社”宣传抗日，进行募捐活动，后来高中毕业了，五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干脆相约去成都报考军校，但最终考上的就只有他一个。

这位先贤的名字叫侯伯英。他在邛崃进行革命活动时曾两次被捕，第一次陈二娘去做担保，清乡军也没有证据，就顺利将他保释了出来。侯伯英既管地方工作，又管武装斗争。为工作需要，他每到一处不得不更换一个名字，侯玉州、侯伯勋、朱建文就是他曾用过的名字。他扮着茶叶商人，来回奔走于邛崃、大邑、蒲江等地城乡，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第二次是被叛徒出卖，将邛、大、蒲中心县委一网打尽，最终在西河坝被害。陈二娘与侯先生及其爱人黄作芸女士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曾在邛崃川剧团工作。（李晓提供）

都是熟识的，解放后陈二娘去世，黄女士感念当年的恩义，还曾到她坟前悼念。

外公脱离40军后，为了谋生养家糊口，又经人推荐，拟到刘文辉24军中任职，中途被截，改任绵阳团管区中校副司令，驻地绵竹，负责征兵及训练等工作。

1949年解放军锐不可当，势如破竹，蒋军大溃败，退往西南，转瞬难逃覆灭的命运，却还在作垂死挣扎。眼看胡宗南的部队从西北退到绵阳了，战火立马就要烧到成都，各师管区部队亦准备列为作战部队进行部署。川军和中央军汇集在四川的军队超过了五十万，一旦战



唱戏是外公晚年生活的内容之一。

略决战，又将是尸山血海。川内局势相当不稳定，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理出头绪。

刘文辉早就同蒋貌合神离，为自保，与邓锡侯、潘文华联手，暗中同蒋对抗。刘、邓、潘能直接指挥的部队有三万多人，若能同蒋决裂，能使驻邛、大、灌、郫、彭、什邡、绵竹、西康的十几万军队动摇。驻绵竹的熊顺义部都有极大可能响应起义。不过，胡宗南十几万兵马卧榻在侧，宋希濂十万兵马也部署在川东，另外还有同床异梦的其他川军几十万人，刘、邓、潘的压力可想而知。

外公不是高层，无法判断各方派系首脑的想法，但坚决不打内战，是他的人生信条和从军原则，所以又到了抉择的时候。形势迫在眉睫，思来想去之后，拉上任宪兵营长的陈栋宇（黄埔同学兼同乡）作证家中有事，跟管区司令陈鼎卿少将告了个假。由于不是作战部队的带兵军官，陈司令没在意，又有陈营长作证，就同意了外公的假。

回到邛崃，外公便积极频繁同中共隐蔽战线的同志及其他进步人

士接触。12月9日，刘、邓、潘响应卢汉云南起义，于同一天在彭县龙兴寺通电起义。12月18日，邛崃解放，12月21日，董宋珩、熊顺义等在什邡、绵竹率部六万余人起义，25日绵竹解放。

由于受侯伯英的影响，外公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国战坚决参加，内战坚决不打，这是他的从军原则；为人低调，是他的品质。打国战抗日，无论多么凶险困难，他从未放弃过、失望过，因此一直不惧死神、作战勇猛；不打内战的原则，让他一次次避开了危险的境地；同时，为人低调，打日本，不给官职也要打到底，打内战，宁愿辞职回家也不上，他从军本来也就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去的。不得不说，能做到这一点，是他为人的一种智慧。

他不再陪蒋家王朝走下去，于是放弃了送到面前的撤到台湾的机票。1989年徐源莱先生（黄埔六期，曾任火井区区长、侍从室侍卫官，陆军中将）从台湾回邛崃，告知他十六期同学在台很受重用，三军司令及“国防部长”均是十六期的，但外公始终都很淡定，并不后悔当年留在邛崃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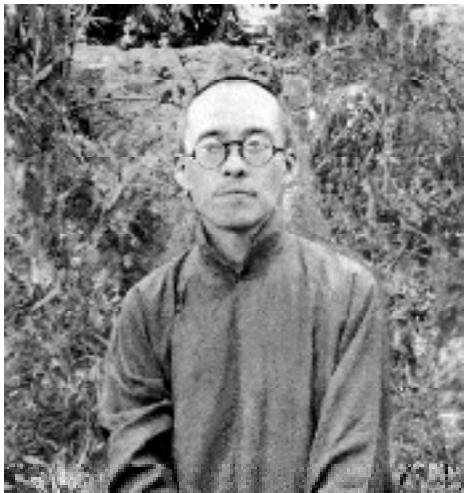
有次他生了重病住院，舅舅告诉他，是日本研制的药品把他医好的，他反而乐了，说：“小日本先进的科学科技进来交流当然好，但他的武装要进来，还要打他龟儿子的。”

2008年8月8日，他非常认真地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当国旗升起来的时候，他双手捂着脸，平时情绪很难波动的外公，像个小孩子般哭了。边哭边念叨：“中国强大了，办奥运了！”我只见外公哭过两次，一次是2007年外婆去世，那次是生离死别的伤痛的哭。这一次，是激动喜悦的哭。也许像他那样的军人，一生最大的念想便是“国家民族”四个字！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陈思华小传

宁稚武



陈思华 1941 年秋留影。

余老矣，精力衰颓，无所事事。闲居无聊，辄忆往怀旧，因忆及亡友陈思华之为人：性情耿介，不随俗浮沉，称述者爰不揣谫陋，为立小传，藉此可见其人风度高雅，亦我县人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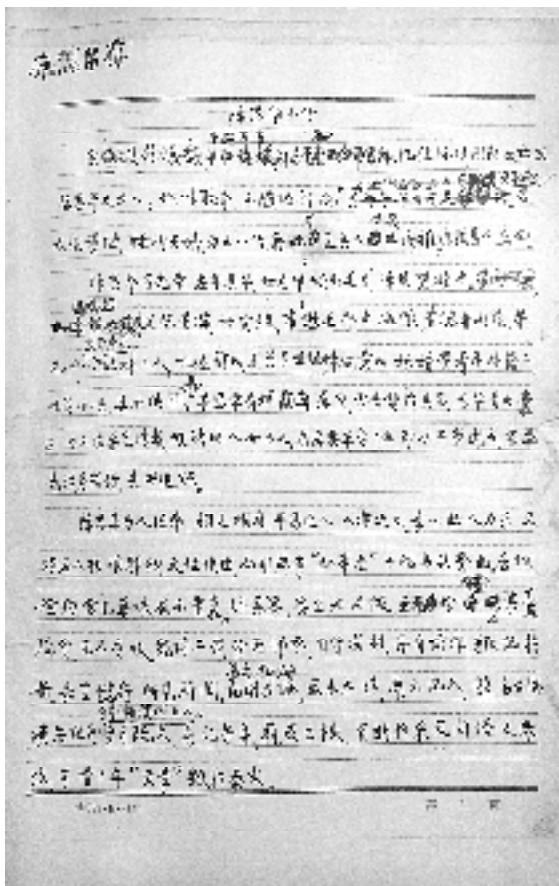
陈思华名先荣，思华其字，世居邛崃卧龙乡，陈坝望族也。其父陈星儒，好货殖，事懋迁，举止温雅，有儒者风度。弟兄四人，思华居长；姐妹二人，

姐适周氏，周英其姐丈也；妹适黄氏，妹婿黄寿丹，外籍人，时客邛崃，县府供职。其弟思学有烟霞癖，屡空，常告贷于其兄，思华有时囊中空，为不伤弟兄情感，假诸他人而与之。弟思禹年方十五即以工书闻名。弟思亮涉身戎行，失明退伍。

陈思华为人坦率，胸无城府，平易近人，人亦近之。素以助人为乐，又好为人排难解纷，天性使然，而非故为“和事老”以沽名钓誉

也。居恒俭约，食无兼味，衣不重裘。好宾客，客至必留饭，虽无珍味，菜羹疏食，无不尽欢。能诗工书，皆无师承，自学成才。每有诗作，辄记于册。嘉言懿行，所见所闻，事无巨细，靡不记入，题名《临溪杂记》。自号临溪河上人。岁月既久，杂记等身，蔚成巨帙，有助于采风问俗之参考，可惜十年“文革”毁于秦火。

民国初年陈思华高小毕业（三年制），成绩出众，丁父忧未升学。太夫人以其居长，欲使经商，继承父业。思华于商贾之事，虽内心不愿，因顺母意，违心应承，学商成都。出师回邛。适周英新任邛崃教育局长故，委以“图书贩卖员”一职。职位虽低，收入颇丰。沿袭旧规，公家出本钱，盈利归于己，另外有薪资，实为优缺。原任斯职者，嫉之不无风言冷语。陈思华何许人也，岂能容忍，愤而去职，自力更生，假陈璧先中学文凭，以同等学历考入四川志成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毕业后出任泸州地方法院检察官。其时军阀专横，经费多被挪用，月俸尚难自给，何言事蓄！退而从事教育。初任邛崃女子简师附小校长，后任云吟女中训育主任兼体育教师，教育学生，德育智育并重，尤重德育。



宁稚武手稿。

任教云中时，有次上体育课，桑园机场空军架机凌空，俯冲近地，向学生频频招手，调戏取乐。陈思华一见此情，勃然怒曰：“一滴汽油一滴血。”盖斥彼辈不应以抗战所需，价值连城之汽油，用作卑鄙下流之动作。不料，学生中竟有空军子女，悟其意，归以告。彼辈为非作歹，不知悛悔，反颠倒是非，诬陈思华诽谤军誉，前来云中兴师问罪，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陈思华为伸张正气，不为淫威所慑，不为暴力所屈，临难不苟免，严辞驳斥。彼辈怙恶不悛，强词夺理，顽固抵赖，彼此各执一词，僵持不下。适云中于是日开恳亲会，并举行毕业生典礼，党（国民党）部书记长陈仲侯亦应邀在座，以领导人身份微词指责，彼辈理屈，悻悻而去。

陈思华有志办学，为国育才，拟将祖遗田产遍植油桐，榨油易钱，以作办学基金。无奈“十年树木”非指日所能就，无米为炊，心余力绌，未竟其志。

1937年日寇入侵，全国板荡，生灵涂炭，岁无宁日。陈思华目击心酸，顿起从戎杀敌之念。因入中央军校学习军事，准备投身军旅，疆场杀敌。不料，毕业后另召任用，报国无门，退居二线，再入法曹，任西昌地方法院检察官，后晋升西昌高院分院检察官，旋代理首席检查官，廉洁自持，不辱官箴。

解放前夕，居正因公飞抵西昌，两院同仁以居正现任司法院长，乃直属上司，联合设宴，为之洗尘，乃交际上寻常之事，无可非议。但陈思华素不“逢迎权贵”，故不“利见大人”，独不参加，其耿直也如此。

侦查案件，甚为谨严，唯恐偏颇，而引起当事人滋生疑窦，自书一联于座右以自警，文云：“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首席检察官贺方仁通晓文墨，一见此联，大为嘉许。公余常阅《洗冤录》，或谓之曰，此检验员（旧称仵作子）专习之书，何阅此为？答曰，俾验尸验伤先有成竹，庶不为检验员所蒙蔽而使受之蒙冤莫白，其重视人民法益，即此可见。

旧时监狱，暗无天日，狱吏狱卒上下其手，狼狈为奸。狱吏克扣囚粮，使囚犯食不果腹，狱卒打秋风，勒索囚犯钱财，乃司空见惯之陋习。物极必反，理所必然。囚徒因一人一勺清水稀饭，不能充饥，群起大哗，绝食反对。监狱与法院仅一墙之隔，思华闻声，前往查看，目击囚犯鸠形鹄面，枯瘦如柴，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追本溯源，由于缺食。本人道主义，彻底革除监狱陋规恶习。并派专人监视炊爨，囚犯始得一饱而免瘐死狱中。

办案不偏不倚，无起诉不受理者，亦无处分后申请再议者，刚正不阿，誉满乡里。对忤逆不孝案件，尤深恶痛绝，必从严惩办。县人嘉其行，方议旌表，旋即解放，其事遂寝。

解放归田，两袖清风，无以为生，自耕而食。与一农民共租耕牛一头，由该农民饲养。牛生一犊，猝死。由于大牛生虱，饲养人以六六粉涂牛身以灭虱，小牛吮乳，中毒致死。饲养人推卸责任，嫁祸于人，诬害陈思华毒杀耕牛。农村中以其身份（官吏）不同，信以为然。率尔送交彭县东方瓷厂禁锢。东方瓷厂乃企业单位，非政权机关，何以送此禁锢？何以要收容？当时其子女皆幼，不能道其所以。耕牛与牛犊向由该农民饲养于其家。思华从未代庖，何毒杀之有，蒙冤莫白，含恨歿于东方瓷厂，年不过花甲，一九六〇年时事也。

1994年冬时，年90。

宁稚武简介

宁稚武（1905年—1996年），名承肃，字稚武，出身于书香世家，系邛崃乡贤宁绅之孙。自幼聪明好学，深得祖父钟爱。1932年毕业于四川志成法政专门学校，为陈思华同窗好友。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邛崃一小、邛崃女师附小、敬亭中学、邛崃县中任教，曾任敬亭中学训育主任，邛崃县中校长。

附：《陈思华小传》面世记

昔时，常于父亲、族中长辈处听闻思华公嘉言懿行，其一生经历，世人称颂，也谓传奇。然听闻并新谱所载事略，皆为大概，不甚了了。2017年清明，族人陈心志献“和鸣小学”（后改制为卧龙中心学校）高级第一班毕业照，余为不负先人情怀，随之陆续采访照片中健在之人、主要人物的后人、族中年长者及其他知情者，撰写《“和鸣小学毕业照”背后的家国情怀》一文，刊发于《今日邛崃》2017年5月9日第七版，了一心愿。

旋即，有过文字交谊的宁缩玄孙宁守中微信告知，陈氏与宁氏曾是世交，陈思华乃其祖父大学同窗且为挚友，画家西丁亦乃其叔的中学同窗好友。其祖父尚为陈思华撰写小传一篇，手稿尚在。余闻之大喜，嘱其复印一份，当晚即收到复印件。

手稿为宁守中祖父宁稚武1994年冬撰写，字迹清秀，多处有改动，然皆清晰可辨，最后一页几行字迹陡然乏力，改动尤多——传文即成，意犹未尽之相也。

余捧读此文，思绪万千。纵观思华公一生，少立大志，胸怀天下，热爱乡梓，倾力办学，为官清正，政声斐然，其德其行足以楷模。思华公回乡后一贫如洗，无所居，在田野间搭棚遮身，病终彭县东方瓷厂乃因一牛犊而起。命运造化弄人若此，令余喟叹再三。

宁公以九旬高龄，为思华公立传，字里行间，于兄行谊敬仰之心、于兄命运不平之意、于兄挚情未了之状力透纸背，令人动容。小传成，心愿竟，越一年宁公寿终正寝。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高山流水，古人之事不虚也！

陈炜（泽恩）丁酉年初夏谨记

公历2017年5月11日

（本文图片由陈炜提供）

走出国门的临邛厨师刘开智

王家荣

从古至今，临邛不仅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品种繁多的美食也久负盛名，脍炙人口。

美食争奇斗艳，大厨八仙过海，他们中间有的还走出了国门，刘开智就是其中一位。

1955年10月，刘开智出生于邛崃城关县府街一个普通人家。大半辈子操持家务、做得一手好菜的母亲，给他的童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母亲的拿手凉菜，如凉拌菠菜、芹菜、干豆腐、扎耳根等，既花不了许多钱，又可口下饭。他9岁那年，全家吃年饭，他自告奋勇跟妈妈帮厨，动手做了一盘花生米拌豆腐干，居然很受全家欢迎。作为奖励，父亲用筷子头沾了杯中酒，送到他口中。

1973年7月，刘开智高中毕业，父母亲听从他的意愿，送他到县城的一家饭馆拜侯志东为师，当了学徒。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5年的学徒期间，言语少而悟性高的刘开智，认真听从师父和师兄的教授，尝遍了红油、麻辣、椒麻、糖醋、蒜泥、怪味、姜汁、白油种种滋味；揣摸了蒸、炒、煎、炖、煨、烩、拌、卤等样样功夫。

他秉承能者为师的理念，善于学习别人的一技之长。除了师傅出手不凡的刀工和用料考究外，他还向当时的师兄辈请教，如后来成为中国烹饪名厨的孟朝品、李世清、彭继远、余邦经、朱林旭、严小



1989年3月13日，刘开智接过澳大利亚墨尔本市长授予的金盆。（王家荣提供）

华、刘富贵、周尧先等。其中的孟朝品，红案特一级厨师，国家级厨师考试评委会委员。1993年，参加全国第三届烹饪大赛西安赛区比赛获热菜银盘和冷菜铜盘奖；曾在美国、秘鲁、埃及等国的餐饮店担任厨师、厨师长。

刘开智多年勤学苦练终于学成出师。师父笑呵呵地告诉他，可以独当一面了！

邛崃人爱说“好酒不怕巷子深”，刘师傅的手艺吸引来不少吃客。好手艺也是一个品牌，1978年，邛崃县饮食服务公司招收了刘开智，而且安排在位于城中心的崃山饭店上班。这里名厨与高手云集，刘开智的技艺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1984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邛崃县饮食服务公司与北京市海淀区颐宾楼饭庄携手经营川菜馆。刘开智被选派赴京。从西南边远县城一下子进入首都大餐馆，未满30岁的刘开智却没有怯生。他凭借日渐炉火纯青的技艺，特别是冷菜之长，很快在京城饮食界赢得了好

的口碑。

1988 年，刘开智和师兄李世清、刘福贵由四川省国际公司公派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国私合营的第一家川菜馆工作，成了改革开放后临邛古城走出国门的第一批川菜厨师。

1990 年 1 月，有世界美食之都美誉的澳大利亚举办一年一度的蒙巴节，吸引全世界不少国家游客来澳观光。墨尔本市同时也将第二届唐人街食品节烹饪大师赛纳入蒙巴节中。澳洲 600 家华人餐馆参加比赛，有 80 多位中外大厨进入复赛，而大赛评委全部由老外担纲，竞争相当激烈。

早在 1988 年 8 月 17 日，澳大利亚各大报社均以中文和英文版面，向世人宣告墨尔本国私合营第一家四川菜馆开业预告。广告介绍：“川菜系中国四大菜系之首，取材广泛，味别多样，适应性强，烹调方法多变，有蒸、炖、烧、炒、卤、糁、卷、烤、溜、烩、腌、拌、煮、炸、煎、煽、汆等数十种，更讲究造型，拼盘犹有工艺之称，其菜式如熊猫戏竹、松鹤延年、金鸡报晓、花前浪蝶等……细致入微，栩栩如生，真使人在筵席中不忍下箸。”还专门对邛崃赴澳的厨师长李世清作了介绍：“足迹遍东南西北，曾数度出主欧美厨政，成绩斐然。”

四川菜馆总店设在盒山区，唐人街则为第一分店。

1989 年 3 月 13 日，刘开智以一道精美的四川九色攒盒荣获大赛金奖，墨尔本市女市长在唐人街街口亲手把一个硕大的金盆授予了刘开智。刘开智还获得去香港旅游的奖励。本届大赛由华人烹饪作家、教师伊丽莎白·琼组织，美国捷运公司和华人商会赞助。刘开智大厨的金盆大奖又为墨尔本的川菜馆打响了一个精彩广告。从那天起，前来用餐和订餐的华人和澳人络绎不绝，有的还热情邀请刘开智合影留念。

1991 年，由公司安排，刘开智任厨师长赴海南三亚友谊饭店工作。1992 年，他又带队赴广州珠海园餐厅。1994 年带队赴广西南宁四川饭店。1995 年，回邛崃在崃山饭店任经理。刚满 40 岁的刘开智带领

全店工作人员把一个食客如云的崃山饭店经营得红红火火，连年获得成都和邛崃嘉奖。2000 年，刘开智赴美国波斯顿四川饭店任厨师长工作 5 年，2005 年回国。

刘开智这位川菜特级厨师，从事餐饮行业 40 余年，技艺与人品俱佳，和许多人合过影，其中有一件事让他永生难忘。那是 1985 年 9 月 26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由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陪同，来到邛崃。总书记轻车简从下基层，谈笑风生谋发展。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好作风让邛崃干部群众感到非常亲切。刘开智说：“中午 12 点半，总书记在餐厅品尝了邛崃棒棒鸡、魔芋烧鸭和鱼香厚皮菜，用了半碗开水泡饭，吃得津津有味。饭后即兴挥毫为邛崃题字，并爽快邀请包括厨师在内的全体工作人员合影！”刘开智至今珍藏着这张十分珍贵的照片。

1993 年，刘开智被邛崃二中聘为烹饪班专业教师，聘期两年。2010 年至 2019 年，他一直被聘为邛崃市饭店与餐饮娱乐行业协会特聘顾问。他说：“带出一批川菜新秀，为美丽邛崃增光添彩，责无旁贷。”

琐忆

2000年2月，春节期间，邛崃举行了隆重的临邛闹春广场文艺活动。来自各镇乡的狮子灯队、幺妹灯队、文艺队、高跷队等，先在灯光球场集中展演，然后走上街头，为市民送上新春的祝福。

(李永年提供)



且说邛崃二中

陈瑞生

1976年9月，我从邛崃县南街小学毕业，升入西街中段的五七二中。次年，学校易换称谓，叫城关二中。说起来，二中的身世比较复杂。1904年，西街天主教堂出资，在其背后开办自立上智初等小学。1919年增建校舍，改为上智高等小学。1924年转成初中，并继续开办小学部，1943年取消小学班。新中国成立前学校停办。1951年，县立女子初级中学由南街大礼堂转至此。1953年变成县第一初级中学，1957年起男女兼收。1960年，更名城关初级中学，当年秋，并入邛崃高中（后来的一中）。1961年，位于书院街的邛崃师范学校迁入。1971年，师范学校搬到东门文昌宫原敬亭学校，留下的旧址开办邛崃县五七二中，是年，兴贤街的城关民办初中合并进来。1977年全称邛崃县城关第二中学校。1981年接纳白鹤中学高中班。1994年撤县设市后，确定为邛崃市第二中学校。

二中的环境

走进二中校门，是一条长长的三合土过道，左边几间平房，依次横钉着收发室、教导处、总务室的短木牌；右手一长溜白墙把紧挨的居民区隔开，作为宣传阵地，壁报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深

入揭批“四人帮”、欢庆十一大胜利召开等，内容丰富多彩且不断更新，常常成为师生驻足之地——我用B2绘图铅笔素描的朱德元帅肖像曾经在此展出。

过道尽头被天桥一样的人字形屋顶覆盖，光线一暗。出去往左，有三排平房构成马蹄形，理化实验室、教职工宿舍和教室杂揉并存。合围的空坝里种着柑子和李子树，万年青环绕阶沿不由分说地绿。向右观望，地况也如马蹄，只不过体量更大，纵深更广。教室、校长办公室、师生食堂、住校生寝室、大礼堂、小操场等汇聚于此。同学王树君之父为管理教学仪器的校工，分得天楼地阵的住房，只是窗外桢楠遮天蔽日，有时白天也需开电灯。李世鸿的母亲在食堂煮饭，我吃过那里的饭巴团，印象新鲜密实。学校也给他家调配了既有大人又有小孩安身的居室，尽管由原来的淋浴间改建。而与天主堂一墙之隔的四合院教职工宿舍，最能体现二中百年沧桑。典型的川西晚清风格，静谧朴素得有几分神秘。青砖黑瓦大出檐，穿斗式木结构，单扇门、



1976年，二中进校门的过道和墙报。（陈延辉提供）

方格窗和篱笆夹壁简洁明快。阳光在屋顶上歇脚，月季、牵牛与紫茉莉从花台盛开，日复一日，两三株金桂陪伴在旁，深秋幽香扑鼻。苔痕点缀宽厚的石板步廊底部，苍润而显古意。还有窜上房梁的猫，直冲云霄的鸟，以及



1977年，
二中的大
操场一角。

檐口飞来飞去的燕子，它们忙碌与感叹的模样，尾随着不易觉察的没落气息，使这方旧地往日印痕隐约可寻。

两片建筑较密的区域再往后，即过道延伸线末尾，视野陡然开阔，一个大操场横亘眼前。边缘横排竖列几通教室，与简易跑道、篮球架以及厕所之间，栽有麻柳、梧桐、皂角、酸枣和美人蕉。桃树在墙角无风自扰，仿佛脸红有人语已，也像我们偶尔替古人担忧一下。开学不久，即遇两件大事。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每班负责制作一个花圈，我们扎纸花，班主任划篾条，刀法快准狠，像极了麻利的篾匠。因成品效果不错，其他班都来取经。教室、操场和檐下，随处站满动手的人。在大操场举行悼念活动，全体脱帽默哀，头顶西风夹杂寒意，吹透秋烟的空茫。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学校组织揭批大会，举着王、张、江、姚的漫画在操场上排练，然后上街游行。大事以外，课间的热闹非此莫属，一场子的人，跳绳、射拱、打乒乓和踢毽子比比皆是。星期天，老师们爱来打篮球，身穿工美社刊刷白漆编号的背心。

操场南面两排教室，中间隔个大水塘。尽里头那排紧靠驻邛部队红砖围墙，吹哨集合声依稀可闻，我起始就读的初一四班，以及教师

宿舍位居其中。初二时，我班前移到水塘这边。窗外左右皆有可观，麻雀从树梢切掠而下，落在无人的操坝上；蜻蜓一晃而过，带着另起段落的兴味。夏日放学迟迟不归，或打落树上的李子和还未成熟的酸枣，或下到积满雨水的池子游几圈。冬天则把在家土法制作的花带炮和射子箭带到空旷处燃放，比谁炸得响，飞得高。记忆犹深的当数厕所，一日课间休息跑去小解，途中，不知谁用弹弓朝天调了一发，小石子刚好掉到我头上，顿时鲜血直淌。赶紧到西街联诊所缝几针，并用白棉纱布包扎起来，脑袋至今留下记号。进入初三，我们退过大操场，搬到过道延伸线终端左侧第一间教室。功课紧张随顺几分幽甜，消磨了校门口黄糕蒸笼旁的徘徊。学期短促，时光微薄，望望要好的伙伴，想想心仪的同窗，谁的内心没有繁华过？连灰调冷白、悬挂四根日光灯管的早晚自习，以及校园路灯昏黄的芒角，也多乎哉不多也，充满晨宵聚散的珍重。

二中的老师

何世波老师一直教我们语文并兼班主任，瘦高，黑边眼镜，补丁衣裤，圆口布鞋，纸烟抽到快烫手还要猛吸两口。初三划分快、中、慢班后，他负责快班，仍与我们在一起。虽然文言和鲁迅的作品比较艰涩，但到何老师这里，不仅易懂，而且趣味横生。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讲到私塾先生念：“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何老师便惟妙惟肖，或低头看课本或缓移目光望天花板，抑扬顿挫里叹词尾音拖长，让人误以为文中的先生就这般姿势和口吻。对我们的作文，何老师非常重视，每次批改对比后，挑上几篇靠前的，隐去姓名课堂上一边念一边点评。我模仿参考资料结构所写的《我爱家乡的广播台》，不仅得到大力表扬，而且以将来争取当作家予以鼓励。严谨，开明，又不失幽默，何老师与大家课外聊天时，话题很少禁忌，前途，恋

爱，好工作，乃至城乡差别，都可涉及——站在万年青旁实地谈论日本电影《望乡》观后，言语没有丝毫违和。开合自如的教学背后，却是日常生活的粗枝大叶。住在学校，吃去食堂，有时午休睡过头，上课铃响不见人影，班长杨少宇和科代表顺理成章去寝室木窗下喊几声。他迅速以十指当梳齿，把头发朝后刮几下，腋下夹着课本，咳两声，不紧不慢踱进教室。

蒲文欣老师个小，温和，眼神清朗，为我们上数学课时，踮起脚尖将公式及解题方法努力往黑板上方写，然后画出各种几何图形。板面久用反光，为了清晰下笔用力。待到铺排满当，才执持木制三角尺从左到右逐一剖析。步幅不大，慢半拍的样子，说话细声细气，显得有些拖泥带水。间或提提问，如没人回应，便自顾自地讲下去。以为全都听懂了，于是够手擦黑板续题，裹在粉笔灰尘里。一节课上完，头发和双肩薄罩一层暗白。积累的粉笔头则被老师们用来提醒上课开小差的同学，蒲老师也不例外，生怕我们不用心，听糊涂。王燕学因眼睛小得眯成一条缝，埋头做笔记时，蒲老师误以为在栽瞌睡，嗖，粉笔头像子弹一样飞到胸前，留下一块灰斑，他为此委屈了不止一回。



1977年，
二中初二
四班考试
前八名的
同学合影
留念。

陈炽昌老师深入浅出的物理解析颇受欢迎，虽然串联、并联的电路常常使我们纠缠不清，但作业完成得愉快，习题量颇大也与测验成绩尽如人意不可分。夏着塑料凉鞋加袜子，春秋蓝色中山装，风纪扣一丝不苟。陈老师脾气好，性子慢，很少批评学生。这或许与他酷爱书法、经常静心临帖有关。挥毫展纸墨迹浓的陈老师杂务较多，几乎包揽了学校大小活动的会标、重要通知以及公告，连挂在大门外的二中校牌也由其题写。习惯成自然，他上课手势丰富，有行云流水之风，黑板上一撇一捺非常耐看，值日生有时舍不得擦。不仅如此，他还善于巧打默记概念、原理和定律的时间差，以便在讲桌上用粉笔研习真草隶篆。每当“巩固一下，抢背五分钟”的口头禅一出，我们就晓得老师技痒，要练一会儿字了。

龚华伦老师为让我们轻松迅捷地掌握化学知识，喜欢打比方。“比如一个糖包子”的个例被反复列举，尽管白糖与面粉接触生成了新东西，但我们仍搞不清有何分解或置换反应，唯余喉头暗动咽口水的份。龚老师虽白发早生，但精神饱满，慢条斯理的言语中直见达观性情。褐色灯草绒衣服略显陈旧，可能身高原因，走起路来给人摇晃感。牙齿微凸，说话有点不关风，咬字发音关键处含混，却能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偶尔为之的理化实验课更非同一般，除了产生浓厚兴趣，最吸引我们的要算烧瓶。以致颇有喜感的叶勇老觉得不过瘾，趁人不备悄悄顺了一个。放学时莫名疾走，长颈玻璃器皿藏在衣襟下，肚子拱起一坨，问是啥子，他竟神色慌张地飞叉叉跑。没想到回家后鼓捣，不小心嫖焦了眉毛。

英语虽然不是主科，但在罗老师严格要求下，大家仍能短时间内把 ABC 囫囵吞枣加以运用，全校英语单词速记比赛中我还获了二等奖。而杨老师的体育课因条件所限，稍显单调，一般绕着操场跑跑，做做广播体操，打打排球，跳跳沙坑之类。

初一教美术的汪特翁老师住在我班隔壁，绘画兴趣小组的同学课余爱往他家跑，对着凳子上的烟缸、茶杯和牙膏皮认真写生。操外地

口音的汪老师高兴时，会拿出难得见到的图册一同欣赏。翻到精彩页面，忍不住来一句“狗日画得好哦”！后来隐约听说，汪老师曾参与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大型泥塑《收租院》的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素描与色彩技法初二得到邹士敏老师悉心指教，前进了一大步。由于有审美水准垫底，她成为全校教师中穿戴最时髦的人。无论冬季的花棉袄还是盛夏的连衣裙，都自己动手裁剪和缝纫，漂亮得成为一道风景。对几个基本功过得去的，邹老师既辅导又加开小灶。记得一次县上几所学校组织联展，为保证我们顺利入选，放学后就到小操场边她窄窄的住处进行修改调整。她不仅给每人准备了图画纸和水粉颜料，而且还发糖果。

二中的分校

二中分校也叫五七农场，位于白鹤山幽居寺。建筑呈四合院布局，由前殿、后殿和左右厢房组成。没了菩萨和信众，更谈不上朝拜，天井正中矗立的石质香炉长久寂寞。1977年，“学工、学农、学军”指示影响力犹在，全校分批错时由班主任带领，每次两个班，交替到农场实行半工半读。上午劳动，下午开课，晚间自习，吃住至少一个月。12月上旬轮到我班，先派几个男生打前站，与长住农场专门



曾经做过分校教室和宿舍的幽居寺大殿。
(彭明权提供)

管理后勤事务的杂工见面，清点农具，对马上要使用的教室和宿舍大扫除。背景有些说道不明的勤杂工起初沉默寡言，逐渐熟络再加气氛合适人不杂，他的应答才多起来。说到投机处，干脆变成精彩的龙



1977年12月，二中分校留影。后排右一戴眼镜者
为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何世波。

门阵，听得一个二个目瞪口呆不想走。

等一切准备妥当，我们先把书包、铺盖、枕头等背上去，再折回来抬着粪，长途拉练一样去给冬小麦追肥。分校农田在半山腰，并非开辟的新荒，多半为熟地。依照事先了解的方法，沟边将粪兑上水，然后往麦田均匀泼洒。青苗长势良好，朔风一吹弯弯腰，生发某种孤单的共鸣。为保证油菜稳健生长，安全越冬，田间管理必不可少，不仅施同样的有机肥，而且增厚根际土层以利保暖。还要在坡地的茶树间翻土、灌溉、除草以及清理黄叶等。好奇伴随专注，我们低头干活话不多。

下午各科安排紧凑，除了体育没条件，其他老师都按时前来讲课。上山方式各显神通，骑自行车的，快步加小跑的，边走边观景的，还有借力同伴交通工具的——数学老师就是搭的顺风自行车。作为教室的佛殿原貌不存，却留有凝重肃穆的外廊和内檐梁柱，教学氛围颇感异样。课一完结，老师们就快快下山赶回城。冬日昼短，吃过晚饭已断黑，不耽搁，我们自觉坐进能见度尚可的教室，先给煤气灯打气加压，再点燃照明，在亮得难以直视的光晕里，温习讲题做作



1978年3月，二中师生上街庆祝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陈相传提供)

业。更多时间用于识字——国家刚刚公布第二次简化字方案，班主任何老师拿着刊登第二表的《四川日报》，写上黑板一个字再对比诠释一个字。偶尔说两句笑话，欢声中吸上香烟言归正传。瞧瞧手表差不多就停住，留给大家睡前料理个人卫生。一时间手电乱晃，人人攥个搪瓷盆，去寺庙下的池塘打水回来洗脸刷牙。路陡边沿窄，挨挨挤挤中，扑通一声，吴恒熙颤巍巍的电筒不慎滑落，顾不及打湿衣袖，捞都捞不赢。借光潦草收拾一番后，住进厢房改建的宿舍。躺到垫着厚厚谷草的上下铺，热热闹闹瞎聊一阵，倦意袭来，就钻进散发皂角幽香的被窝，无梦到天明。

餐费按每位几元钱收取，食堂人手有限，各班得派两个女生前去帮厨，我班是韩亚萍与刘琼英。青菜萝卜白米饭，日日吃得简明扼要，遇见猪肉的机会屈指可数，能推一次豆花，已算高级。实在寡淡不过，班里要好的三五男生便另辟蹊径开油荤，轮流打平伙。譬如拿着贾荣家里带来舍不得轻易吃的午餐肉罐头，跑到僻静无人处，卵石垒灶树枝当柴，搁上大铝碗，倒入军用水壶汲取的溪泉，舀几勺肉进去，撒点盐，顺手频掐田里嫩绿的豌豆尖做俏头，没等熟透，各人就怀里掏出筷子吃起来。升腾的青烟和私摘行为如果被生产队社员发现，大家也不慌张，仍若无其事细细品尝，因为隔着一个沟谷，那边

做活路的人奈何不得，等他们跑过来，黄花菜都凉了，只能隔空逼啦啦地喊。

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城，换换衣服洗洗澡，或者为一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等半宿。新鲜劲头没过，星期天早早踏上返归之途。田垅开阔，峰峦环合，理想的清游环境中，虽不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更不晓得寺后岩壁风化严重、垮塌毁损的石刻造像为唐代艺术珍宝，却也望了满眼平坝没有的景致，尤其是贫家茅草房前敞放的鸡鸭摇摇摆摆，兔子嘴唇颤动不休，顿时觉得莫名欢喜。分校山连丘，坡坡坎坎费脚力，倘若疲倦乘虚而入，那就席地依傍田埂，斜躺一晌黑甜，顾不上霜华与尖冷。睁眼太阳已经西沉，山村的况味裹胁风尘俗土迎面扑来，粗糙而有诚意，使我们在夕照光阴里，记住了感动。

劳动其实不止在农场，还有勤工俭学拣石灰石（兔儿蛋）一途。利用阳春三月到暑气熏蒸的中间时段，趁流水未丰，沙石裸露界面大，我们肩挎篾背篼，手提小尖锄，跟随班主任去往西河坝每周辛苦



1979年6月，二中初三一班毕业留影。

半天。翻过堤埂后，忙不迭地蹲身寻觅，努力完成八十斤任务。圆大且表面散缀白点的石子，我们称为广灰，既压秤又是石灰石上品。鼓捣一定量，就背一趟到烧石灰的窑子边，何老师提起掂一下，录记斤两，通常都高估，不像其他班，带了大杆秤计重量。此项活动夏季来临便告结束，为此最后几天非常快乐，因收工后半道返转，衣裤一脱不顾冷，抖抖索索摸下河，至少在两岸打个来回。不够勇敢、只找浅处扑腾的小样男生，屡屡成为玩笑对象，比如将其穿戴抱去藏了，让他光着屁股手脚并用趴在河堤上，溜溜得像断尾壁虎……

1979年6月，中考的日子。我早晨在家吃了两个荷包蛋，把大人的机械表套到臂膀上，揣好准考证，心情轻松约了同学，一起去设在快班对面教室的考场。熟悉的环境里，升学考试未曾牵惹功名。等待进场的间隙，仍与大伙儿在土路边打鸡腿，激烈得把手表甩到了万年青丛一阵好找，所幸没误开考铃声。待各科考试结束，我们在教室外的空地匆匆照了毕业合影，便各奔东西。当记忆的招魂能力将昔日小瞬间一一唤醒，岁月连忙就是不知老之将至。那些教室，那些老师，那些同学，那些作业，那些失落，那些安好……让我固执地护惜。而目击的成长，说得再多都免不了唏嘘。如果把往事的阴影加深，高光处或许能发现，一生大事的预设或称引，被中学初定，有什么慧观，也在那时略见分晓。“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系宋代诗人陈与义的名句。回望二中四十载，数算之下，我恐怕得惊他两惊！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记火井双童村小学

高义奎

双童小学是一所山村小学，地处邛崃革命老区火井镇双童村。20世纪后半叶，经过几十年的艰难曲折，发展为一所从小学到初中共有学生320余人的山乡村小。该校校门两边原有一副醒目的对联：“一代人才千秋业，半亩校园万顷田。”该校把培养一代代人才当做千秋大业，把不大的校园看成万顷良田。在学校老校址双庙子河对面原碾房的几堵白色灰壁上，50年代初，火井中心小学校在此书写了浓墨大字标语“向着文化大进军”，落款是“火井小学”，非常醒目，一直留存至2016年夏碾房被洪水冲毁。这是毛泽东主席于1950年8月发出的“向文化大进军”的号召，一直激励着双童小学全体教师为山区教育事业不懈奋斗。

校址变迁

新中国成立前，双童村没有正规学校，只是先后出现过几所私塾，有名的私学先生是李跃光、李光清、山先显等。1950年初，双童村停办私塾，由人民政府在双庙子开办了一所正规的农村小学（公办），首任教师康永昌。以后逐步发展，相继增加了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班。当时办教育实行国家公办学校和集体民办学校“两条腿走路”

的方针。校址从双庙子迁到乐巷子后，规模不断扩大。1978年前后，全校共有小学班5个、二年制初中班2个，共有教师9人，学生320余人。

双童小学坐落在双童村龙头山（俗称尖峰顶）南麓的小平坝上（小地名乐巷子），学校周围是田野，东南角与农家相邻，西边是通往火井高场的公路。校园总面积约3亩半。有三幢校舍，四周围墙环绕。

1950年起，学校设在双童村一所古庙（双庙子）里，为公办小学，校名为双庙小学，首任教师是临邛城里人康永昌。1958年，在校内增设一所民办小学（简称民小），1959年又在本村另一所古庙（五童庙）里开设一个民小班。1960年两个民小班停办。

1964年，由大队（村）主办，在该村的廖边新办了一所民小，校址在原廖仁明家的高楼上，校名廖边民小。1967年起，双庙小学更名为胜利小学，廖边民小改为向阳民小。1968年因廖家将楼房出卖并拆除，向阳民小合入胜利小学，校址在双庙子，校舍全是破旧庙堂。

1969年，由国家拨款1000元，大队主持，拆下双庙子的部分旧房子，在三中队的乐巷子新建一幢土木结构的校舍，即该校南边的一幢房子，另设一个民小班。1976年，该校开设一个民办初中班，国家拨款2400元，由大队主持，拆下双庙子的部分旧房，新修了一幢校舍，即该校北边的一幢房子。1978年，由大队组织群众投工，国家拨款1500元，将双庙子剩余旧房全部拆到乐巷子，在该校的围墙外北边操场上扩建一幢旧式房子共4间，并修了简易厕所一间。1979年，新制篮球架一副。1981年，恢复乡村建制后，因该村原名火井公社九大队，境内有双庙子和五童庙，故该村名改为双童村，该校也随之更名为双童小学。

1983年底，火井乡实行群众筹资办学。乡政府统筹规划，共投资1万余元（包括旧房折旧款在内），对该校进行了彻底改建。新修了围墙和校门，并配置铁门一对。将原扩建的4间旧式房子拆除，重新修建一幢砖木结构的校舍，即校东边的一幢正规教室，又将原来的简易

厕所修成砖木结构的新厕所。还将原有的两幢土木结构校舍墙壁全部换成砖壁，靠外的窗户全部配有钢筋，屋檐板和窗户都刷上了油漆。另外，还新制两张乒乓球台，每个教室前面新修花台各一个，校园里种上了花木。乡政府还专门为学校配了一根钢管旗杆和一面国旗。为了方便建校运输，校门前专门修了一段 20 米长的公路与通往高场的公路连通。围墙外靠北的校地作为该校的后操场上体育课，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艰苦办学

1964 年秋，在廖边高楼上招收一年级新生 41 人。课桌凳、黑板、讲桌等全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宇松亲自组织木匠，砍了双庙子一棵大桢楠树，新做了四尺长的三人连桌凳。开学时，学生家长高高兴兴地带着娃儿来报名，每生收学费 2 元 7 角钱。此前，山区农村学校少，招生人数受限。该校所招一年级新生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学生 14 岁，最小的 7 岁。其余都是 8 岁至 11 岁的孩子。新学校取名廖边民小。

1965 年秋，该校（班）又新招一年级学生 20 人，由高义奎一人教学，这就成了比较流行的“复式班”。当时提倡的是“学校办在家门



1967年初，文
化大革命的浪
潮也冲击到火
井地区。（季
康泉提供）

口，方便贫下中农子女就近入学”。不光有“两级复式”，还有“多级复式”。最多的是后来十大队毗卢寺小学的五级复式，即小学 1 至 5 年级（1968 年后小学实行五年制），各年级学生都由一个老师教。当时有人戏称为“一揽子学校”。几个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一个人教，老师的教学负担可想而知。学生在一个教室里分坐成两行或三行。给这个年级讲课时，其他年级就布置做作业，如此交替进行。老师根本没有休息时间。放中午学时，远的学生都带着玉麦馍馍来吃。为了让学生不吃冷食，高义奎老师发动学生每人带点柴到学校，中午，在廖家锅上给学生烧开水，并将馍馍蒸热。为了照管好学生，高老师每天也带馍馍当午饭，师生关系非常融洽。那时要求教师关心学生，勤走家访，了解学生情况，对每个学生每学期至少走一次家访。每周还要到中心校集中开会一次，开会时间都是放学吃晚饭以后，经常开到晚上 10 点左右，有时甚至 11 点。每次开会，各人都要汇报对学生进行家访的情况。学校还提倡勤工俭学，发动学生放学后捡谷子、摘老茶叶和扯夏枯草、猪鼻拱等，卖的钱全部用作学校的办公费。

以后，全公社各大队先后办起了民办小学，有的是两所，当时的十大队甚至有三所民办小学：三圣宫民小、毗卢寺民小、山家营耕读小学。民办教师的生活待遇完全由大队决定，一般每月工资 15 元钱。还有几所耕读小学老师每月仅 6 元钱，外加生产队给记工分。民办教师的工资和办公费等主要来源是学生交的学费，每学期老师要向大队报告学费开支情况。教师的口粮为每年 360 斤贸易粮（包括大米和少部分玉米），由学生家长平均负担。每学期开学后，学生便用竹箢箢



五十年代初火井小学在双庙子对面碾房写的标语。

或小口袋把自家应出的粮食给老师送到学校里。所以，当时有人戏称民办教师吃的是“箢箢粮”，这和解放前的私塾差不多。学校没有计时钟，老师没有手表，上下课时间都是大概加估计。后来，县文教科给每所民小配发一只闹钟才解决了计时困难。为了方便起见，高义奎老师无论上学或开会，总要背个挎包，装那只十分珍贵的闹钟。因此，有人戏称高老师是“背钟老师”。

当时，农民都比较贫困，又未实行计划生育，大都是多子女家庭。大人要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小孩子无人照管。所以，学校允许学生带着弟妹来上学，老师要关心和帮助这些带着弟妹来读书的学生。针对此情况，高老师上课便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带弟妹上学的学生座位安排在靠外一边，既方便他们进出，又不太影响别人上课；弟妹哭闹时，允许他们离开教室去哄；准许他们迟交作业；正课上完后，允许他们提前放学回家。有时候，带来的弟妹哭闹不止，他们也跟着呜咽，老师无助又无奈！

师生情深

双童小学的学生非常可爱，他们天真活泼、淳朴热情、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学习努力、互相帮助、劳动积极、不怕吃苦，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毫无怨言，乐观向上。师生互相关心、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情谊。1976年9月1日，学校按时开学。可是，该校新招的初中班没有教室上课，因为新教室正在修建之中。大队党支部作出决定，借用四中队的公房作为初中班的教室，等新教室完工后即搬进去。四中队的公房是三间两头转的大瓦房，正中三间是集体养猪的两排猪圈，东边靠洗甲溪一头是该中队集体的保管室，民中班的教室就设在西边靠小路的转角里。新招收64名初中学生，大都来自火井高场街上、一大队、九大队、十大队和油榨乡杨子山。全班64个学生塞在一个转角里，挤得满满的，连老师的讲桌和黑板之间也只能侧着

身子才能通过。“教室”完全没有墙壁，四面通风，且有一边靠近粪坑和猪圈。学生们一见如此糟糕的学习环境都傻了眼，特别是街上的学生更觉惊诧。但是，那时是划片招生，高场下半街划入双童小学招生范围，学生们也无可选择。回去把这些情况告知家长，有的家长说：“读书又不是去享福，你们的高老师教书十几年，他都去得，你为啥子去不得？”有的家长说：“房子再好，读书不专心也枉自，只要努力学习，粪坑边上也能出人才。”听了这些家长热情支持和真诚理解的话，老师心里热呼呼的，并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克服困难，把这批学生教好，不辜负家长的热情支持和殷切希望。后来，该班果然培养出一个当时十分罕见的中专学生。

该班师生齐心协力，迎着困难上，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自己动手，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老师发动农家的同学每人带40根去叶脱壳的长玉麦秆到学校，老师也从家里砍来竹子，带来齐刀，和同学们一起动手拦壁头。只用了三天课余时间，就把教室拦好了，并将教室内布置一新。在玉麦秆拦的教室里上课，师生们心情舒畅。但是，集体的公房毕竟不是真正的教室，上起课来仍然干扰不少。特别是母猪生猪仔时，每天吃几次奶，一群小猪总是叽哩哇啦叫个不停。此时，老师必须提高声音讲课，连喉咙都嘶哑了。有时社员要挑粪到集体地里种庄稼，舀粪时，臭气熏天，久久不散。有一次，有几只小猪受惊后，不知怎么就钻进教室，弄得大家哄堂大笑，教室里乱成一团，折腾了好一阵才把它们撵出去。为了不影响学生上课，饲养员主动把宰猪草的时间挪到清晨学生未到校时，以免影响学习。该班在四中队公房里坚持上课两个多月，新教室竣工后才搬回去。

那时的初中是两年制，1976年招收的学生，1978年就毕业了，师生们两年的友好相处，真是情深谊厚。临毕业，要分别了，同学们都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同学之间有的互赠照片，有的互赠小礼品，各自表达深切的情谊。

双童小学78级毕业，考入中专的1人，升入火井中学高中班的



1987年冬双童村小学全体教师和省市“普九”检查团合影。

有 17 人，在山村小学民中班里是比较罕见的。因此，受到县教委的表彰和奖励。

79 级初中毕业班在半期考试前就搬到中心校集中教学。全乡几个民中班的学生在中心校集中后，就按学习成绩分成了一、二、三、四班。四班是优等班（当时称为快班），由彭定永任班主任，教语文。三班次之，由高义奎任班主任，教语文。在最后总复习时，两位老师协商分工，彭定永兼三班的字词复习，高义奎兼四班的语法复习，以便集中精力备好课、上好课。毕业班还特别开了晚自习，那时教室里没有电灯，同学们都点着煤油灯来上课，整个校园沉浸在一片浓浓的学习气氛中。1979 年夏毕业时，直接考入邛崃师范的 1 人，考上高中的有 12 人。

1976 年秋，双童小学二年级从双庙子迁到乐巷子新校址。由于新的教室尚未完工，就暂时搬到离乐巷子不远的三中队一座废弃的破旧碾房里上课。当时，碾房一进门就安放着上课的黑板。说是黑板，其

实就是由几块木板拼接而成，再用墨汁染黑，放在一个木架子上的长方形的旧揉面案板改成的简易黑板。学生的课桌是由当地木匠做的不到三尺长，二人共坐的连桌凳。黑板前面放不下全班桌凳，还有几张桌凳只好放在碾台上。有的学生坐在碾台上读书，常常把脚伸到碾槽里，晃来晃去，觉得很好玩。该班就在破旧碾房里上了上了一学期课。直到第二年开春，新教室修好了，才从那个破旧碾房搬进新教室。

有一次，78级初中班进行爬山比赛、野炊活动，地点选在双庙子后面的尖峰顶。全班同学分组比赛，扛着红旗向陡峭的山顶挺进。同学们个个争先恐后，沿途欢声笑语，你呼我应，相互鼓励，“加油！加油！”之声此起彼伏。师生们在山上尽情欢呼、跳跃、放声歌唱。歌声响彻山野，飞向蓝天。接着，大家分组埋锅造饭，炊烟四起，热腾腾的饭菜香气四溢。直到今天，老师和同学们走到一起时，还津津有味地谈起那次爬山野炊的欢快情景，愉悦之情溢于言表，终生难忘。

勤工俭学

大搞勤工俭学是当时的潮流。那时，中心校要求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双童小学发动学生打青蒿、捡牛屎等，为集体积肥料。最难忘的是1976年，双童小学在该大队五中队的马褡裢开了三亩多荒地，办起了学校的课余小农场。全校根据各班年龄和人数，分班划片，进行开荒耕种，民中班成了农场的主力军。师生们向当地生产队学习，小春种油菜，大春种玉米，玉米地里间种黄豆等，也种红麻。学校积的肥料，全都用在小农场里，获得了较好的收成。收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粮站，卖的钱全都用于学校办公和体育器材等开支。通过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增强了同学们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劳动，共同克服困难，分享劳动的快乐，增进了师生情谊。

70年代后期，农忙时除了放农忙假，双童小学还开展支农活动，老师带着学生去生产队帮助干活。例如，1979年初冬，小学五年级就

在老师带领下扛着红旗，去学校附近的四中队支农。在洗甲溪边李家坝，同学们帮生产队欠田（用锄头把已撬来翻转的田土挖成碎块），准备种麦子。结果，学生们不会干活，边欠边踩，将田里整得坑洼不平，乱七八糟，踏成一片。中午，生产队还特别派社员用水桶把热气腾腾的豆浆稀饭与好菜送到田里给学生们开午饭。大家感觉比家里的饭菜好吃多了，吃了一碗又一碗，很快就把饭菜吃光了。

双童小学不断发展，成绩斐然。在开办民中班期间，除了有 29 名学生升入火井中学高中班外，还有 1978 年直接考入中专（温江财校）的 1 人；1979 年直接考入中师（邛崃师范）的 1 人。几十年来，双童小学在该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经过全校师生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虽然昔日的山村小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硕果累累的过去必将载入邛崃教育的史册。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陪马识途参观文君井

陈炽昌

1995年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杂文作者会在邛崃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杂文家和四川省的作家等几十人参加。承办单位是邛崃市委宣传部和文君酒厂，会议的一项活动是参观文君井。作为邛崃的主要旅游景点，文君井是西汉才女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当垆卖酒千秋佳话的一处纪念性园林。

当时我接到市委宣传部通知，全国杂文作者会与会人员要参观文君井，听说马识途等四川省作协领导也要一同前往。出于敬仰，我必须亲自接待（当时我任邛崃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因为马老是著名的革命家和作家。我记得在念高中时就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以及散文、诗词等名作，深受鼓舞和教育。能亲自参与接待真是幸事，一同参观的还有全国重要刊物《求是》杂志副总编以及牧惠、蒋元明等一些杂文战线上的重量级人物和学者。

参观当天上午10点过，宣传部部长熊定能陪同马老一行二十余人来到文君井，我在门口迎接。只见马老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笑容可掬，是一位十分慈祥的长者。握手问好后，我向马老一行介绍了文君井概况和清代果亲王诗碑。然后，看琴台，穿回廊，来到文君井旁的诗碑，驻足观看郭沫若1957年国庆节为文君井题的词。这个题词是当年邛崃县文化馆馆长魏朗先生写信请郭老题《文君井》三字，郭老



作者(左)与马途识先生(右)在文君井畔合影。

得知已有晚清进士邑人曾光燦题了，他就不再题，故用中国科学院信笺即兴题文君井词。无论从题词的内容和书法艺术，都属上乘佳作。

参观诗碑时，马老披露了一段尘封往事。他说，1965年，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到成都开会。因与郭沫若私交很好，就相约到邛崃参观文君井。车都备好了，没想到动身前一日郭老临时接到中央电报催其返京，只好作罢，成为一大憾事。

马老一行在邛崃市领导的陪同下，轻松愉快地边走，边看，边听，并在文君井旁合影留念。作为接待人员，我们通常都不参加，只有领导作陪。接着，马老一行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井旁的古碑——唐刻“文君井”三字。我解释说，此碑说明在唐时文君井已是一处园林胜景，这口古井相传是当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酿酒取水之井。此井十分奇特，井泉清冽，从来不浑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取井水烹茶，品茗者甚众。八十年代有自来水后，此井封存，只作参观用。同时，有省上名家刘东父、姚石倩书写的石碑。井旁是当垆亭，亭旁有书法

名家、川大老师周浩然的题联“择婿何须父命；当垆更暖人心”。马老对三位老先生都熟悉，看得也很仔细。

马老对陈列馆两旁一副抱柱对联十分感兴趣，联文是：“从落拓中识奇才，千秋共赞文君美；在青史上留鸿爪，万世咸钦司马才。”马老问作者是谁，我说是解放前就读于川大中文系的一位老先生，后从教。此联是他撰并书的。马老说：“好！”

接着，又参观月池中的一座船舫，有楼取名漾虚楼。过小桥见门口一副对联，为邛崃女诗人周澹秋所撰：“拾级上妆楼，宝镜晶莹人宛在；焚香弹古调，瑶琴清响韵依然。”此联有意境，将参观者带入想象空间。然后，又参观了陈列馆，主要是邛窑出土的典型器物及文管所部分馆藏的条件。马老一行看得很认真，很仔细。后又来到后院两边厢房，柱上挂着省委老领导、临邛书画院名誉院长杨超同志题的“临邛书画院”竖匾。参观了两边厢房里的书画陈列馆。在参观过程中，我向马老一行汇报了临邛书画院的情况。马老说：“邛崃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厚，作者的水平也不错。”在我听来，这是老一辈对我们的鼓励。

随后，马老一行步入杨超题的诗碑院，也是文君井园林的一处主要景点。正中为张爱萍将军题写的“风流传千古”以及历代诗人如唐代李商隐、杜甫，宋代陆游，元代汤显祖，清代王国维等对文君井的题咏诗词，特邀请省内书法名家书写并刻石上墙。马老一行边欣赏边议论，慢慢品味。

我按程序介绍井旁的老诗碑及邛崃颇具国学和古文诗词及楹联修养的老先生的作品。当时另外一批参观人员问了一个问题，宣传部工作人员请我过去解释一下。这边马老看到一副我们本土一位管姓老先生撰的、我用隶书书写的一副楹联：“谁歌郢市传春雪；君到临邛问酒垆。”马老问陪同的熊定能部长，楹联是谁书写的。熊部长说：“就是刚才给您介绍的那位同志。”赓即简要介绍了我的情况。马老说：“我能否跟他合张影？”宣传部工作人员马上过来传达。说真话，当时我

有点懵了，有一种受宠若惊、同时又倍感温馨的感觉。因为，马识途先生是老革命家，老领导，文坛泰斗，书法家。尊敬不如从命，于是我和马老在文君井旁合了影，又和《求是》杂志副总编三人合了影。但想不到的是，马老接着说：“可不可以给我写张字？”我有些神色慌张地连连说：“不敢，不敢，您老是大家，我都是读您的作品长大的。”马老接着安慰我说：“不要谦虚嘛，我喜欢您的隶书。”推让再三，熊部长也在一旁鼓励我。最后，推不脱了，我说：“好嘛。我就不揣冒昧，班门弄斧了，权当小学生向老师交的作业。”他还说，内容由我定。

着手写字之际，这件事也让我反思。我乃无名小卒，马老是大家，书坛泰斗，省内主要景点常见马老的题字题联，他对隶书的研究精深。这件事让我真正读懂了虚怀若谷这句成语，受益匪浅。我搜索内容，利用一个星期天，推掉杂事，拙就了一副隶书对联：“云山起翰墨；星斗焕文章。”这是国学大师饶宗颐的一副诗文节句联。我写了好多张，选了一副还算过得去的寄到成都红星路省文联转马老收。算是诚惶诚恐交了卷，并附信一封，说明联文的出处，以及对马老的道德文章的赞颂，并请马老在书法上予以指正赐教。

马老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当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靠的是坚定的信念、过人的胆识和机智勇敢。

2004年，年届90高龄的马老在成都举办了个人书法作品展，出版了《马识途书法集》一卷。展览非常成功，作品被藏家收藏，所得善款和稿酬共230多万元，马老全部捐出，资助四川文学院与新闻学院，设立基金，奖掖后学。

2012年，马老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

马老今年已106岁，仍健在。不仅是他家族的良好基因，愚以为还与他平和的心态、高尚的情操、丰富的学养以及超常的德行密不可分。这是很多人无法企及的。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我与第一代身份证

陈映平

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是我国户籍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保证全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定的一项重要措施。

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公布施行。翌年10月，邛崃县成立了颁发居民身份证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人力、物力、财力做宣传、组织工作，确定先在城区临邛镇试点，后在全县推广。同时，在邛崃县公安局设立了身份证颁证办公室，简称颁证办。是年，利用报告会、黑板报、有线广播等宣传形式在邛崃城关、街道、镇乡和农村广泛深入地开展颁发居民身份证的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使广大居民明白我国为什么要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怎样申领居民身份证，如何对待颁发居民身份证等问题，以取得广大群众积极配合和支持，让颁发居民身份证这一前所未有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86年12月，在位于县府街72号的公安局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举行了颁发居民身份证业务技术培训会，各机关、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每个大队2人）共计130多人参加。参加培训的这些人，都是经过单位按照上级要求严格选拔推荐的，他们政治可靠、责任心强、工作细致，具有较强的书写能力。培训完回去后，他们将担任各单位核对户口、复核发证项目、收验照片、填写卡证和发

证等工作。培训开课当天，成都市公安局廖所长来邛进行颁证业务培训指导，县颁证办主任、公安局长孔祥文作总动员，要求参会人员认真学习贯彻《条例》精神，统一思想认识。一要认真做好常住人口摸底、核实；二要组织试点、培训业务骨干；三要填好入册登记、底卡等表；四要做到采集信息准确无误，少返工，高效率……会上还讲解、演示了登记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和住址及底卡等资料的填写方法。

由于颁发居民身份证是一项大工程，涉及千家万户，工作量大，质量要求高，任务十分繁重。培训会结束后，聘请了30多人为技术、业务骨干。技术人员主要负责照相等工作，分期分批到各镇乡为办证者照标准相，若遇老弱病残则上门服务。仅红光一个公社，就花费了三天的时间才照完相。业务人员负责办证，并分成4个组分片包干镇乡。东路由徐贵清、陈建强负责前进、固驿、高桥、羊安等地；西路由李世清、李荣炉负责西河、油榨、火井等地；北路由杨洪云负责桑园、拱辰、君平等地；南路由徐伦质、王安鹏负责南河、卧龙、平乐、夹关等地。各居委会、街道、镇乡也相应成立了颁证办公室，接受县颁证办业务指导。组长由镇乡办公室主任担任，负责核实时本辖区内符合办理身份证件的居民人口，查清发证人数底数等信息，收集整理、登记并上报到县颁证办。

其时，我在交通运输企业的人劳科办公室管理人事档案和资料工作。一天，办公室主任唐平安通知，叫我去公安局报到学习。当我到了会议室后，才知是参加公安局举办的颁发居民身份证业务学习培训会。后因工作需要，三天的培训我只参加了一天。但在后来办理单位职工和家属近300张身份证时，我几乎参与了全过程。

我单位职工来自川内外，驾驶人员较多，因工作性质，他们一般早出晚归。尤其是货车驾驶员，常年在外跑车，十天半月未归家成为常态。而家属虽长期居住在邛崃，但本人户口大多数在原籍。颁证前的准备工作中，对花名册上在岗、已退休和常住家属户口逐户逐人摸



1986年12月，邛崃县颁发居民身份证城关试拍全体
工作人员留影。

底、核对，查清符合发证人口底数。对户口待定的人，动员其返回户籍地落户办证。对返回原地有困难、按政策又不能在住地落户的，遂登记为暂住人口。经过多次入户走访了解后，出入还是比较大，多数是出生时间和家庭住址误差较大，城市人口出生时间一般按公历计算，广大农村则是按农历计算。有15个驾驶员出车于省外，且住址不详，一时联系不上，另有7个驾驶员回射洪、南部、乐至、遂宁、重庆等地探亲。这给采集第一手信息、建卡带来极大困难。当时单位符合办证人数多，加之人手少，时间紧，又无现在的交通通讯设施，前后分别给他们发了几封加急电报均未见回音，这让我一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按时上交办证资料、卡片信息、不拖全县颁证工作后腿，我只好与另一同事坐长途公共汽车到射洪、南部、遂宁和重庆。到了所在县城，再赶手扶拖拉机七拐八弯，时而在山巅时而入峡谷，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本人重新登记信息并核实确认、签字按手印。这一艰辛过程虽已过30多年，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办证照相统一尺寸规格，头顶到下额高32毫米，脸宽28毫米，每人一寸近期免冠照两张。居民身份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其有效期限分三种：16岁—25岁有效期为10年；26岁—45岁有效期为20年；46岁以上长期有效。据《邛崃市志》记载：

居民身份证由 18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前面 51 为四川代码，01 为成都代码，30 为邛崃县代码，中间为出生年月，后为身份证编号。1987 年底，全县颁证 39.7 万人，占 16 岁以上人口的 95.63%。1988 年，颁证工作交由公安局户籍科承办。1994 年，因邛崃撤县建市，报经公安部批准，邛崃居民身份证行政区划码由 510130 调整为 510183。1996 年 8 月 1 日，正式启用 510183 行政区划码。1998 年，1.14 万名 16 周岁以下人员身份证号码编制完成。2005 年 11 月，正式启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换发工作。近 20 年间，共颁发、换发居民身份证 89.64 万份。

身份证办理发放完成后，户籍科从当年留下来的 30 多位技术、业务骨干中又聘请了李世清、叶启超两人继续留下长期工作。当时既无电脑、又无复印机等先进办公设施，所有信息、填表、制卡、登记等全凭手写。人员少，工作量大，要求填表书写要准确、正规无误，聘请的技术、业务人员均写得一手好字。“2000 年才退休，在公安局户籍科工作了 15 年。从办居民身份证培训那天开始，到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办证结束，我是经历者，见证者。当时叶启超比我大几岁，退休却在我后面，属超龄工作人员。”年近八旬的李世清老人如是说。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若要北漂和南下到千里之外去打工、下海经商等，一时半会儿证明不了其合法身份，那将寸步难行，是一件非常苦恼的烦心事。如今，有了居民身份证，一卡在手，便可行走天下。

居民身份证不仅保证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更给人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带来了极大方便。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述闻

1969年11月底，邛崃县革命委员会召开邛崃县第一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1500名，列席代表80名。图为大会结束后，部分代表合影留念。

(谢恒章提供)



1987年，邛崃首次举办水上音乐会

陈叙言

1983年10月，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邛崃县委、县政府提出发展临邛镇旅游产业的构想，主要内容包括城内文君井、古街区等景点景观的开发，城郊围绕白鹤山·九里泮、竹溪湖·磐陀寺景区开发，加上绕城水景带的建设，涉及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纳入规划的景区景点随着时间推移，面貌有了根本改观。据时任邛崃县文化局局长陶开敏回忆，1987年初，位于西郊、从马湖到白鹤的七里畔河道整治工程宣告竣工，清澈的流水将两岸风光映衬得更加秀丽。三月的一天，县长张义铭找他到办公室，并提出两个问题要他回答：一是县上想打造七里畔景区，咋个造势？二是七里畔名字比较土，需重新取一个，啥子名字才得体？陶开敏因担任过农村文艺工作队队长兼编导，有较为丰富的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经验，所以当张县长提出如何宣传的问题时，他脱口而出：七里畔自然资源丰富，可以充分利用其临水优势，举办一台大型的水上音乐会。至于名字，可在七里畔的基础上做一点微调，改为九里泮，一来顺口许多，二是泮字既与岸又同水有关，突出了以水文化为核心的景区宣传基调。张县长听后颇感兴趣，进一步问：水上音乐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呢？陶开敏想了想，回答：可以用空汽油桶铺底，让舞台有足够的浮力，上面搭板子固定，周围捆上车轮胎，稳定舞台周边。然后再用钢丝拉扯固定舞台整体，



从马湖到白鹤的七里畔河道竣工后，清澈的流水将两岸风光映衬得更加秀丽。

使舞台不至于随波漂荡。张县长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论证和研究，采纳了陶开敏的建议，并由他牵头落实，演出时间定在五月一日。至此，水上音乐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开始循序渐进地展开。

首先，需要划定节目的具体编排和确定出演人员。据歌手侯福祥介绍，刘三姐的传说经邛崃文艺工作队的改编演绎，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为传唱，邛崃人对其印象深刻，水上音乐会准备恢复其中一些片段，作为一开场就牢牢吸引观众的节目之一。同时，成都市歌舞团副团长兼长笛首席杨天胜拿出了他创作的、根据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天方夜谭》改编的小型管弦轻音乐作品《阿里巴巴》，作为邛崃水上音乐会的第二个节目……演员除了本土的，还专门邀请了省、成都市的知名演员参与，有省歌舞团著名民歌手练正华演唱的歌曲，还有沈伐和涂太忠表演的方言谐剧，以及成都市杂技团团长刘廷玉表演的拿手好戏走钢丝、魔术与鞭技，都纳入到节目表单之中，把两个小时的节目演出既定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全力为观众带来一场盛大且难忘的水上音乐会。

在演员们开始紧锣密鼓排练演出节目的时候，另一边，陶开敏等人也在为搭建水上舞台而忙碌。虽然在县二轻局协调邛崃地方国营建

筑公司等单位的配合下，水上舞台已进入施工阶段。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使偌大的舞台浮在水面上，需要数量众多的空铁桶。在那个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的年代，空油桶一下成了稀罕货。好在县车队了解水上音乐会的具体情况后，十分支持，借出了大批队里闲置的油桶，同时还借出足量的旧轮胎，一下子就解决了舞台基座与四周包边所缺材料的问题。位于白鹤山一侧的水上舞台（今牌坊处）基础打牢后，铺上木板，再覆一层红地毯，整体外观显得精致而豪华。除主舞台外，为保证演出当天节目的执行效率，舞台对面的岸上还搭建了临时的男女更衣室、化妆间和厕所，可谓配套齐全，也足以得见主办方对这场水上音乐会的重视。

考虑到本活动是邛崃首次举办，前来看稀奇的观众一定不少，为保证每一位观众都有尽可能好的参与体验，让没占到好位置、离得远的观众也可以一饱耳福，舞台必须配备音量大且数量较多的音响设备。陶开敏回忆，好在当时县广播站把原来县里的高音喇叭换作了低音喇叭，拆下闲置的高音喇叭刚好可以利用起来，作为音乐节的音响设备，这样演出的音乐声通过数个高音喇叭扩音，其声响即便身处河对岸都可以清晰听到。

音乐节的组织开展并不是跳跃性的，而是一环紧扣一环。舞台搭建完毕后，还需经过反复实验，确保其具有足够的浮力与稳定性。同时，观众与演员的人身安全是音乐会当天的头等大事。道路交通、治安维护由公安局负责，而陶开敏等人则在反复商讨后，制定了应急预案，确保《刘三姐》全体演员的水上安全，以及刘廷玉高空走钢丝节目的万无一失。这个盛大的节日就在紧张的筹备和细致的落实中如期而至。

演出当天，陶开敏作为节目组织者，一大早就动身前往九里泮，侯福祥、孙益辉等家在城里的演员也趁着夜色还未褪去，怀揣着紧张而激动的心情前往现场化妆、提前做好演出准备。尽管天刚亮不久，但路上已有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甚至形成了一定的拥堵。“还堵车呢。”



水上音乐会的舞台。（侯福祥提供）

陶开敏对此印象很深，“稍微晚点，那已是堵得寸步难行，汽车从大西河一直塞到环扇子。”相较于汽车的窘迫，步行与骑自行车的人则明显轻松惬意许多。大家灵敏地闪避穿梭，一路笑谈不绝，个个脸上带着喜悦，透露着对演出的期待。因时候还早，路也很长，人群仿佛一条狭长的溪涧，在黎明时分不急不缓地向九里泮流去。

上午九时，黑压压的人群已把风景区的河道两岸挤得满满当当。那情景，即便已经过了三十多年，演员孙益辉的话语间不经意流露的震撼，还是再现了当日人声鼎沸的壮观：“怕是有三四万人哦，那么大的河岸两边，居然显得有些拥挤。”对此，陶开敏和侯福祥有同感：除了单位组织的人员，许多是携家带口的居民，还有附近乡村的村民。小孩在人群间穿梭嬉闹，母亲追在背后大声呐喊，生怕被绊倒踩着，男人们则在树下悄悄抽烟，低声笑谈，还有善于捕捉商机的小贩在人群中不停地吆喝。对岸的河畔也是乱哄哄一片，平日里即使稍微

繁杂便会嫌吵闹的人，这个时候看着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却也别有一番赏心悦目之感。

上午十点整，剪彩仪式正式开始，早已就位的省、成都市和邛崃县领导依次上台讲话和致辞。礼炮、奏乐仪式完成后，主持人出来报幕：请欣赏歌剧刘三姐选段《山歌好比春江水》。主持人前句话还未说完，便已缓缓地举起左手，紧接着饱含激情地问道：三姐在哪里？话音刚落，他手指的方向便响起了刘三姐高远的歌声。只见刘三姐扮演者站在一条小船上，举着无线话筒动情地演唱《山歌好比春江水》，歌声伴着艄公船桨荡出的粼粼波光传得很远。一曲作罢，船刚好到达舞台，刘三姐与艄公扮演者鞠躬下台，在观众的意犹未尽中，开场的表演缓缓结束。

随后的节目精彩纷呈，观众掌声喝彩声不断。其间还有一段小插曲，侯福祥清楚地记得，当省曲艺团的谐剧演员沈伐正在表演《抓壮丁》时，县里邀请的省射击队却开始了对空打



当年的舞台位于现在的牌坊处。

靶表演。天空中响起的乒乒乓乓枪声，立马吸引住两岸观众的视线，都在抬头仰望，并且欢声如潮——晓得节目的编排出了差错，抢了沈伐老师表演的风头。几分钟后，沈伐走下台，阴沉着脸，一边换服装一边喃喃自语：“太不落教了，是哪个搞起的嘛？”

表演持续了两个小时，在观众意犹未尽中结束。其时已到饭点，人们原路返回，骑车来的骑车回家，走路来的又走路回家，大家一路有说有笑，虽空着肚子，却神采奕奕，对刚才一系列节目回味，议论，反响热烈。九里泮的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水上音乐节却还未落

幕。侯福祥说，音乐会除了文艺演出，还结合了邛崃的艺术节、摄影展、书画展和歌手大赛，是一个综合性的节日，持续了一整天时间。

水上音乐会为邛崃文艺复苏、九里泮景区打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带给经历过的人难忘的美好记忆。时至今日，陶开敏回忆起这个由他提议策划的活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八十年代初，邛崃经济逐渐复苏，为改变邛崃除去一个补了三十几下的铜号和只有笛子二胡的窘迫现状，县领导董朝永找到钟表公司经理季康泉，要他请海鸥表的郭经理帮忙从天津购进一批铜管乐器。乐器回邛后，县上成立了每件乐器都是两套的双管编制乐队。以此为背景基础，传统文艺在邛崃的土地上再次生根发芽，群众文化市场快速扩大，人们对文化演出参与的积极性也随之提高。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底子，陶开敏才敢于承担水上音乐会的策划。为此，他不无自豪地感叹：“有的朋友经常调侃我，张艺谋打造的印象刘三姐闻名四海，而我策划的水上音乐会中的刘三姐选段比他还早呢！”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巴口香豆腐的来龙去脉

周灵

邛崃这座城市，有着很多关于吃的烙印，比如奶汤面和钵钵鸡，多年来一直令邛崃土著百吃不厌，让外来游客终生难忘；比如甜皮鸭，虽然没有乐山的名气大，但论正宗，吃过的人一定会觉得各有千秋，不遑多让；比如碗碗羊肉，或许找遍全川也找不到其红汤那种特有的味道。我的同事到邛办事，这个是午餐必吃的。

但在老一辈的记忆里，几十年前最流行、最火爆的吃食并非上述那些，巴口香豆腐才是那个时代吃食方面的高端主流。邛崃名酒文君酒在鼎盛时期，其名气和口碑恐怕也不过如此。

今天邛崃东街的文君酒厂大门，其实正是我外公的母亲——非常有名的东街陈二嬢的家。外公的父亲是清末民初的武将，当过管带，兼过火井分县的分知事，后来跟着他的上司邓标统上了战场，战死在长沙。1918年外公出生前，他们就住在那里，直到1987年搬迁至天庆街。那处宅子，我们祖辈几代人住了近百年。从酒厂大门进去不远，曾经有一口水井，那个位置，正是巴口香豆腐创始人陈二嬢的豆腐作坊位置。

这个巴口香豆腐，当年名驰川内外，是十分紧俏的抢手货，堪称食品界的路易斯威登、豆腐界的布加迪威龙。它的口碑如此之高，是因为其价格合理，选料上乘，制作工艺更是精益求精。

据说它的选料十分考究，一定要当年产出的黄豆、胡豆、海椒、花椒等。黄豆须是山区产的，寻常豆腐的黄豆是清洗干净后就直接碾磨成豆浆开始制作，巴口香豆腐的黄豆这般精贵，决不会如此草率地处理，一定要先择去坏的，在泡了水后，又择去浮豆、小豆和铁豆，剩下的粒粒饱满，再经过一番加工处理，才能磨豆浆，这样才确保不会涩口；点豆腐不能用石膏，要用其特制物，否则会影响豆腐的凝固结实度；成型后要用草叶承载好弹抖一番，不垮方才真正将主体制作成功。海椒，必须是成都牛市口或邛崃石坡的二荆条。花椒也不普通，一般的花椒都是独粒的，而汉源九襄的花椒，每粒大花椒上还要背附一粒小花椒，因此称为娃娃椒，巴口香豆腐所选的花椒料，正是这种特有的娃娃椒。而豆瓣，是用新鲜胡豆剖成两半后，用胡瓜叶垫底并将之覆盖包裹后再晒，为的是让其保持清香且滋生出对人体有益、能提升红豆腐香味的有机微生物霉菌……

在制作时，发酵也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活。连霉菌杆也跟其他豆腐发酵得不一样，白霉菌丝纤细如发，顶呈圆珠状。到这种状态了，才开始搅拌，并制作成墩状，泡进罐子里。需每日换清水，泡上半个对年才算成功。在烘焙制作中，还要加点酒、醪糟等佐料，才会在口感上更加特别。正是这种不同，让人从一点点细微的味道、口感上的差异，越品越能拉开寻常豆腐与它的差距，想要模仿却无迹可寻，更难以企及超越。

豆腐制作好后，外形方方正正，色泽外红内黄，夹开之后，两边对冒油珠，黄灿灿的晶莹闪亮、璀璨欲滴，外软内酥，入口化渣，那美妙的味道，实在无法形容。



外形方正的豆腐，夹开后两边对冒油珠，那美味实在无法形容。（王树林提供）

陈二娘的这手绝活，后来传给了外婆，外婆又传给了我的幺姨。小的时候，我因为体质差，吃饭难以下咽，全靠外婆做的巴口香豆腐才能下饭，现在经常回忆起那个若有若无、似曾相识的滋味，便情不自禁地又怀念起外婆推豆浆、点豆腐的身影。

1944年，外公从一线抗日战场回到军校（黄埔汉中校区）继续完成学业，胡宗南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的名义举办了一次对回炉学生的欢迎宴会。胡是行营长官，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同时还负责军校的事务，故十分看重此次宴会，当时在汉中的军政首脑及文教名流全到场了。在宴会接近尾声时，胡神秘地说：“给大家上一样坐飞机来的佐餐菜，我平时靠它才吃得下饭。东西不多，每人尝一口味道。”副官小心翼翼地端上一个小笆笼，笆笼上贴着一方红纸，上面写着两行小字：邛崃县东街陈二娘豆腐。外公万万没想到，胡长官这么郑重其事隆重推出的东西竟然是自己家生产的红豆腐！

在那之前，红豆腐还没有名字。外公脱离四十军后，只身回到邛崃，没有直接进家门，而是戴着一顶民国时期特有的大檐帽，戴着一副墨镜，来到陈二娘的豆腐铺子，说：“听说你家的豆腐很有名，我要尝一尝。”陈二娘没有认出他来，以为是来买豆腐的，便让他尝了一小口。外公尝后，高兴地说：“好久没吃到这个味道了，香！硬是香！一巴口就香！”这一下原形毕露，被陈二娘认了出来，笑骂道：“你龟儿娃娃装怪！”从那天以后，陈二娘的红豆腐就叫巴口香豆腐了。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的一天，傍晚时分，有个兵骑了一匹马到豆腐铺子向陈二娘买豆腐。陈二娘的豆腐十分畅销，当天的量是早就卖完了的。那个兵面带难色，徘徊着久久不肯离去。问及原因，说自己是驻成都的川军第四师范师长（范绍增）的勤务兵，范师长只吃邛崃东街陈二娘做的这个牌子的豆腐，头天吃饭，就因为寻常的佐餐豆腐不合口味，只尝了一口便扔出去了，埋怨下面的人不尽心，气恼得饭也没吃。副官交待今天务必买到陈二娘家的豆腐，否则回去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陈二娘见小伙子十分恼火难受，从成都那么



巴口香的制作秘方使酱品厂红豆腐的品质有了飞跃性提高。

(周丛文提供)

远颠簸过来，白跑了冤枉路，还无法回去交差，便把自家留用的罐底剩下的一点点豆腐连同窝子油都舀来送给了他，那个勤务兵才千恩万谢、眉开眼笑地离去。

巴口香豆腐是品牌食品，因为精，故而稀；因为稀，故而奇。自然有不少消费者趋之若鹜，而且还有大户抢购，手快有、手慢无的情况常常发生。川康巨头刘文辉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老主顾，每年都是提前一年全款付讫订货，次年取货，还要快，慢了就没了，预定的量是有限额的，供完这个量，其余的都是要每日做零售卖给大众的，谁也改不了这个规矩。刘文辉这个预定的惯例延续了二十几年，直到新中国成立。

我的姑婆刘松筠，是外公的表妹，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颌面外科主任，现已退休。新中国成立后，她就读于华西医科大学。那个时候，大约半年甚至一年才能回邛一次。回学校时，大多数同学都是要带一些特产、礼物作为同学之间的交流和分享，姑婆什么都可以不带，但巴口香豆腐是一定要带一坛去的。这豆

腐仿佛是现在的网红食品，在华西医科大学大受欢迎，“有这个‘巴口香’豆腐，饭都要多吃一碗。”姑婆那些同学如此评价。巴口香稀缺而又火爆，供不应求是必然的，但姑婆是个非常大方的人，每次带去的豆腐都开心地看着被同学们一抢而光。直到如今，姑婆退休多年，她的那些同学都是华西的名老专家及教授，聊起当年，一直念念不忘的，多是刘教授家的巴口香豆腐，仿佛嘴边香味仍在，让人意犹未尽。

叶文白先生，邛崃中医界泰斗，与外公私交极好。外公每次给他送巴口香豆腐去，往往会多舀一两勺罐底沉淀、为数不多的窝子油——这个窝子油，无论是煮面用作底料，或炒菜加上一点，还是直接和饭吃，都是香到极点的。叶老便吩咐家里人：全家上下里外的东西，都可以随便吃，唯独那份窝子油，任何人不能动。可见叶老对巴口香豆腐的喜爱，已经到了非常执着和痴迷的程度了。

后来，国家将豆腐作坊那一片地收走，并砌了一道墙与住房隔断，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紧缺，原材料都是稀罕货，巴口香豆腐便没有条件再制作，只能停产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邛崃县商贸局局长吴祖刚知道文君酒厂副厂长李惠明与外公私交不错，便委托其当了一回说客，带着邛崃县酱品厂副厂长杨宏泽亲自登门，向外公做动员工作，希望能将巴口香豆腐的制作秘方和品牌贡献给国营的酱品厂使用，外公同意了。但因为批量生产与精细生产的矛盾性、烘焙技术的火候掌握程度、以及这样那样的各种原因，生产出来的红豆腐与老巴口香豆腐的品质相去甚远，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虽然巴口香的制作秘方使酱品厂红豆腐的品质有了飞跃性的提高，让其他红豆腐难以望其项背，但吃惯了老巴口香的一辈人仍然这样评价：“现在的巴口香，跟以前的相比，拍马也赶不上。”

再到后来，市面上各种巴口香牌子的食品都走马灯似的频繁出现，但巴口香豆腐，却再也没有见到了。

私立泉源小学溯源

唐文迪

据《邛崃县志》记载：“邛崃私立泉源小学建于民国 25 年，为当地留日学生陈鹿昀集资学田百余亩所办，初、高小同时招生，在县东路颇有名气。”《邛崃县志》记载的私立泉源小学，位于羊安街道永安场泉水桥旁。

为追根溯源，近日，笔者走访了陈鹿昀的小儿子、77 岁高龄的陈德仁老人，此文即根据陈德仁老人讲述和陈鹿昀的大女儿、85 岁高龄的陈俭廉老人撰写的回忆其父亲创办私立泉源小学的文稿，记录整理成文。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 1935 年），陈鹿昀从日本留学回乡，即开始筹划办学事宜。经过实地调查，最终选址于泉水桥旁边一座清幽恬静的古庙。陈鹿昀将祖上遗留的田地变卖了几十亩，又动员亲朋好友捐资，并招来能工巧匠，大兴土木，于次年建成了一所乡村完小，取名泉源小学。为方便学生上学，陈鹿昀还安排民工，在学校大门口至川藏公路之间，专门修了一段五百余米长的碎石路，取名儿童路。道路两边遍植绿化树木，微风拂过，绿意盎然。这条路至今尚存。

泉源小学占地约 25 亩，校门呈八字形，中西合璧，正上方镌刻着醒目的校名。校门背面相同位置为校训：礼义廉耻。从校门往里走，有一甬道，两旁有繁茂的木槿花。左边为渔塘、菜蔬地，右边为大操坝，坝中有一升旗台，右角还有一个八角凉亭。沿校门中轴线甬



1945年，泉源小学创办人陈鹿昀的妻子（右一），以及都在该校读书的几个子女。
(陈德仁提供)

道再往里走，系一红漆双扇大门，大门内是一排西式洋房，左右为教室和校务办公室，办公室挂有孙中山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再往前走是花园，里面遍栽桃木李果和种类繁多的四季花卉，其中有两颗桂花树，花开时节，十里飘香。还有一棵桢楠树，至今树龄达150年之久，已被邛崃相关部门列为挂牌保护古树。花园两边还建有图书室、乒乓室、音乐室、办公室、寝室等。继续往里走是学校大礼堂，礼堂左侧有一口老井，没有人知道老井建于何年。井水水质清澈，入口甘甜，不仅保证了学校数百师生的生活用水，更见证了学校的成长。

学校建成后，陈鹿昀自任校长。后又得到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回龙镇人刘启德相助，两人共同管理学校。学校提供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完备课程的学习，在各地招募教师，开设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音乐、美术等课程。陈鹿昀的妻子也在学校教音乐课。学校广招周边的适龄儿童入学，陈鹿昀的六个子女，也先后入泉源小学读书，最小的陈德仁入学时仅四岁多一点。此外，陈鹿昀及学校教师的许多亲戚家的子女，也在这里读书。



1952年，已改为泉水小学的部分教职员合影。（张忠提供）

不仅如此，一直抱着教育救国理想的陈鹿昀，遵循有教无类的古训，对贫苦百姓子女上学的费用加以减免。对于来自赤贫户的学生，学校不仅让其免费读书，还免费提供吃住。对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学校更是不吝奖励，鼓励其德智体全面发展。当时，学校还组建了童子军，统一服装，服装上面有肩章领章，头戴船形帽，手持圆木棍，在校门口执勤站岗。同时，学校还提倡礼仪教育，讲究尊师重道，要求学生上学和放学回家要向父母行九十度的鞠躬礼。童子军则行军礼，右手三指抬手致右耳旁，三指象征三民主义。

每周一早上，学校举行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师生齐唱《三民主义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还操练跑警报课目，在“预行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号令中，学生在草丛里、大树下作隐蔽演练……每逢周六下午，学校要举行文艺汇演，活动背景幕布上，蓝底白字书着“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泉源小学创办于抗日烽火期间，当时学校招聘的教师中，有不少是从大城市来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学校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学校组织师生演唱抗日歌曲《延水谣》，公演秧歌剧《兄妹开荒》，特

别是学校组织师生自编自演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以“九一八”东北沦陷，中国人民受到日本侵略者凌辱为素材，激发民众的民族气概和爱国热情，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师生们走遍了附近的乡村和场镇进行活报剧演出，宣传抗日救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泉源小学积极开展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当局某些人的反感。一日，县上派公差来泉源小学调查，提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可能是学生的回答不一致，引起了来人的不满。不久，学校的一位教书先生被县上来人抓了，被押送到邛崃县城。陈鹿昀焦急万分，先是以学校名义出面担保，未果；又联系邛崃教育部门的一名学督参与保释，仍未成功。几经周折后，因案情重大，这名教书先生被押解到省城成都。押送途经泉水时，这名教书先生提出要面见陈校长一面，作告别之意。陈鹿昀不顾个人安危，出面以礼相待，嘱咐其“要保重身体，好自为之”。

1949年12月，邛崃解放。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广泛展开。陈鹿昀家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泉源小学始改为泉水小学。1951年4月，陈鹿昀在家中悬梁自尽，时年50岁。多年后，当地仍有一些老人评价说，陈鹿昀为两个儿子取名为德公和德仁，四个女儿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廉字，足可见其胸怀公仁廉洁之心。他虽然是中国早期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身上却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创办私立泉源小学乃教育救国，造福乡梓，算得上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乡绅。

铁夫韩永信

王文才

—

韩永信（1885年—1934年），临邛夹门关庆元桥南岸烟市街人。习气功，善用铁棒，一身“棒打不死，刀砍不入”功夫，人称“韩铁夫”；精技击，杭州、上海、河南……打金章夺冠，名噪武林；其体型、体格、武功、武德如燕青，“身高六尺以上，嘴边三缕长须，十分健壮”，开茶社，设医庐，诸行百艺，无有不精，人送雅号“小燕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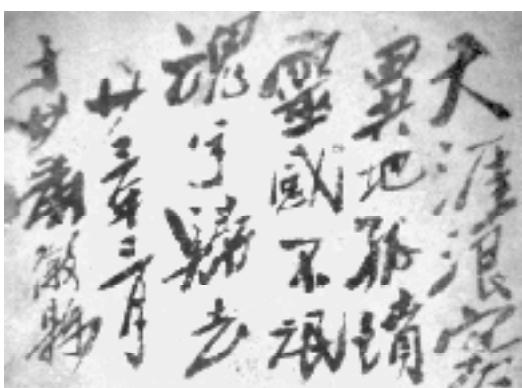
永信的出生地，是远近闻名的“武林之乡”。东有拴马青冈林，武生郑元亨、郑元钦，武状元郑常和（御赐名郑安国），在为朝廷大开武棚子训练武术人才，邛州、雅州、新街子、五家口、洪雅……四面八方的学子，都来门下习武；南有熊营丙墙下，武状元熊韬（人称“熊飞刀”），及熊氏武功才女“八姑娘”，在道子坪培训刀棍、拳法；西有麻柳树，北有草池坝，石达开将领李瞎子和李道子，隐姓埋名大量训练武士，盼望东山再起，洗刷大渡河战败之耻辱。夹门关“武林之乡”的声誉，是“懒虫子（蝉）的屁儿——昂登”。

习武、开武棚子的人家，都有专治跌打损伤的祖传秘方，不少人还开着药铺，方便自己人，也方便他人；多崇尚武德，习武之前必先

学会做人；好打抱不平，凡事都先礼后兵。大凡能用“礼”解决的问题，绝不动“兵”。社会上风行打金章民俗活动，每年成都青羊宫花会期间，都要举办“国术擂台赛”，名扬全国。从小生活在这氛围里的韩永信，耳濡目染，浸饱了尚武好斗、锄强扶弱、昂首挺胸、不怕天王老子、好打抱不平的特质，什么东西都喜欢去尝试、去模仿，养成了我行我素的“乐天”性格。

二

永信父亲韩申之，母亲（英国人，英国福音传教士、西医医生），长兄韩兴元及侄子等，全家三十余人受福音教洗礼。永信与妻子高星华，生有三个女儿，无男丁。尊父韩申之安排，将胞兄韩兴元 12 岁的儿子韩连辉，过继名下，承家业，延香火。韩家在夹门关烟市上开有“乐天茶铺”，由继子韩连辉担任管事。茶铺前是繁华的水码头，远来近到的人们，有事无事都喜欢去喝茶、冲壳子、摆龙门阵、听马路消息；乡人有了矛盾纠纷，都喜欢去里面摆前因后果，说来龙去脉，让茶客们“称理”。人们都称乐天茶铺为“乐天称理铺”。



韩永信之墓照片背后的题字。

1917 年，韩家在邛州县城南街开了“乐天医庐”。乐天医庐，人称“济平医社”。永信外出游学时，交由妻子高星华及女儿打理。乐天医庐医术前卫，求医者众。除用黄汞、海碘酒、石炭酸等药物治头癣外，还能医治外伤诸病。1927 年，济平医社开创了枪伤包扎、扩创缝合、脓肿切开、引流等外科手术。这在邛州，乃至周边县城，直到后

来十多年的时间里，其医术都无人超越。

三

永信习武很是认真、吃苦，常和师兄弟们在榨油房里练功。一次，他在榨油房里练气功，还没有鼓足气，四个师兄弟就把榨油撞杆扯圆了，对准他的肚皮大喊一声：“韩师，来了！”榨油撞杆由一根整木做成，好几百斤重，加上撞杆头铁箍、铁砧，四个师兄弟卯着劲猛戳过来，起码是千斤以上的力量。

永信慌忙之中，立即鼓了半口气，用肚皮顶住了猛戳过来的撞杆。感觉一股热流从喉咙涌到了口头，他仰脖、闭嘴吞下这股热流。随即，又对师兄弟们说：“重新来！”四个师兄弟又拉起撞杆……他继续练功。回家喝了几口药酒后，没事！如此反复，永信练就了一身“棒打不死，刀砍不入”的功夫。

永信力求精益求精，与时俱进。喜欢游学，博采各家之长，补自己之短。他外形俊俏，姿质风流，武艺高强，身手敏捷，聪明伶俐，



夹门关庆元桥南岸烟市街是韩永信的出生地。

谈吐优雅……两个轿夫吭哧吭哧地抬着滑杆去邛州，永信抱着一根粗粗的铁棒，躺在闪闪悠悠的滑杆上，哼着咿咿呀呀的曲子，不觉间就走过了王店、道佐、平落，踏上了九里三坝的青石板路。当晚下过雨，次日艳阳高照。九鼎山、夹金山、西岭雪山远景十分通透，村庄、田畴、花草、树木等近物，显得格外清新，抬滑杆人的心情也十分舒畅。

走完九里三坝，刚拐进山坳不久，路边草丛中便嗖嗖嗖地窜出一伙拿着刀斧棍棒的强人。这伙强人有六七个。到邛州的这条青石板路，虽被称着大路，其实也不过一米多宽。六七个彪形大汉齐刷刷地拦在路中间，看上去却是黑压压一片。没见过世面的人陡然看到这阵势，浑身的筋都会吓缩。一个头人模样的强人挥着手中的棍棒大声说：“贵人知道该怎么做吧？”

轿夫吓得浑身发抖，顿时迈不开步子。永信没等轿夫放下滑杆，就一个鹞子翻身跳下来，将手里的铁棍“哐”地一声往路中间一杵。霎时间，强人仿佛感到耳鸣，地也在颤抖。看见厚厚的一块石墩，在铁杵下咔咔咔地发出声响，霎时活啦啦地就裂成了几瓣。永信对强人摇晃着铁棒说：“认得这是什么，认得就让开！”强人见状，吓得脸色铁青，自知来者惹不起，便纷纷逃去。

四

永信在游学过程中，曾参加各地的“打金章”活动。一次他受县长任和平引荐，从重庆坐船出川游学。在少林寺结识了少林寺保卫团团总恒林和尚。恒林俗姓宋，59岁因积劳成疾去世后，其弟子妙兴接任了登封县僧会司及少林寺保卫团团总的职务。妙兴，字豪文，俗姓金，自幼学拳习武，技艺超群，绰号“金罗汉”。妙兴37岁阵亡，遗体由弟子永信运回少林寺后，葬于寺东北山坡上。

1928年，王佩渠的镖手在郑州市设擂。镖手在擂台上口出狂言，藐视天下武士。永信不平，报名登擂，和镖手角斗时间长达三个小

时，最后击败镖手，扬名武林。之后，永信被雇为冯玉祥将军的保镖。

1934年2月，永信被推荐为四川武林代表，参加开封武馆举办的擂台赛。第一场，对方派了一个高徒，刚几个回合，永信就把这高徒打下了擂台。第二场，对方上来的是大徒弟，没有几个来回，也被永信打下了擂台。擂主感到太没有面子了，就亲自上场。尽管擂主气急败坏地使出浑身解数，最终也被永信击倒。

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呐喊声和尖叫声！擂主感觉丢尽了脸面，竟被一个四川人占了上风。耿耿于怀的他看着人们逐渐散去，心中涌起了坏水的波浪。永信收拾好行装，正准备起身，感觉背上被人拍了一巴掌，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在身体里升腾。久经沙场的永信，一下就意识到自己遭人暗算，中了铁沙掌。猛地回头怒视，那人正是擂主。

擂主奸笑着说：“四川果然有名人！不过，韩兄，七天之内你必须来找我！”说完后，便带着一伙人扬长而去！永信知道，擂主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七天之内不去找他拿药吃，就非死不可！要想不死，就得找他“留下面子”，输一场比赛……

永信听后，义愤填膺地说道：“大丈夫，死则死尔！”毅然决然地带着随行人员离开了武馆。

不到七天，永信内伤发作，去世在洛阳寓所。随行人员悲痛不已，将他葬后，让郑循武带回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叫永信继子韩连辉去河南，取回继父韩永信的行李及物品。韩连辉走到成都，当时秦岭不通车，需三个月才能到达。感觉路途遥远，便放弃了去河南的打算。

郑循武带回的是一张坟墓的照片，正面旁边写着：“人生到此，逝者如斯。挚友韩君铁夫异地之归宿，民国二十三年二月二日。”背面写着：“天涯浪客，异地孤坟。灵感不泯，魂兮归去！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于甘肃徽县。”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